

陈璞平 / 著



陈独秀之死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示陈独秀“莫斯科学”反省，他拒绝道：“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请教外国人，苏联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我不去给他们当反面教员。要反省，我在中国反省，绝不去莫斯科！”蒋介石请陈独秀担任劳动部长并重建一个新共产党，陈独秀一口回绝：“不可，不可，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让我与老蒋划伍，我是宁死不从的。”中共中央要求陈独秀“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他却答非所问地道：“中国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在与中共合作不成的情况下，陈独秀公开宣布自己“不隶属任何党派”，决心寻求“不拥国，不阿共，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的第三条路线。“托匪汉奸”案使得陈独秀声誉大损，寄予厚望的“独树一帜”政治活动也付诸东流，无奈之中，他不得不离汉入川，隐居小城，苟度余生。陈独秀是一个有独立见解的人，但他过于迷信自己的“独立思考”，听不进不同意见，尤其是晚年更加固执，没有将自己融入火热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中，而是闭门造车，政治上不断遭到打击，思想上找不到知音，生存环境每况愈下……他一生中握笔的最后一个字是“抛”，他抛弃了这个世界，最终也被这个世界所抛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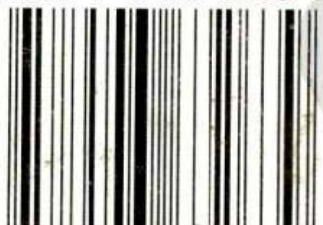
青 岛 出 版 社



陳獨秀 革命
CHENDUXIU ZHISI

一 / 段 / 历 / 史 / 的 / 拂 / 尘 / 与 / 反 / 思 ·····

ISBN 7-5436-3263-2



9 787543 632639 >

ISBN 7-5436-3263-2

定价：28.00 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独秀之死/陈璞平著. —青岛:青岛出版社

ISBN 7-5436-3263-2

I. 陈... II. 陈... III. 陈独秀—人物研究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年第133277号

书 名 陈独秀之死

作 者 陈璞平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青岛市徐州路77号,26607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5814611—8664 传真 (0532)5814750

责任编辑 李忠东

装帧设计 刘 咏

内文设计 青岛正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16开(640mm×960mm)

印 张 23.5

插 页 2

字 数 400千

印 数 1~10000

书 号 ISBN 7-5436-3263-2

定 价 28.00元

盗版举报电话 (0532)5814926

(青岛版图书售出后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承印公司调换。

地址:胶南市珠山路120号 电话:0532-8183519 邮编:266400)

建议陈列类别:人物传记



作者陈璞平,男,1961年12月生,山东省禹城市人,中共党员,副教授,研究生学历,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十佳理论工作者,山东省优秀中青年知识分子。现任中共德州市委副书记,兼任德州市历史学会会长。长期从事理论宣传工作,出版有《能力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论纲》、《从陈独秀到毛泽东》等多部理论和文学专著。业余时间从事文学创作,著有《圆梦》、《迷航》、《陈独秀之死》、《我母亲的红色之恋》。荣获两届山东省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事迹被收录于《当代中国中青年学者辞典》、《中国当代历史学学者辞典》等。

序

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 高挺先

我之所以欣然同意为璞平同志的《陈独秀之死》提笔做序，是因为他曾经在宣传战线辛勤工作了17年。作为一名早已远离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党政干部，竟然能忙里偷闲写出这部作品，其锲而不舍的好学精神不能不令人惊讶和钦佩。

璞平同志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理论宣传教育工作，曾荣获“山东省十佳理论工作者”和“山东省优秀中青年知识分子”称号。他在工作之余，写出了不少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其中《迷航》一书荣获第六届山东省精神文明“精品工程”奖，现在又推出了这部反映陈独秀晚年生活的历史传记作品——《陈独秀之死》，可谓硕果颇丰。

陈独秀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位著名人物。璞平同志立足翔实的史料，将文学的激情浪漫和史学的冷静严谨做到有机结合，以陈独秀的晚年历史为基点和归宿，不断回首他的早年政治生涯，密切联系时局形势，结合其本人性格特点，作透彻的分析、阐述和探索，以娴熟的表达手法，游刃有余地诠释了陈独秀晚年鲜为人知的历史、特别是陈独秀在政治上一步步走向死亡的必然命运，观点独具匠心却又入情入理，令人耳目一新，可谓是一部成功地记述陈独秀晚年历史

的著作。这部著作警示我们：一个人不论曾经有过多少辉煌、多少光环和荣耀，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不能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就必然会掉队落伍，终将为历史所无情地淘汰和抛弃。我想，这也正是这部著作的真正魅力、震撼力和价值所在。

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是一个逼迫着我们不断学习的学习的时代。“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我们停止学习，必然被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所淘汰。读书是一个学习过程，著书也是一个学习过程，著史书是一个更为艰辛的学习过程，它需要科学严谨的态度、锲而不舍的钻劲、不断求索的精神。当然，我们不是要求所有的人都去著书立说，而是倡导在全社会形成一个无人不学、无时不学、全民都学、终身在学的好学之风。党的十六大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任务，这就要求我们把学习的任务摆到第一位，璞平同志无疑较好地实践了这一点。



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今安庆)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历任中共第一至五届中央最高领导人,先后称书记、委员长、总书记。

你见过蝗虫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底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因为过去底人连足迹也不曾留下，只有这桥留下了永远纪念底价值。

此骨非饥寒所困，一身为人类之桥。

—— 陳獨秀

目

录

序 高挺先

第一章 (1)

面对“悔过”才能出狱的条件,陈独秀坚决地说:“我宁愿炸死在监狱中,实在无过可悔!想让我低头认罪,简直是白天做梦、痴心妄想!我要无条件出狱!”

第二章 (17)

蒋介石请陈独秀担任劳动部长并再建一个新共产党,陈独秀一口回绝:“不可,不可,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让我与老蒋为伍,我是宁死不从的。”

第三章 (30)

陈独秀重返武汉,故地重游,不免感慨万千。此时他已今非昔比,从当年八面威风的一党之首变成了默默无闻的一介难民。

第四章 (41)

中共中央要求陈独秀“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他却答非所问地道:“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

第五章 (52)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示陈独秀



到莫斯科学习反省,他拒绝道:“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去请教外国人,苏联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我不去给他们当反面教员。要反省,我在中国反省,绝不去莫斯科!”

第六章 (67)

面对白色恐怖和“革命低潮”,陈独秀得出了革命应该全面退却的结论;毛泽东则从中看到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第七章 (93)

党的六大后,陈独秀一度信守着“如果六大成绩不错,对共产国际和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的诺言。然而,江苏省委“独立事件”的发生,再一次使他陷入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第八章 (112)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提出“武装保卫苏联”,陈独秀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三次致函中央,陈述不同意见,由此引发了一场他与党中央之间的重大争论,史称“三封信”问题。

第九章 (128)

1929年春夏之交,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完成了向托派的转变,中共中央在反复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将他开除出党。

第十章 (151)

在与中共合作不成的情况下,陈独秀公开宣布自己“不隶属任何党派”,决心寻求“不拥国,不阿共,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的第三条路线。

第十一章 (170)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将全部精力投



入到“反对派”的事业中去。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他费尽心机,最终促成了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

第十二章 (186)

陈独秀三面出击,既严厉批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现行政策,又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同时拿出相当精力协调解决托派内部矛盾,表现出十足的“反对派”风格。

第十三章 (213)

陈独秀在法庭上以三军不可夺志的气魄,高举自由、独立、解放的大旗,自撰辩诉痛斥国民党政府卖国腐败和专制独裁,义正辞严,脍炙人口,字里行间闪烁着五四精神的光芒,一时为进步青年所争相传诵。

第十四章 (230)

陈独秀把囚室当研究室,潜心著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但由于他拿出相当的精力协调狱外的托派组织活动,这使他最终没能实现最初拟定的写作计划。

第十五章 (252)

正当陈独秀将全部精力和热情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王明却无中生有地挑起了轰动一时的陈独秀“托匪汉奸”案,最终导致他与中共关系彻底破裂。

第十六章 (271)

“托匪汉奸”案使得陈独秀声誉大损,寄予厚望的“独树一帜”政治活动也付诸东流,无奈之中,他不得不离汉入川,隐居小城,苟度余生。

第十七章 (291)

在经历了穷困潦倒、世态炎凉、丧母

失友等一系列打击之后,倔犟的陈独秀为了维护仅存的一点尊严和人格,躲进深山僻壤。唯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情深意重的潘兰珍始终与他患难与共、相互支撑。

第十八章 (311)

亲友的相继去世和文稿印章的被窃,使陈独秀已是千疮百孔的心灵又遭重创,身体每况愈下,思想也日趋固执消沉。贫苦之中,他再次拒绝了蒋介石的诱惑利用和中共的善意援助,以此来保持自己最后的一丝尊严。

第十九章 (325)

陈独秀是一个有独立见解的人,但他过于迷信自己的“独立思考”,听不进不同意见,尤其是晚年更加固执,没有将自己融入火热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中,而是闭门造车,思考出所谓“最后的政治意见”,最终为那些曾经是他的支持者、拥护者所抛弃。

第二十章 (343)

陈独秀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政治上不断遭到打击,思想上找不到知音,几乎到了无人理睬、被人抛弃的地步,而周围的亲朋好友一个个“先我而死”,这使他的心灵刻上了难以拂去的“无数伤痕”。

第二十一章 (356)

陈独秀一生中握笔的最后一个字是“抛”,他抛弃了这个世界,最终也被这个世界所抛弃。友人叹道:“仲甫一生轰轰烈烈,虽然毁誉难凭,大道莫容,但其是非功过现在恐难结论,论定尚需十世后。”

后 记 (365)

第

一

章

面对“悔过”才能出狱的条件，陈独秀坚决地说：“我宁愿炸死在监狱中，实在无过可悔！想让我低头认罪，简直是白天做梦、痴心妄想！我要无条件出狱！”

公元1937年8月23日，秋高气爽，天空晴朗，六朝古都南京城在连日遭到日军飞机狂轰滥炸之后，出现了少有的宁静。

位于总统府附近的江苏省第一监狱始建于清末，规模并不大，占地只有两亩左右，因靠近老虎桥，故又被人们称为“老虎桥监狱”，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改为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地方。这里一年到头铁门紧闭，戒备森严，向来少有人光顾，今天却不知为何突然热闹起来。一大早，监狱门口就挤满了新闻记者，他们脖子上挂着照相机，手里拿着采访本，时而窃窃私语，时而左顾右盼，似乎在等待着什么重要人物的出现。



临近中午时分，狱门被打开，里面先是跑出4个全副武装的警察，接着走出一位先生，有5旬左右的年纪，身穿长袍马褂，头戴黑色礼帽，举止优雅，气度不凡。他姓陈名独秀，字仲甫，安徽省安庆市人，曾经是新文化运动的统帅、五四运动的领袖、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此时，他在众多亲朋好友的簇拥下，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出监狱大门。

守候多时的新闻记者们立刻将他围个水泄不通，抢着拍照、采访：

“请问陈先生，你今天获得自由，将来有何打算？”

“陈先生对政府的明令减刑有何感想？”

“听说蒋总统有意邀请先生到政府任职,是否有此事?”

“陈先生对目前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有何评价?”

.....

陈独秀是5年前在上海因叛徒告密而突然被捕的。

在此之前,他虽然在大革命失败后已经被共产国际毫不留情地撤销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接着又受到开除出党的严厉处分,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首领,但是在蒋介石看来,无论是共产党的左派“反对派”也好,还是“赞成派”也罢,都是中共内部的派系之争,陈独秀的身份、地位无论怎么变化,仍然是“危害民国”的“赤党”头目,绝无“姑息养奸”之可能。因此,当蒋介石得知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后,欣喜若狂,立刻命令连夜将陈独秀用专列秘密押解南京,经过一番闹剧般的公开审判之后,最终以“危害国民罪”判处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后减刑为8年。从此,陈独秀被打入大牢,开始了漫长的铁窗生活。



对于这次突然提前减刑释放,陈独秀是始料不及的。他与蒋介石以往打交道甚多,实在是太了解老蒋的为人了。蒋介石向来心狠手辣,与共产党水火不容。早在10年前,他的两个儿子、著名的共产党人陈延年、陈乔年就是惨死于老蒋之手,而自己则是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通缉的头号共产党要犯,如今虎落平川,龙陷浅滩,老蒋岂能轻易放过他?因此,从被捕之日起,陈独秀便将生死置之度外。在押赴南京的火车上,他从容不迫,酣睡达旦。判刑之后,他更是从未幻想过有出头之日,以至当国民党政府突然在一夜之间为他办完了出狱手续,他走出阴森森的监狱大门,沐浴着灿烂的阳光,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再次获得人身自由的时候,竟然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但有一点陈独秀是清楚的。那就是:如果不是今年入夏以来国内形势发生骤变,蒋介石是绝不会发此善心的。

二

1937年的夏天是不寻常的。

7月7日深夜,驻扎北平市宛平县附近的日本军队借口一名士兵失



踪,突然炮轰宛平城和卢沟桥,开始向华北地区大举进攻。中国守军第29军219团在旅长何基沣的率领下当即奋起抵抗。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7月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率先向全国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①

接着,毛泽东、朱德等7位中共领导人联名给蒋介石发来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芦〔卢〕沟桥,实施其武装攫取华北之既定步骤,闻讯之下,悲愤莫名!平津为华北重镇,万不容再有疏失。敬恳严令廿九军,奋勇抵抗,并本三中全会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迫切陈词,不胜屏营待命。”^②

7月9日,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将领又率全体红军打电报给蒋介石,表示“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驱,与日寇决一死战”。^③

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共产党人以虚怀若谷的博大胸襟,不计前嫌,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和平倡议。

实际上,第二次国共合作谈判自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就拉开了序幕。这期间,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频繁穿梭于延安、庐山、杭州、南京和西安之间,力促国共两党实现一致对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而,蒋介石当时并未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在谈判中不断节外生枝,致使和谈一直没有取得重大进展。

卢沟桥事变的发生,无形中对国共谈判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7月17日,蒋介石终于以“最后关头”为题,在庐山第一次公开发表了措辞强硬的谈话,向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宣布“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④

7月28日深夜,日军开始向我平、津两市大举进犯,29军虽英勇抵抗,终因备战不足导致失利。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在战场



^{①②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4~275、278、279~281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④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省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编印,第1064页。



中国守军第29军在卢沟桥奋起抗战。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指出“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不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上壮烈殉国。至31日,北平、天津相继失陷。

平、津失守后,举国上下一片哗然,蒋介石不得不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为其长期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进行辩解:“……这几年来的忍耐,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我们为的是什么?实在为的是安定内部,完成统一,充实国力,到‘最后关头’来抗战雪耻。现在,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那就必须不惜牺牲来和倭寇死拼。我们大家都是许身革命黄帝子孙,只有齐心努力杀贼,驱逐万恶的倭寇。”

蒋介石虽然认为抗日已到“最后关头”,但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上仍是迟迟下不了最后决心。他一方面电邀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到庐山商谈合作事宜,一方面又将中共代表提交的和谈议案束之高阁,一拖再拖,不做具体解决。

8月13日,日军调集20万兵力,发动了对上海的大规模进攻,并扬言3个月即可灭亡中国。由于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地区和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皆在上海,蒋介石这才不得不下定最后抗战之决心,在国共谈判中也开始由消极应付改为主动合作。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全面阐述了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在此之前,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同国民党经过反复谈判,终于就红军改编问题达成协议。

8月22日,蒋介石正式发布命令,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委任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全军共3万多人,主要任务是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红军改编后,即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10月2日,国共两党谈判又达成协议,将原在南方坚持革命游击战争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以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随后,新四军在大江南北展开了神出鬼没的敌后游击战争。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了。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周恩来在谈判中反复提到的“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也很快得以解决。毫无疑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客观上促成了国民党当局提前释放陈独秀。



三

8月15日这天夜里,石头城里异常安静,天刮起徐徐凉风,饱受夏日炎热的人们颇感凉爽惬意,许多人家早早关灯就寝,整个城里几乎没有一点声音,像是一座死城。

此时此刻,陈独秀正就着昏暗的小油灯在伏案写作。淞沪战争爆发后,日军飞机开始频繁空袭南京。老虎桥监狱靠近蒋介石总统府,无形中也成了日机轰炸的目标。尽管监狱侥幸躲过数次空袭,但从此晚上再不准使用电灯,这给陈独秀的写作带来了极大不便。

陈独秀近来受《宇宙风》杂志主编陶元德先生之约,正在赶写自传。他本意是不愿写自传的,可众多朋友一再劝他将过去的经历写出来。

替陶元德先生来当说客的是原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汪原放。汪原放与陈独秀的关系非同一般。他的父亲汪希颜是陈独秀早年的反清战友,可惜英年早逝。他的叔叔亚东图书馆经理汪孟邹更是与陈独秀有几十年的交情。然而,就是这样的关系,最初也被陈独秀婉言谢绝了。他对汪原放说:“我根本没有写文章的兴趣和欲望,尤其没有写文学性文章的激情。自传要有观点,弄得不好,又碍党禁,惹出麻烦。我现在毕竟还是狱中之人。”

可是陶元德锲而不舍,几年来始终不放弃,不断催汪原放向他约稿。直到西安事变之后,国共开始恢复谈判,陈独秀的心情也随之开朗了许多,便勉强答应下来。他对汪原放解释道:“我之所以迟迟不写,并不是因为避免什么虚荣。现在开始写一点,也不因为什么虚荣。休谟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文字生涯中,我的一生差不多是消耗在政治生涯中。至于我大部分政治生涯之失败,也并不是为虚荣的对象。既然非让我写不可,就只打算照休谟的话‘力求简短’,只略略写出幼年时代印象较深的几件事而已。”

1937年8月,《宇宙风》杂志第50期冲破国民党的禁忌,隆重推出传记文学《实庵自传》的前两章。然而,陈独秀所用的“实庵”笔名实在不如真名来得惊天动地,于是聪明的编辑随后巧妙地做了注脚:“陈独秀先生除为本刊写自传(第50期起)刊登外,还俯允经常撰文,可望每期都有。陈先生是文化导师,文坛名宿,搁笔久矣,现蒙为本刊撰文,实不特本刊之本也。”



这一说明实际上等于变相地告诉读者，作者“实庵”便是当年大名鼎鼎的新文化运动统帅、中共早期领袖陈独秀。于是，自传一经登出，立刻轰动文坛，大受欢迎，不少报刊争相评论，称之为“传记文学之瑰宝”，陈独秀也就只好身不由己地接着写下去了。

半夜时分，万籁俱静。陈独秀突然觉得远处传来“嗡嗡”的声响，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颗重磅炸弹落在囚院外爆炸了。霎时“轰”的一声巨响，眼前从黑暗中冒出一片火海，房子猛烈震动起来。向外跑已来不及，说时迟，那时快，陈独秀连滚带爬，钻到书桌底下。紧接着屋顶便塌了下来，玻璃窗“哗哗”成了碎片，书桌顿时被埋在砖瓦泥土之中……

四

第二天一早，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主任陈钟凡便急匆匆来到监狱探望陈独秀。

陈钟凡是江苏建湖人，字觉元，生于1888年，早年曾加入光复会，后来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与张国焘、段锡朋、邓中夏、许德珩等北大同学创办《国民杂志》，鼓吹进步思想，深得陈独秀喜爱和信任。陈独秀被捕判刑后，陈钟凡时常到监狱探望老师。七七事变发生后，他马上与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联名向南京政府递交保释书，为营救陈独秀出狱四处奔波。昨夜日机空袭之后，他心中惦念老师安危，一夜未眠，天不亮便向监狱赶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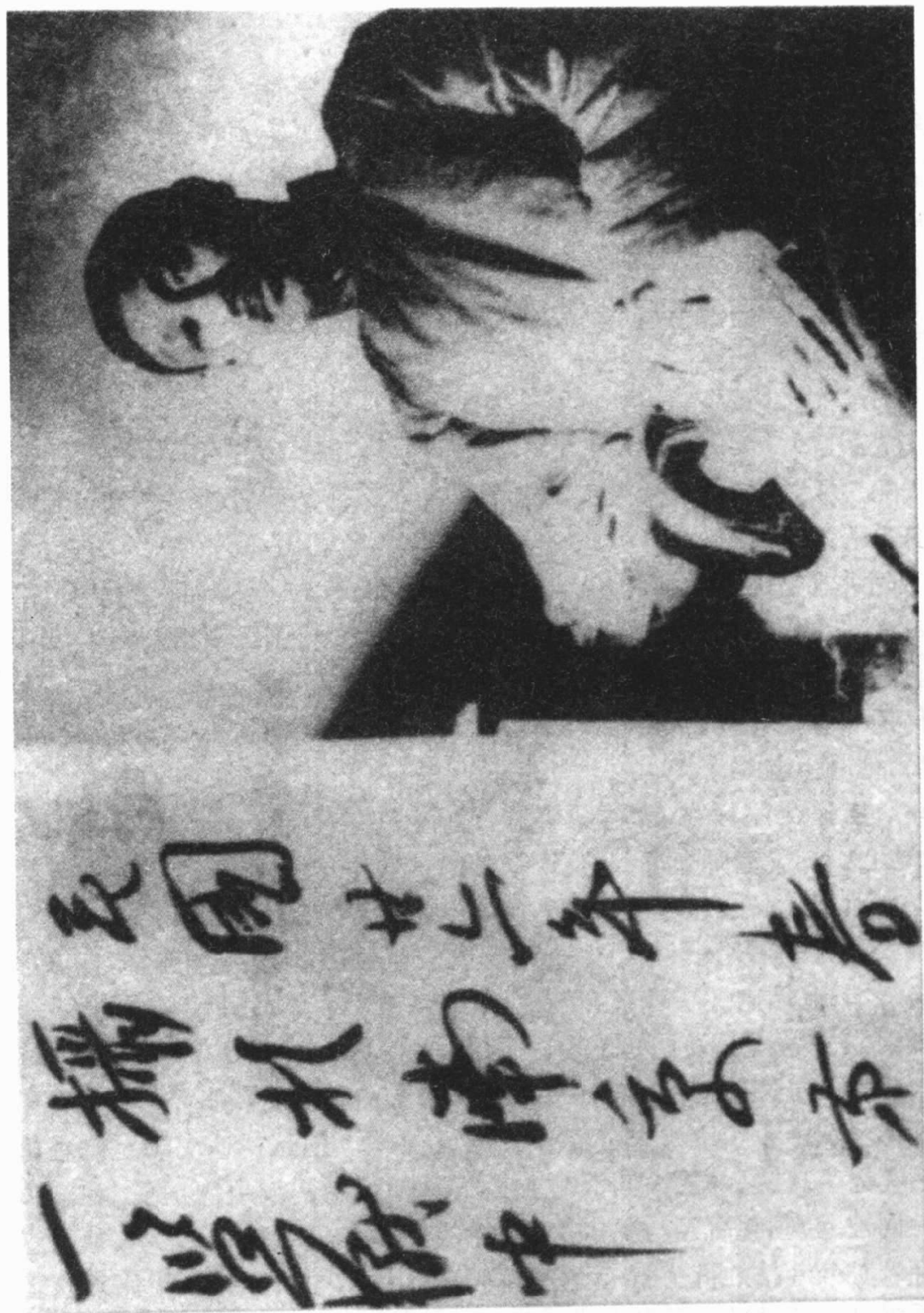
一路上，到处浓烟滚滚，一片废墟，血肉模糊，惨不忍睹。陈钟凡见此惨状，不住摇头叹息。当他来到老虎桥监狱门前，见这里比往日更加戒备森严，高墙内还在冒着烟火，便知是遭了轰炸，只是不知陈独秀生死如何，心中一急，额上便冒出了一层汗来。

陈钟凡办完探监手续，走进囚禁陈独秀的独院，看见一位年轻女子和两位小伙子正在废墟中扒着书籍，忙个不停。他认得这女子是陈独秀的后妻潘兰珍，另外二人叫濮德志、罗世藩，曾是托派组织成员，和陈独秀一同被捕判刑，后经与狱方交涉，专门照顾老头子的生活。陈独秀这时穿着脏兮兮粘的裤头背心，坐在院内树阴底下的藤椅上，正悠然自得地看报纸。陈钟凡一颗悬在半空的心这才放下，便走过去问道：

“仲老，没炸伤吧？听说这里挨了炸弹，我可是一夜未合眼。”

陈独秀见他进来，合上报纸笑道：“死了几个犯人。我的命大，房子





1937年南京獄中的陳獨秀

被炸塌了，我躲到桌下安然无恙。看样子日本飞机也奈何我不得。”

潘兰珍搬来一把椅子，道：“别人都吓煞了，他还有心开玩笑，差点就丢了性命。”

陈钟凡皱着眉道：“这个地方一刻也不能待了！日本人再来空袭，我看就不会这么幸运了。”

陈独秀两手一摊道：“你以为我愿待在这鬼地方？老蒋不放我，我又能去哪里？他巴不得借日本人之手将我炸死在这里呢，这倒显得与他无关。”

陈钟凡沉吟片刻，道：“仲老，前几天我与胡适、张伯苓先生联名上送政府的保释书，昨日已有了回音。”

陈独秀问：“老蒋怎么说？”

“保释可以，但你必须写一份‘悔过书’。”

陈独秀闻言猛地从藤椅上站起，把手中的烟卷狠狠甩在地上，态度坚决地说：“我宁愿炸死在监狱中，实在无过可悔！想让我低头认罪，简直是白天做梦、痴心妄想！”他在院子里转了两圈，又意犹未尽地高声强调：“我陈独秀拒绝人保，附有任何条件，皆非所愿！我要无条件出狱！”^①

陈钟凡与陈独秀交往 20 余年，太了解老学长的脾气与人格了，让他低头认罪，实在是不可能，但还是小心地劝道：“仲老，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您老千万不要太固执，还是先出去再说。听说在押的中共党员也要写了悔过书才能出狱。”

陈独秀把脖子一拧：“他们是他们，我是我，我陈独秀就是这么个犟脾气，违心的事，一件也不做。再说，中共党员写悔过书是奉命行事，到时候组织上顶着。将来若是有人向我身上泼脏水，谁替我担待？我是浑身长满嘴也说不清。不写，坚决不写！”

陈钟凡苦劝半天，也不起作用，只好告辞。

陈钟凡刚走，潘兰珍便忍不住抱怨道：“依这个人也真是死心眼，有人保释不是很好吗？管他什么条件不条件的，早出去一天都好。”

陈独秀摸着山羊胡须，胸有成竹地说：“阿珍，你不用急，形势所迫，老蒋很快就会放我出去的。”

濮德志不相信地问：“总书记，你认为老蒋真的会释放政治犯吗？”

陈独秀冷笑一声：“这次可由不得他。若依他，当然恨不得杀了我们才好，可小日本打过来了，为了收买人心，他总得做一做抗日的样子。”

^① 参见陈钟凡著《陈仲甫先生印象记》。



转眼几天过去了,日本飞机照旧天天来轰炸,政府却没有任何释放政治犯的迹象。小道消息倒是不少,有的说蒋介石已下令悉数释放政治犯;又有的说要把政治犯押解到抗日前线去打仗;更有的传说要对全部政治犯重新进行审判或枪决……不过传说中,也有令人欢欣鼓舞的好消息,有人说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到南京反省院和西安行营看守所看望了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大批红军西路军被俘干部及沈钧儒等救国会“七君子”已于近日释放出狱。濮德志和罗世藩天天为这些传闻的真伪争辩不休,争执不下时,便求陈独秀裁判,可陈独秀从不做评论,只是一笑了之,依旧是埋头看报纸、喝大茶。

自传是不能再写了,自上次敌机轰炸之后,监狱晚上过了8点连油灯也不让点了,生怕招来日本飞机。于是,天一黑陈独秀便蒙头睡大觉。只是急得潘兰珍团团转,整日心神不宁地盼着。

五



8月20日上午,一辆高级轿车突然来到老虎桥监狱门口。一位戴着眼镜、留着短须、梳着背头的男子走进陈独秀囚住的小院。

陈独秀一见来人,大喜过望,抢过去,握住他的手喊道:“适之兄,你终于还是来了,我还以为这辈子与你再无相见之日。”

来人姓胡名适,字适之,是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此刻,他脸上带着微笑,幽默地道:“仲甫兄说哪里话,上次来京,确因公务繁忙,没有来得及看望老兄。这次再不来拜访,岂不真要和我断交了吗?”

陈独秀听了,面呈内疚之色,连连摇头:“惭愧,惭愧。是我的肚量小了,还望老兄海涵。独秀如有出头之日,一定专门设宴陪罪!”

胡适与陈独秀相交已久。可以说,陈独秀对他有过知遇之恩。

胡适原籍安徽绩溪,1891年生于上海,20岁时赴美留学,先在康乃尔大学学农,后改学文学。1915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早在《新青年》杂志创刊伊始,胡适的旧友汪孟邹便经常将杂志寄给他,而他则频频从美国寄回文稿,并与陈独秀信函交驰、联络频繁,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两人见解相同,虽未见面,但惺惺相惜,神交已久。

蔡元培聘任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时,陈独秀曾极力推荐当时尚在美国学习的胡适,并给他去函道:“孑民先生盼足下早日回国,即





胡 适

不愿任学长,校中哲学、文学教授乏上选,足下来此亦可担任。”此信使胡适下定回国之心。

1917年7月,胡适学成归国,被北京大学聘为教授,同时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在中国平静的文坛上卷起一阵狂澜,迅速成为新文化阵营中锋芒最劲的人物,被陈独秀誉为“今日中国文界雷音”。如果说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帅,胡适则是当之无愧的急先锋。

然而,随着新文化运动向纵深发展,《新青年》开始分化,陈独秀和胡适之间在思想上出现了难以弥合的鸿沟。他们两人虽然都鼓吹新文化、新思想,但陈独秀只讲新文化不讲旧道德,只讲新思想不讲旧伦理;胡适则是既讲新文化又讲旧道德,既讲新思想又讲旧伦理。1963年胡适去世时,蒋介石曾写了一副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可以说一语道出了新文化运动两位巨子的同中之异和异中之同,这也是陈胡二人两种文化人格的区别所在。

五四运动后,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期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对陈独秀转而信仰马克思主义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对此,陈独秀针锋相对,发表《论政治》一文,全面宣传马克思主义,公开与胡适决裂。两个昔日的“亲密战友”不仅在报刊上鏖战不休,而且见了面也是争个没完。1925年冬,胡适来上海治痔疮,借住亚东图书馆,时常和陈独秀见面,可是每次见面,总是以两人激烈的争吵而告终。一个讲社会主义好,另一个讲资本主义好;一个讲马克思主义,另一个讲实用主义;一个讲苏联如何如何,另一个讲美国如何如何。彼此互不相让,最终不欢而散。

两人虽然政见不同,但私交尚在。陈独秀一生5次被捕,胡适都极力营救。最后这次被捕判刑后,陈独秀曾多次去信胡适,希望他来看自己。有一次胡适来南京办事,实在没空探望他,只是捎来书信一封,说“此次来京匆匆,不能来省视吾兄,十分失望”。陈独秀一气之下,马上致函汪原放,赌气道:“我知道他在此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已经够忙了。”他愤然表示要与胡适绝交。^①不曾想,到了生死关头,还是胡适向他伸出友谊之手,想到此,心中内疚不已……

胡适见状,忙避开话头道:“仲甫兄,前几天听觉元说你拒绝保释后,我马上致函汪精卫,要他亲自向蒋先生求情,破例开释你。今日接到兆



^① 参见陈独秀致汪原放的信,1933年11月15日,收入《回忆亚东图书馆》。



铭的亲笔复函,兄弟一刻也不敢耽误,便赶来向你报喜。”

陈独秀接过汪精卫致胡适函,只见一手熟悉的毛笔字跃入眼帘:

适之先生惠鉴:

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收复,并转著安。

弟·汪兆铭顿首

八月十九日^①

陈独秀看罢,脸上露出一丝欣慰的笑纹,半晌才说:“适之兄,我每次被捕,你都为我奔走说情,真是患难见真情呀……”

胡适见陈独秀动了真情,也十分感慨:“仲甫兄,你乃旷世奇才,若是埋没于囚牢之中,实在是国之不幸。其实早在20年前,我就劝你不要过多涉猎政治。你若是专心做学问,我敢打赌,定成文学泰斗。”

陈独秀笑道:“彼此,彼此,我也一直认为适之兄做官实在可惜。可是你我都弃文从了政,这也许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所不同的是,我从政数十年,屡屡受挫,失败多于成功,老兄你倒是一帆风顺,飞黄腾达,前途不可限量呀!”

胡适不愿过多争辩这个问题,弄不好双方都会尴尬,于是避开刚才的话题说:“仲甫兄,估计这两日你即可出狱。如果那时小弟尚在京城的话,一定前来接你出狱……”

两位老友又寒暄一番,胡适道还有公务要办,便告辞了。

胡适所说要忙的公务,是马上就要到大洋彼岸担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全权特命大使。他此时没有对老友明说,是因为陈独秀向来反对他从政。他怕看到老友那张失望的脸,若再发起脾气,劈头盖脸数落他一番,弄个自讨没趣,只得悄悄而别。不过,胡适临别之时,还能不计前嫌,上书汪精卫要求开释陈独秀,也算是对得起这位相识几十年恩恩怨怨说不清的老朋友了。

陈独秀不知道胡适要走,更不知道蒋介石在如何释放他的问题上也是左右为难、费尽心机。

1937年夏秋的形势对国民党已是万分紧迫。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疯狂的军事进攻,严重威胁着南京;另一方面,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强烈要



^① 见汪精卫致胡适函,1937年8月19日,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





求释放一切政治犯,特别是释放像陈独秀这样有名望的政治犯。蒋介石开始是想让陈独秀写一纸“悔过书”,给共产党一个下马威。没想到弄巧成拙,倔犟的陈独秀宁可炸死在大牢也不悔过,这反而搞得蒋介石下不了台。在押的共产党员不写“悔过书”,可以要求他们的上级去做工作,可陈独秀的上级是谁呢?他目中无人,唯我独尊,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谁也奈何不了他。正好此时胡适给汪精卫写信,使老蒋给自己找到了无条件释放陈独秀的台阶。他马上下令国民政府“设法开释陈独秀”。于是,先由司法院长居正呈文给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煞有介事地谓陈独秀:“入监以来,已逾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盖深知悔悟,似宜有其既往,藉策将来,拟请钧府依法宣告,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接着,国民党政府下达陈独秀减刑的指令:“兹依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三十八条,宣告将陈独秀原执行之有期徒刑八年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随后,司法院又训令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国民政府将该犯陈独秀原处刑期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现值时局紧迫,仰即转饬先行开释可也。”^①



从“呈文”到“指令”、“训令”以及见报的“明令”,一向以腐败和低效著称的国民党政府,竟奇迹般地在一天之中就完成了,可见当时时局之“紧迫”,也看出蒋介石急于想甩掉陈独秀这个“烫手山芋”的狼狈心情。

于是,一夜之间,陈独秀有了自由身。

六

8月23日,身陷狱中5载的陈独秀终于获得了自由。

上午9时,探监时间一到,潘兰珍和陈松年便走进囚居陈独秀整整5年的小院。一进门,见濮德志、罗世藩已经来到,潘兰珍便赶忙收拾东西;陈松年则扶着父亲在藤椅上坐下,小心地问:“父亲,昨日《中央日报》刊登出您老减刑释放的消息,我已经给安庆发了加急电报,把这个喜讯告诉家里,让祖母高兴和放心。不知您老人家是否准备随我一同回安庆老家?”

陈独秀沉默片刻,道:“这两天我一直在考虑出狱后何去何从的问题。按说我与阿珍回安庆与家人团聚,是为最好,我离家几十年了,也应

^① 有关文件均收入《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



该好好孝敬一下你祖母了。但是,安庆地处长江要塞,是通向武汉及内地的必经之路,南京一旦失守,首当其冲要被日本人占领。听说安徽省府现在已是人心惶惶,正忙于搬迁六安。因此,即使回安庆,也是住不了多久的。其他地方,一时尚无合适去处。近日傅斯年几次邀我居住他的寓所,我看也好,一来可以感谢南京的老朋友这些年对我的关照,二来我的身体也不太好,想在京城请名医检查治疗一些日子。至于日后,再看形势而定。松年,你明日就回安庆,照顾好你祖母,一旦安庆吃紧,好做打算。”

这时,陈独秀在北大任教时的3个得意门生——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主任陈钟凡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三处处长丁默村陆续来到陈独秀房间,顿时室内热情洋溢、笑声朗朗。

说话间,典狱长进来。他走到陈独秀面前,煞有介事地说:“陈先生,奉上级之命,我现在宣读准你出狱的国府令。”他拿出公文,干咳一声,拉着长腔念道:“查陈独秀前因危害国民案件,经最高法院于民国23年6月30日终审判决,处有期徒刑八年,在江苏省第一监狱执行。该犯人狱以来,已逾三载,近以时局严重,爱国情殷,深知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①

典狱长宣读完后,满脸堆着媚笑:“祝贺你,陈先生,从现在开始,你就可以自由地走出监狱大门。”

话音刚落,室内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这时,濮德志、罗世藩实在忍不住,上前拉住陈独秀的手道:“总书记,你出去了,千万要设法营救我们。”

陈独秀见状,想起一同蹲狱5年,两个年轻人对自己无微不至地关照,不觉一阵心酸,道:“德志、世藩,不要难过,你们放心,我陈独秀绝非无情无义之人,出去以后,一定尽快营救你们出狱。”

众人正要离去,丁默村突然说道:“陈先生,陈果夫部长已为你在中央党部招待所安排好了下榻处,外面有车子在等候,请陈先生务必赏光。”

听完此话,陈独秀皱起眉头。丁默村曾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后来叛变革命,投靠陈果夫,当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处长。陈独秀向来厌恶变节之人,更不愿同中统局打交道,于是冷冷地说:“丁先生,请你转告陈果夫先生,说我谢谢他的美意,但中央党部不是我一个山

^① 强重华等:《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第22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野村夫能够住的地方，鄙人已接受傅先生之邀，暂到他府上安身，恕不能从命。”^①

丁默村被弄得十分尴尬，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心里暗骂这老头子不识抬举。

当陈独秀走出监狱大门，面对记者连珠炮式的提问时，他胸中有太多的话想说。他本是一个天生的演讲家，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口若悬河。5年漫长的铁窗生活，寂寞得令人发疯窒息。尤其是《国府明令》上说他“深知悔悟”之类的不实之词，使他火冒三丈、如梗在喉。本来无罪，何来“悔悟”？如若保持沉默，岂不是承认自己有罪！他恨不能立刻向全世界发布他的反驳声明。但是，陈独秀毕竟是久经沙场的政治家，他长期与世隔绝，对外面的世界知之不多、知之不全、知之不透，此时就发表声明批驳《国府明令》，弄不好会适得其反。因此，他只是微笑着向记者们挥动着礼帽致意，始终缄口不言。

潘兰珍、陈松年护着他挤出包围圈，钻进一辆黑色小轿车，随着一阵喇叭声响，飞也似的离开监狱。

汽车开出很远，陈独秀突然扭过头来，隔着玻璃窗，久久地望着这座曾经关押了他1800多个日日夜夜的高墙大院，眼神中流露出无限感慨，似是在作最后的告别。



^①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党史资料》1979年第3、5、8期。

第

二

章

蒋介石请陈独秀担任劳动部长并
开建一个新共产党,陈独秀一口回绝:
“不可,不可,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
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有不共戴
天之仇。让我与老蒋为伍,我是宁死
不从的。”

七

陈独秀出狱之后,夫妇二人便住进了傅斯年家中。^①

傅斯年,字孟真,山东聊城人,早年在北京大学读书,因崇拜陈独秀,主编《新潮》杂志,宣传民主与科学思想,被誉为《新青年》之再现。五四运动时期,被推举为北大学生会主席,一举成为名震南北的学生领袖。傅斯年虽然长得文质彬彬,骨子里却如同陈独秀一般透着狂傲。胡适当年从美国归来,他的课堂一时间听众如云,有人便对傅斯年说,那个胡博士真有学问,你也去听听吧。于是,傅斯年便去听了,不仅听,还询问,一问一答之间,胡适的汗就下来了,从此两人便建立起了亦师亦友的特殊关系。胡适后来说,他当时就发现,傅斯年的国学根底比他还好,所以他常常提心吊胆,激励自己要加倍努力。傅斯年虽然傲气,但在陈独秀面前却恭敬得很。或许是性格相近的缘故,陈独秀在北大时就十分器重这个学生,傅斯年对待这位老师也是几十年如一日,不管是陈独秀得志时还是失意时,他始终不忘尊师之道,保持着亲密的师生友情。傅斯年的妻子俞大彩是俞大维的妹妹,早年



^①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党史资料》1979年第3、5、8期。

毕业于沪江大学,对陈独秀这位学府巨匠自然也是十分尊重。所以这次出狱,傅斯年几次邀他到家中居住,陈独秀便一口答应下来。

陈独秀出狱不几日,收到陈果夫和陈立夫兄弟二人联名的请柬,邀请去赴家宴,说是要为他压惊洗尘叙旧云云。傅斯年也同在被邀之列。

陈独秀接到请柬,感到十分突然。他和二陈虽是旧识,但政见不同,交往并不多。再加上这几年陈独秀做了蒋介石的“阶下囚”,陈氏兄弟却是青云直上,身居高位。陈独秀知道,蒋介石当年曾是陈其美的门人,而陈氏兄弟则是陈其美的亲侄儿。因为这层特殊关系,蒋介石当政后,对他二人格外关照。如今陈果夫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陈立夫担任蒋介石的英文秘书。二陈又是中统特务组织的创始人,一直党权在握,并且根深蒂固,此时社会上已有“蒋家天下陈家党”的说法。提起陈氏兄弟,谁不退让三分!

傅斯年有些担心:“仲老,是不是前几天出狱时你回绝了丁默村,惹恼了陈家兄弟,设了鸿门宴,要算计你?我看就说身体不好,辞掉不去,免得招惹是非。”

陈独秀虽然对请客的用意也是百思不解,但却没这许多顾虑,反倒劝起傅斯年来:“管他想干什么,去了再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老头子刚从监狱里放出来,总不能再把我抓进去吧。若不去,倒显得我小气了。”

这天晚上,陈公馆布置得富丽堂皇、典雅气派,到来的大都是陈独秀当年的旧友和学生,其中有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兼教育部长朱家骅、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暨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周佛海、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长陈公博、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包惠僧,还有北京大学文学学院院长胡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金陵大学文学系主任陈钟凡等。

陈立夫见宾客到齐,便举杯道:“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大家大都是仲甫先生多年的老友、学生和同乡。今天鄙人和家兄略备薄酒,希望诸位开怀畅饮,不醉不休。”

诸位宾客异口同声称好,纷纷举起酒杯,一同与陈独秀碰杯。陈独秀见此情景,心里十分感动,端杯一饮而尽,然而双手抱拳,向诸位一拜道:“谢谢陈先生和诸位对鄙人的盛情款待!谢谢各位多年对鄙人在狱中时的热情关照。鄙人无罪坐牢,吃了5年白饭,还要多谢蒋先生了。”说得诸位笑了起来。

笑声中,陈果夫从座位上站起来,笑声朗朗地说:“诸位,我还要向大



家报告一个好消息。委员长十分赞赏仲甫先生渊博的学识和爱国精神，特委托鄙人请仲甫先生担任国民政府劳动部长一职。”

陈果夫话音未落，全场便响起热烈掌声。

不料，陈独秀站起来，大声说：“陈先生，请你转告鄙人对蒋先生的谢意。只是鄙人一向独往独来惯了，如今年事已高，思想落伍，恐难以胜任。”

陈果夫没想到陈独秀会当场拒绝，十分尴尬，只好道：“当年先生也曾是一党领袖，丰功伟绩，有目共睹。若是先生以为劳动部长一职难以施展报国之志，咱们还可以从长计议……来，来，来，大家先喝酒。”

朱家骅把陈独秀拉到一边，低声道：“鄙人也受委员长委托，想请先生出面再组建一个新的共产党，并供给10万元经费和国民参政会5个名额。中共是你当年一手所创，到头来却被斯大林一脚踢开，这可是你重整旗鼓的大好时机，先生意下如何？”

陈独秀听了，摇头道：“我创建中共至今不悔。现在要我再组建什么新的共产党，岂不是证明我过去的所作所为是错了？再说让我看老蒋的脸色行事，我陈某人绝干不出这种低三下四的事情。”

胡适过来道：“仲甫一向清高傲气得很，为政府做事肯定是不会的。不过，进国防参议会，我看未尝不可，一则现在国难当头，国家正是用人之际，委员长也有此意；二则也可解决仲甫今后的民生大计，何乐而不为？”

陈独秀听了还是摇头：“不可，不可，蒋介石杀了我许多同志，还杀了我两个儿子，我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让我与老蒋为伍，我是宁死不从的。”^①

陈独秀见朱家骅面色难堪，便缓和了一下口气，又说：“不过请你转告蒋先生，值此大敌当前、民族危亡之际，既然国家需要国共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我定以大局为重，抗战期间，绝不反蒋就是了。”

胡适见他态度如此固执，提到延年、乔年之死，闪闪发光的眼睛马上黯淡下来，知道他心中对蒋介石痛恨之极，强拧着叫他和蒋汪共事，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又道：“我看这样，美国有一家图书公司看中了你在狱中写的自传，不如我给你安排一下，到美国去续写自传，这样既可躲避一下国内的环境，又可重操旧业，著书立说。你为政治奔波大半辈子，现在身体又不好，晚年应该过几年安逸生活了。”

陈独秀依旧是摇头：“美国我是不去的！现在国难当头，我应尽自己微薄之力，与大家同甘共苦，共同抗日。再说，我是一个中国人，若是真



^①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党史资料》1979年第3、5、8期。

写自传,在中国也能写,何必跑到美国去。过去一些大军阀官僚垮台后,都跑到国外当寓公,其实这是一件十分可耻的事。我一向反对退隐,此时若是出去了,别人便真的以为这次做牢是犯了什么罪了,倒让我说不清楚了。”

包惠僧见大家话不投机,便岔开话头说:“听说仲老这几年一手狂草练得越发洒脱,什么时候有空,给我也写一幅?”

陈独秀道:“好哇,到时我就给你写一幅岳飞的《满江红》如何?”

陈钟凡见陈独秀虽刚刚出狱,却依旧是铁骨铮铮、不媚权贵的性格,心中感叹万分,不禁诗兴大发,说道:“仲老真是英雄不减当年,不怕各位见笑,我这里即兴赋诗一首,献给仲老。”说罢,沉思片刻,慢腾腾地吟道:“荒芜人海里,刮目几天民?使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人方厌狂士,世岂识清尘?且任鸾凤逝,高翔不可驯。”

陈独秀听了心中技痒,说:“觉元有此雅兴,我也和一首献丑。”略一思索,高声朗诵道:“暮气薄大地,憔悴苦斯民,豺狼骋郊邑,兼之暮尘频。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

“好一个‘龙性岂能驯’,活脱脱是仲老的个性。”傅斯年忍不住拍手叫好。

包惠僧听了也感叹不已,对站在身边的周佛海道:“这就是仲甫的性格,不媚权贵,愈挫愈奋,从不向黑暗和失败低头。”

周佛海却有些不以为然:“物极必反,不媚权贵过了就是恃才自傲、目中无人;愈挫愈奋过了便是不识时务、固执己见。仲老这一辈子在这方面吃亏甚多,可总是不接受教训,蹲了5年大牢,性格非但没有半点改变,反而越发固执。我看他是不到黄河不死心,不见棺材不掉泪呀。”

包惠僧想反驳,可琢磨着这话也不无道理,于是苦笑一声道:“这老头子一根肠子通到底,死不悔改了。”

八

这一晚直闹到深夜才散。第二天一大早,陈独秀便来敲傅斯年的门。傅斯年以为出了什么事,慌忙穿衣起床,将独秀让进客厅。

陈独秀未坐稳,便说:“孟真,昨晚我思前想后,觉得有必要发表一个声明,进行辟谣。《国府明令》中说我‘爱国情殷’可以默认,‘深知悔悟’则纯属无中生有。这是我写的一份声明,你看可否登出?”说着,将一份

声明书递给傅斯年。

傅斯年接过信，打开一看，信虽不长，但写得极佳，全文如下：

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知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诸鄙人身者，是外患罪之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称兵据地或企图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国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思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织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以难堪之诬蔑也。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为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士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盖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

陈独秀(章)八月二十五日^①



傅斯年看罢，沉吟片刻道：“发表个声明表明态度，倒也有此必要。不过，你看现在哪家报社敢登你这篇声明呢？这可是犯忌呀。”

陈独秀道：“我也知道这样的文章很难登出，但总觉得不吐不快。你觉《申报》如何？”

傅斯年说：“《申报》报道比较公正客观，且对你入狱之事一向同情。记得当年你被捕入狱公开审判时，各报都慑于政府高压，只字不敢刊载你自撰的《辩诉状》，唯独《申报》别出心裁，在《地方通讯》栏内用‘苏州通讯’的形式，发表了《辩诉状》的要点。这次《申报》或许还能刊登。”

陈独秀道：“那就拜托孟真将此稿送去如何？”

傅斯年笑道：“这没问题，举手之劳。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也，时过境迁，到底敢不敢登也说不准呀。”陈独秀叹口气：“也只能碰一下运气，实在不登，也是无奈，问心无愧就是了。”

两人议论了一番时政，陈独秀突然又想起一事，道：“孟真，还有一事要拜托你。我的几个难友王文元、濮德志、罗世藩还都在狱中，你能否设

^① 此文载《党史资料》1980年第2期。



包惠僧



周佛海

法通融一下，争取让他们早日出狱？”

傅斯年道：“我看问题不大，现在国共正在合作，周恩来一再催促蒋介石释放政治犯，听说开出的名单就包括你们托派人员，估计也就是早晚的问题。”

陈独秀感叹道：“恩来就是恩来，不计前嫌呀。”

傅斯年笑道：“恐怕还是毛泽东说了算吧。”

陈独秀道：“润之早年和我有师生之谊。此人海纳百川，气度非凡，我相信这点度量还是有的。”

说话间，周佛海登门来访，邀他到家中做客。周佛海原是中共一大代表，后来脱党，投靠了蒋介石。陈独秀对他看法一向不好，本不愿去，可见他一片热情，又不忍推辞，便随他去了。

一连几日，陈独秀每天都到周公馆去聊天。可几天后，突然又不去了。不管周佛海怎样来约，总是找个借口辞掉。傅斯年感到奇怪，便问：“仲老，佛海怕你闲在家里烦闷，让你出去散散心，也是一片好心，何必这么不给面子？”

“不要提了。”陈独秀心烦地摆摆手：“一世清白差点毁于一旦。”

傅斯年忙问：“此话怎讲？”

陈独秀道：“佛海家中现在每天都有不少文人政客聚在一起谈论时政，这本无可厚非。我久别社会，也需要多接触些人，可我去了两次，慢慢听出一些门道，原来都是些‘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一类的汉奸论调。佛海当年随我创建共产党，也算是个有功之臣，后来觉得清苦，没有出头之日，便投靠了老蒋。按说老蒋对他也不薄，他却自恃有些才气，仍不满足，觉得英雄无用武之地，现在又和汪精卫搅在一起。这个汪兆铭现在到处散布汉奸言论，他们在一起呆久了，还能有好事？依我看，再这样下去，早晚会投靠日本人。”

周佛海与陈独秀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

周海佛 1897 年出生于湖南沅陵，1917 年考入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1920 年回国到上海，经陈独秀介绍，加入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后又赴日本，和施存统共同组建了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党的一大代表，1924 年脱党。1937 年 8 月初，蒋介石召集社会各界人士，举办讨论抗日问题的“庐山谈话会”，周佛海是主持人之一。后来，“谈话会”由庐山移至南京继续进行。周佛海、陈公博、陶希圣等人是主张对日妥协的，他们所召集来的一批人在讨论对日方针时，也大都主张以和平方法解决中日冲突，由此时人戏称这一经常在周氏官邸



举行的座谈讨论会为“低调俱乐部”。陈独秀被周海佛拉着去了几次，待看清真相后，十分感慨，自然是不屑与他们为伍，便说什么也不去了。

两人感慨了一番之后，陈独秀又问：“孟真，我的声明为何还没登出，《申报》方面有解释吗？”

傅斯年说：“《申报》馆编辑部主持言论的胡仲持先生和总经理马荫良先生都与我通过电话，他们二人意见倒是一致，认为国民党当年以‘危害民国’判你的罪，本身就是一件冤案，应予赔偿，现在迫于形势，将你释放，却仍在对你造谣污蔑，说什么‘深知悔悟’，根本不能自圆其说。你在信中表明的两点态度，无不言之成理，在《申报》发表，应该不成问题，但采取什么形式发表，用‘书面谈话’，还是用‘读者来信’，一时不能作出决定。他们怕处理不当，或是国民党新闻检查室通不过，或为读者所忽略，都不能达到先生的目的，所以迟疑不决，拖到现在未登。”

陈独秀也知《申报》的难处，不便过于催促，只好说：“能登出就行。”

其实《申报》没有刊登陈独秀的声明书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不但陈独秀不知道，傅斯年也不清楚。那就是陈独秀入狱时的身份是中国托派的首领，虽说他已为中共开除，但到底托派和中共目前是什么关系，胡仲持、马荫良也搞不清楚。为了慎重起见，他们便托胡仲持的哥哥胡愈之征求中共方面对这封信的意见。谁知中共方面反馈过来的信息比较冷淡，认为是否发表此文，可由《申报》自己决定，中共不予干涉。这下子胡、马二人就更加弄不清共产党的态度，若贸然登出，既得罪国民党，又得罪共产党，那就太得不偿失了。于是，为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二人决定“暂不发表”。再加上受战争影响，《申报》由五六大张改为一张半，又多为军事报道所占，陈独秀出狱的消息和淞沪战事相比，已不是什么重大新闻。这样耽误到12月15日，《申报》终因拒不接受日军检查自动停刊，陈独秀的这封信也就再也没有发表的机会了。

此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证明，陈独秀当时一再坚持发表这个声明是非常有远见的。不然，人们果真以为当时陈独秀已经默认“深知悔悟”了。这是后话。

九

转眼进入9月，淞沪战事进入白热化。日本集结上海的兵力越来越多。日机开始还有所顾忌南京守军的炮火，只是夜间出动空袭，后来简



直肆无忌惮，大白天也三五成群飞过来狂轰滥炸。国民党政府已正式宣布迁都重庆，整个石头城人心惶惶，扶老携幼，纷纷逃难他乡。

傅斯年的母亲有病在身，听见飞机嗡嗡叫声就心惊肉跳，非逼着儿子搬家，傅斯年只好将老母亲送到一位安徽朋友的老家暂居，又让妻子俞大彩携幼子到江西岳父家避难，自己则整日忙着中央研究院的内迁事宜，再也无暇顾及陈独秀。包惠僧和陈钟凡见此状况，便劝他到自己寓所居住。独秀见陈钟凡家比包惠僧家宽敞，便搬到陈钟凡家中。包惠僧住在莫愁路一家独院，两家相距不是太远，便经常过来陪他聊聊天，这样过得倒也不闷。

这天晚饭后，陈独秀正躺在床上休息，潘兰珍进屋小声说：“有位外地客人想见你，说是你过去的部下。”

陈独秀猛地从床上坐起：“可是罗汉？”

潘兰珍摇摇头：“说是上海来的。”

陈独秀脸上马上露出失望的神色，自语道：“这时候，上海正打得火热，谁来见我？”暗自思忖着，来到客厅，见是一位戴眼镜穿西装的年轻人，看着面熟，却一时想不起在哪见过，便问道：“这位先生是……”

那位年轻人见到陈独秀，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恭敬地道：“总书记，我姓吴，你不记得我了？你在上海时我给把过风。”

陈独秀依稀有点印象，这才知道是上海托派组织派来的人，心里就有点不痛快，便阴沉着脸道：“原来是吴先生，找我有何事？”

吴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过来，开门见山地说：“同志们得知总书记出狱后，非常高兴，都希望你能重振党的组织，再掀反蒋斗争新高潮。我们已在租界为你找好寓所，陈其昌同志专门派我来接你。别看上海现在打得热火朝天，但租界里却要比南京安全得多。”

陈独秀生气地道：“现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各党派联合抗日，乃是头等大事，再提反蒋是没有出路的。日前我听到有人说托派是汉奸，我还不相信，现在看你们若不及时悬崖勒马，离汉奸也不远了。你回去告诉陈其昌，上海我绝不会去，日后你们也不要再来找我！”

吴先生道：“总书记，你何必把界限划得这么清，莫斯科已经把你开除了，听说你又不愿到蒋介石那里去做官，你不回上海，还能到哪去？再说，不管你怎么和我们划清界限，在别人看来，特别是在斯大林眼里，你就是我们的总书记。听说前几天你还托人保释王文元、濮德志、罗世藩等同志出狱，这能说你和组织没关系吗？”

陈独秀冷冷地说：“我那是尽朋友之情，和组织没有丝毫关系。”



吴先生苦苦相劝道：“总书记，自古乱世出英雄，不如乘现在时局混乱，你领着我们再干一番事业吧。”

“不去！不去！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互不干涉。”陈独秀越发冒火，索性大声喊道：“阿珍，送客！”

吴先生被这厉声拒绝弄得狼狈不堪，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只好告辞。

说话间，包惠僧走了进来，见陈独秀气乎乎的样子，便问：“仲老，刚才出去的是什么人？是他惹你生气了？”

包惠僧原名包道亨，是湖北黄冈县人，生于1894年。1917年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担任《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的外勤记者。1920年2月，陈独秀离开北京南下武汉，他前去采访，从此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兴趣，先是加入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任负责人，后又代表广东出席了中共一大。大革命时期，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独立第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在汪精卫发动七一五政变后，参加南昌起义，因生病与组织失去联系，从此脱党。1931年起，历任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参议、蒋介石的军委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现任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参事。



陈独秀长叹一声：“惠僧，不瞒你说，刚才那个年轻人是托派临委陈其昌派来请我回去重新领导组织的。现在的托派不比从前，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非常复杂，有些年轻人自傲得很，无组织无纪律，我行我素，根本管不得，社会上名声不好。你说我能再蹚这个浑水吗？”

包惠僧试探地问：“仲老是怕延安方面不高兴吧？”

陈独秀一瞪眼：“胡扯！我陈某人这辈子怕过谁？算了，不提这事，提起来就心烦。你来得正好，我答应过你，给你写一幅字的。”说罢，在桌上铺开宣纸，挥毫写道：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包惠僧笑道：“仲老墨法刚劲，尤其是‘莫等闲’三个字，看得出仲老依旧是老骥伏枥，壮心不已啊。”

“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今非昔比，廉颇老矣。”陈独秀苦笑道：“纵有满腔报国之志，老蒋也不会理睬的。”

包惠僧乘机劝道：“现在时局越来越紧，南京绝非久留之地，依我看



不如溯江而上,先去武汉避避,那里抗日气氛浓,又是仲老故地,回旋余地大。你若同意,我就给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写封信,他是我的老乡旧友,关照一下不成问题。”

陈独秀道:“我想再等两天。”

包惠僧有些着急:“你到底还要等什么?难道你看不出,觉元夫妇也急着搬家,只是见你不走,不好意思像孟真那样弃你而去。过两天我也要去武汉了,到时候谁在这里照顾你?”

陈独秀沉默片刻,终于叹口气:“好罢,那就依了你,先去武汉吧。”

包惠僧见他同意了,心中松口气,忙回去准备给何成浚写信。陈钟凡听说此事,自然十分高兴,原来他早就想离开南京,只是见陈独秀没有走的意思,碍于面子,拖到现在。现在见独秀终于同意去武汉,夫妻两个一刻也不耽搁,连夜收拾行李,恨不能马上长上双翅离开这个鬼地方。

十

陈独秀冒着生命危险,滞留南京的真正原因是在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他北大时的学生罗汉。

罗汉是湖南人,早年与周恩来、陈延年、李立三等一起留学法国,在巴黎入党。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大革命失败后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回国后随陈独秀加入托派组织。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突然被捕时,罗汉侥幸逃脱,此后便隐名埋姓躲到苏州一家漆染厂做事。抗战全面爆发后,他经上海来到南京,见到了刚刚出狱的陈独秀。

陈独秀是在一个偏僻的小饭馆里秘密会见罗汉的。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还在和托派人物交往。虽然罗汉这5年没有参与托派的任何活动,但陈独秀还是觉得小心一些为好,免得授人以柄。

罗汉说:“我在上海见到了临委负责人陈其昌,他托我捎信给你,希望你回去重新领导组织的工作。”陈独秀摇摇头:“现在全国各党派团结一心,共同抗日,而陈其昌却仍然坚持反蒋方针,到处攻击国共合作,在社会上名声很臭,这样下去是没有出路的,我可不愿和他们来往。”

罗汉压低嗓音又道:“这次我到南京后,还见到了先生的一个故友,先生猜一猜是谁?”

陈独秀漫不经心地说:“你说的是彭述之吧?听说他出狱后,马上到



上海投靠陈其昌去了，我对他早已没有兴趣。”

罗汉摇摇头：“这个人你肯定感兴趣。”

陈独秀无精打采地道：“我现在还能对谁感兴趣？”

“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的叶剑英。”

陈独秀一听“叶剑英”3个字，顿时睁大眼睛：“你见到叶剑英了？”

罗汉说：“大革命期间我在四军任政治部主任，叶剑英是参谋长，彼此私交不错。这次我与他见面时，他和周恩来正在督促蒋介石尽快释放政治犯，我便请他设法帮助将托派政治犯也解救出狱，他欣然答应，并叫我根据知道的情况，开个保释名单，还专门询问了你和彭述之、郑超麟、何资深等老党员在狱中的表现。看样子你这次被提前释放，其中还有周恩来、叶剑英的作用。”

“周恩来一向胸怀宽广，以德报怨。当年我在武汉被停止中央领导工作时，是他亲自安排了我的住处，甚至变卖了自己的家当，照顾我的生活。1927年底我到上海后，很少有人来看我，还是他看望我的次数最多。这就是恩来呀。若党内多几个恩来，我何至如此呢？”陈独秀感慨了一番，又问：“叶剑英对我怎么看？”

罗汉很有信心地说：“很好，没有反对情形，不然怎会保释你呢？我还向叶剑英提起王文元尚未出狱，请他帮忙，他很爽快地答应了。尽管我们跑了两天没有找到文元，但由此可见中共对托派还是友好的。此外，他们对你拒绝当劳动部长和重组新共产党之事也非常赞许。”

陈独秀点点头，沉吟半晌说：“你再和叶剑英谈谈，看看他们是什么意思。”话一出口，他又怕罗汉误解他急于和中共接触的用意，便解释道：“我知道，延安是不会欢迎我的，我也犯不着巴结他们。只不过现在日军入侵，需要各种政治势力联合起来共同抗日，中共是目前最大的在野党，国共合作对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以及充分发挥这一战线的作用至关重要。在此民族危亡的关头，一切个人恩怨都要抛弃，现在重要的是精诚团结，各党派应将全力用在民族解放战争上面。如果有可能，咱们有必要和中共就抗日的问题建立合作关系，这不是无原则地退让和妥协，而是符合列宁精神的。列宁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不被马克思主义的现成公式所束缚，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大胆地决定不同的政治口号和斗争的方法。”^①

第二天，罗汉再次来到中共驻南京办事处，向叶剑英转达了陈独秀

^① 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希望与中共合作抗日的意愿。在罗汉的安排下,8月底的一个夜晚,陈独秀秘密会见了叶剑英、博古,初步探讨了合作抗日的可行性。^①叶剑英等人鉴于此事重大,不敢擅自做主,“应与中共中央商量决定,故嘱罗汉赴陕”。^②于是,罗汉从叶剑英手中领了路费及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后,便马不停蹄连夜赶往延安。

陈独秀之所以迫切希望尽快与延安接触,是因为当时的种种迹象表明,中共确实也有着与陈独秀合作的良好愿望。托派重要成员王文元20年后在回忆中谈到了他对叶剑英在南京营救他出狱之事的看法。他说:“今天我提起这段故事,丝毫不是为了夸示我的‘重要性’,仿佛现今中共的一位元帅,曾经为我的出狱奔走过的。绝对不是,我不会如此无聊。所以要提及者,只想说明我以前屡次说过的一个看法,即:中共党员对于托派关系,并非一贯敌对,亦非一致敌对的……只有极少数如陈绍禹一派,才把反托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本。很多人并不看重这斗争,把它当作主要是苏联内部的事。在老一辈的共产党人中,多数还不会认真相信斯大林一手捏造的加于托派的荒唐罪名,他们始终相信托派仍是共产主义营垒中的革命者。叶剑英当时仍对罗汉以老友相待,并偕同着去营救另一个托派,我们是不能不作如是解释的。”^③

这也就是陈独秀一再滞留南京等候罗汉的原因。只是在罗汉赴延安多日毫无音信,和叶剑英接触又无实质性进展的情况下,陈独秀才下决心离开南京到武汉去。他心想:如果中共真有合作的诚意,就一定会再派人到武汉和自己晤谈;如不派人联系,武汉此时已成全国政治中心,再做其他打算也不迟。

晚上,陈独秀躺在床上,对潘兰珍说:“阿珍,我知道你想去上海。其实我何尝不想去上海呢?只是上海虽好,但不能去,那里有日本人,还有一些我实在不愿见的人。南京是不能呆了,现在就很危险,恐怕也守不住多久。安庆老家也不能回,安庆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南京若是沦陷,安庆就会成为日寇下一个侵略的目标。安徽省府现在就在忙着搬迁六安,松年来信说,他们现在已经在准备避难离乡了。这样我们只能溯江而上,到武汉去避难,好不好?”



①② 罗汉:《给周恩来等公开信》。

③ 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1977。

第

三

章

陈独秀重返武汉，故地重游，不免感慨万千。此时他已今非昔比，从当年八面威风的一党之首变成了默默无闻的一介难民。

十一

1937年9月9日，陈独秀、潘兰珍登上了开往武汉的客轮。历史惊人地巧合。10年前的这一天，他因为大革命失败，被共产国际撤销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黯然离开武汉赴上海。10年后的这一天，他则因为抗战爆发被提前释放出狱，以难民身份重返武汉。这个中的辛酸滋味，恐怕只有陈独秀自己知道。

武汉位于南京上游，逆水行船，十分吃力。越往上行，越是惊涛骇浪、狂澜汹涌，严重超载的小客轮发出低沉的喘息声，如同一只负重爬行的耕牛。

晚饭后，陈独秀一个人悄悄地来到甲板上，思绪也似这滔滔江水此起彼伏、难以平静。轮船明天就要经过他阔别多年的故乡安庆，那是生他养他的地方，又是他开始革命生涯的摇篮。他多么想踏上故土，回去看看阔别多年的家，看看双目失明的养母，看看小儿松年及其家人，了却他那魂牵梦萦思念故土之情。然而，令他烦恼的是，身边还有陪伴他度过那5年寂寞监狱生活、感情笃深的少妻。他与潘兰珍年龄相差近30岁，进了家门，亲朋好友又将怎样看她？这些苦衷，他又无法对兰珍明讲。想到路过家门而不能归，他真是百感交集、愁肠百结……

潘兰珍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身后，小心地问：“阿



拉听说依已经20多年没有回过老家。阿拉问过,明天上午船到安庆,依不想下去看看阿拉的婆婆?”

陈独秀沉默片刻道:“阿珍,你跟了我5年,从未问起过我以前的婚姻,你就不想知道?”

潘兰珍柔声道:“阿拉想知道,可依不讲,就是不愿讲,阿拉不想惹依生气。”

陈独秀握着潘兰珍的手道:“你真是一个善良的人。今天晚上,我就原原本本地告诉你我过去的两次婚姻……”

他点上一支烟,吸一口,慢慢陷入回忆……

十二

1879年10月9日,清光绪五年己卯八月十四日乙丑,陈独秀出生在安徽省府安庆城北的独秀山下。那时候,谁也不会想到,40年后,他竟然一鸣惊人,干出了翻江倒海、惊天动地的伟业,成为当时中国最有政治影响的风云人物之一。

陈独秀祖上代代习儒,但功名都未显。到了他父辈这一代,只有四叔陈昔凡中过举人,在外做个小官。陈独秀的父亲陈衍中虽自幼读书用功,却始终没有中举,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外教书,在陈独秀两岁时因染上瘟疫,死于苏州怀宁会馆。

陈独秀小时候聪慧过人,《三字经》、《百家姓》一教就会,背得滚瓜烂熟,在同龄的小伙伴中称得上是佼佼者。1896年,他参加县府考试,获得第一名秀才,一下子轰动了安庆城,人们均以奇才视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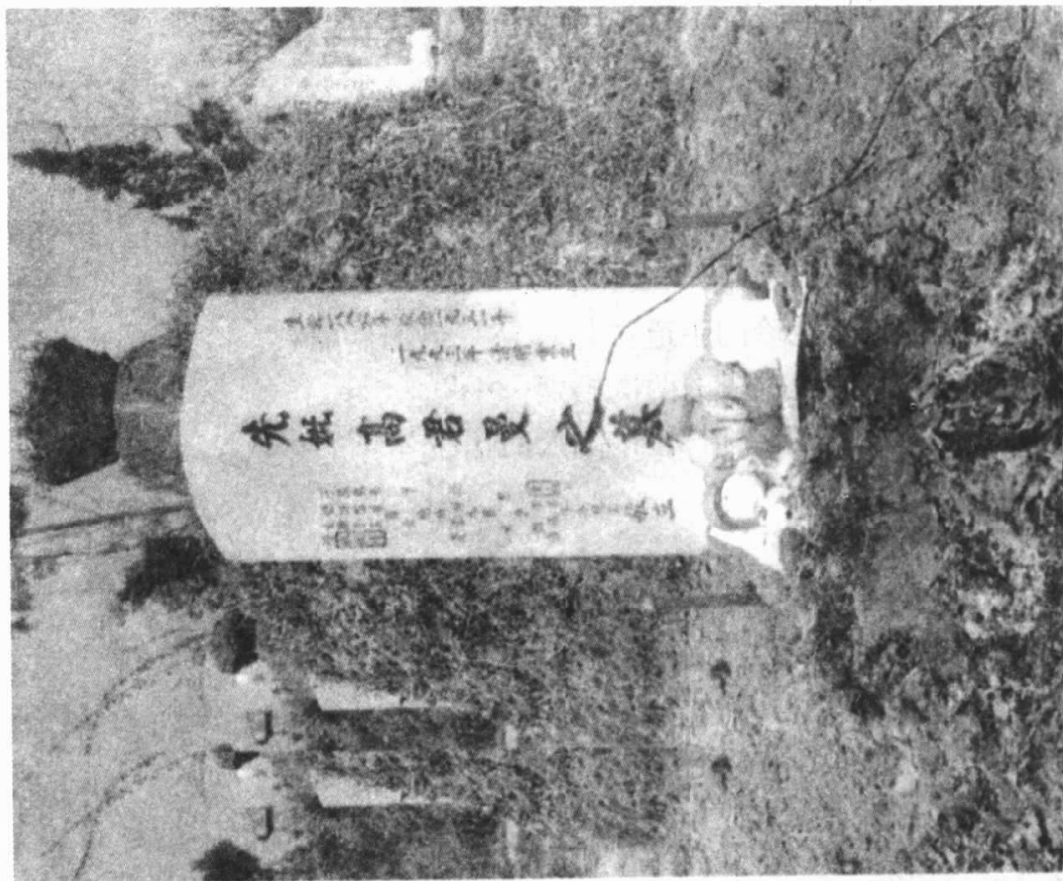
这时候,他的四叔陈昔凡也时来运转,由知县、知州、知府升到道员,被朝廷赏戴花翎,并且在外发了大财。这“双喜临门”的事,使原本家业贫寒的书香之家一跃成为安庆的名门望族。然而,陈昔凡虽然名利双收,个人生活却并不称心。他先后娶妻3房,却都没有生子。为了使家业后继有人,他便将独秀过继为嗣子。于是,陈独秀摇身一变成了阔少爷,更加令人刮目相看,许多当地乡绅争先托人上门说媒。

1897年,18岁的陈独秀与安徽统帅副将高登科之女高晓岚结婚。陈独秀文科高中,洞房花烛,郎才女貌,文武联姻,自是踌躇满志、春风得意。新婚燕尔,小两口相处得还可以。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人的思想裂痕越来越大,最终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陈独秀的第一位夫人高晓岚



陈独秀的第二位夫人高君曼之墓

高晓岚比陈独秀大3岁，目不识丁，一心希望丈夫安分守己、读书做官。然而，陈独秀少年得志，颇负才名，对政治日益关注，逐渐确立了为挽救国家危亡而奋斗的志向。高晓岚偏偏对这一切不屑一顾。时间久了，夫妻之间的口争日渐增多。陈独秀多次劝她识些字，但她概不接受。陈独秀欲留学日本，想借她的金手镯作为盘缠，而她坚决不给，并骂道：“这是我娘家陪嫁的东西，你这个黑心肠的东西，休想打它的主意！”一次次的争吵使陈独秀渐渐变得心灰意冷。之后，两人即使在一起，也很少说话，形同陌路。

1903年，陈独秀从上海潜回安徽，创办《安徽俗话报》，成立革命组织岳王会。高晓岚做梦也没想到，父亲替自己择配的郎君竟成了大逆不道的“乱党”、革命党，于是两人一见面，更加吵得不可开交。也许是出于对自己不幸婚姻的感触，不久陈独秀在《安徽俗话报》上连续发表文章，猛烈抨击“父母包办，强迫成婚”的封建婚姻制度，大声疾呼，主张学习西洋文明，男女自由恋爱。

就在陈独秀为自己的不幸婚姻而苦恼不已时，一个青春貌美的少女翩翩来到身边，她就是高晓岚的同父异母妹妹高君曼。

高君曼比陈独秀小7岁。与姐姐相反，她自小上学，聪明伶俐，活泼烂漫，十七八岁时已能写一手像样的文章。高登科此时受时势影响，观念也有所更新，为了培养女儿，将她送到北京女子师范读书。

北京的读书生活把高君曼带入了全新的境地，使她由外而内地呈现出时代新女性特有的风采。在此期间，姐夫陈独秀的大名开始引起她的注意。

辛亥革命后的陈独秀，已经在知识界崭露头角，有了相当的名声。他在报刊上发表的诗文，不仅思想敏锐、感情充沛，而且文笔流畅、生动泼辣，使得高君曼产生了与这位令人神往的姐夫交流思想的念头。于是，她利用假期回安庆的时间，以探望姐姐为借口，寻机来到陈独秀家中。

在陈独秀的记忆中，他这个小姨子只不过是一个天真活泼、不谙世事的小姑娘。然而，时过境迁，现在站在他面前的高君曼不但身材高挑、明眸皓齿，而且打扮入时、摩登新潮，浑身散发着少女的青春气息，特别是谈吐不凡、思想新颖，又爱好新文学，富于感情和想像，与过去简直判若两人。于是，两人一见如故，打开话匣子，从古到今，畅所欲言，甚是投缘，大有乍遇知音、相见恨晚的感觉。

从此，高君曼借着各种理由，时常去和陈独秀见面、交谈。陈独秀优



雅的谈吐、深刻的见解，渐渐使得高君曼对他的崇拜之情达到了五体投地、不可自拔的程度。久而久之，他们的感情迸发出爱的火花，由互相爱慕而终于堕入情网。

姐夫和小姨子相爱，对陈、高两家无疑是晴天霹雳，武将高登科、文官陈昔凡两亲家联手反对，高登科逼迫女儿立刻出嫁，陈昔凡则扬言要将养子逐出家门。面对如此强烈的反对，陈独秀和高君曼没有屈服，要求婚姻自主的决心更加坚定。陈独秀这年31岁，他自幼就倔犟好胜，反抗精神甚强，又与结发妻子高晓岚没有感情，自然不会为外界舆论所动。高君曼是知识女性，既然找到深深相爱的人，自然也不会轻言放弃。为了摆脱家族的反对和歧视，1909年，陈独秀与高君曼毅然离家出走，来到杭州，正式结为伉俪。

陈独秀经历了一场婚姻悲剧之后，忽然觅得了自己心中的佳偶，喜从悲来，自然对高君曼加倍怜爱。高君曼为人贤淑，知书达理，能理解陈独秀的事业。所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伉俪之间恩恩爱爱，情意浓浓，和睦相处。闲暇时，夫妻二人携好友二三，游西子湖，诗文唱和，纵谈天下，好不快活。

陈独秀在和高君曼一起生活的这段日子，创办了影响一代青年人的《新青年》杂志，发起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化运动，插手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现了国共合作，揭开了大革命的序幕。

可是，就在陈独秀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高君曼突然离他而去。

陈独秀和高君曼的分手不能不说是一场爱情悲剧。导致他们最后分手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陈独秀由于革命生涯所带来的颠沛流离和巨大风险，则是他们分手的最主要原因。

高君曼比较注重安定宁谧的家庭生活，可陈独秀天生是一个看轻家庭的人。自从结婚之后，高君曼的生活便充满动荡。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时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的陈独秀从安庆逃往上海，途经芜湖被军阀逮捕，差点被枪毙。1919年6月，陈独秀在北京街头散发革命传单，被北洋军阀逮捕，虽然经过多方营救，于3个月后被释放，可高君曼为此担惊受怕，惶惶然一天天度日如年。1921年中共创建不久，陈独秀再次被捕入狱，此次高君曼也被牵连坐牢。次年，陈独秀又一次被捕。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与高君曼向往的教授夫人生活实在相距太远，只是凭着对陈独秀的崇仰苦苦支撑着。为了使丈夫能够专心致志从事事业，她把全部精力用在家务和孩子身上，包括照料陈独秀与前妻的儿子延年和



乔年。可是这一片苦心偏偏又得不到陈独秀的体谅，两人终于开了口舌之争，继而又发展到出手相打，从此感情裂痕越来越深。1925年，两人又大闹一场，高君曼一气之下，带着幼子陈子美、陈鹤年从此离开陈独秀，去了南京……

听完陈独秀的述说，潘兰珍半晌没有说话，沉默了许久，才问：“那后来呢？”

陈独秀说：“后来我就到了武汉，那时候正是大革命的危急关头，有许多大事要办，忙得连睡觉的功夫也没有，根本无心顾及儿女私情。”

“再后来呢？”

“再后来大革命失败了，我也被撤职了，在上海隐居了两年。因为看不下去李立三这些‘左’派糟蹋革命，就在党内成立了左派反对派，于是被共产国际开除出党了。”

“再再后来呢？”

“再再后来我就在上海遇到了你。”陈独秀笑了：“你这傻孩子，哪来的这么多后来。”

潘兰珍没有笑，轻声问：“那大夫人现在好吗？”

陈独秀的脸色一下子又阴沉下来，顿生悲戚之色，好半天才道：“死了。大革命失败后，松年的大哥延年、二哥乔年先后在上海被蒋介石杀害，我的大女儿筱秀到上海为哥哥奔丧，又猝死在那里。二子一女之死使她一病不起，就在咱们相识的那一年得肺结核病去世了。”

陈独秀深深吸口烟，又慢慢吐出，闭目沉默了许久，才又说：“她跟我没过一个安宁日子，没享一天福。虽说我们没什么感情，但她是一个善良而老实的人。这些年，我亡命在外，家里多亏了她。她为我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先后有二子一女因我而死，现在只剩下松年一个孩子。”

“那……二夫人呢？”

陈独秀低下头，陷入极度悲伤的沉默中：“也死了。听说她在南京时带着子美和鹤年两个孩子，日子过得很苦，可从来不向我伸手要钱。我那时正忙于大革命事宜，也顾不上管她。松年他妈去世的时候，她还专门到安庆去奔丧，哭得死去活来，觉得对不起她的姐姐，可陈家人始终不接纳她这个儿媳妇。这使本来就已极度悲痛的她精神上又受到难以承受的刺激，回到南京后咯血病就复发了，又患上了子宫癌，贫困交加，终因无钱治病，第二年就死在南京，才46岁。死后还是我的旧友潘赞化、陈公博帮助安葬的，否则连收尸的也没有。她葬在何处，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子美、鹤年姐弟俩现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她有文化，又是将军



的女儿,年轻时是那样的聪慧、漂亮、充满活力,本来可以嫁一个富贵人家的子弟,过一辈子荣华富贵的生活,偏偏看上了我这个不安分的人,最后落到客死他乡的凄惨结局。总之,是我对不起她们姐妹俩,她们是为了我受苦受累、早早过世的……我心中有愧呀。”

潘兰珍坐在一旁默默抹了半天眼泪,突然像是明白了什么:“那明天船到安庆,我们要是下船,老太太见了阿拉……自然是不肯相认的啦?”

陈独秀为难地道:“我养母这辈子也不容易,松年他妈去世了,她又支撑着这么个家,还一天到晚为我担惊受怕,警察三天两头去搜查,连吓带累,双目就失明了。她的病是为我愁出来、累出来的,我怎忍心再惹她老人家生气呢?”

潘兰珍道:“先生不用再说了,阿拉听明白了。婆婆连二夫人那样有身份的媳妇都不肯认,见了我这个地位低贱的女人更是不会认的。先生不必为我作难,明天我们不下船了。将来见到婆婆,阿拉一定不会惹她老人家生气,一定好好孝顺她老人家。”

陈独秀听了兰珍发自内心的话语,心中激起阵阵暖流,禁不住抓住她的手,深情地说:“难得你这么明白事理。阿珍,你跟了我这么一个老头子,后悔吗?”

“阿拉不后悔。阿拉没找错依。阿拉原来就听别人讲过,先生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今天听先生讲起过去的事,阿拉心中更加崇敬依。阿拉一定好好伺候先生,不让先生再受委屈。”

陈独秀久久凝视着这位心甘情愿受苦而又情深意厚的少妻,再也无话可说。

十三

第二天上午,一声汽笛长鸣,安庆到了。

陈独秀和潘兰珍走出舱门,登上甲板,凭栏北望,江边一座巍然挺立的宝塔顿时映入眼帘。他默默望着,古塔依旧,江水滔滔,往事一幕幕从他眼前闪过。许久,他才低声对潘兰珍说:“阿珍,你看见江边那座宝塔没有?此塔叫‘振风塔’,可是大有来历。我的家乡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自古战火频频,动荡不安,人既不杰,地也不灵,一直没有出过状元。后来有人说,安庆东边有条青龙,西面有一条卧虎,龙虎相斗,安庆颠簸不安,文采均随江水付诸东流了,哪能出什么状元呢?于是,这位先生



说,须在江边建一座塔镇之。明代安庆知府王宗徐到任后,听到这个传说,觉得有道理,便四处筹款,建造了这座塔,命名为‘振风塔’,还特意在塔底座下的迎江寺刹门前左右各拴了一只巨大的铁锚,以镇文采。于是人们又传说,振风塔像一支毛笔竖立在青龙的头上,两个铁锚锁住了白虎,从此安庆开始兴旺,出了很多有名的文人墨客,像明代大思想家方以智、清代书法家邓石如、清代著名的桐城派等等,于是就有了‘过了安庆不说塔’的说法。”

潘兰珍插言道:“还出了先生这样的大人物。”

陈独秀笑道:“我算什么大人物,现在一钱不值喽。”

潘兰珍认真地说:“我听说先生创建的共产党十分了不起,先生自然也就了不起。”

陈独秀摇摇头:“没有因果关系。阿珍,你不知道,当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袁大头的人要抓我,我连夜带着君曼离开安庆,坐着一只小船,顾不得江面上风高浪急,颠簸着顺流而下,到达芜湖后,又被叛军抓去,出了布告,要杀我的头。我说:要枪毙,就快点!”^①

潘兰珍吓得脸色都变了:“依怎么这么傻呀,快点找死呀?”

“后来幸亏地方名流相救,才死里逃生,到了上海。这是我参加革命以来第一次被捕。”

“依到底被抓了几次呀?”

陈独秀屈指一算道:“5次,算起来最后这一次蹲大牢时间最长,整整5年。”

潘兰珍听了满脸崇敬之色:“依真是了不起。”

“阿珍,你不知道,我们安庆好玩着哪。那独秀山峻峭险要,小时候我常常去攀登。安庆城那狭窄的街道铺的都是石板条,很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安庆的小吃像墨子酥、顶雪贡糕、蚕豆辣酱都是很有名的。还有安庆出的‘三宝’,你知道是什么吗?其中余良卿膏药那是大名鼎鼎,相传是仙人铁拐李带来的鲫鱼熬制而成,拔毒镇痛,在江南和东南亚一带很有名气……”

陈独秀滔滔不绝赞美着家乡,直到振风塔完全看不见了,才长长吁叹一声,慢慢走回船舱,躺在铺上,再不作声。



^① 摘自高语罕著《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载重庆《大众报》1942年6月4日第3版。

十四

客轮在长江上经过3天3夜颠簸,于9月12日中午靠近了武汉码头。

陈独秀在潘兰珍的搀扶下,提着行李,随着逃难的人流好不容易走下客轮。望着熟悉的码头,他心中又是一阵隐隐作痛。

武汉这座城市陈独秀来过3次。1920年2月,刚刚从北洋军阀监狱里释放出来的陈独秀第一次来到武汉,先后在文华大学、汉口青年会、武汉高等师范进行演讲,引起巨大轰动。1927年4月,他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再次来到这里,更是名声鼎沸、八面威风。如今他又以一个难民的身份回到这里,已是孑然一身,政治身份从高潮跌入低谷,当年曾经团结在他麾下的一批年轻的共产党精英蔡和森、瞿秋白、邓中夏、彭湃、方志敏、恽代英、罗亦农、苏兆征、向警予、陈延年、陈乔年等已经先后离开了这个世界,而那时的陈独秀也已不复存在。真是“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回首往事,历历在目,浮生若梦,命运如此大起大落、变化莫测,怎不令他感慨万千!



陈独秀正思忖着,几名军警簇拥着一位身着黑色中山装的男子迎面走来。

“这位可是从南京过来的陈先生?”

“正是鄙人,几位是……”

那男子哈哈一笑,自我介绍道:“鄙人蔡孟坚,奉何主席之命在此恭候先生多时了。”

陈独秀来武汉前,包惠僧曾托人捎信给湖北省主席何成浚,请他关照陈独秀,这样也好使他一到武汉就能有个落脚之地,免受奔波之苦。可是,好心未必办得成好事。何成浚那时整日忙于接待安顿从南京搬迁过来的政府机关、企业,哪有闲心去特别关照一个落难秀才,便吩咐武汉市警察局长蔡孟坚,让他代为关照。^①

一听到“蔡孟坚”3字,陈独秀的脸顿时阴沉下来,这个名字他太熟悉了。蔡孟坚是一个老牌的反共专家。1931年,就是他逮捕诱降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和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导致恽代英、蔡和森、柔

^①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党史资料》1979年第3、5、8期。

石、冯铿、殷夫等20多人被捕,可以说他双手沾满革命者的鲜血,为此曾得到蒋介石的当面嘉许,被破格晋升为少将参议。陈独秀自然不愿和这样的人打交道,便马上一口回绝:“陈某一介草民,不敢烦劳何主席和蔡先生关照。”

“既然如此,陈先生住下后,请到警察局打个招呼,我对何主席也好有个交代。”蔡孟坚碰了一个软钉子,心中不快,丢下几句场面话,便扬长而去。

蔡孟坚走后,陈独秀气得直跺脚,骂道:“这个包惠僧,办事不牢,别人不找,却找警察局长来‘关照’,成心想气死我!”

潘兰珍赶忙劝他不要上火。陈独秀老大的不痛快,骂了半天才住嘴,看日落西山,好不容易在码头附近找了一个简陋的小旅社住下。

潘兰珍见房间条件太差,劝他换一间好点的。陈独秀摇摇头:“算了,手里这点钱都是朋友送的,将来还不知生活怎么样。花完了,怎好意思再向朋友张口,将就着住吧。”

坐了3天轮船,陈独秀感到十分疲倦。吃过晚饭,夫妻俩便早早睡下了。



十五

第二天早上,陈独秀便要去武汉大学拜访王星拱校长。潘兰珍不放心他一人外出,非要一起去;陈独秀拧不过她,便同意了。于是,老夫少妻坐上一辆人力车,来到武汉大学。

王星拱,字抚伍,安徽安庆人,生于1889年,早年曾留学英国伦敦理工大学,回国后到北大任教。他与陈独秀是同乡,又在同校任教,私交颇好。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独秀到北京新世界等处散发传单被捕,当时同去散发传单的就有王星拱。这次老友重逢,格外高兴。王星拱说:“前几日,段锡朋和陈钟凡一起向我推荐你来任教,你若能屈驾前来,武大定当蓬荜增辉。”独秀却婉言谢绝道:“我今天来,一是拜访多年未见的老友;二是因我刚到武汉,尚有《宇宙风》给我写自传的稿费未到,我之前已请亚东汪老板寄武大请抚伍兄收转。”王星拱连连点头:“此事放心,当请汪老板照寄不误。”寒暄片刻,陈独秀便起身告辞。

回来的路上,潘兰珍问为何拒绝在武大教书。陈独秀说:“你不懂,当此国破家亡之际,我哪有心思讲那些脱离实际的老古董。”

两人说着话，回到码头已是正午时分，远远地就看见旅馆门口停着一辆黑色轿车，车旁站着几个国民党士兵。陈独秀心一惊，以为是蔡孟坚又寻上门来找麻烦。走到近处，才看清为首的是一名文质彬彬的少将军官。那位少将看见他从人力车上下来，忙快步迎上前道：“陈先生，我可找到您了。”

“恕老朽眼拙，这位将军是……”陈独秀觉得来人面熟，却一下子想不起在哪儿见过。

少将摘下军帽：“先生真的不认识学生了？我是杨鹏升啊。”

陈独秀顿时眼睛一亮，又像是在做梦一般：“原来是蓬生？你不是在前线和日军作战，怎么到武汉来了？”

“一言难尽，先生先随我到家中，慢慢细说。”将军言罢，不由分说，将陈独秀夫妇让上汽车，离开了小旅馆。

此人姓杨名鹏升，别名蓬生，四川渠县人，原是北大学生。20年前，陈独秀在《新青年》上连续放重炮，以其新颖的思想、饱满的热情和才华横溢的文章赢得了青年的尊敬和喝彩，杨鹏升便是当时千千万万疯狂崇拜陈独秀的进步青年之一。大革命时期，杨鹏升先是东渡日本留学，回国后又投笔从戎，征战在枪林弹雨之中。1932年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服刑时，杨鹏升已调任南京陆军中央军官学校任上校战术教官，因军人身份不便前去探望，便经常委托章士钊带一些物品去看望陈独秀。后来，杨鹏升调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少将参谋、武汉防空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便与陈独秀失去了联系。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在报上看到陈独秀提前释放出狱的消息，十分高兴，听说陈独秀近日要到武汉来避难，便向蔡孟坚询问，才知住在码头附近。于是，他马上备车赶来，四处打听，费尽周折，终于找到陈独秀夫妇。

两天后，陈独秀夫妇移居武昌双柏庙后街26号一所桂系军人的旧式平房里，终于算是在武汉有了栖身之地，开始了他的难民生活。

9月14日，陈独秀在给汪孟邹的信中写道：“弟已抵汉，暂寓旅社，日内即移居武昌。”

16日，他又写信给汪孟邹：“弟日前由南京来汉口，兹已租定寓所，来信望寄武昌城里双柏庙后街26号陈仲甫收可也。”^①



^① 转引自唐宝林等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第

四

章

中共中央要求陈独秀“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他却答非所问地道：“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

十六

陈独秀租住的这座宅院，古色古香，幽静清雅，颇有几分庭院风味。虽然日子过得清苦一些，但杨鹏升经常携夫人来拜访，总算给陈独秀寂寞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欢乐。

杨鹏升早在大学时期就酷爱书画、国画、金石及园艺，并且颇有造诣。他的作品多次在北京、上海以及日本等地展出，受到广泛的注意。章太炎先生为他选编过数集《杨鹏升印谱》，郭沫若写诗赞他是“蜀派印圣一世雄”。陈独秀对他的精湛艺术很是欣赏。因此，陈独秀居汉期间，两人互赠往来频繁，杨鹏升曾为陈独秀精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陈独秀一直视为珍宝。杨夫人擅长国画，陈独秀便常写条幅，请她做画；或者她做画，请陈独秀题字。他们在一起时从不谈论政治，只谈艺术和友谊，颇有古人遗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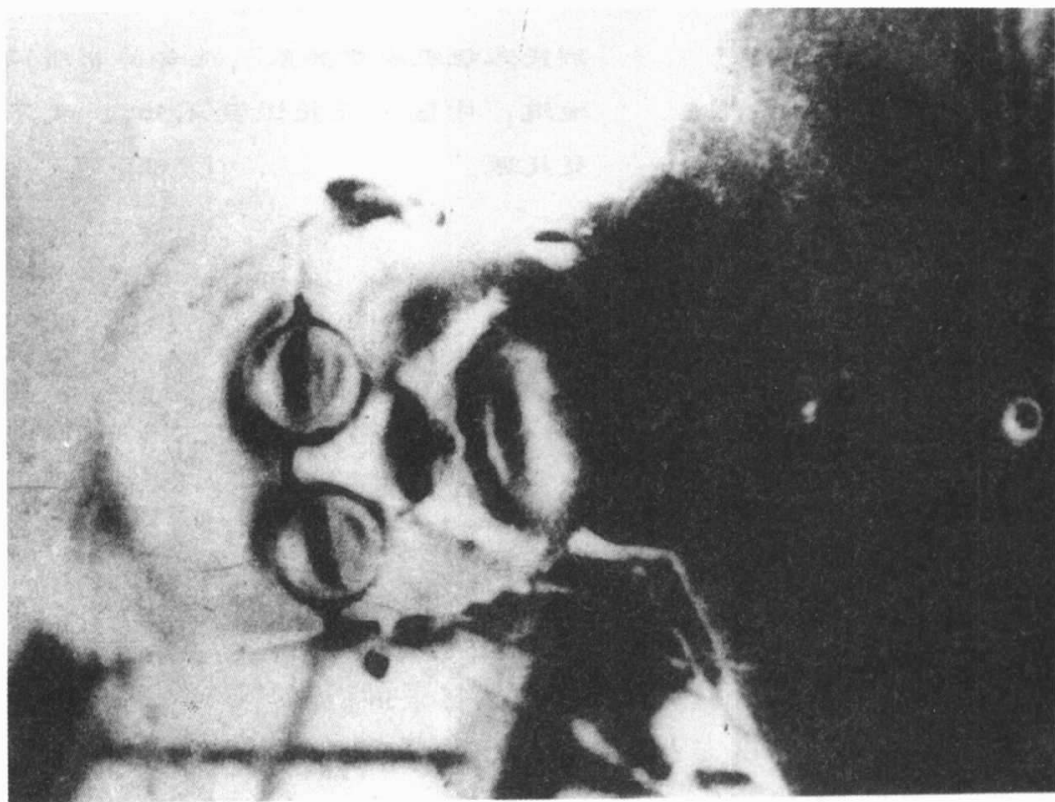
这样过了一段日子，杨夫人终于忍不住，悄悄问杨鹏升：“蓬生，仲甫先生来汉半个多月了，也不寻个正当职业，听说王星拱先生聘他去武大任教，被他拒绝。这老头子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不然你通过关系，给他谋个职位。”

杨鹏升听了直摇头：“仲甫先生乃当今奇人。他是新文化的统帅、五四运动的灵魂、中共的缔造者。





大革命时期的林伯渠



抗战时期的林伯渠

想当年,提起他的大名,无人不晓,如雷贯耳。尽管现在廉颇老矣,生活艰难,却仍不失大家风范,根本不会将名利放在眼中。蒋委员长给他部长之职他都瞧不上眼,我若随便给他找个差使,岂不是污辱了老先生的人格!依我看,他绝不是一个自甘寂寞的人,眼下不谋职业,自有他的打算。我们能做的就是尽力照顾好他的生活,做一点雪中送炭的事情。”

杨夫人奇怪地问:“他能有什么打算!依他那心直口快的脾气和与你的交情,有什么心事不能说呢?”

杨鹏升道:“不说自有不说的道理。正因为仲甫先生心胸坦荡、光明磊落,才说明他对未来的设想确有难言之隐呀。”

十七

杨鹏升判断得一点也没错,陈独秀之所以谢绝朋友为他推荐的工作,是因为早在胸中计划好了未来。他目前正在焦急地等待着最后决定他何去何从的关键人物。这个人就是受他之命前去延安会见中共领袖毛泽东的罗汉。

9月底的一天,被陈独秀望眼欲穿的罗汉终于风尘仆仆地来到武汉。

原来罗汉离开南京赶到西安后,很快就找到驻在七贤庄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与中共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取得了联系,但不巧的是由于山洪暴发、道路中断,一时不能去延安。

林伯渠是湖南临澧人,老同盟会会员,曾任孙中山大元帅的参议,1921年参加共产党。大革命时期,林伯渠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罗汉是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北伐军攻打南昌时,四军、六军曾协同作战,所以两人早就熟悉。提起陈独秀,林伯渠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我和仲甫一晃已经有10年没见面了,他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有着比别人不同的地位。只是仲甫脾气太倔,若能放弃某些成见,回到一条线上来工作,于民族与社会都是极需要的。”^①

罗汉笑道:“林主席这样一说,我的心就踏实多了。仲甫先生这次是非常有诚意的,否则就不会派我千里迢迢到西安来。只是现在山洪暴发,我一时去不了延安,仲甫又等着我的消息,你看如何是好?”

^① 罗汉:《给周恩来等公开信》。



林伯渠略一思索,道:“这样吧,我马上给延安拍电报,请示中央。你在这里耐心住几天,等我的消息。”

安顿好罗汉,林伯渠马上给延安发报,说明缘由,请求指示。

当晚,刚从太原来陕的王若飞听说罗汉到了办事处,便前来拜访。王若飞大革命时期和陈独秀关系非同一般,也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党内为数不多的主张客观对待陈独秀的领导人之一。他在莫斯科时,曾经因为替陈独秀说好话而受过严厉处分。1931年,王若飞从苏联一回国,便被国民党逮捕,直到抗战爆发后才被党组织营救获释,现任陕甘宁边区宣传部长。他对罗汉说:“我过去与仲甫共事较久,深知他个性倔犟。但是,中央看重组织问题,这也是共产党一贯的原则,并非针对哪一个设立。因此,希望罗汉兄能劝说仲甫等几位老朋友完全以革命家的气魄站在大时代的前面,一切向前看,不争论,过去的一切是是非非,都无需再费笔墨唇舌去争辩。”^①

9月10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联名给林伯渠发来回电:



请告罗汉我们对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则:(甲)我们不拒绝同过去犯过错误而现在真心悔悟,愿意抗日的人联合,而且竭诚欢迎他们的转变。

(乙)在陈独秀等托派分子能够实现下列条件时,我们亦愿与之联合抗日:(一)公开放弃并坚决反对托派全部理论与行动,并公开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承认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二)公开表示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三)在实际行动中表示这种拥护的诚意。

(丙)至于其他关系,则在上述三个条件实现之后,可以再做考虑。^②

罗汉马上从西安返回南京,而此时陈独秀已启程赴汉,于是他在八路军南京办事处又见到了博古、叶剑英。这时博古、叶剑英已接到毛泽东、张闻天的电报。对中共中央指出的3项条件,博古、叶剑英都认为关键是第一条。

博古说:“本想和陈独秀谈一次,但因为自己党龄太浅,与陈先生过去又没有私人接触,恐怕难以谈出任何具体结果。”

^① 罗汉:《给周恩来等公开信》。

^② 叶剑英等人:《致〈新华日报〉的信》,1938年3月19日。

罗汉问：“可否由润之先生亲自与仲甫谈？”

叶剑英摇头道：“润之谈怕也不适宜，因为他们两人的个性都很强，都有闹翻的危险。最合适的人选是恩来，他谈结果或许会圆满些，但他现在不在武汉。眼下不如让董必武同志先去和仲甫交换一下意见，他们年龄相仿，又都是党的创始人。”

罗汉与中共中央当年秘密接触的详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至今没有过多的党史资料公开佐证。不过后来叛变投敌的张国焘对此事倒有过一段专门回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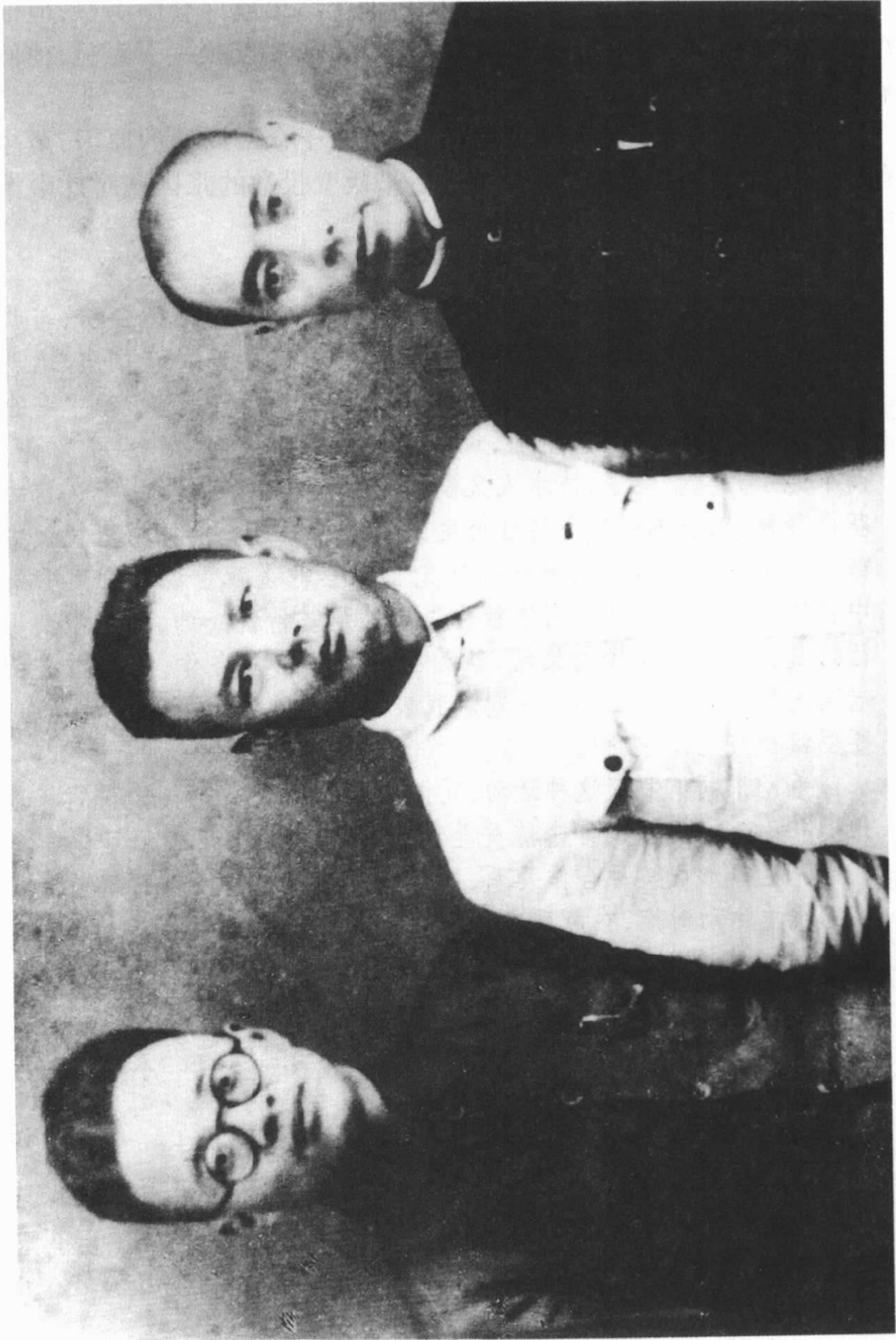
1937年10月间，罗汉来到延安，他以陈独秀代表的身份，与我们商谈合作。罗汉是我在五四运动时即在一起共事的老同志、老朋友。他与毛泽东也有旧谊，后来脱离中共，成为陈独秀托派中一个重要角色。他这次和我会面，说到陈独秀先生过去对中共的贡献，两个儿子为党牺牲了，陈本人又被国民党判了10年徒刑，不久前才获得释放，以及陈一直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等等。他并指出托派内部意见不一、派系甚多，但陈独秀先生和其他多数重要人物主张与中共恢复合作。他还说明陈独秀先生等是坚持抗战的，赞成中共现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认为国共既能恢复合作，社会主义的老同志们更应重新团结在一起。我表示欢迎陈先生等的这种意向，要罗汉径与毛泽东商谈。



毛泽东同情罗汉这种活动，觉得中国的托派不能与苏联的托派相提并论……他似也怀念陈先生的旧谊。他曾向我表示可以与陈独秀先生等形成某种合作关系，以期一致抗战。毛还说到从前我们搞苏维埃运动时期，在肃反工作中，犯有很多错误，现在斯大林老在闹肃反，恐怕错误尤多于我们。现在我们团结一切力量抗日，陈独秀托派如果表示改悔，何尝不可一起抗日。

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张闻天也只好遵照实行。张闻天和罗汉多次商谈的结果，形成了19个条件。其主要内容是：托派坚持抗日，拥护中共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的现行政策，在言论上和实行上均将有明朗的表现；托派中愿意恢复中共党籍者，须公开脱离托派并承认已经参加托派的错误；不愿恢复中共党籍者，可以与中共在党外合作，支持中共的抗战政策。中共中央也不再对抗日的托派人物采取敌视态度。^①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3册，第421～422页，东方出版社，1991。



周恩来、叶剑英、博古（秦邦宪）合影（自右至左）。

张国焘是迄今为止唯一公开回忆罗汉到过延安的见证人,其他材料都只是说罗汉到了西安。也许是张国焘将西安错记成了延安。现在看,罗汉当时到没到过延安已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张国焘的回忆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当时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陈独秀的态度是积极的,就是允许陈独秀在有条件的前提下到延安工作。

听了罗汉的陈述,陈独秀仔细看了看中共中央的3项条件。对于陈独秀来说,第二项是能够接受的,他在南京与叶剑英等人晤谈时对此事其实已有明确表示,而第三项因为是建立在第一、二项的基础上,目前还是虚的,暂时可以不论。关键是第一项,又被中共中央称为“先于一切的条件”。^① 罗汉心里直打点,如果陈独秀断然拒绝,双方合作事宜恐怕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

没想到陈独秀却说:“第一条我已声明同托派组织脱离关系了。”

罗汉忙问:“何时声明的?我怎么不知道。”

陈独秀从抽屉里找出一份手稿,说:“你到西安后,我在南京通过包惠僧给《中央日报》总编辑程沧波发表了这个声明。”

罗汉接过来一看,见上面写道:“陈独秀,字仲甫,亦号实庵,安徽怀宁人。中国有无托派我不知道,我不是托派。”^②

这个声明写得很有意思,既不说自己过去是否干过托派,也不提自己什么时候脱离了托派,而是用了“我不是托派”这样的含糊词,什么时候开始不是托派了没讲。潜台词是说:如果说我过去是托派的话,我现在已经脱离了,总之现在不是托派了。这也算是一种不失体面地承认了自己过去加入托派的错误。对于像他这样宁折不弯性格的人来说,能把话讲到这个程度,也算是“委屈求全”、难能可贵了。

罗汉长吁一口气:“这下好了,我就担心你不同意这一条,那事情就难办了。可是我在《中央日报》也没见到这个声明呀。”

陈独秀说:“那我就知道了,总之我声明了,他不发是他的事情了。”

罗汉道:“这不要紧,有这份手稿就足以说明问题了。我马上再回南京去找叶剑英、博古,趁热打铁,把这件事办妥。”

陈独秀也同意。他从桌上又拿出一封信:“这是我给中共写的一封信,提出了抗日救国的7条纲领,表明我的抗战态度,以示我的诚意,你



^① 叶剑英等人:《致〈新华日报〉的信》,1938年3月19日。

^②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党史资料》1979年第3、5、8期。



把这个一起交给叶剑英。”^①

两人又闲聊了几句，罗汉便匆匆离开。

十八

此时的南京已是危在旦夕，国民党大部分政府机关和各党派陆续搬到武汉，一时间武汉成为全国救日救亡的政治中心。陈独秀开始是想利用等待罗汉去南京的时机将《实庵自传》写完，因为近来《宇宙风》杂志主编陶元德再三来信催促。但是，面对全国日益高涨的抗日形势，他的政治热情又一次点燃，再也无暇旁顾。陶元德后来回忆说：陈独秀出狱“到武汉以后，他的全部精神就放在抗战文章上了，自传已无心续写。我呢，虽然要的是自传，但也不能强人所难，更不是不知重轻缓急。况且在烽火漫天之际，《宇宙风》这刊物能否支持得下去，唯天知道”。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陈独秀开始频频在报刊上发表抗日文章，自传一直到他去世也未完成。



10月2日，陈独秀在《宇宙风》杂志发表短文《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指出“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呼吁全国民众、尤其是“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以在野党的资格绝对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于抗日战争之军事最高统率权”，号召全国人民必须“赶快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使政府能够抗战到底”。^②

陈独秀本来是悄悄来到武汉避难的，知者甚少，但这一文章的发表立刻泄露了他的行踪，同时也唤起了人们对他往日辉煌的回忆。

10月6日，陈独秀应邀到武昌华中大学做了《抗日战争之意义》的著名讲演，这是他出狱后第一次公开露面参加政治活动。次日出版的《大公报》记录下了当时的热烈场面：“华中大学的礼堂已经挤满了青年群众。大门外站着两个黑衣警察，执着枪，阻止一片黑压压的群众进门……台上台下，到处都有人在密密地集聚着，连风也难透过。”陈独秀“从猛烈的掌声中，由华中大学学生抗敌工作团的同人陪伴着步上讲台”。“群众的狂热使他微微有点兴奋，枯干的面色返着红。他老了，头顶秃了半个，发已斑白，留着短须……倔强的风骨随时表露着，一件灰色袍子，

^① 《终身的反对派》，第340页，青岛出版社，2001。

^② 陈独秀：《从第一个双十节到第二十六个双十节》，载《宇宙风》第49期。



失去了光的皮鞋,依然是寒士风度。”陈独秀演讲完毕,“六百个座位的礼堂里,三千只手作了一度雷声似的鼓掌。”

此后数日,陈独秀又连续被邀请到各处发表抗日演说,再次成为公众瞩目的风云人物,引得许多新闻记者和社会名流纷纷前来求见和拜访。然而,时隔不久,他以身体不适为由,突然闭门谢客,从武汉各大报刊上消失得无影无踪。

陈独秀闭门谢客确有“身体不适”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政治方面的因素。从表面上看,他现在似乎已经获得自由,门庭若市,四处演讲,十分风光。实际上,国民党特务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他的盯梢跟踪,他的宅院周围常有不三不四的人转来转去,后虽经杨鹏升多方斡旋,安全状况才有好转,但他此后不得不提高警惕,加倍小心,免生是非。

这天早上,天淅淅沥沥下起小雨,陈独秀感到无聊,正躺在床上看书,突听有人敲门,以为又是记者来访,就对潘兰珍说:“不管是什么人,就说我病了,一律不见。”

不一会儿,有人在院子里高喊:“仲甫先生,你看看我把谁带来了。”话音未落,潘兰珍已领着两个人走进客厅。陈独秀正要发火,抬头看时,见其中一人是罗汉,另一位男子有50多岁,身着长袍,精神焕发,前额稍秃,一双细长的眼睛透着神采。陈独秀一愣,喜出望外地说:“原来是璧伍兄,一别10年不见,你是越发神采奕奕、老当益壮了。”



来人姓董名必武,号璧伍,湖北黄安人。他生于1885年。17岁中秀才。28岁时东渡日本,进入东京私立日本大学攻读法律,加入中华革命党。1919年走上马克思主义之路。在湖北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并参加了党的一大。大革命时期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长江局委员兼民运部长。此刻两人久别重逢,心情都十分激动。彼此寒暄客气一番之后,渐渐转入正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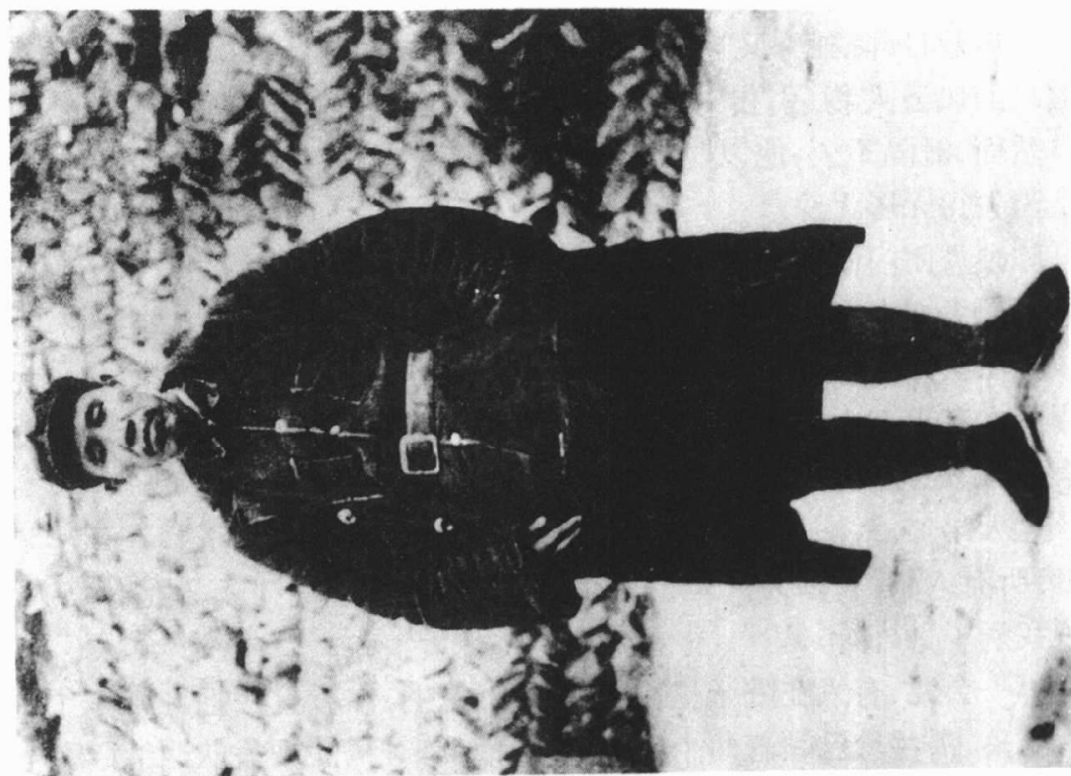
董必武道:“我这次是受润之之托,专程前来拜访。”

陈独秀感慨地说:“谢谢润之还记得我这位老朽。”

董必武又道:“不知仲甫兄对今后有何打算?”

陈独秀不假思索地说:“鄙人一生所求,大半失败,还能有何新的打算?这次出狱后,本想效仿陶渊明,找处山野陋室,隐居起来做些学问,从此再不过问政治。无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只能尽我所能,倾我全力,投身抗日救亡之运动。这也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仲甫兄的赤子之情,国人皆知。你托罗汉先生带给中央的抗战7条纲领我已拜读,受益匪浅,觉得和中共所决定的路线并无不合,说明我



延安时期的董必武



中共一大时的董必武

们在抗战问题上还是有共识的。目前,我4万万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没有理由不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这是仲甫兄的看法,也是中共中央的基本方针。眼下,抗日统一战线已初步形成,润之和恩来都希望仲甫兄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抛弃过去的固执和偏见,共同完成我们当年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宏图大志。”

陈独秀听了十分感动:“我也正有此意,所以才不计前嫌,托罗汉和你们联系,共商抗日大计。”

董必武呷口茶,又诚恳地说道:“你我都是开诚相见的老朋友,有话也就直说了。依弟之见,你写个书面检讨,回党工作吧,中央是欢迎你的,润之、恩来也是欢迎你的。”

陈独秀一听“检讨”二字,马上皱起眉头,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走着,半晌才说:“回党工作固我所愿,不过唯书面检讨恐难从命。”

董必武劝道:“仲甫兄,你还是那个老脾气,你拒绝当国民党的劳动部长和组织‘新的共产党’,难道你还拒绝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吗?”

陈独秀认真地说:“璧伍兄,中共是我们当年共同所创,我对它的感情自然非同一般。8年前,我因为反对共产国际路线,被莫斯科开除出党。现在大敌当前,我不计较过去的是是非非,主动向你们伸出友谊之手,可你们非要我陈某人写个书面检讨,才能回党工作,这岂不是证明我过去坚持的主张都是错了吗?我绝不能做无原则的让步。”



罗汉也劝道:“仲甫先生,我看你也别太认死理。中共毕竟是共产国际一个下属支部,润之对莫斯科也要有一个交代。依我看,你就凑合写一个检讨也未尝不可。”

陈独秀摇摇手,急躁地说:“现在乱哄哄的时代,谁有过无过还在未定之数。不写!有什么好写的!”^①

董必武见陈独秀态度坚决,毫无回旋余地,只好道:“仲甫兄,中央并无强行之意,我们只是希望你能站在大时代的前面,以抗日大局为重,拿出革命家的气魄,放弃某些个人成见,不要错过回党工作的机会。希望你一定三思。”说罢,与陈独秀握手告别。

这天晚上,陈独秀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董必武的来访打开了他记忆深处的闸门,10年前他与中共之间的恩恩怨怨一下子浮现在眼前……

^①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党史资料》1979年第3、5、8期。


第

五

章

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国际指示陈独秀到莫斯科学习反省，他拒绝道：“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去请教外国人，苏联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我不去给他们当反面教员。要反省，我在中国反省，绝不去莫斯科！”

十九



1927年7月15日深夜，曾经被共产国际吹捧为“经过考验可靠的”国民党左派领袖汪精卫终于撕下了假面具，秘密召开“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公开叛变革命，杀气腾腾地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刹那间，大江南北腥风血雨，白色恐怖笼罩神州大地。陈独秀由友党领袖变成了标价1500块大洋的通缉首犯。他不得不化装成苦力，隐匿在武汉一家由中共秘密开设的纸行小阁楼上。

汪精卫这时急于想捉住陈独秀，以便向国民党右派表白他已彻底和共产党划清界限，从而尽快摆脱被动局面，也好与蒋介石一争高低。不过，汪精卫万万不会想到，此时的陈独秀不但遭到国民党方面的严厉搜捕，同时也被共产国际毫不留情地罢免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

毛泽东曾经说过：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段充满辩证法的至理名言此时用在陈独秀身上，似乎让人啼笑皆非。蒋介石、汪精卫要在肉体上消灭他，共产国际要在政治上击垮他，同时遭到敌对双方的反对，这也算是千古奇闻。陈独秀走投无路，政治生涯跌入最低谷，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

就在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的前3天,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召集下进行了大换血,组成了张国焘、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和张太雷五人临时中央局,停止了陈独秀、彭述之的工作,并建议陈独秀赴莫斯科,美其名曰“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被陈独秀拒绝。7月13日,陈独秀致函临时中央,以“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工作”为由,提出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主动提出辞职,也算是陈独秀的明智之举。他心里清楚,早在5月份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共产国际就有撤换他的意思,只是没有物色到合适人选,这才暂且作罢。6月17日,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罗易在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中就已明确提出:“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领导机构。”7月8日,共产国际给中共发来电令,指示中共要“采取种种办法,纠正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机会主义错误,在政治上健全党的领导机构”。^①正是根据这一电令,鲍罗廷停止了她的领导工作。

7月13日,实际上已经开始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和鲍罗廷秘密地由武汉去庐山,商讨如何正式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构,并就中国共产党对大革命失败应承担的责任做了讨论、定下了基调。

7月23日,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抵达武汉的当天,马上会见了瞿秋白、张国焘。

罗明纳兹告诉瞿秋白、张国焘,他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纠正过去驻华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在中国革命中所犯的错误的,并指导中共目前的工作。罗明纳兹紧接着宣布:中共中央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违反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现在共产国际决定改组中共中央的领导,陈独秀不能再任总书记,甚至还要受到开除党籍的处理。他还表示:中共中央发生错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党中央为一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所盘踞,缺乏阶级意识和革命的坚定性,对共产国际的正确指示很久以来都是机会主义地加以曲解。现在共产国际不能信赖那些动摇的知识分子,要大胆地提拔一些坚定的工人同志担负中央的领导工作,并使他们在中共中央占多数。^②

7月26日,罗明纳兹召开中共中央临时中央局会议,决定7月28日

^①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定》,1927年7月,收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人民出版社,1985。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东方出版社,1991。





八七会议旧址

瞿秋白

以召开中共中央紧急会议的形式来批判陈独秀并对之作出组织处理。但是,由于时局紧张,交通不便,与会人员未到齐而将会议推迟。8月3日,罗明纳兹再次召开临时中央局会议,议题仍旧是进一步筹备中央紧急会议事宜。两次会议均未通知当时尚未正式解除中共中央总书记之职的陈独秀参加,尽管陈独秀在7月底还写信给临时中央局,对党在近期内的的工作提出过若干建议。^①8月初,罗明纳兹去长沙,在苏联领事馆召集湖南临时省委会议时,再一次公开号召与会者签名打倒陈独秀。

可以看出,此时名义上仍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显然已经被完全排斥在即将召开的八七会议的中央领导之外。这同时也表明,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首任总书记,作为共产国际指示在中共的具体执行者,陈独秀已完全不为共产国际所信任,并且被剥夺了正常陈述自己意见的权力。他已无法主宰自己的政治命运了。

二十

1927年8月7日,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的安排,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以及瞿秋白、李维汉、张国焘、苏兆征、毛泽东、蔡和森、李达、罗亦农、项英、向忠发、张太雷、卢福坦、顾顺章、王荷波、彭湃、邓中夏、彭公达、任弼时等20余名在汉的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青年团中央委员和中共地方组织代表。

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正率领南昌起义部队转战赣东,没有出席会议。

会前,张国焘提出通知陈独秀参加,因为陈独秀到目前为止仍然是名义上的总书记,人又在武昌,没有道理不来,但被罗明纳兹一口否决。^②

八七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批判陈独秀以及改组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并对陈独秀作出组织处理。会上,罗明纳兹首先传达了共产国际7月8日的指示精神。接着,瞿秋白代表上届中央委员会做关于党的今后工作方针的报告,提出党的策略应是“独立的工农阶级斗争”。会议经过简单的讨论,即通过由罗明纳兹起草、瞿秋白翻译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这篇告全党党员书全面回顾了大革命的经验教训,



^① 唐宝林等:《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② 李立三:《党史报告》,1930年2月1日。

但回避了共产国际及其驻华代表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工作方面的错误,把一切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了陈独秀。最后,会议选举了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9人为委员,周恩来、邓仲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7人为候补委员。

8月9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第一次会议,瞿秋白、苏兆征和李维汉3人当选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工作。至此,陈独秀的中共政治领袖生涯正式宣告结束。

耐人寻味的是,八七会议在政治上、组织上乃至文字上、口头上均未提及陈独秀的名字,文件中一律以“中国共产党的指导者”代之“陈独秀”。按照中国传统“摇头不算点头算”的选择习惯,既然新选出的政治局没有陈独秀,也就意味着他已经被排除在新的政治局之外,自然也就被撤销了以前的职务,自然也就没有必要专门在文字上作出组织处理意见。不过,也正因为文字上没有形成对陈独秀组织处理的决议,按照排除法的逻辑推理,只是将他排除在政治局之外,并没将他排除在中央委员会之外。所以,陈独秀在名义上还是中共五大选举的中共中央委员。这一点,被当时的中共中央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地忽视了,更被后来编史者和读史人所遗忘。



应当说,陈独秀作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对于大革命的失败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的主要错误是:对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的政治面目没有清醒的认识,过于相信国共合作,而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独立性和领导权问题未能坚持,甚至为了维护国共合作而有意无意地对事实上的国民党右派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以至在客观上“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①,同时也助长了国民党右派等反革命势力的膨胀。在四一二政变后,由于仍然如此,也就未能为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而作出有效的努力,由此终于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和中国共产党遭受空前的挫折。

在大革命遭到失败、共产党人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八七会议果断停止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对他所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批判和清算,重新确立了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和政治路线,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诚如毛泽东后来所说,这种批判的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

^① 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



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①

周恩来后来说:“‘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把反对机会主义看成是对机会主义错误的负责者的人身攻击。”^②八七会议的主持人李维汉也认为:“应该让他参加会议,允许他进行申辩或保留意见。”^③

时过境迁,史学界有人提出了为什么不让陈独秀参加八七会议的新见解,认为陈独秀当时被排除在八七会议之外,并受到缺席批判,其根源在于他对中国革命持有与共产国际不同的主张。^④

早在大革命时期,面对国民党右派的一次次猖狂进攻,陈独秀就多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的建议。当时陈独秀并不知道,远在莫斯科,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在中国问题上争论的焦点正是中共应不应该退出国民党。托洛茨基主张中共必须尽快退出国民党。斯大林则坚决反对之,他在严厉批判了托洛茨基的言论之后,对中共何时退出国民党做了明确的预测。斯大林说,中国革命“到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接近完全胜利的时候,到了资产阶级革命进程中显露出过渡到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的时候……到了那个时候,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的联盟应当代之以在国民党党外的联盟”。^⑤然而,蒋介石、汪精卫们并没有按照斯大林为他们设计的轨道行事,而是没等中共准备退出国民党,便突然毫不客气地对共产党人大开杀戒。这一血淋淋的事实无情地证实了斯大林所预测的中共退出国民党的时间表纯属主观臆测。这使他在和托洛茨基的争斗中处于不利局面。

这个时候,如果让陈独秀参加了八七会议,并重弹早该退出国民党的老调,岂不是和托洛茨基遥相呼应,更会使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陷入被动。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陈独秀出席八七会议,至于中国革命失败的原因,自然是陈独秀不执行共产国际指令的结果,不到会的人自然也就不会提出反驳意见。这种不正常的组织处理,对于陈独秀来讲自然不会接受。这就为他此后总是对八七会议耿耿于怀埋下伏笔,也



① 毛泽东:《学习和时局》。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2页,人民出版社,1980。

③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第166页。

④ 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438页。

⑤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31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为他最终被开除出党种下祸根。

二十一

客观地看,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陈独秀的错误也绝非个人的错误,而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处于幼稚时期所犯的 error。如果追究责任的话,绝不应只是归结于陈独秀一个人,而应当看到这是一种思潮、一种倾向。从基本上讲,这种思潮和倾向又都源于共产国际。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毛泽东还是瞿秋白都看得清清楚楚。

毛泽东 10 年后在延安会见埃德加·斯诺时说:“看来共产国际在 1927 年提供给中国共产党的不是什么‘意见’,而是干脆发的命令,中国共产党显然甚至无权不接受。”^①这就明确指出:大革命后期,中国共产党(当然包括它的总书记陈独秀)没有权力不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

瞿秋白在中共六大的报告中回答了大革命后期“最高政策是谁在执行”的问题,他认为是鲍罗廷和罗易。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仅是 3 个领导之一,“动摇于鲍、罗之间”,而倾向于鲍罗廷。^②

看来,瞿秋白内心深处根本也没有那种把一切失败的责任归究于陈独秀一人的思想。

然而,事实上,八七会议以及此后逐渐升级的一系列指责,将大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一古脑儿推给了陈独秀,不仅把共产国际的错误转嫁到了陈独秀的头上,而且把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国民党内的苏联顾问魏金斯基、鲍罗廷、罗易等等所做的错事也都一古脑儿加在了陈独秀的头上。蔡和森在《论陈独秀主义》一文中,开门见山就说:“所有从中国近时革命运动中发生出来的各种机会主义的理论与实际——自戴季陶主义,彭述之主义,谭××主义,以至鲍罗廷主义,都可以且应该归纳在这一中国孟塞维克的总路线之中——即陈独秀主义之中。”^③

蔡和森的上述归纳方法,显然不是他的发明创造,而是来自共产国际和莫斯科。

按照共产国际的逻辑,中国的大革命失败了,总要有人负责,共产国

①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第 139 页,三联书店,1979。

② 瞿秋白:《中国革命与共产党》。

③ 《蔡和森文集》,第 804 页,人民出版社,1980。



际不能负,这样会影响它的威信,会影响世界革命,会助长托洛茨基攻击斯大林的气焰,因此中共中央只有挺身而出承担这个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如果由中央集体来承担,又会影响中国革命,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威信,因此只能由某一个人来承担。陈独秀是中共总书记,在大革命中又确有重大过失,对不起,这个责任就只能由他来负了。

客观地讲,这一切在当时恶劣的革命斗争形势面前,也许是唯一的选择,但对于陈独秀个人来讲,显然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以至当八七会议结束后,瞿秋白、李维汉一起到他隐蔽的住处传达国际指示,要他到莫斯科去学习反省时,他马上干脆地拒绝了。

“不去,坚决不去。大革命失败了,我作为总书记,我是有责任,可共产国际更有责任,我只是国际指示的一个忠实执行者而已。要我写悔过书,过从何来,如何悔之,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要斯大林悔过呢?我是执行他的训令的。他悔过我就悔过,要我做替罪羊,于情于理都说不通。现在要我到苏联学习,我去学什么?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的问题为什么要去请教外国人,苏联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我不去给他们当反面教员。要反省,我在中国反省,绝不去莫斯科!”^①

瞿秋白深知老头子的脾气,知道多劝也无用,只好说:“既然你实在不愿去苏联,那就算了。但是,武汉是无论如何不能住了,你在这里名声太响,熟人太多,汪精卫又在四处搜捕你,实在太危险了。不如和中央一齐先到上海去,虽说上海的白色恐怖一点不亚于武汉,但毕竟城市大,有租界,易隐藏。古人讲,大隐隐于市,或许那里更安全一些。”

陈独秀冷静下来细想,知道武汉确实不是久留之地,又别无去处,只好答应了瞿秋白、李维汉的要求。

1927年9月中旬,在中央的周密安排下,陈独秀乔装打扮,与秘书韩少宫、中央出版局局长汪原放等一行4人登上英国“松和”号轮船,悄然离开武汉,到上海去了。^②

八七会议对于陈独秀的批判和处理,对他日后政治思想立场和政治生涯的变化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可以说,对于撤销总书记职务的决定,他是能够平心静气接受的,但对于给他罗列的一系列“罪状”,他死也不认账,这为他今后和新一届中共中央产生矛盾埋下了无法消除的祸根,并且逐渐使这种矛盾的冲突达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最终令人惋惜



①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

②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地出现了谁也不曾想到、谁也不愿意看到被自己亲手缔造的党中央所开除的可悲局面。

二十二

1927年9月15日傍晚,从武汉驶来的英国客轮“松和”号抵达上海码头,离别上海半年之久的陈独秀悄悄回来了。他先是被中央安排在江西北路福生里酱园弄,不久迁居法租界里一幢不起眼的3层楼房里,过起了隐居的生活。^①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租界人多复杂,鱼龙混杂。虽然国民党当局同租界巡捕房相互勾结,狼狈为奸,共同缉捕共产党人,但是租界“国中之国”的特殊性,使它同国民党当局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国与国”的关系。国民党警察、宪兵和特务不能擅自进入租界执行“公务”,更不能随便在租界开枪和捕人。巡捕房抓到共产党人,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这在一定程度上为共产党进行地下活动提高了“安全系数”。建党初期,陈独秀一直住在上海租界里从事革命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全国一片白色恐怖,中共中央再一次将上海租界作为自己理想的藏身之地。



应该说,陈独秀当时虽然因为犯有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撤销了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又一再拒绝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要他赴苏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的决定,但中共中央对他还是尊重的,秘书韩少宫依然跟着他,生活上也很安逸。但是,他却因为大革命山崩似的失败,而陷入深深的自责和苦闷之中。

1922年8月,陈独秀曾经发表过一篇《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的文章,对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这篇文章对中国经济社会进行了详尽分析,认为“在产业幼稚的东方……资产阶级及无产阶级的形式及意识虽然都正在开始发展,而团结力量却十分幼稚,因此国家统治权仍旧完全掌握在封建阶级手中”,在这个大背景下,国共两党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从“封建阶级”(军阀政治)手中夺回国家统治权。他接着指出:“孤军奋斗的国民党,虽然有民主革命

^① 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载《社会科学》1980年第5期。

的历史,但是党员太少,还没有支配全国政治来代替军阀的力量。”由此,他对当时的中国提出一个著名的地缘性质的政治结论:“这样的经济及政治状况,遂使中国的阶级斗争不得不分两段路程:第一段是大的和小的资产阶级对于封建军阀之民主主义的争斗;第二段是新建的无产阶级对于资产阶级之社会主义之争斗。”中共只有在帮助国民党完成“第一阶段民主主义的争斗”和荡平军阀统治中转向为本阶级利益争斗的第二阶段路程。在这里,陈独秀特别强调第一阶段斗争有着“双重意义”,即“不但能给中国的资产阶级以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且在产业有发达的国家”,也是“解放无产阶级使他们从幼稚而到强壮的唯一道路”。^①他认为,在打倒封建军阀、铲除殖民奴役的第一阶段,劳资双方是互为依存的,这就是国共合作的现实条件。应该说,“两段路程”的设想在理论上是无懈可击的。

早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前一个月,中共二大上就作出了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和以国民党为主要联合对象的“民主联合阵线”决议案。此时无论是孙中山、陈独秀还是共产国际都十分清楚,国共合作北伐是“劳资两利”之举,所以自然一拍即合。陈独秀发表此文应该说只是对既定政策的一个理论注解。

然而,陈独秀也深知劳资双方终究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共产党想利用第一阶段的成功向第二阶段发展,也就是按照党的决议把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化。这一点,国民党和他一样十分清楚。邓演达就曾说过国民党是共产党的“清道夫”,而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中共五大上所做的《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性质》的报告更是使国民党右派心惊肉跳。汪精卫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出席中共五大,并听了罗易的报告,明白了在共产国际和中共的策略中,他只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是共产党联合的对象,而不是像迎汪复职时讲的那样请他出来领导,明白了在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是要力争领导权的,因而他得出“共产党绝对不可靠,国共迟早要分家”的结论。

对于国民党来说,资产阶级革命无所谓新和旧,只有步骤的先和后。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已经荡平了旧封建军阀割据势力,再没有什么可与中共合作的项目了,于是国共双方都在准备革命的第二步了。虽然一贯务实的毛泽东早已看出发生这种变故的可能,也曾想抢先一步,可书生气十足的陈独秀和自以为是的共产国际就是不许,他们要按部就班地等到“第一步”完成之后再向国民党开刀,结果在紧要的转折关头让蒋介石



^① 《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石抢占了先机,不待北伐完全胜利,而是乘有胜利把握之机,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重创共产党,紧接着又逼迫汪精卫就范,实现了宁汉合流,奇迹般地实现了“两次革命”(北伐胜利摧毁封建军阀割据和宣布共产党为非法,政治上实现一党专政的资产阶级制度)的一次成功。

这是一步陈独秀甚至包括共产国际都未曾料到的死棋。可以说四一二政变使陈独秀关于“两段路程”的设想产生了断层,此后共产国际一味推卸国共合作期间的政治责任,终于使陈独秀设想的“两段路程”或者说“两步走”理论(被后人概括为“二次革命论”)破产。

陈独秀一直坚信“两段路程”设想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可严酷的现实是:这个理论使共产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这一切究竟是因为什么?操作过程中到底在哪个环节出了差错?他实在搞不明白。苦恼彷徨之余,他以诗言志,表达了对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屠杀人民罪行的满腔悲愤之情:



是太平洋的急潮怒号,
是喜马拉雅山的山鬼狂啸;
美满的呀、美满的人间,
已经变成了苦闷的囚牢!
我的灵魂飞上了九霄,
俯瞰人间的群众颠沛如涛;
宛如被射了双翼的群雁,
垂死的〔地〕哀鸣,血泪滔滔。
那畜辈的良心早泯,
只知把民众作肉食血饮;
我们要恢复固有的幸福,
呀,但我们
有自己的觉醒。

.....

然而,愤怒的诗人并不能改变残酷的现实。在与世隔绝的日子里,他像一头受伤的雄狮,困在铁笼里,添着血淋淋的伤口,每每彻夜难眠。经过一番痛苦的反思,他终于承认,自己天生不是搞政治的材料。想通了这一点,他的心才慢慢趋于平静,开始到纯学术领域中去寻找精神寄托。



二十三

转眼到了深秋季节。这天晚上，瞿秋白和李维汉突然一起来到陈独秀的寓所。

见到接替自己的两位中央主要领导，陈独秀并不反感，似乎还有点高兴，彼此寒暄几句，显得十分亲热。李维汉见他桌上摆满字典、词典之类的图书，感到奇怪，便问：“独秀同志，你这是……”

陈独秀道：“我这是在研究中国文字学和音韵学。”

他见瞿秋白和李维汉似乎没听明白，便解释道：“目前我们使用的文字是衍音象形字，它的缺点是不能够使多数人识字写字，加造新字很不方便。再加上中国文字自古以来是被官僚文人用来作八股文，所以一用现在的文字、代表现在的语言、叙述现在的生活，便不知如何写了，给人的感觉好像中国的文字已经破产了。文字是代表语言的符号，如果只能说出，不能写出，岂不成了有语言而无文字的国家？现在有很多人致力于平民识字扫盲运动，自然是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但他们使用的所谓扫盲课本根本没有注意平民日常生活的需要，所以平民日常所需的字90%没有，教他们识了这些八股字又有什么用处！”

陈独秀说到兴处，点燃一支烟，猛吸两口，也不管瞿秋白、李维汉是否有兴趣在听，又说道：“我国的文字改革运动始于新文化运动，到现在已经整整10年了，这期间遇到的阻力很大，几乎没有什么进展，只是做了一些注音字母的工作。即使是注音字母，我看也不如日本的假名便当。注音字母之所以没有普及，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依我看，最主要的原因是其自身的缺点太多，尤其是制造注音字母的人们既没有把它做成拼音文字的决心，而又要用拼音文字的方法，所以弄得不三不四，自然没有人肯用了。”

他见秋白、维汉听得似懂非懂，便又进一步解释道：“我写的这本书稿叫作‘中国拼音文字草案’，共分自序、北京话、汉口话、上海话和广州话5部分。可能你们会问：为什么不用国语，而采用4种地方话做标准语？这是因为目前我国的所谓‘国语’，或曰‘普通话’，人为的性质太过分，离开实际语言太远了，它不能够叫作‘国语’；一种国语必须有一个地方语做标准，现在真正国语未成立之前，应该以有最大影响的地方语做标准语来过渡。于是，我就采用了北京、汉口、上海、广州4个地方语。





李维汉



瞿秋白

这4个地方都是中国产业中心或政治中心的最大城市,因此这4个地方语基本上能够代表我国大多数人的实际语言,并且它们都有相当影响的文学作品。”

说到这里,他显出坚毅的神情:“做这本书,是十分冒险的,但我不怕。任何一项创新的事业都会遇到相当的阻力。我要率先向旧的传统宣战,为后继者扫除前进的障碍,使最近的将来中国真正有一种拼音文字出现。”

瞿秋白、李维汉听他云山雾罩地大侃了一番文字学,面面相觑,搞不清这老头子怎么突然对搞学问感起兴趣来。

李维汉道:“独秀同志,你研究学术问题这种严谨求实的态度很值得我们敬佩和学习,但你是老革命,我们还是希望你能振作革命精神,为党多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

陈独秀突然沉默起来,好半天才两手一摊,苦笑道:“我原本就是一个教书匠,投身政治十几年,总结起来,多半是失败的,现在老了,重操旧业,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做点学问有何不好?再说,以我现在的处境还能做什么呢?”

瞿秋白和李立三交换了一下眼色,试探地道:“你最好还是到苏联呆上一段时间,一则可以养养身体,二则那里比国内安全,三则可以好好总结一下中国革命的问题。”

一听到“苏联”两个字,陈独秀脸色马上变了,断然拒绝道:“谁让你们来劝我的?是那个罗明纳兹?还是你们嫌我老头子在跟前碍事?我不去苏联,要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我在中国研究,干吗要到外国去!”

瞿秋白见他不高兴,知道多劝也没用,只好又说:“这个问题咱们从长计议。最近中央决定重新办一个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由郑超麟同志负责,你就为刊物写一些文章如何?”

陈独秀面色这才缓和下来,点点头:“写文章我乐意,只是文章写不长,我还要赶写我的书稿。”

李维汉笑道:“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现在形势十分严峻,到处白色恐怖,写短文更适合。”

两人又同陈独秀聊了一会儿,见实在无话可说,便告辞了。

1927年10月后的一段时间内,陈独秀基本上不和任何人来往,也没有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发表任何评论,而是把全部精力放到学术研究上。不管谁来看他,寒暄几句后,他就开始和你聊文字学。遇见湖北人时,他问这几个字湖北音怎么读;遇见广东人时,又问那几个字广东音怎么读;他还专门请邓颖超校核北京话、项英校核汉口话、沈雁冰和陆缀文



校核上海话、杨殷和罗倚园校核广州话，俨然成了一个大学教授。

郑超麟后来回忆道：“陈独秀自从武汉退出领导机关以来，就未曾为了他的地位而斗争，未曾团结一部分同志在他周围。他甚至反对若飞和乔年的活动。到上海后，他专心研究中国文字拼音化问题，除他以外，没有一个同志对此问题感兴趣。我们对他这个文字工作有种种猜想。尹宽认为他这事情同《汗书》里的曹参为相一般，人家去见曹参有所建议时，曹参总是醉人以酒，以堵塞建议者之口。总之，当时没有人相信他认真重视这个文字工作的。”^①

但是，不管人们怎么猜测，陈独秀我行我素，依旧关起门来搞学问，到1929年3月终于写成《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书。

与此同时，陈独秀并没有忘记瞿秋白交给他的任务。短短4个月的时间里，他以“撒翁”为笔名，在党中央机关刊物《布尔什维克》上专辟“寸铁”一栏，一口气发了140篇“寸铁”短文，猛烈抨击宁汉合流后的国民党反动势力的丑恶嘴脸。

瞿秋白有一次问郑超麟：“你对仲甫的文章怎么看？”

郑超麟道：“仲甫的文章依旧是宝刀不老，豪情不减当年，但从署名上看，我想是喻意撒手不再过问党内事宜的意思。”^②

瞿秋白笑道：“你以为仲甫关在屋里埋头研究学问，写文章署名用‘撒翁’就表示他永远撒手不过问政治了？这说明你太不了解仲甫了，他这个人永远是永远不甘寂寞的，尤其是想不通的问题，谁也别想让他盲目服从。”

果然，时隔不久，陈独秀开始郑重其是地给中央写信，阐发自己对时局、对中央政治路线的看法了。



^{①②}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第

六

章

面对白色恐怖和“革命低潮”，陈独秀得出了革命应该全面退却的结论；毛泽东则从中看到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

二十四

八七会议之后，不屈不挠的中国共产党人以生命和鲜血为代价，在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区域，尤其是在大中城市及其近邻，发动了一轮又一轮激烈的起义、暴动，终使一度陷入低谷的热潮又呈星星之火之势。然而，中共党内蕴藏的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复仇心理和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不满情绪也迅速爆发出来，从而助长了“左”倾思想的发展。在湖北，暴动的队伍中出现了“杀尽土豪劣绅”、“不用一切钞票”的激进口号；在湖南，愤怒的群众自发起来对付反革命恐怖，捉到地主就杀，地主跑了就烧他的房屋；江苏省委更是进一步把部分群众的盲目行动上升到方针高度，提出“厉行红色恐怖”的错误口号。于是，在党内形成一种舆论：“左”是站着斗，右是跪着降，“左”比右好，从而在批判右的倾向时掩盖了“左”的倾向的存在，并且为“左”的东西披上了“最革命”的外衣。



瞿秋白终于无法驾驭这种极端情绪化的局面，令人遗憾地走向另一个极端，犯下了“左”倾盲动错误。从1927年10月开始，中央连续下命令在各地搞武装暴动。11月间，江苏省委发动宜兴、无锡一带农村暴动时，要求所有群众必须参加，“不来者以反革命纪律



制裁”^①；同时脱离实际地规定：“暴动一起，即应取攻势，不得有丝毫准备退后或准备失败的心理，譬如暴动起时只一千人，然而到第二天至少要增为五千人，第三天至少要增为二三万人。”^②结果，起义不到1天，即被镇压。城市工作更是“左”得出奇，中央决定武汉工人总暴动时，武汉市只有200个党员，而国民党军队有10个师，起义结果可想而知。这样，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各地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摧残，共产党员由近6万人锐减至1万人，革命进入了低潮。

公正地讲，对中共党史上出现的第一次“左”的盲动主义，虽然是以瞿秋白的名字认定的，罗明纳兹的错误指导却是形成这次盲动的直接原因。当各地武装暴动失败的消息陆续传到上海后，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不但不从指导方针上寻找原因，反而变本加厉，加大了推行力度。

1927年11月9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中央政治局委员外，还有中央指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重要的省委或中央分局代表，共十几个人。南昌起义失败后辗转到香港的周恩来接到中央的指示，于11月上旬也从九龙乘船赶赴上海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议共进行了两天，由瞿秋白主持，通过了由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

在革命性质上，罗明纳兹认为，中国革命是马克思所称的“不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的进程必然要从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这就明显地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不懂得无产阶级在领导人民大众夺取政权后，还需要经过一个政治上、经济上实行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

在对革命形势的分析上，罗明纳兹认为，中国革命的进展虽然受到历史挫折，但它始终继续不断地发展，尤其是农民暴动自发地到处爆发，而有汇合起来成为工农民众的暴动，推翻军阀、豪绅、资产阶级统治之趋势。这种关于中国革命形势一直高涨的说法，否认了当时中国革命形势总的来说处于低潮，否认了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

在“现时总策略”上，罗明纳兹提出了“左”倾盲动主义方针：“努力使互相隔离零星散乱的农民暴动，变成尽可能的大范围内的农民总暴动。”“党的责任是努力领导工人日常斗争，发展广大群众的革命高涨，组



① 《暴动须知》，载《江苏省委通讯》第2期，1927年11月20日。

② 《江苏省委紧急决议案》，1927年11月9日。



暴动〔织暴〕动,领导他们到武装暴动,使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①由此可见,这个总策略的核心是武装暴动,是城市加农村暴动的汇合。罗明纳兹并不认识在中国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性,而是强行按照苏俄模式搞城市中心论。

当各地武装暴动遭到失败后,罗明纳兹不仅不从指导方针上寻找原因,反而提出了专门处罚领导起义失败同志的“政治纪律”。11月会议上,根据他的提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在组织上实行惩办主义的政策。

谭平山首当其冲地遭到了开除党籍的严厉处分。

谭平山是广东高明人,生于1886年,早年加入同盟会。五四运动时期是北大学生领袖,后受陈独秀委托组建广东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委常委、中央组织部部长和中央秘书长。1926年11月,他又在共产国际七大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中国委员会主席。中共五大时,曾一度被斯大林看好顶替陈独秀任总书记。就是这么一个老资格的革命者,竟然在参加领导南昌起义兵败之后,突然被开除了党籍。

关于谭平山被开除党籍的原因,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南昌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个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

毛泽东的处境也非常不妙。

秋收暴动后,毛泽东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没有按照中央指示盲目攻打长沙,而是带着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这种做法就连一向自以为是且对毛泽东颇有成见的张国焘也赞叹不已,他说:“由于毛泽东的老练,能根据本身的处境来采取行动,保全了若干实力,因而后来能成为井冈山上的英雄。”毛泽东“所并〔拼〕凑起来的队伍,以农民武装为骨干,来不及与南昌暴动的主力相会合,乃向湘鄂边境的山区单独行动。当这些队伍企图进攻平江、浏阳等县城,遭受到严重失败的时候,毛泽东曾被批评为专凭枪杆子的军事冒险主义者,也即是不肯发动群众的机会主义者。当他受着敌军的压迫,向井冈山退却的时候,又被批评为不顾群众的逃跑主义者。他也因此受到接二连三的处分。但他能掌握了这支约一千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455~457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谭平山

人的部队,建立井冈山基地,并费尽心机来应付中共中央的指摘,才没有成为盲动主义下的牺牲品”。^①

张国焘这里所提到的“受到接二连三的处分”,即是指11月会议上罗明纳兹撤销了毛泽东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书记的职务。更为倒霉的是,这个处分决定传到井冈山时不知怎么走了样,竟然变成了开除党籍,这使毛泽东过了一段十分难熬的日子,直到次年误传才得到纠正。

同时,罗明纳兹还指责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给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委全体成员“警告”的处分;张国焘被撤销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只是因为周恩来具有公认的卓越才干,同一次会议上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

至于陈独秀的问题,尽管会前王若飞提议,按照组织原则,应该通知名义上仍是中央委员的陈独秀参加会议,但马上遭到罗明纳兹的拒绝。同时,会议再一次决定,陈独秀要去莫斯科领命。^②

11月会议结束的第二天,陈独秀便见到了这次会议中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看过之后,他拍着桌子直摇头:“胡闹!完全是胡闹,典型的‘左’倾盲动!”倔强的陈独秀终于忍耐不住,晚上彻夜不眠,奋笔疾书,给中共中央发出了第一封带有鲜明政治观点的信,公开反对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提出了一整套完全退却和防御的策略。

他不同意中共中央认为大革命失败后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是直接革命形势”的观点。他认为:“国民党虽然不能长久统治巩固,而眼前尚不至崩溃,因此,我们以群众力量扫荡它们夺取政权的时机尚未到。在实际行动上若取时机过早的政策,更是错误。”据此,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即目前“不可存‘以暴动取得政权’的幻想”,“万万不可随便做政治的暴动,尤其是上海”,要动,也“应偏重经济的斗争”,“我提议用‘四不’口号(不缴租,不完粮,不纳捐,不还债),更简单明了,容易唤起广大的农民群众,而且又可以通行全国”。^③

11月12日,意犹未尽的陈独秀再一次上书党中央,批评党中央11月会议精神通过的“所有政治的经济的政纲”“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政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45~346页,东方出版社,1991。

② 李培之:《飞度关山的人——回忆王若飞同志》,载《人民日报》1982年1月8日。

③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第554~555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纲”，且明言是“武装暴动的工农革命”，这与共产国际屡次决议案中说的“民族革命”不同，由此要求中央迅速“确定现在革命性质及吾党政纲”。^①

二十五

12月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对陈独秀的来信沉默了1个月之后，终于给他发出第一封回信。回信回避“革命实质及吾党政纲”问题，着重对陈独秀关于形势分析和放弃武装暴动而主张偏重经济斗争的意见做了驳斥，指出：“发动工农的经济斗争，以引导到政治暴动是非常之必要，而且是唯一的方针。”至于陈独秀指出的“四不”意见，虽然对于“发动农民群众是非常之对，非常之必要”的，但由于“农民群众在现在的阶段，已经分不开经济与政治的”，所以“只准备做经济斗争，而不要指出政权的目标，这就不对了”。“如今经济上改良的可能非常之少……非工农自己取得政权是不可能得着改良。”^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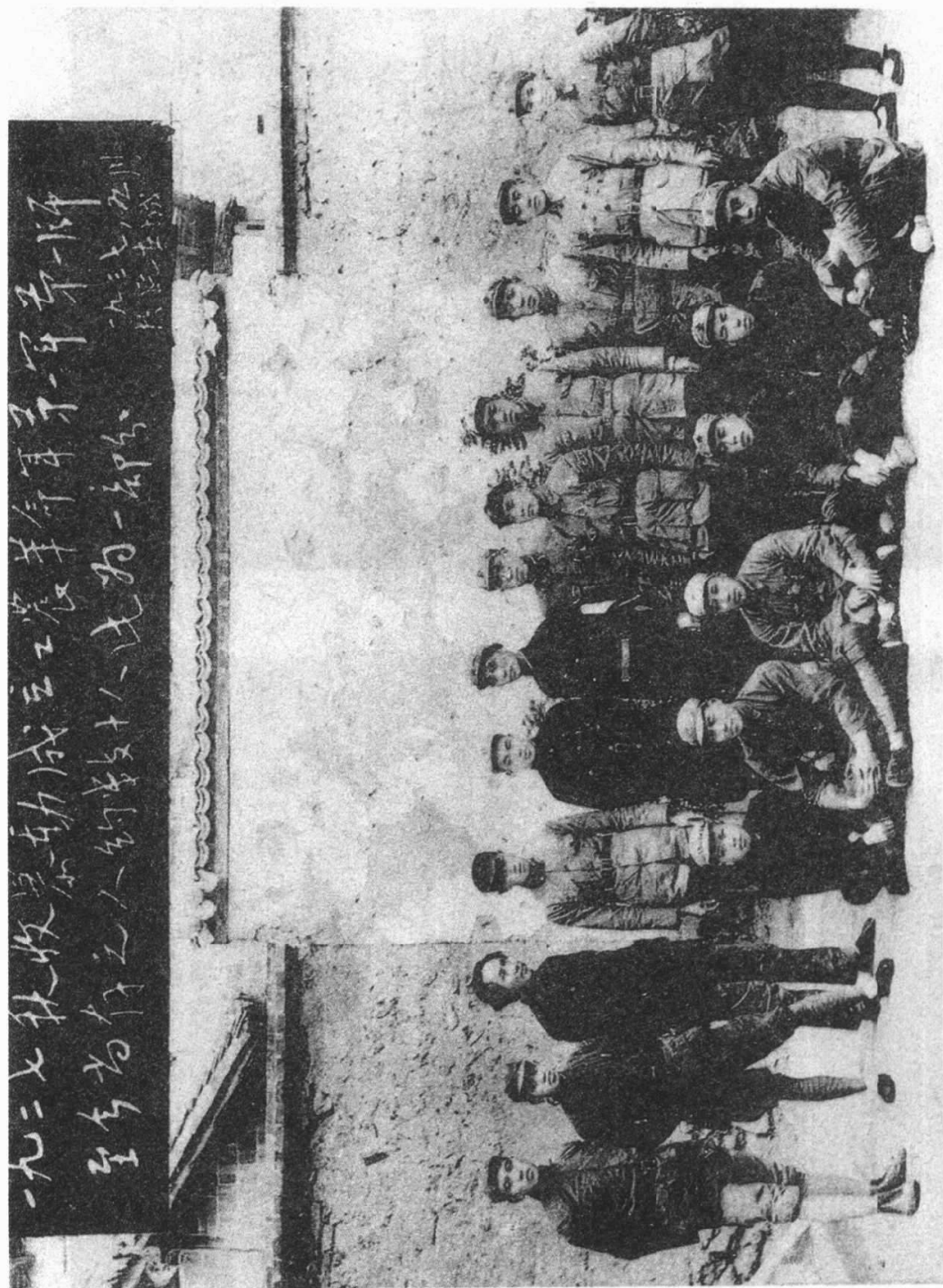
12月13日，陈独秀得知广州起义爆发后，又致函中共中央，对广州起义采用“工农政府”、“独裁政府”、“苏维埃政府”这些口号提出疑义，其理由是“苏俄政制精义是无产阶级独裁，离此，则苏维埃无特殊意义”。这些意见表明，他当时仍然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民主革命。然而，对于中央提出的武装暴动政策，他不再坚持反对，甚至赞成举行广州起义：“广州暴动，无论成败我们都应该做！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对广州暴动提出了5点建议，以求防止“一旦失败，我们什么也得不到”的最悲惨结局：

（一）在广州的非战斗员悉数迁到有农民暴动之可能的地方，迅速促其暴动，此事一刻也不能延搁……不如此，则不独广州孤立不能持久，并且广州一旦失败，我们什么都得不着。

（二）不要用“工农政府”、“独裁政府”和“苏维埃政府”，改用“工农兵平民（贫民亦不妥）代议政府”。

（三）放弃国民党旗帜，国民党各级党部如有赞成土地革命者，可与之党外合作……即谭平山如以国民党地位，或另组他党而能从事土地革命工作，我也不可加以排斥，我们不可持“党外无党”的谬见。

^{①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551～553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毛泽东与参加秋收起义的部分人员合影。



叶挺



张太雷

(四)广州离香港太近,反帝行动要慎重。

(五)共产国际代表不要参加广州事变。^①

毫无疑问,1927年12月11日爆发的广州起义,是中国无产阶级为建立苏维埃政权而进行的一次英勇尝试。把无产阶级反抗统治者的英勇斗争看作盲动是极其错误的。但是,群众的英勇斗争也绝不能掩盖“左”倾盲动主义所带来的危害。就在起义爆发的同一天,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站在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的讲坛上,满怀信心地预测着中国革命的未来:“只有瞎子和懦夫才会怀疑中国工人和农民正在走向新的革命高潮”。布哈林则乐观地估计说:“在广州,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就有5个县由农民苏维埃控制的,建立了苏维埃政权……这个政权发动了真正的消灭地主的斗争。在那里有三四百个地主被砍了脑袋……在这有几百万居民的地区内,地主已经被从肉体上消灭了。”正是在这样的指导思想指引下,罗明纳兹头脑发胀地估计了人民群众英勇斗争的精神力量,不是把广州起义看作革命高潮渐趋低落的一场掩护战,而是看作中国革命高潮到来的开端,一味强调进攻,反对必要的有计划的退却,终于导致了广州起义的失败。

多年后,周恩来深刻总结了广州起义的教训。他认为:起义是可能的,但坚守不容易,“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国际代表是德国人纽曼,他主张起义后坚守广州,建立苏维埃。起义的总指挥叶挺同志是起义的前夜才请去的。叶剑英同志刚入党,搁在一旁没有被用。叶挺在起义的当夜主张把队伍拖出去,纽曼大骂叶挺动摇,说广州起义是进攻的,应该‘进攻进攻再进攻’。第二天张太雷同志牺牲。第三天大败,仓皇退出。结果张发奎回到广州,来了个大屠杀。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②

陈独秀提出的5点建议,相当一部分与周恩来的反思完全一致,这也说明陈独秀当时的预测是正确的。

就在党中央收到陈独秀来信的同时,传来了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因此,中央给陈独秀的回信口气就显得较前一封信缓和得多,对他提出的5点建议也做了耐心的解释和回答。对第一条建议,中央解释道:“广州暴动没有大规模农民暴动配合。”对第二条建议,中央予以否决:“广州



① 《中共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7年12月。

②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74~175页,人民出版社,1980。



暴动时已提出了‘工农代表会’，我们不要怕说‘独裁’，独裁是任何革命中都需要的”。第三条建议，中央回答：“召开的两党联席会议恐是不能实现的。”对于第四条建议，中央表示“同意”。对于第五条建议，中央答复是“已不是问题”。^①

虽然在对待广州起义问题上，陈独秀和党中央多少有了些共同语言，因而双方的关系一时也有所改善，但从总体上来看，中央并没有采纳他提出的意见；同时，中央对他的处理意见也未见任何更改的意思。这使陈独秀一直耿耿于怀。

应该说，陈独秀在当时党内普遍认为中国革命处于继续高涨时期的形势下，能够清醒地看到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并且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向中央提出自己的看法，实属难能可贵，体现了一个老党员的政治觉悟和人品。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陈独秀站出来与中央路线唱反调的时候，远在千里之外偏僻山沟里的毛泽东同样也认为革命形势目前处于低潮。

毛泽东曾对大革命失败后的敌后态势做过如下详细的概括：“现在全国是反革命高涨时期，被打击的中间阶级在白色区域内几乎完全附属于豪绅阶级去了，贫农阶级成了孤军。”^②红军的敌人国民党“是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地稳定了它的政权的党。它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已改造了它的军队——改造得和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都不相同，而和世界现代国家的军队却大体相同，武器和其他军事物资的供给比起红军来雄厚得多，而且其军队数量之多超过中国任何一个历史时代的军队，超过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它的军队和红军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它的政权是全国性的政权”，而“我们的政权是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僻地的政权，没有任何的外间援助。革命根据地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条件同国民党区域比较是落后的。革命根据地只有乡村和小城市。其区域开始是非常之小，后来也并不很大。而且根据地是流动不定的；红军没有真正巩固的根据地。红军的数量是少的，红军的武器是差的，红军的粮食被服等物质供给是非常困难的”^③，“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



① 《中央政治通讯》，第14期，1927年12月。

② 《井冈山的斗争》。

③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后,才慢慢地起来……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終了”。^①

但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在领导秋收起义和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实践中,不仅看到了革命的低潮形势,而且看到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看到了“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看到了“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的希望和可能。他对中国革命的现实有着入木三分的认识,能在革命处于最低潮时期满怀信心地预见:“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的婴儿。”^②

陈独秀则与毛泽东有着截然相反的判断和结论。

陈独秀此时毕竟居住在大城市,并且已经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对敌我双方形势的变化情况知之不多,只能根据自己视野所及的一些现象和国民党报纸的报道来判断革命形势。在他眼中,过多地看到的是革命力量和各地武装暴动在城市中的失败,对毛泽东领导的工农红军这股新生的革命武装力量的作用和意义估计不足,对整个形势的看法不免失之偏颇、流于肤浅和表面。

陈独秀认为军人总是压制人权和自由,是和贤明政治不相容的。他把红军看作是游民无产者和土匪的组织。他认为这些人只会在乡下制造动乱,对无产阶级革命毫无益处。在陈独秀看来,只有在革命快要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完全控制了局势时,才能够建立红军,红军引不起革命,只有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够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和掌握苏维埃。甚至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还顽固地坚持这一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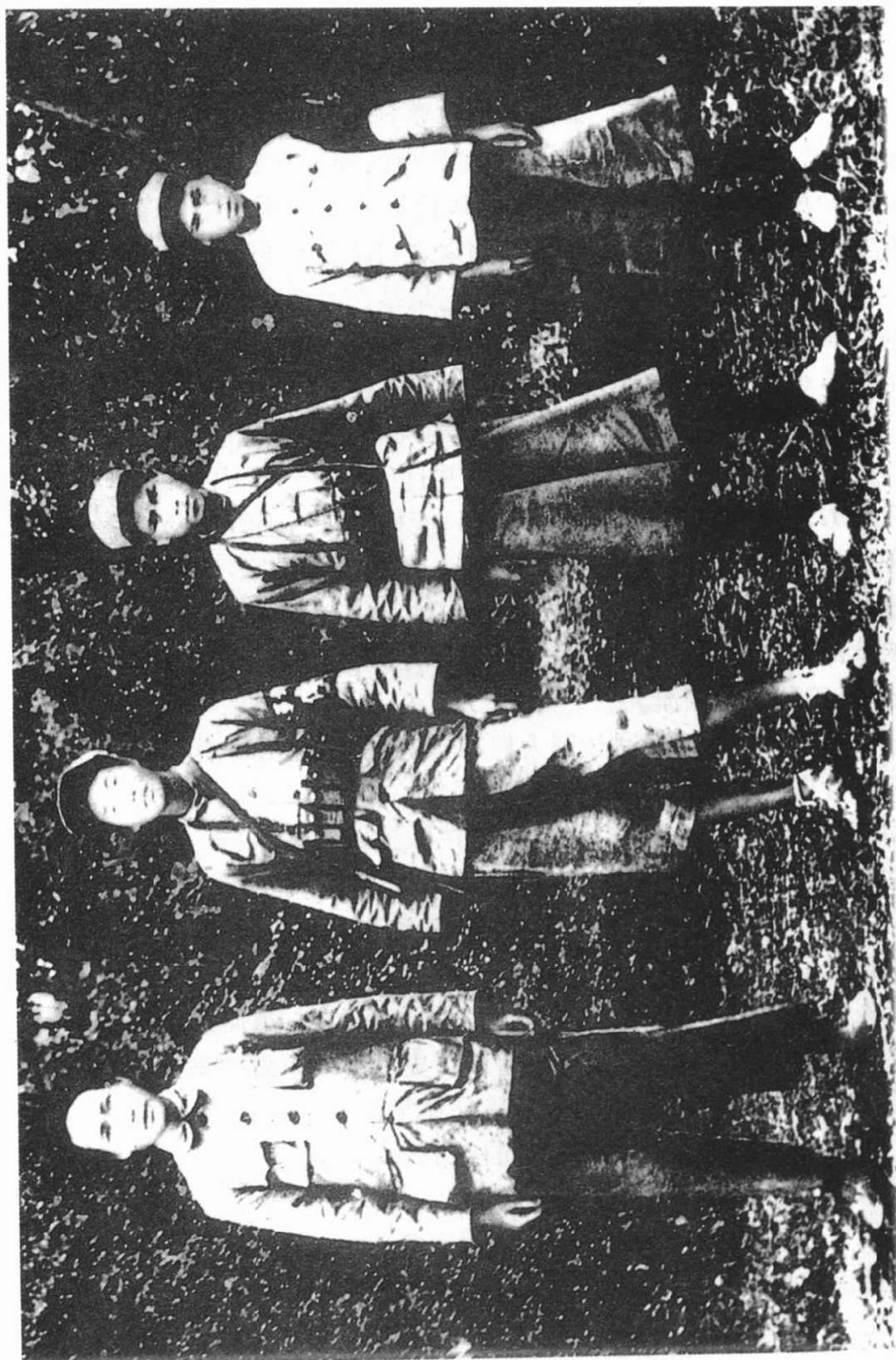
陈独秀的悲剧就在于他不理解这样一个真理:革命运动取得胜利,通常都是通过军事行动。他也没有从历史上吸取重要的教训:每个朝代都是建立在军事实力基础上的,或者是靠掌握了兵权。

在这一点上,托洛茨基和他同样弱智。托洛茨基甚至嘲笑毛泽东说:“认为农民可以独立地建立苏维埃,是在相信奇迹;认为可以组织农民的红军,也是奇迹。”在他看来,在远离城市的偏僻农村建立苏维埃和由农民组建红军等,是根本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

① 《井冈山的斗争》。

②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31年的毛泽东与红军战士。

陈独秀和托洛茨基在这一问题的看法上的不谋而合,成为他后来接受托派观点的重要思想基础。

有意思的是,这两个同时指出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的中央委员当时都不得志:毛泽东刚刚受到了撤销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甚至被误传开除了党籍。陈独秀则只是一个被剥夺参加任何党内会议资格的挂名中央委员。他们关于中国革命“低潮论”的看法无一例外地得到了中央的严厉批评和讥笑。

所不同的是,由于毛泽东处于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对这个问题看得显然比陈独秀要高一筹,更真切,更深刻。他从“革命低潮”中看到了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找到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成功。陈独秀则从“革命低潮”中得出了革命应该全面退却的结论,最终滑向取消主义的泥坑。

二十六

这天晚上,陈独秀正趴在桌前赶写一篇短文,秘书韩少宫悄悄走进来,有些兴奋地说:“独秀同志,你看是谁来了?”

陈独秀抬起头,见一位英俊潇洒的青年站在他的面前,后面还跟着一位剪短发、穿旗袍的年轻女子,不觉眼前一亮:“乔年,静仪,你们从哪里来?我可有日子没见你们了。”

来人是陈独秀的二儿子陈乔年和他的夫人史静仪。陈乔年生于1902年,1919年赴法国巴黎勤工俭学,1922年经越南共产党领袖胡志明介绍,和陈延年、赵世炎、王若飞一起加入共产党,1923年转入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回国后,任中共北京地委组织部长,中共五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任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八七会议后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史静仪是湖北应城人,留苏学生。两人于1926年结婚,次年5月在武汉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红五”。

陈乔年道:“前段时间我在武汉得了伤寒,躺了两个月,最近中央调我到江苏省委担任组织部长,刚到上海没几日。”

陈独秀关切地问:“我还在武汉时就知道你得了伤寒,可那时候汪精卫已经叛变革命,正在到处抓我,中央不允许我到医院去看你,我是干着急没办法。你从小身体就不如你哥好,自己要多加注意。”

提到大儿子陈延年,陈独秀的脸色顿时阴沉下来。半年前,陈延年





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



陈独秀的次子陈乔年

在上海被捕,不久便被残害在龙华监狱。

陈乔年见父亲伤心,忙岔开话头问:“爸爸,听秋白同志讲,你最近正在研究拼音文字,进展怎样?”

一提起拼音文字,陈独秀又来了精神,兴致勃勃地对儿子说:“我写的这本《草案》,拟定的单声母和单韵母共43个,采用的字母形体是最完备的国际音标,但也有小小增改的地方。这是因为中国结合声母的语言特别发达,国际音标不尽适用。于是,我就依据音理参照国际音标及各国字母,创造了9个结合声母及3个单声母。”

陈乔年道:“看来你是不打算过问政治了?”

陈独秀道:“不过问了,不过问了,我已经老了,革命是你们年轻人的事情喽。”

“可你在中央机关刊物上不停地发表文章,评论时政。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撒翁’一定是你的笔名吧。”

陈独秀笑道:“不亏是我的儿子,一眼就看出是老子的文章。不过,我那都是为了消遣,秋白一再找我约稿,不好推辞。撒翁撒翁,自然是撒手从此不再过问党内的事情。”

“你要是能从此撒手不再过问党内的事情,那你就不是我的父亲了。这是你刚写的诗吧?”陈乔年从桌上拿起独秀刚写的文章,轻声念道:



苏维埃的列宁永生,孙中山的精灵不冥;
热血未干的朋友们呀,
快放下你们的葡萄酒杯,莫再如此地在昏迷沉饮;
烈火已将烧到你们的脚边,你们怎不来自卫生命?
呀,趁你们的声音未破,快起来把同伴们唱醒;
趁你们的热血未干,快起来和你们的仇敌拼命;
在这恶魔残杀的世界,本没生趣之意义与价值可寻;
只有向自己的仇敌挑战,就是死呀,死后也得安心。
莫忘了你们尊贵的使命!①

史静仪听罢,连声赞道:“好诗,好诗,字里行间充满革命激情,这等激情就连我们这些年青人也自叹不如呀!”

陈独秀有些尴尬:“一时诗兴发作,偶尔为之,不足为奇。”

① 孙文光辑:《陈独秀遗诗辑存》,载《安徽师大学报》1989年第4期。



陈乔年又问：“可你接二连三地给中央写信，又是什么意思？”

陈独秀道：“我见到了于革命于党有害的事情，不能不说，我不会顾忌你们说我是机会主义者。再说，我对中央路线有看法不能提吗？起码我还是中央委员嘛。”

陈乔年苦笑道：“你这个中央委员现在还不是有其名无其实！中央11月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让你参加了吗？”

陈独秀不满地说：“他们不让一个中央委员出席中央会议，这恰恰说明党内生活不正常、民主作风发扬得不够，这更需要党员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他们总不能剥夺一个普通党员向中央反映个人意见的权力吧。”

陈乔年劝道：“爸爸，你这个人的脾气就是固执，大革命的失败已经证明了你的错误，不去莫斯科反省，在家搞点文字学也很好嘛。为什么非要提意见？这不是自找难堪吗？别人会以为你对中央的处理决定不满。”

陈独秀有些生气：“我就是不满！大革命失败了，我比谁都难过，对此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不能把责任全部推到我一个人身上。斯大林天天坐在那里遥控指挥，事事都要经过他的批准同意，稍有不从就说你反对共产国际，这叫我如何工作？”

史静仪见父子俩吵了起来，忙道：“乔年，你和爸爸难得见面，还是不谈政治好。”

陈乔年不听妻子的劝说，又指责父亲说：“不管你怎么辩解，你过去执行的路线和政策都是错误的。你现在对中国革命性质的看法也是错误的，不能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资产阶级身上，党应该有自己的武装，走苏维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革命才有希望。”

陈独秀见陈乔年振振有词地对他一番“说教”，十分恼火，一时又无法反驳，便转脸对史静仪说：“静仪，你看看，这还了得，儿子竟然教训起老子来，简直是岂有此理！”

史静仪说：“爸爸，乔年也是为您着想，您这么大岁数了，身体又不好，借这个机会激流勇退，毕竟是我们党的创始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到莫斯科去搞点学问多么好，省得在这里担惊受怕的。”

“莫斯科我不去，我要在这里和同志们一同战斗。”

陈乔年忍不住道：“爸爸，你也应该有点自知之明，你以为你现在是谁。你以为地球离开你就不转了？你好心好意为中国革命的前途着想，一封接一封给中央写信，可换来的是什么？大家都拿你的意见当笑料到处宣传，一边看，一边骂，根本没有人理解你的意见。现在，从国际到中



央再到地方，整个党内都说革命形势在不断高涨，都在准备暴动，武装反抗反革命。只有你一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说革命处于低潮，要我们大家不要武装暴动。别人怎么看你？你何必自讨没趣，我都替你脸红。”

陈独秀没想到乔年会说出这番话来，呆了半晌才说：“中央真的拿我的信当笑料宣传？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尽一个普通党员的义务，我是真心实意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担忧。他们怎么能这样！”

陈乔年突然又有点可怜父亲，轻声说：“爸爸，我从小就崇拜你，觉得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无所不能，无坚不摧。现在我长大了，我有我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了。你是一个大学问者，但不会成为大政治家。还是听儿子一句劝，离开残酷的政治斗争，搞点学问吧，你一定会大有成就的。”

陈独秀像是没有听见儿子的安慰，自语道：“现在国家一片黑暗，需要的是行动和斗争，而不是关起门来做学问、研究理论。算了，跟你说你也不懂，总之我不再给中央写信就是了……”

陈乔年不敢再说什么，一时大家都沉默起来。乔年又坐了一会儿，见实在无话可说，便和史静仪双双告辞。陈独秀将儿子送到房门口，默默地望着乔年夫妇消失在黑幕里，好半天才关上屋门。

他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他与乔年见的最后一面。



二十七

陈独秀虽然不同意陈乔年对他的批评，但乔年提到“党内一些同志却拿他的信当笑料”对他刺激颇深。因此，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没有再给中央写信。

转眼冬去春来，到了1928年春天，陈独秀无所事事，便继续闷在屋里写他的文字学书稿。这天晚上，忽听得有人敲门，开门一看，走进两个年轻人，原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周恩来和江苏省委常委、农民运动部长兼宣传部长王若飞。

“稀客，稀客。恩来，若飞，有一段时间没有见到你们了。”

周恩来、王若飞和陈延年、陈乔年早年同在法国勤工俭学，共同发起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来王若飞又和延年、乔年同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回国后，周恩来和延年同在广东省委工作；王若飞则在陈独秀身边工作，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又与乔年同在江苏省委工作。



王若飞



周恩来

周恩来一向十分尊重陈独秀,即使是他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后,还经常看望他,照顾他的生活。王若飞则与陈乔年私交颇好,大革命失败后,曾经因为反对采用整人的方法对待陈独秀,受到11月会议的“警告处分”。陈独秀看见他们两人自然心中高兴。

周恩来道:“上个月,我受中央委托,去了一趟香港,主持召开广东省委扩大会议,纠正立三同志在处理广州起义善后中的‘左’的错误。这不,刚刚回到上海。”

陈独秀问:“立三同志什么时候去了广州?”

王若飞说:“立三同志是春节后以中央代表的身份去的广州,主要是去处理广州起义失败的善后事宜。结果他到了广州之后,把这次起义说得一无是处,并且指责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省委犯了军事投机的错误,在关键时候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广东省委有许多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采取惩办的办法,处分了很多起义领导同志,搞得影响很不好,广东的工作也无法开展。”

“广州起义还是有必要的,失败了需要总结教训,单纯采用整人的办法不好。”陈独秀连连摇头:“立三同志毕竟年轻,头脑简单,容易发热。”

王若飞又说:“恩来同志也认为不妥,所以中央专门派他去重新处理这件事。”

周恩来道:“广州起义是必需的,它在中共革命史上的意义是不容抹杀的。起义之所以失败,关键是敌强我弱,没有争取广大农民的配合,在战斗形势不利时又没有及时撤退转往农村。立三同志确定的处分决定是不对的。”

陈独秀连连点头:“恩来处理得对。我在起义之初就给中央写过信,专门指出要有农民暴动进行配合,可秋白不听。怎么样?起义失败后连退路也没有了。”

周恩来接着说:“这次到广州,我对广东的地方党组织领导情况进行了一次调查。目前党的组织确实已到了极严重的时期,党的力量极弱,绝难以发动暴动。上到省委,下到广州、汕头市委,直至农村支部,被全部破坏。有的党员只知表示个人勇敢,称匹夫之勇,反对秘密工作,结果做出了无谓牺牲。有的被反革命气焰吓破了胆,躲藏起来。甚至退党叛党的也有。在这种情况下,一味搞暴动,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我已给中央打了报告,建议好好研究一下下一步的方针。”^①

^① 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报告,手稿,1928年4月4日。



陈独秀关切地问：“中央怎样答复？”

周恩来说：“中央在4月28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纠正了中央前一阶段提出的‘中国已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看法。目前城市工作受到挫折，农村工作却又不被重视，而毛泽东却在偏僻的井冈山居然站稳了脚跟，并且领导红军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这值得我们对应该走什么道路进行很好的反思。当前要紧的是农村和城市工作相互配合，二者不可偏废。”

陈独秀笑道：“恩来，你的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批评罗明纳兹的‘不间断革命论’。”

王若飞解释道：“独秀同志，你还不知道，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在今年2月25日作出了一个《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中央也是前两天刚刚收到。这个决议指出：目前中国革命正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认为罗明纳兹提出的现阶段中国革命已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关于中国革命是‘不间断的革命’的说法也是错误的。决议提出，中国革命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目前全国还未出现革命运动的新高潮。国际同时还决定调罗明纳兹回国，秋白同志也到莫斯科汇报工作去了。”



王若飞这里所提到的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纠正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起了决定性作用。1928年4月28日，瞿秋白根据这次会议指示，离开中共领导岗位，赴莫斯科汇报工作。罗明纳兹也奉调回国，不久被打成“反党集团”分子。1934年，罗明纳兹经不住打击，自杀身亡，随后被联共（布）中央开除出党。

陈独秀道：“共产国际这次还算明智。我早就说现在是中国革命的低潮时期。你看看最近上海的外国驻军大部分都撤回回国了，如果是革命还在高潮的时候，帝国主义肯把军队撤退么？因此，要保存革命力量，千万不要轻易暴动，不能拿同志们的生命开玩笑。”^①

周恩来说道：“共产国际只是谈高潮没有到来，并没有说现在就是低潮时期。我们现在如果一味强调革命低潮，势必会使党内滋长一种灰心、沮丧的情绪，对革命的推进产生消极的影响。所以中央的意思是，革命潮仍是高涨的，但不是一个最高潮。”^②

陈独秀道：“高潮就是高潮，低潮就是低潮。中央现在定的调是‘不是最高潮’，到底是高还是低？下边的同志怎么干？无所适从嘛。这样

① 参见郑超麟著《陈独秀与托派》。

②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28年4月28日。

很容易再犯路线错误的。”

周恩来一时无语。说实在话,周恩来此时的心情是十分矛盾的。他在南昌起义后,转战途中,患上恶性疟疾,几乎丢了性命,辗转到香港只养了半个月的病,稍一好转,便被中央催促着从九龙乘船来上海参加11月会议。会上,罗明纳兹对南昌起义提出严厉的批评,指责周恩来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政策”,给他以“警告”处分,但当时中央工作又离不开他,结果他在八七会议上刚刚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又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并兼任组织局局长,担负起处理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

11月会议后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和瞿秋白的观点基本相似,认为目前中国革命并没有低落,而是继续在高涨。但是,由于他历来注重实际,所以很快就感到各地盛行的军事冒险行动是危险的,会招致重大的损失。于是,他在1927年12月24日针对江苏省委计划明年元旦在大江南北同时发动全省暴动提出了不同意见,提出:日期不应如此定,要看预备的程度来定。1928年1月14日,他又代表中央给湖北省委写信,指出:“中央认为你们有无政府党与盲动主义的倾向,即是认为一切的斗争都是暴动,无往而不暴动,一切解决于暴动。”^①

党史专家金冲及这样描绘过周恩来当时的政治态度:“自然,周恩来当时在这方面的认识还很有限,主要是从战术上而不是从战略上提出来问题的,他对革命潮流高涨这一估计并没有怀疑。对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暴动问题上也没有反对。区别只是主张发动暴动必须考虑到主客观条件是否具备,必须做好周密的准备,不能不顾一切地蛮干,这自然是远远不够的,仍不能从根本上纠正‘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②

直到共产国际来信纠正了罗明纳兹的错误主张,中共中央仍然认为:“革命潮仍是高涨的,但不是一个最高潮。”这就说明,“左”倾盲动主义在当时不仅仅是罗明纳兹个人的看法,在整个中共中央内部已经形成共识,并没有人认为这有什么错误。

陈独秀本来对周恩来批评“左”倾盲动主义的做法十分赞赏,但见他又转了一圈,仍认为革命处于“高潮”,便有些不高兴,于是转了话头问:“恩来,你们今天来,肯定有什么事情吧?”

周恩来和王若飞对视了一下,说:“根据国际的指示,中央决定6月



① 《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96~197页。

②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

间在莫斯科召开党的六大,检讨中央现行政策,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研究部署今后的工作。”

陈独秀说:“是应该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认真总结一下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和教训。”

周恩来又道:“国际还专门来了指示,特邀你和国焘、和森、章龙、中夏5人直接出席,不必经过中共中央推荐选举。”

陈独秀马上回绝道:“莫斯科我是不会去的。”

王若飞道:“国际现在已经意识到‘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正在纠正,说明他们同意了你对中国革命的一些看法,这对你应该是一个改善同国际关系的机会。不如借此机会到苏联,彼此将问题讨论透,这对中国革命前途和你个人的政治前途都有好处。”

陈独秀冷笑一声:“我还有什么政治前途?八七会议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儿推到我的头上,足见早有牺牲我一人的决心。共产国际这是文过饰非,拿我当替罪羊。大革命失败了,作为总书记,我自然有责任,可共产国际更有责任,我只是国际指示的一个忠实执行者而已。我不会做违心的检讨,也没有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现在要我去苏联讨论中国问题,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外国去讨论?苏联的问题斯大林为什么不来请教中国人?我不去给他们当反面教员。我这个人性子直,不会讲奉承话,不会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但绝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如果到了那里争吵起来,于谁都不好。再说,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莫斯科去研究,在中国就不能研究?”^①

王若飞又道:“听说国际还考虑让你当东方部长,这说明他们对你还是有诚意的。”

陈独秀说:“他们不要老指着我的后脊梁骂我是老右倾机会主义、骂我叛变革命就阿弥陀佛了。我现在再不愿当官,更不能当一个被人牵着鼻子走的蠢牛。恩来你是好意,我心中有数,感激不尽。我在武汉最困难的时候是你帮助了我,我不会忘记的。”

他见周恩来还要说什么,又道:“恩来,你不要说了,我心里明白,中央知道你和若飞与我私交不错,所以委托你们来劝我,秋白也来劝过我多次,无非是怕我和党的路线唱反调。我可以告诉你们,假如六大成绩

^① 参见黄玠然著《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载《党史资料》1979年第1期。



不错,我今后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①

陈独秀屡次拒绝共产国际让他到莫斯科复命的指令,长期以来一直被史学界认为是离党越走越远的叛逆行为,岂不知陈独秀作此决定自有他的考虑和苦衷。

首先,陈独秀此时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已经产生强烈的抵制情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②,而党内却没有人怀疑、也不敢怀疑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领导。陈独秀斗胆包天,第一个站出来对国际的瞎指挥提出了质疑。可惜的是,陈独秀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的思想纵然迸发出闪光的火花,却找不到“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的途径,同时他又不承认后来毛泽东开辟的“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以他宁折不弯的性格,只能用不从来表示抗议。

其次,陈独秀对到莫斯科之后的下场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这从后来一些犯了错误的中共领导人赴苏之后的处境可以得到印证。1930年11月,李立三遵照共产国际命令,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检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没想到,一呆就是15年,饱尝“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滋味。1938年2月苏联肃反扩大化期间,他被诬为“日本特务”,逮捕入狱,坐了1年牢。出狱后,王明竟向苏共中央提出要将他流放西伯利亚,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幸亏正在苏联疗伤的周恩来听说后,为他说话,这才留在莫斯科。直到党的七大前,毛泽东亲自向苏共中央发电报要人,李立三才于1946年1月回到祖国。这期间,瞿秋白、王若飞等同志也都在莫斯科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现在看来,陈独秀坚决不去莫斯科,也算是先见之明。

在这一点上,毛泽东和陈独秀有着同样的机警。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后,由于毛泽东坚决反对“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便提出让他到莫斯科去休养。毛泽东自然明白李德的用意,坚决不离开苏区,宁可到条件很差的粤赣山区去养病,这才避免了李立三悲剧的重演,这才有了毛泽东的随军长征,这才有了遵义会议的扭转乾坤。

这是后话。

周恩来见他态度十分坚决,知道再劝也无益,便只好转了话题:“独

^① 参见张国焘著《我的回忆》。

^②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年6月27日。



秀同志,还有一件事情本不想告诉你,考虑再三,觉得你是老革命,会挺得住的,所以……”

陈独秀见周恩来说得吞吞吐吐,马上有种不祥的预感:“怎么回事?是不是乔年出事了?他已经有3个月没来看我了。”

王若飞道:“是的,乔年同志2月份被捕了,不过现在组织正在积极营救,你不要太着急。”

陈独秀一阵头晕:“其他同志怎么样?”

“都及时转移了。”

“那就好。”陈独秀轻声说:“你们放心,乔年像他哥哥一样,宁死也不会出卖同志。”

周恩来一时也无话可劝陈独秀,默默站了一会儿,便和王若飞离去了。

二十八



陈乔年是在1928年2月16日这一天被捕的,当时他正在上海英租界刺绣女校秘密召开各区组织部长联席会议。与此同时,上海总工会则在酱园路召开各区特派员及各区总主任联席会议。由于叛徒唐瑞林告密,租界巡捕突然包围了这两个会议的会场。结果,陈乔年、郑复他、许白昊等11名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机关负责同志被捕。这是江苏省委和上海总工会继1927年6月陈延年、赵世炎等人被捕之后遭到的第二次大破坏。

唐瑞林当时担任中共浦东区委书记,他的舅父就是蒋介石手下的重要干将缪斌,此人实际上早就和缪斌勾结叛变了,但一直隐藏在党内,伺机给中共机关一个大的打击。由于他的告密,江苏省委、上海总工会机关和浦东区委遭到破坏,不久罗亦农等中共主要领导干部也遭到不幸。

陈乔年等人被捕后,当日被押在英租界新闻拘留所,次日即被引渡到上海国民党淞沪警备区司令部龙华看守所,拘押在天字监1号牢房。

起初,国民党当局只知道捕到了陈乔年,却不知道哪一个是,因为唐瑞林并不认识他。为此,狱中地下党组织经过周密研究,决定由同时被捕的周之楚顶替陈乔年。等陈乔年保释出狱后,再讲明真实身份,到那时敌人也就无可奈何了,这样虽然周之楚有生命危险,但这是营救陈乔年的唯一办法。

周之楚出身商人家庭,父亲是华侨大商人,家财万贯,被捕后虽屡遭



陈乔年的妻子史静仪与儿子

严刑拷打,但始终没暴露身份。当组织上将要他顶替陈乔年身份的决定告诉他时,他完全赞成。所以,当法官再次审讯时,周之楚便承认自己是陈乔年,法官信以为真,便判了周之楚、郑复他、许白昊死刑。

正当营救陈乔年的计划顺利实施时,突然节外生枝。周之楚的父亲得知儿子被捕的消息后,心急如焚,火速赶回国内,四处奔走,打通关节,用重金营救儿子。这样一来,国民党便知道了周之楚的真实身份,陈乔年的身份也就不问自明,狱内外党组织的任何营救措施都不起作用了。

陈乔年身份暴露后,国民党并没有立即杀害他。敌人知道他担任党的重要职务,又是陈独秀的儿子,于是多次对他进行审讯,使用了各种残酷的刑罚,企图逼迫他招供。陈乔年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宁死不屈,虽然被打得体无完肤,却从不泄露一点党的机密。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与郑复地、许白昊一起,在自己的胞兄陈延年牺牲的地方——龙华的枫林桥畔英勇就义,时年26岁。

乔年牺牲的那段日子,陈独秀再也无心写“寸铁”文章,整日坐在桌前发呆。自从他被撤销党的总书记以来,不到1年的时间内,他连续失去了4位亲人。先是去年6月大儿子延年在上海被蒋介石杀害;接着,大女儿筱秀前来奔丧,悲伤过度,暴死于上海医院;今年6月二儿子乔年被杀,史静仪忙于营救,不满周岁的孙子小红五因无人照料而不幸夭折。

陈乔年去世后,史静仪生下一个遗腹女,取名“陈鸿”。1928年底,史静仪奉命去苏联留学,行前将女儿交由党组织托人代养,从此便不知生死,再无下落。

这一连串的打击,令陈独秀痛不欲生,不到50岁的年纪,顿时苍老了许多。在同志们面前,他强撑着不肯流泪,身边又没有一个可以倾吐的亲朋好友,只能将对蒋介石的满腔仇恨和对亲人的无限思念深深地埋在心底,从此便越发沉默不语。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陈独秀在南京监狱中获悉此消息,以为蒋介石肯定性命难保,高兴得像孩童一样,托人打酒买菜。他对人说,生平滴酒不沾,今天为国仇家恨,为大革命以来死难烈士,要痛饮。当他斟第二杯酒时,呜咽起来:“延年、乔年啊,为父的为你俩酌此一杯。”说罢,老泪纵横,痛哭流涕,积压了多年的悲愤终于得到了宣泄。^①

^①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



第

七

章

党的六大后，陈独秀一度信守着“如果六大成绩不错，对共产国际和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的诺言。然而，江苏省委“独立事件”的发生，再一次使他陷入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二十九

就在陈独秀沉浸在儿子牺牲的噩耗中不可自拔时，中共中央的数十名精英通过不同渠道陆续聚集苏联首都莫斯科，在那里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次代表大会非常引人注目。它是中国大革命失败后中共领导人的第一次大聚会。它将深刻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制定党在新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决定未来中国革命向何处去。

中共六大的会址设在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不远的一座3层别墅里。它原先是沙皇时代一个地主的庄园，因为楼房外墙是白色，又称“银色别墅”。大会的秘书处设在底楼，二层是会议室以及周恩来和邓颖超、瞿秋白和杨之华、王若飞和李培芝夫妇的住房，三层是代表们的宿舍。这里远离城区，环境幽静，是一个理想的开会地点。

6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市内的一座大楼里接见了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等。

斯大林依旧是习惯地叼着那个乌黑发亮的大烟斗，精神显得非常好。面对着坐在眼前的一群心情激动、满脸虔诚的中国年轻人，斯大林更像一个点化人



生的神父。

斯大林开门见山,就六大所要解决的两个根本性问题发表了意见。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他认为,目前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关于革命的高潮与低潮问题,斯大林指出,现在中国的形势不是高潮,而是低潮。

斯大林的结论语出惊人,使得中共的领袖们半天没回过味来。近1年的时间,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形势的判断一直是高潮!高潮!高潮!今天斯大林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又说是低潮,大家还以为耳朵出了毛病。

向来胆大的李立三马上站起来反驳说:斯大林同志,中国革命现在还是高潮,因为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

斯大林对这个年轻人的莽撞并没有生气,回答说:在低潮时也会有几个浪花。

李立三再无话可说。

应该说,斯大林的这些看法是正确的。他的谈话为六大确定了基调,指明了方向。

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召开。出席大会的有正式代表84人、候补代表34人,代表了全国的4万多名党员。瞿秋白致开幕词,共产国际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代表致祝词。19日,共产国际第一书记布哈林发表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重要讲话。20日,瞿秋白代表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做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然后,代表们分组讨论这两个报告,讨论进行得十分热烈,焦点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要不要进行合法斗争、革命的高潮与低潮等问题。

早在党的六大召开前,共产国际内部和苏共党内对于托洛茨基的斗争已见分晓: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特别决议,谴责“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撤销了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的领导职务。11月,联共中央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正式开除托、季等75人的党籍。到1928年1月17日,托洛茨基被流放到阿拉木图。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六大,虽然主要是为了纠正中共前一阶段的“左”倾盲动主义,但为了与批判托洛茨基的问题挂钩,又提升了批判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所犯错误的温度。

于是,大会一开始,代表们就对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过程中应负的责任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周恩来说：“这次大会讨论的目的，是为了使同志们回去不再发生错误和误解，在工作上得到很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并不要重在个人的对与不对，我们并不以个人错误或误会为批评的重心，而是要使问题得到明白的解答，使大家都了解正确的路线。”^①

王若飞在发言中首先对陈独秀所犯的错误做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他认为：陈独秀的错误应由中共中央集体负责，不能归之于他一个人。^② 党的八七会议、11月会议上批判陈独秀的错误时，不允许陈独秀参加会议是不对的，陈独秀据此不参加党的六大是“有部分理由的”。在六大选举中央委员会时，王若飞甚至还提名陈独秀当候选人。王若飞的这个建议在大家看来无疑是异想天开，于是马上有人指责他袒护陈独秀，甚至讥笑他是陈独秀的“尾巴”。年轻气盛的王若飞自然不服，反驳道：“革命失败了，陈独秀要负主要责任，但我们也不是没有责任，我们不能像那些事后诸葛亮一样，把责任推给别人，好像自己一贯正确，以布尔塞维克自居。请问你们在紧要关头提出过什么建议！不过也是跟着走罢了。”^③

王若飞的仗义执言给他后来的政治生涯带来了极大麻烦。1929年末，正在列宁学院学习的王若飞被指控参加了所谓“陈独秀派别”活动，受到批判，下放劳动，几乎开除党籍。

事隔18年后，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毛泽东郑重地对王若飞说：你在六大时对陈独秀错误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④ 这算是对当年的一段冤案有了结论。

由于王若飞等其他一些同志的工作和斗争，瞿秋白在政治报告讨论后的总结发言中承认：“大革命时期党的错误是否责任由他（指陈独秀）一人负呢？大家说不应该，又说他应多负一点。他的思想是有系统的，常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政治意义上说，是他要负责的……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是和他共同负责的。至于过去，则五四运动的《新青年》杂志以来，他对中国革命有很大的功绩，现在只能说他个人犯了错误，在政治上，机会主义应由政治局负责。”^⑤

不仅如此，六大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在写到这个问题时指出，大革

①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政治报告讨论会上的发言记录，1928年6月27日。

② 参见唐宝林等编《陈独秀年谱》。

③④ 李培之：《飞度关山的人》，载《人民日报》1982年1月8日。

⑤ 瞿秋白：《政治报告讨论之结论》。



命时期的机会主义是发生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甚至没有采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

六大在批判陈独秀右倾错误的时候，也批判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魏金斯基、罗易等人的错误指导，虽然共产国际并没有承担任何责任而做自我批评，但终究是认可了中国方面对其所派代表的批评，并在事实上也似乎多少吸取了一些教训，决定改变过去直接向中共派出由外国人充任共产国际代表的办法，而改为请中共中央派员在共产国际设立常驻机构——中国代表团，以此来指导国内共产党的工作。这与八七会议相比稍稍有了些进步。

会上，瞿秋白的盲动主义错误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张国焘也再次受到共产国际的严厉批评。自此，继中共老一代领袖陈独秀完全退居二线之后，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等资格较老的领导人也各自退出历史前台，而时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的王明、博古、王稼祥、沈泽民等人则由米夫安排，出任会议的翻译工作，他们不是正式代表，却咄咄逼人地屡屡向大会提出议案。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开始通过留欧、尤其是留苏的中国学生对中共中央发生影响力。

党的六大历时近1个月，至7月11日正式闭幕。大会选出向忠发、周恩来、苏兆征、蔡和森、项英5人等为政治局常委，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和常务委员会主席。

陈独秀在新选举的中央委员会中落选，仅仅保留了党籍。

六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有着重要意义的大会。大会指出：中国的社会性质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阶段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政治形势，是处在两次革命高潮之间；中国共产党的总任务不是进攻，而是争取群众，准备暴动。大会批评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

延安整风时，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报告中评论说：“总起来说，‘六大’关于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的决定基本上是对的，所以说‘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对的。”^①这些决定由于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决议，所产生的影响特别巨大，从而在一系列带根本性的问题上澄清了党内长期存在的错误认识，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六大也有它的不足之处。首先，它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中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6页，人民出版社，1980。



心问题是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农民斗争的武装割据,因而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仍然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其次,继续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排除在中国革命的动力之外,对中间阶级的作用、反动势力内部的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政策。

对此,周恩来后来也有评论:“‘六大’也有毛病,犯了一些错误。但这些错误没有形成路线错误,没有形成宗派主义,虽然一些倾向是有的。这些,对以后立三路线、宗派主义的形成是有影响的,但不能负直接责任。这是我个人的看法。”^①

应当说,中共六大对陈独秀的评价是比较公道的,在当时那样的历史背景下,能说到那个程度已实属不易,而且六大制定的路线与陈独秀在1927年11月间致中央的信中的基本思想也是吻合的,虽然中央没有重新肯定他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但这也算是用另一种方式认可了他的正确。正因为如此,当王若飞从莫斯科写信告诉陈独秀六大情况,劝他不要消极,要站在六大路线上重新工作时,他并没有表示反对。^②后来陈独秀还承认:“幸而六次大会对于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革命高潮之盲目的肯定,和对机会主义一样,加以相当的矫正。”^③

但是,陈独秀显然低估了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和残酷性,忘记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道理,随后国内斗争形势的发展,再一次将他卷入政治纷争之中。



三十

六大结束后,瞿秋白、周恩来、王若飞、苏兆征、张国焘被留在莫斯科学习和工作,总书记向忠发、宣传部长蔡和森等人回国。但是,不到1个月,实际主持中央工作的蔡和森因六大前的工作错误被撤销职务,再加上不少中央委员牺牲、叛变、消极,李立三很快就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正式委员,并任宣传部长,实际主持中央工作。

当时,各地党组织在大革命失败后遭到了严重的摧残。党的六大本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7页,人民出版社,1980。

^② 彭健华:《回忆和陈独秀的两次会晤》,载《党史资料》1980年第1辑。

^③ 参见张国焘著《我的回忆》。



意是纠正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然而,就在六大结束不久,共产国际于1928年7月17日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要求中共中央继续反右倾,并称右倾在中国“是现在情况下特别危险的倾向”。布哈林指出:“中国在愚蠢之极的右倾时期以后,又出现了‘左’倾。目前‘左’具有盲动情绪、盲动策略等形式,但是,一般说来,现在脱离正确路线的倾向‘右’比‘左’更甚。”这里,“愚蠢之极的右倾”显然骂的是陈独秀主持的中央,“又出现了‘左’倾”无疑是指瞿秋白临时中央,而对下一届的李立三中央呢?布哈林的忠告仍然是要防止“‘右’比‘左’更甚”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一指导思想无疑使李立三坚定了欲将中国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决心。于是,比瞿秋白更加“左”倾的新的“左”倾路线出现了,各地党组织再一次遭到一系列新的重大损失。

1928年间,湖北省连续3次遭到摧毁性的大破坏,中心区域的工作几乎完全垮台。广州党组织几乎全遭破坏,省委被迫移往香港。湖南省委在省内难以存身,9月间不得不将省委机关远迁上海。山西、陕西、四川、云南等省委在这年夏天事实上同中央断绝了联系。由于接连遭受挫折,不少党员对党中央和省委失去信任,组织内发生许多无原则的派别纠纷,甚至发展到各自为政、各行其是,有些地方党组织生活陷入半停顿状态,其中最突出的是顺直问题。

顺直指的是北平(清朝曾设顺天府)和河北(曾名直隶省),而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范围远远超过这两个省市的地域范畴,包括了原来的中共中央北方局所领导的河北、山西、北平、天津、察哈尔、绥远、热河、河南北部和陕北等广大地区。李大钊遇难后,北方局和顺直省委的工作就一直纠纷不断,党内的个人意气之争和派别成见越来越严重,到了使工作难以开展的地步。1928年1月,中央第一次对顺直省委进行改组,一部分党员不服,随即在正定地区组织了第二省委。7月再一次改组后,北平东部地区遵化、玉田等4县的党组织的一些人又成立了“护党请愿团”,不承认新的省委。针对这种情况,12月中旬,中央委派刚从苏联回国的周恩来亲自到天津解决顺直问题。经过周恩来大量深入、细致、耐心的工作,原来像一团乱麻的问题终于理出了头绪。1929年1月,新的顺直省委成立。

对周恩来这次顺直之行,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做了这样的评价:“在顺直党的历史上,已经酝酿着很复杂的纠纷,到了六次大会的前后更广大的〔地〕爆发起来,使顺直党成为破碎零离的现象。中央经过极大的努力〔,〕派人巡视召集几次顺直的会议,特别与这一错误的倾向奋斗,最后得



到了顺直全党同志的拥护,才把顺直的党挽救过来。”^①

顺直省委以及其他一些党组织之所以敢于公然对抗和藐视中央权威,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当时党内许多同志根本看不起工人出身的新任中央政治局主席和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

向忠发一步登天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对刚刚发生的历史事件缺乏深刻的理解,党内相当一部分人为某些表面现象或正在燃起的愤怒情绪所左右,致使在总结经验教训时,把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归罪于中央领导人是知识分子的缘故,因而从上到下逐渐形成一种强烈的反知识分子倾向。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整个党的领导作了错误的估计:“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主要缺点……就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片面地认为这种组织成分“就是武汉反动以前本党政策机会主义布尔维克主义的策源地”,并提出“彻底新造各级党的指导机关”的口号。^②为贯彻这一精神,中央还对各级党委组成人数的成分作了硬性规定:省委、县委委员中,工人、贫农分子必须占半数;市委常委5人中,工人分子至少需2人;省委常委5~7人中,至少需有工人、贫农分子2~3人。

广州起义失败后,部分干部群众更是把愤怒情绪完全发泄到知识分子领导头上,认为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知识分子把握领导机关”。新上任的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③在这一错误认识的指导下,参加起义的主力军教导团的几百名学员撤退到海陆丰根据地后,没有当干部使用,而是统统编到第四师去当战士,后来绝大多数学员令人可惜地在作战中牺牲了。

共产国际从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创建,就对中共的组织成分不以为然。他们认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主要成分应该是工人,而中国共产党显然不符合这一“模式”,创建初期主要是知识分子,党的一大出席代表12人可以说是清一色知识分子,而且大多数是高级知识分子,后来多数是农民,唯独缺少工人。大革命的失败,加强了他们的这一看法,认为中共党犯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主要原因是“共产党领导的积极分子都不是工人出身”。布哈林甚至在党的六大上公开指责张国焘和瞿秋白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第149~150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469~472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③ 引自《周恩来选集》上卷第180~181页,人民出版社,1980。



向忠发

中國共產黨 十大政綱

- 一、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的統治。
- 二、沒收地主的土地和地租。
- 三、推翻地主的封建統治。
- 四、建立工人政府，蘇維埃代表會議。
- 五、統一中國，承認民族自決權。
- 六、實行八小時工作，增加工資。
- 七、沒收地主的土地，分給農民。
- 八、改良工人生活，給土地和工資。
- 九、取消軍閥地方的苛捐雜稅，實行統一的累進稅。
- 十、聯合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蘇聯。

说：“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

在这种全盘否定知识分子，以工农分子干部代替知识分子干部，实行大换班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六大明确提出“两化”：“党的指导机关工人化”和“干部的工人化”，并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六大选出的84名正式代表中，工人44人，占51%；农民6人，占7%；知识分子34人，占42%。36名中央委员中，仅工人就占21人。5名中央政治局常委，工人占3名。

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中央常委会主席的。

向忠发，1880年生于湖北省汉川县的一个破产农家。14岁入汉阳兵工厂当工人，由于他颇为能干，又有点江湖义气，逐渐成为工人中有影响的人物。1922年他加入共产党，1925年以武汉地下党组织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四大。北伐军攻占武汉后，他出任武汉总工会委员长兼武汉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名声大振，成为武汉三镇家喻户晓的人物。他在1927年党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八七会议后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赴共产国际任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向忠发虽然理论水平不高，头脑简单，缺乏上层政治斗争的经验，但也很注意自己的“金字招牌”。他的口头禅是：“我是一名普通工人。”“我只是想从工人阶级的立场出发，发表一点我个人的看法，请同志们批评。”这一名言备受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赏识。布哈林就曾赞扬他说：“向忠发同志的讲话很有新意，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这与目前当政的一些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张国焘有明显的区别。”

米夫则在六大新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指出：“共产国际认为最好由向忠发同志担任总书记。”尽管当时政治局的“多数人总觉得他不能负起领导的重任，也讨厌他的‘米夫味’，但因中共缺乏领导重心，而又没有其他适当的人来充当”^①，最终接受了米夫的提议。于是，向忠发一跃成为继陈独秀、瞿秋白之后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任领袖，“我们党最不光彩的一届总书记”诞生了。

然而，反知识分子倾向和领导机关工人化、干部工人化实践的结果，非但没有加强党的布尔什维克建设，反而使党在政治上、组织上严重削弱。从中央领导班子看，一方面，把五四运动涌现出来的、经过大革命锻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82页，东方出版社，1991。



李立三

炼的、既有理论知识又有一定经验的优秀知识分子干部排斥在中央委员会之外,像毛泽东、刘少奇、恽代英等;另一方面,把工人当偶像,在实践过程中急于求成,拔苗助长,选上来的干部质量不高,甚至有些人品质不好。据统计,参加六大的代表,后来有16名叛变革命,其中14名是工人。像六大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卢福坦,1932年9月被敌人逮捕后,很快将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总工会、铁路总工会和海员总工会等组织人员情况及秘密地址一一出卖给敌人,并当上国民党特务头子。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叛变后,破坏作用就更大了。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党的总书记向忠发本人也成了出卖革命同志的可耻叛徒,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实属罕见。

由于中央不信任、排斥知识分子,甚至对工人也要求纯而又纯,结果全党的政治水平普遍降低。从全党的组织状况看,党内不团结、知识分子怠工、机关混乱、闹宗派等现象日增。中央后来不得不承认:“因反机会主义而变成反知识分子……放着反对小资产阶级意识不谈,专门反对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个人,而造成了党内的工学界限,增加了党内的纠纷。”^①

可笑的是,反知识分子反而导致知识分子的“秘书长专权”。1928年11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中就专门提出党内存在秘书长专权问题:“只是机械的〔地〕找些工人分子进来,而不加以积极的教育,或则机械的〔地〕规定指导机关工人成分的比例,结果还不是由那些旧人——知识分子包办?甚至闹成秘书长专政的笑话。”

尽管中央几次批评党内存在“秘书长专政”现象,但这一现象一直未能得到有效克服,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央本身也存在这个问题。六大选出的中央领导班子一度很不健全,主要成员一部分留在共产国际工作,在国内的只有中央常委主席向忠发,常委兼中央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李立三,还有几个工人委员。向忠发什么也不懂,这样事实上就形成了李立三一个人说话算数、大权独揽的局面。

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彭述之等一些知识分子出身的老资格共产党员,由于在六大前后失去了党内重要职务,自然看不起不学无术的傀儡总书记向忠发,自然看不惯大权独揽的实际指挥者李立三。于是,他们纷纷聚集到上海,密谋将老牌领袖陈独秀推出来,取李立三而代之。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1928年11月1日。





尹 寬



彭述之

三十一

八七会议之后,陈独秀实际在党内还有相当影响,从中央到地方有不少同情他的人掌握着大权。这些人主要是:先后担任过中央宣传部部长、北方区委副书记、顺直省委书记的彭述之,担任过上海区委妇女部书记的彭述之妻子陈碧兰,担任过山东地委书记、中央局秘书、江浙区委书记兼宣传部长、安徽省委书记的尹宽,担任过湖南省委书记的何资深,担任过中央宣传部秘书、中央机关报《向导》和《布尔塞维克》负责人的郑超麟,担任过江苏省委委员的蔡振德,担任过上海区委委员兼码头工委书记、江苏省委委员的马玉夫,担任过北京地委书记、北方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顺直省委“前委”书记的刘伯庄,担任过湖北省委代理书记的任旭,担任过江西省委书记的陆沉、汪泽楷等。邓中夏虽然当时任江苏省委书记,但省委班底几乎全是陈独秀派,不听邓中夏的,只听王若飞的。这样湖南、湖北、江苏、北京等主要地区的实际掌权人都是陈独秀派,其中郑超麟、彭述之资格很老,可以说是党的创始人。这些人对撤销陈独秀总书记职务有抵触情绪,不能不引起斯大林的深忧。于是,六大前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将他们陆续调离重要岗位或撤职,这就更加激起他们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不满,于是便自发聚集一起,自称“陈独秀派”,开始进行反对以瞿秋白为首的党中央活动,企图恢复陈独秀在党内的领导权。

首先是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他参加六大后一回国,就去看望陈独秀,报告了六大情况,然后鼓动陈独秀与他们一同起来反对中央。王若飞也定了一个计划,要恢复陈独秀在共产党中央的领导权,并委托六大代表、云南省委书记王懋庭从莫斯科带回一封信,请郑超麟转交陈独秀,劝他不要消极。此外,像政治局委员项英、江苏省委书记李富春以及江苏省委的何孟雄、蔡振德、马玉夫等都支持陈独秀复出。他们也曾多次找到陈独秀,请他出来领导他们的派别行动。

出人意料的是,陈独秀对上述情况采取了“不鼓励,也不禁止”的态度。他要么以“研究文字学,不再过问政治”为由搪塞,要么明确表示“不参加,而且反对这种活动”。他自信给中央信中的那些意见是正确的,“他是希望秋白、亦农等人,同他一般客观,坦白,大公无私,可以渐渐接受他的意见,而恢复过去的工作精神”。他甚至“相信莫斯科是真诚革命



的,虽然对于中国问题认识错误,将来在事实证明之下,仍能觉悟接受他的主张”。^①应该说,陈独秀当时并没有创造“新党”的念头,更反对为了恢复自己的领导权,团结一部分亲近的人,在党内进行秘密的小派别活动。

然而,共产国际并没有因为陈独秀的消沉而放松对他的警惕,始终觉得陈独秀是一块心头之患,时刻担心他有朝一日成为中共党内的托洛茨基。

1928年11月,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留在苏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瞿秋白和张国焘时,问:“陈独秀是否能找到必需的钱和获得其他的条件来办一张报纸?”言外之意,担心陈独秀会以办报乃至其他活动形式来反对共产国际。

张国焘断然回答:“没有可能。陈独秀做了这么多年著名的中共领袖,其他社会关系早已断绝,现在没有人敢出来资助他办报。”^②

作为陈独秀的得意门生,张国焘太了解老师的做人准则了。

早在1928年春天,张国焘就曾经找过陈独秀,劝说他“为了有效地挽救中共和抛弃以往纠纷以及开展以后的光辉前途,应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

那时候的张国焘正处在政治失意时期。南昌起义失败后,中央临时政治局11月上旬作出了《关于处分张国焘的决议》。《决议》指出:“应开除国焘同志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对这个处分,张国焘感到实在是冤枉。他本来就反对南昌起义,为了阻止起义,甚至在南昌惹火了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还差点让谭平山当反革命抓起来枪毙。最后起义失败了,国际不但不表扬他有先见之明,反而将他、和周恩来各打五十大板。周恩来虽然受了“警告”处分,但马上又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委员,同时兼任组织局局长,反比八七会议升了官。自己则靠边站,不再重用。在这种情况下,他心灰意冷,找到已经撤职正在闭门思过的陈独秀,提出重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设想。

陈独秀问:“工农党和共产党有什么不一样呢?”

张国焘解释道:“这个党仍然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摆脱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遥控。”

^① 郑超麟:《回忆录》,1945年手稿。

^②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425-426页,东方出版社,1991。



陈独秀沉思了一下,说:“这是合情合理地改变党内现状的好办法,但这个办法不现实,首先是共产国际不会平心静气地考虑这个建议,必定给我们以无情打击。同时西欧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向来不重视东方问题,自然也不会给予我们以有力的支持。”

张国焘依旧不死心:“但我们可以依靠本国的力量啊。现在党内有相当多的同志同情你、拥护你,反对秋白推行盲动主义路线的。”

陈独秀摇头道:“就内部状况来说,即使多数同志同意我们的见解,经费问题也是难以解决的,这件事以后再说吧。”^①

对于陈独秀来说,虽然六大没有纠正八七会议对他的某些不恰当的处理,但他毕竟是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员,他对六大制定的中国革命的路线、方针还是基本同意的。

应当说,陈独秀的个人品质是无可挑剔的。他光明磊落,从不搞阴谋诡计,有不同意见马上提到当面,不背后搞小动作。他从任党的总书记时起,就把反对他和拥护他的人看成是一样的工作同志,把一切党员都视为他的群众,从不拉拢一部分拥护他的人去打击反对他的人,直到后来他加入托派,也是公开组织反对派。李维汉后来说,陈独秀是我党早期犯错误领导人中少数几个不搞阴谋的人。鲁迅先生对他性格的描绘更是入木三分:“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树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设法提防。”^②

但是,陈独秀并非生活在真空中。不久,党内发生了“江苏省委独立事件”,一下子把“陈独秀派”反对中央的活动由背后推到前台,致使他陷入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三十二

那时的中共江苏省委在中央具有举足轻重的特殊地位。这不仅是因为江苏有着全国最大的产业区域经济中心上海和全国最大的政治中心南京以及无锡、南通等工业城市,还因为上海党组织没有设立市委,一直是由江苏省委兼管,而全党产业工人的人数,仅江苏省就超过1/3,况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64~365页,东方出版社,1991。

^② 鲁迅:《且介亭杂文·忆刘半农君》。

且中共中央的首脑机关也设在上海,这使得江苏省委在各省省委中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哥大”,江苏省委书记也就成为党内引人注目的人物。

大革命失败后,江苏省委书记由项英担任。1928年6月,由于项英以及王若飞、徐锡根等其他省委领导人去莫斯科参加党的六大,省委工作暂由李富春和何孟雄主持。在此期间,江苏省委对瞿秋白的“左”倾错误进行了公开抵制,通过了由省委农委书记何孟雄起草的《江苏农民秋收斗争决议案》。《决议案》在肯定了党的八七会议以来江苏农民运动发展成绩的前提下,指出农民暴动中出现的缺点、暴露出的问题。《决议案》认为:江苏农民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客观上敌人力量太强,主观上受到“左”的影响,盲动主义作祟。为此,《决议案》明确提出了“要极力洗刷以前盲动主义的错误”,甚至把反对盲动主义列入了“今年秋收斗争的任务之一”。《决议案》还特别强调:“江苏不是总暴动时期,还是准备暴动时期,是秋收斗争,不是秋收暴动。”《决议案》改变了一直使用的“秋收暴动”的提法,而采用了“秋收斗争”的新提法,这与瞿秋白“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有很大的差别。



党的六大之后,新的中央领导人向忠发、李立三则认为江苏省委贯彻中央路线不力,工作搞得四平八稳,没有斗争声势,没有暴动气氛,非常右倾。他们认为,江苏工作“落后”的原因,主要在于那些出身于知识分子的江苏省主要领导干部身上,于是作出了改组江苏省委的决定。

1928年10月17日,中央通过了以工人出身的六大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为书记的新江苏省委人选名单,7名常委中,5人为工人出身。此时原省委书记项英在六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已调任全国总工会任党团书记,江苏省委仍由李富春、何孟雄主持。因此,中央此决定一出台,立刻遭到江苏省委的抵制。

10月29日,遵照中央指示,在李富春的主持下,江苏省委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此问题,并邀请向忠发出席会议。会上,江苏省委表示同意中央加强省委的意见,但反对中央派人来担任省委书记,认为罗登贤是广东人,语言不通,情况不熟,不便于开展工作,建议中央任命本省工人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徐锡根为江苏省委书记。

在江苏省委常委一致反对的情况下,向忠发只得暂时取消了关于改组江苏省委的决议。

12月,上海法商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工委举行罢工。中央决定成立由党中央、团中央、全国总工会、上海工联和江苏省委联合组成的“行动委员会”,领导这次罢工。不久,中央又将江苏省委和行委合并,统一由

行委领导这次罢工。中央的这种作法再次引起江苏省委的不满,江苏省委认为,“行动委员会妨碍了江苏省委的职权”,“简直中央可以代替省委”。

这次罢工失败后,向忠发、李立三非但不去检查中央在指导上的错误,反而把责任完全推到江苏省委身上,更加感到有必要改组江苏省委。

中央和江苏省委的矛盾冲突开始升级。这时候,正是周恩来去天津解决顺直省委问题期间。于是,1929年1月3日,向忠发和李立三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由中央兼江苏省委,理由是:一则中央可以得到现在江苏工作的实际经验,使对全国工作的指导能更切合实际;二则可以从原江苏省委中抽出一批干部去加强上海各区区委。会上,虽然项英提出反对意见,但政治局仍然以多数通过决定,只是没有通知江苏省委。

1月中旬,周恩来从天津回到上海。他一回来,就听到这个消息,立刻觉得这个决定不妥,马上找到向忠发和李立三,建议召开政治局会议重新讨论。

1月13日,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会议,重新讨论江苏省委问题。会上,周恩来指出中央兼江苏省委将会产生的4个问题:首先,妨碍中央的政治领导,中央加强政治指导不单是与群众接头,而且还需要一个理论的涵养,如兼并省委必妨碍这一工作。其次,中央深入群众,不是每一个斗争都要去指导,这样反显不出中心,反不能提纲挈领。再次,兼省委会妨碍中央的本身工作。最后是秘密工作问题,如中央发生问题,影响中国革命是非常大的。



会上决定由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项英组成特别委员会,讨论后再向政治局提出意见。经过周恩来的说服,原来坚持合并的向忠发、李立三都放弃了自己的主张,接受了他的意见。

但这时,中央政治局原来“由中央兼江苏省委”的决定已通过小道传到江苏省委。他们认为这是中央对江苏省委的不信任,对此也采取了不正确的做法,马上召开区委书记联席会议和各区会议,表示无论中央怎样决定,省委将一概不接受,并宣传“独立”,与中央脱离关系,拒绝一切指示,拒绝中央巡视员巡视,并指示各区委转移,使中央找不到他们。同时,向在沪各省部代表进行宣传,企图联合反对中央。江苏省委独立的理由是:现在的中央被“广东派”及“旧中央派”把持,解决江苏各省问题是“抢地盘”;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仍是“盲动主义”,只专注农民,忽视工人;中央经济不公开,中央委员生活奢华等。因为当时江苏省委的经济有独立的来源,不需依靠中央接济,他们还能单独与外省党组织通信,

在当时各地党组织本来就对中央缺乏信任的情况下,极有可能联络某几个省委起来响应,壮大声势。

江苏省委的这种观点和行动,与“陈独秀派”基本一致。所以,此时担任江苏省委委员的“陈独秀派”成员蔡振德和马玉夫便竭力推动这个“独立”事件的发生,而且“独立”后,又找到更多的“陈独秀派”成员帮助,而当时江苏省委最需要的是宣传方面的帮助,因为他们“缺乏摇笔杆的人”。于是,李富春亲自到郑超麟家,请他出山。郑超麟、彭述之、刘伯庄、汪泽楷、蔡振德、马玉夫等几位主要的“陈独秀派”分子便聚集到蔡振德家,奋战几天几夜,为江苏省委起草了几篇宣言和决议案。

面对党的组织就要分裂的严峻形势,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这次会议,一方面正式通过中央不兼省委的决定,另一方面也严厉批评了江苏省委。周恩来认为,江苏省委“独立”事件是破坏党的组织原则的,只会造成党组织的涣散和分裂,在严酷的秘密环境中甚至会直接危及党的生存。他严肃指出:江苏不过是各地问题的积聚和反映,促成这次问题的大爆发。对此,中央必须要有坚决的态度。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教育全党的机会。

1月16日,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出席江苏省委的会议,做了报告,耐心地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周恩来还召集外省在上海的代表开了几次会,以全党的名义谴责江苏省委的行动,表示拥护中央,保证了外省党组织与中央采取一致的立场。同时,在政治局中,李立三、周恩来批评了暗中支持江苏省委行动的项英。项英表示服从中央决定,出来做省委的工作。经过耐心的教育,江苏省委于1月19日召开省委临时会议,通过决议案,承认错误,放弃“独立”,接受中央关于“改组省委,加强区委的办法”。

1月24日,中央政治局决定原省委解散,省委常委分别给予警告处分,李富春改任上海法南区委书记,何孟雄为南通市委书记,新省委由工人出身的政治局候补委员罗登贤担任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彭湃参加省委工作,委员还有李维汉、徐锡根、康生3人。第二天,周恩来向江苏省委宣布了中央的决定。一场轩然大波终于得到比较顺利的解决。

“陈独秀派”参与江苏省委反中央的活动,终于被揭发出来。然而,蔡振德和马玉夫拒不认错,最终宣布退出省委。

事隔50年后,当事人李维汉曾对此事作了全面的评价。他说:“江苏问题的解决,前后历时三个月。这个问题反映了当时党中央的领导水平不高,江苏省委的组织纪律性不强,有严重错误,但主要责任在中央。



一是中央过分强调了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认为强调工人干部加强省委领导,才有助于贯彻六大决议。当时,省委和各区县的领导工作虽有缺点和错误。但还没有到不能继续工作的程度。二是处理问题简单。调整省委班子,不同省委同志商量,召开各省来沪代表会议时,不通知江苏省委派人参加,就简单地决定停止江苏省委的职权和工作。恩来当时不在上海,党中央虽由向忠发负责,但实际上是李立三说了算。立三听不进省委同志不同意见,以救世主的态度来处理这个问题,我当时是有感觉的。这些做法虽然主要出自立三的意见,但中央其他同志,包括我在内,都是有责任的。三是中央对省委问题的分析言过其实。对于党内的不同意见,采取扣帽子、打棍子的方法,促使了矛盾的激化。江苏省委在未正式接到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央兼省委的通知时,凭小道消息,不顾党的纪律,进行一系列违反组织原则的活动,甚至将‘六大’召开期间争论的一些问题不加区别地进行传达,进行反对中央的宣传。在这方面,也是极其错误的。”^①

江苏省委“独立”事件后,陈独秀和中央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尽管陈独秀此时仍然对六大没有纠正八七会议对他的评价耿耿于怀,但六大毕竟纠正了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提出的路线方针和他1928年11月给中央致函中的政治观点基本吻合。因此,他本着服从大局的原则,一直压制着心中的不满,尽最大努力信守着自己曾经讲过的“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对共产国际和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的诺言。在江苏省委“独立”事件中,实事求是地说,他既没有鼓励,也没有阻止,采取的是不介入态度。然而,中央对问题的处理虽然自始至终没有提及陈独秀,但批评处分的同志却都是同情支持他的人。陈独秀几次想解释此事与己无关,又怕给人以“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感觉。彼此之间就这么相互猜测着,开始产生了新的隔阂。

此后的半年中,陈独秀一直和中央不冷不热、若即若离。直到“中东路事件”发生,他再也忍不住了,接连向党中央写了3封信陈述自己的意见和主张,由此引发了一场他与党中央之间的重大争论,史称“三封信”问题。这一次争执涉及许多重大原则问题,双方各不相让,矛盾急剧升级,最终导致了陈独秀被开除党籍。

^① 曹英:《红色档案》,第316页,改革出版社,1999。



第

八

章

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提出“武装保卫苏联”，陈独秀再也无法保持沉默，三次致函中央，陈述不同意见，由此引发了一场他与党中央之间的重大争论，史称“三封信”问题。

三十三

1929年7月10日，“东北王”张学良不顾苏联政府的抗议，突然派军警包围哈尔滨苏联领事馆，进行非法搜查和劫掠。7月16日，张学良又撕毁中俄中东路的协议，调东北军沿苏联国境布防，做出武装进攻苏联的姿态，并以武力强行接管中东铁路，逮捕、驱逐59名苏方高级职员。苏联政府被迫于7月17日宣布与国民党政府绝交。7月19日，苏联远东红军越过中苏边界开始侵扰满洲里和绥芬河。从8月起中苏军事冲突急剧升级，震惊中外的中东路事件爆发了。

中东路事件的发生有着很深的历史背景。

中东铁路原名“东清铁路”，亦称“东省铁路”，是根据1896年的《中俄攻守同盟密约》和《中俄合办东清铁路公司合同章程》、1897年的《旅大租借条约》、1898年的《中俄续订东三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由中国清朝政府出股金500万两，沙俄政府修建经营的。它于1897年7月动工，1901年11月竣工，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道相连，全长2189公里。铁路建成后，沙俄企图独霸中国东北的野心为日本帝国主义所不容，遂于1904年爆发了日俄战争。沙俄战败后，中东铁路长春至旅大段便归日本所有，称“南满铁路”，沙俄在中国东北的势力范



围缩小到长春以北的北满地区。

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于1919年宣布废除沙俄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种特权,明确表示:中东铁路“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价”。

1924年,列宁逝世后,苏俄又与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中俄协定》,改称中东铁路由中苏“共管”。1926年3月,苏联曾组织了一个特别委员会,主席是托洛茨基,成员有伏罗希洛夫、捷尔任斯基和齐采林。这个特别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代表都同意的情况下,作出一个决议:“为了保障在‘第二时期’(所谓‘第二时期’,即指中国革命还未胜利的一段时期——托洛茨基注)中东路不致为帝国主义者所夺取,必须将该路的管理权保留于苏维埃政权之手”,同时“必须采用广东的政治教育方法使铁路趋于中国化”。^①

这个时候的中东铁路尚留在东北军阀张作霖之手,中共和国民党同意“该铁路的管理权保留于苏维埃政权之手”也就不难理解。

可是自从张学良易帜归顺南京政府之后,蒋介石自然就不能容忍苏联利用中东路宣传“赤化”和垄断铁路,于是出于内压共产党、外亲帝国主义的需要,制造了一系列反苏事件,致使苏联政府被迫撤回了驻广州、上海、武汉、长沙等地领事馆及商业机构。1929年5月7日,张学良借口苏联在驻哈尔滨领事馆召开远东共产党员大会而派军警搜查,并逮捕了苏方人员39人。接着,国民党政府制造了中东路事件,使反苏浪潮达到顶峰。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出现了几方面错综复杂的情况。

帝国主义国家幸灾乐祸,酝酿采取干涉。美、英、日、法、意、德等国密谋组织联合委员会,在中苏冲突未彻底解决以前将中东路收归“国际共管”,妄图趁火打劫。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还亲赴中国驻美大使馆,对国民党政府的反苏挑衅大加鼓励。

国民党政府在帝国主义国家唆使下,一面挑起了与苏军的武装冲突,一面掀起“收回主权”、“维护民族利益”的欺骗宣传。当时中国的大多数民众不明了事件真相,看不清问题的实质;许多人接受国民党的宣传,赞成国民党政府以武力“收回”中东路主权的行动。

共产国际则连续对中共发出指示,提出“武装保卫苏联”、“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变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斯大林甚至说:“谁决心不开秘密军事会议而绝对地、无条件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捍卫苏联、保卫苏联,谁就是革命者。谁决心绝对地、毫不动摇



^① 托洛茨基:《中俄冲突与反对派》,载《中国革命问题》第316页。



陈独秀

地、无条件地捍卫苏联,谁就是国际主义者……谁撇开苏联反对苏联而捍卫世界革命运动,谁就是反对革命,谁就必然要滚到革命敌人的阵营里去……在这个问题上保持中立,犹豫动摇,指出附带条件,寻求第三种立场,就是企图逃避责任,逃避无条件地捍卫苏联的斗争,在保卫苏联的紧要关头开小差。而逃避责任是什么意思呢?这就等于不知不觉地滚到苏联敌人的阵营里去。”^①在这里,斯大林把苏联一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凌驾于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之上,并和各个国家、民族的利益对立起来,作为检验各种各样集团、派别和政党革命与反革命的分水岭,要它们“无条件、绝对地捍卫苏联”。

苏联红军和张学良的东北军开战后,斯大林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迫切需要中国共产党进行武装暴动,以分散国民党和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力量。于是,共产国际开始改变中共六大关于中国革命形势是处于低潮的估计,接二连三给中共中央发指令,提出了中国反动派已濒临崩溃、中国革命已临近高潮的新的脱离中国实际的观点。

这个涉及中国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复杂事件,迫切要求中共中央能够从国际国内形势和群众觉悟的实际出发,向广大人民说明事件真相,揭露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引导群众向国民党政府的亲帝反苏卖国政策作斗争,以维护中苏人民的友谊,推动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



然而,遗憾的是,李立三并没有这样做。他全然不顾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未达到它们不能再继续统治下去的地步,不顾群众的觉悟水平和斗争的高涨没有达到可以推翻国民党政权的程度,不顾红军力量虽然有了某些发展但与敌人的力量相差仍然极为悬殊这样一个基本客观事实,而是毫不迟疑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采取了简单化的策略,在机关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决议和文章,提出了与当时客观形势相距甚远的、错误的宣传内容和行动方针。

1929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发出《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的第四十二号通告。通告指出:“如果帝国主义国民党实行对苏联的武装进攻的时候,我们应毫不犹豫地号召广大工农群众的直接革命行动,号召士兵叛变与红军结合起来,实行国内战争,使帝国主义国民党失败,使苏联红军完全胜利,一直到推翻买办资产阶级国民党政府,建立工农苏维埃的共和国。”通告并且说什么“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是目

^①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47页。



前“中国革命最迫切的主要任务”。^①在行动方针上,中央则要求组织学生、工人、店员、士兵进行游行示威、罢工、罢课,“以广大群众的革命暴动,来消灭帝国主义国民党强盗结果苏联的战争”。^②

12月8日,中共中央就武装保卫苏联问题向全党发出第六十号通告,指出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武装保卫苏联已不是宣传时期,而且要进到动员群众马上就要执行这一任务的时期,“可以断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必然要引起全世界革命的大爆发,而且要消灭全世界帝国主义的统治……无疑的要更快的〔地〕爆发革命高潮”,提出红军“须实行大规模的游击,过去避免夺取主要城市之策略,也须改变,只要有胜利的可能有群众可发动的,便须向主要的城市进攻,以至占领这些城市,就是占据极短的时期,也是有极伟大的政治影响。红军执行这样的策略,以与全国工农兵的斗争汇合起来,便可促进革命的巨潮”。

显然,这些宣传号召和行动方针严重脱离了中国国情和广大群众的民族感情,将使我党陷入孤立被动的困境。



三十四

这种极“左”思潮的出现,引起了陈独秀的注意。他再也按捺不住,改变了对政治问题长期保持沉默的态度,开始向中央写信公开表明自己的不同观点。

7月28日,陈独秀就中东路事件给中共中央写了第一封信^③,信中指出,在中东路问题的宣传上,要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应该把斗争矛头紧紧对准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他认为:中东路问题不单是中俄两国间的纠纷,而是国际纠纷的导火线,由这导火线而至爆发战争“是慢性的”。这种战争,无论是帝国主义各国在援助中国的名义下共同向苏联进攻,还是苏俄退让后帝国主义之间因争夺中东路而导致第二次大战,都要在中国做战场,“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他尖锐地指出:“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

① 《中央通告第四十二号》,载《红旗》1929年第34期。

② 《准备着广大群众的暴动》,载《红旗》1929年第35期。

③ 此信刊《红旗》第37期(1927年8月7日)。题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意见》。

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并且收到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这种情形不用说是于我们不利的。”有鉴于此,陈独秀认为,“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要特别慎重。他批评中央拿“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太说教式了,太超群众了,也太单调了”;“离开具体问题说教式的单调宣传,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反而使群众误会我们只是卢布作用,而不顾及民族利益”。为此,他提议中央赶快补发一个通告,以取消中央第四十二号通告中说的这样几句话:“并且帝国主义对苏联战争开始的时候,毫无疑问的〔地〕要引起本国工人阶级的革命,造成世界革命的高潮,这样便是中国革命更有利的条件,而更可促成全国革命高潮更快的〔地〕到来。”陈独秀认为这种宣传,使同志们会很自然地作出奇怪的结论:“原来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还有这些好处,我们让他赶快向苏联进攻吧!”最后,陈独秀在信中恳切地表示,写信的目的是“对于重要问题,都想有点意见贡献于党”,并且希望能够把他的意见全文都在党报上发表出来。

应该说,陈独秀的这个意见是可取的,而且是宝贵的,在当时全党及全国纷纭复杂的政治氛围中吹进了一股清风。

陈独秀发出第一封信后,感到意犹未尽,于是没等中央回信,便于8月5日又给中央写了第二封信,对当前政治形势和党的革命策略问题较系统地提出了12条建议。

关于当前政治形势,陈独秀认为:大革命的失败,表明资产阶级取得了胜利,目前资产阶级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也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因而“增加了它的阶级力量之比重”;蒋桂战争等等仅仅“都是资产阶级政权之内部冲突”,从另一角度看,目前不是“革命高潮时期”,只是“两个高潮的过渡时期”,而党中央对于国民党政权和蒋桂战争性质的认识反映了“极端的左倾的危险观念与策略”。

关于革命策略,陈独秀认为:中央应采取“退守政策”,而不应采取“直接的进攻政策”,如不能强迫群众游行示威、罢工,因为这样做只会失去群众。他批评道:“现在的中央的政策……始终不认识革命失败与资产阶级之胜利,始终不认识现在是列宁所谓‘革命二个波间过渡期’,则在政治分析与估量上自然发生错误。政治上有了错误的估量,即是把敌人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坏,把自己的情形估量得非常之好,自然要发生盲动主义;盲动主义碰着不动的阻碍,自然要发生命令主义;命令主义者惟恐命令不通行,自然要抹死党内德谟克拉西,排除一切意见不同的分





子,造成自己褊狭的一致,以便令出惟行,好证明其‘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说’。”

陈独秀对党的组织路线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看法。他说:“德谟克拉西,是各阶级为求得多数意见之一致以发展其整个的阶级力所需之工具;他是无产阶级民主集权制之一元素,没有了他,在党内和党外都只是集权而非民主,即是变成了民主集权制之反面官僚集权制。”由此,陈独秀认为:“同志间关于理论上政策上意见不同的争论,是党的进步的现象,决不是坏现象;反之,大家都没有什么不同的意见,这正是党之幼稚的表现,争论之结果,理由最充足的,自然会为大众所公认;错误的意见,一经公开的〔地〕被大众批驳下去,以后才不至隐蔽在党内,遇着机会便要发作出来。”他批评中央道:“如果你们老是固执你们的褊狭性,而不顾及党内德谟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意见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霸蛮的造成你们意见的一致,对于不同的意见,禁止讨论,或消极的〔地〕不在党报上发表出来,一听到同志中和你们有不同意见,不管他的内容如何”,便“给他戴上一顶帽子,如‘反对派’、‘托洛斯基派’、‘某某派’等,来镇压住他,且以暗示一般有不同意见的同志免开尊口;这便是有意的或无意的阻止了党的进步”。“同志无论在理论上,在政策上,在工作方法上,只要不离开革命的立场和党的立场,即和中央有显然不同的意见,而公然出来争辩,都是党内德谟克拉西所容许的。”“列宁常常说过:‘无产阶级的战士,应该是有政治自觉的’,党教育党员,是要教成有政治自觉的战士,而不是要教成随声附和的奴才,不是要教成看鞭影而行止的牛马,不是要教成纯粹的雇佣劳动。”总之,中央应抛弃八七会议和六大以来的机会主义(即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的错误);党中央应发扬和扩大党内民主,不能用“反对党内和平”的口号取代“团结党内争取群众”的口号。

陈独秀在信中最后表示:“因为我不忍眼看见无数同志热血造成的党,就这样长期的在不正确的路线之下,破灭消沉下去,不得不拿出我一年以来慎重考察的结论”,要求中央“稍稍抑制自己的褊狭性,平心静气的〔地〕把我的意见详细审查一下,”并将此信在党刊上发表,“以便公诸全党讨论”,即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对党的路线的“争辩”。^①

在发出第二封信后,陈独秀接到了党中央1929年8月3日刊登在《红旗》第37期的《中央答复撒翁同志的信》。在这封信中,中央拒绝陈

^① 本信收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5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



独秀第一封信提出的批评和建议,认为他和中央的分歧“不只是部分的策略问题的讨论,而且包含了很严重的原则的问题”。中央的回信最后说:“中央热诚的〔地〕希望这一解答的信到达以后,很快的〔地〕得到你取消这些观点的申明。”“中央以布尔塞维克的热诚,准备接受你以后对于重要问题的意见。”^①

对于中央的批判,陈独秀自然不能接受,便于8月11日第三次写信给党中央,表示自己不同意中央8月3日回信中对于自己的批评,并重申了自己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他认为,中央对中东路问题的宣传方法,在战略上有两个缺点:(一)未曾用群众所能了解的事实而不仅是我们主观上的理论,对于中东路问题之本身,加以正确的详细的解析及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能够使群众减少民族偏见,不致为国民党所欺骗而接受我们的宣传的领导。(二)“只是”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与宣传,在事实上只能动员无产阶级的觉悟分子,而未能在实际利害上激动无产阶级以外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意识比较落后的群众,把这些广大群众放在斗争战线之外了。

他进一步辩驳说:7月28日我那封信,不是讨论党的一般宣传问题,而是专指对于中东路这一特殊问题的宣传方法,特别指出其中关于宣传方法的缺点。“我的意见也并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收回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的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向反革命的势力进攻。”然而,中央“缺少戒心与注意的宣传策略,固然不是跟着群众跑,却也不能争取群众”。

陈独秀接着说,宣传工作应从实际出发,着眼于群众,革命的原则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可以统一,但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他反过来猛烈抨击中央“把策略和原则混为一谈,这不是偶然的错误,乃是‘你们的原则’错误”,“拿几个原则机械地死板地用命令主义蛮干,而不知道对于各种各样复杂的问题有时间空间性的不同的活的策略运用之必要,这正是你们简单化和纯主观不看事实的盲动主义精神之表现”。^②

收到陈独秀第二封信后,中共中央当时并没有回答,也没有如同处理第一封信和第三封信那样,把它作为回信的附录一起交党内刊物发表。

^① 《中共答复撒翁的信》,载《红旗》第37期,1929年8月7日。

^② 此信刊《红旗》第39期,1929年8月20日。



这是因为陈独秀的第二封信与第一、三封信不同。这封信谈的完全不是中东路问题,而是阐明他在中国社会性质、革命性质、革命任务与革命道路上同党中央的分歧。尽管这封信在要求发扬党内民主、指出中国革命处于低潮等问题上有某些可取之处,但总的来说,陈独秀的意见在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犯有取消主义的严重政治错误。他指出的所谓大革命失败后“主要的是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势地位”,封建势力“变成残余之残余”的论点,是不符合实际的。他所谓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革命对象已经是资产阶级,不必再进行民主革命的主张,更是根本错误的。他反对开展“工农武装割据”,也是错误的。这些都是重大理论、路线性质的错误,表明陈独秀已经开始由右倾机会主义堕落为取消主义了。因此,尽管陈独秀强烈要求将此信早日在党报上登出,共产国际还是认为公开刊登容易引起党内同志的思想混乱,所以最终决定不把他的第二封信在党内刊物上发表。

对于陈独秀的第三封信,党中央马上做出了反应,再次撰文批判他的意见“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精神,与无产阶级的民族革命的观点和阶级观点绝不相容”,它“极有害于革命的斗争,有害于党对中东路问题的整个的路线”。



紧接着,中共中央向各地发出通告,指出中央发现反对派“在党内与党外有他的秘密组织,有他的秘密的出版物”,“现在中国机会主义思想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见解,正凭借着托洛斯基的理论,与他一无二样地来反对现时党的正确路线”,号召各级党部及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绝不容许反对派破坏中国党的统一,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无留恋地开除出去”。^①

这样,对于一个具体问题的宣传方法和策略之争,双方人为地将它发展成了原则路线之争,由此大大地升级和激化了。

蔡和森将这三封信定性为“资产阶级工党的大纲”,是“陈独秀走向反革命营垒”的“最后转变”。^②

^① 《批评撤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意见的机会主义的错误》,刊《红旗》第39期,1929年8月20日。

^② 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载《布尔什维克》第4卷第5期,1931。

三十五

陈独秀致中共中央常委的第一、三封信,是在中东路问题已经成为当时的重要政治事件,而中央在宣传这一事件内容和行动方针上都存在某些严重“左”倾错误的背景下发出的。应当说,陈独秀写给中央的这两封信,完全是就事论事,目的仅仅是出于“对党的责任”、“想有点意见贡献于党”,从而改善党的宣传工作。他与中央在中东路事件宣传上的分歧,不是根本立足点的不同,而是具体宣传内容上的分歧,并没有什么反革命之处可寻,更不能由此得出他已在客观上“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的结论。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有专家学者对这个结论提出质疑,认为至少在以下3个方面陈独秀是无可非议的^①:

首先,陈独秀的立场是站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政府,拥护苏联和维护中国革命一边的。

陈独秀在第一封信中指出:“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政府,对于收回中东路的宣传,是戴着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来欺骗民众”的。“在这样情形之下……我觉得我们的宣传……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解释”。在第三封信中他说:“在原则上,‘拥护苏联’这一口号,不仅是无产阶级所必需,而且是被压迫民族所必需,我不但不反对这一口号的宣传;反之,我却以为我们以前宣传这一口号太不充分。”他还说:“并不是说对群众解释因收回中东路而必然发生的危险和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之后,而不归纳到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和拥护苏联,而是说必须对中东路问题本身有了正确的详细的解析,把国民党拥护民族利益的假面具打碎,然后我们的口号才能发生比较大的效力。”从他这些话的内容看,他的立足点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拥护苏联的,也是反对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卖国政策和维护中国革命利益的。他不满意的只是中央对于国民党“收回”中东路这一具体问题没有做出正确的剖析,没能有针对性地揭露他们的欺骗,以致我们的宣传效果不大。所以,中央指责陈独秀的一、三封信是反对中国革命的,是“反苏和反共产国际”的说法,是对陈独秀本意的一种曲解。



^① 王洪模:《重评陈独秀一九二九年致党中央的三封信》,载《陈独秀评论选》(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其次,陈独秀主张在宣传内容上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着眼于争取广大人民群众。

围绕中东路事件,我们党的宣传应当从什么情况出发,以什么为着眼点?陈独秀主张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着眼于争取广大人民群众。他在第一封信中说:“此事在中国发生,事件本身又和中国社会有直接利害关系,民众多数心理又是怎样,我们如何宣传才能获得广大的民众同情,这些实际情况,都不能让我们闭着眼睛不理,而可以自由前进的。”现在,国民党政府的欺骗宣传,“收了效果,不但小资产阶级的群众,甚至有许多劳动群众也受了欺骗,或者在受了欺骗而迷惑的严重空气之下,不敢别持异议”。“在这样情形之下,我们的宣传方法,似乎不能像别国的兄弟党那样简单”,只提出“反对进攻苏联”、“拥护苏联”、“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不联系中国人民切身利益去提口号,就起不到动员群众的作用。

陈独秀认为:我们的宣传应当从自己的国情出发,坚持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一致性。因为当时群众存在的实际问题在于中东路是在中国领土上,中国收回主权是合理的,社会主义的苏联为什么不把属于中国的主权归还中国呢?因此,他在第一封信中说:中央应“详细指出:在未推翻帝国主义宰割以前,中国真能自己收回中东路是怎样的一个幻想,而且这一幻想必然酿成中国民族实际的莫大灾难”。当广大民众“明白了中国自己收回中东路,在此时确是有害无利的幻想,他们才能够了解苏俄和帝国主义不同,才能够了解苏俄是反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才能够了解苏俄是被压迫民族联合战线的领导者”。显然,陈独秀所坚持的这些宣传内容,是从中国国情出发,有利于引导群众把爱国主义同国际主义一致起来。

陈独秀接着指出,在中东路事件的宣传上,应当贯穿阶级观点和群众观点的一致性。他强调:对于中东路收回这一具体问题,没有正确的剖释,只是拿世界革命做出发点,拿拥护苏联做动员群众的中心口号,则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而不能动员广大的群众。他在信中针对中央批判他“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辩解说:“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有自己阶级以外的群众,最革命的以至比较落后的广大群众之拥护,才能成功。”“不应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这是对的,我的意见也并不是主张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去跟着他们说收回中东路,而正是要打破群众的幻想,打破国民党的假面具。把群众拉到我们这边来,在我们口号之下,在我们领导之下,向反革命的势力进攻。”在这里,陈独秀阐明的是革命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同样,反对国民党在中东路事件



上的亲帝反苏卖国政策也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他认为,只看到无产阶级最先进分子的觉悟,不考虑中间和落后群众的觉悟程度是不行的,要把无产阶级的阶级观点与群众观点一致起来。

陈独秀还认为,原则的坚定性不排斥策略的灵活性。他说:原则是一定不变的,此所以谓之原则,虽策略战略,则因有复杂的时空性之不同,便不能时时事事都必须照着原则机械地死板地应用,不能有一点变化性。“拥护苏联”这一原则口号,“应用到夹有民族问题的中东路这个特殊事件,为争取广大群众计,便要小心,单是这个口号便不够了”,还应补充以反对国民党的“卖国或误国”政策的口号,才便于为群众所接受。显然,陈独秀的主张是:同一个原则,在贯彻上因时间、地点、情况的不同,采取的策略口号和斗争方式应有所不同,这不能说是错误。

再次,陈独秀对中东路事件引起的时局危险的估计和处理中苏纠纷的想法,也有可取之处。

中东路事件发生之后,陈独秀认为:时局发展的危险前景,不是像共产国际估计的一种可能,即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共同向苏联进攻,而是“有两种可能形势:一是苏俄始终取强硬政策,帝国主义者必然在援助中国名义之下,共同向苏联进攻,不但在远东,近东也是一样;一是苏俄若取退让政策,帝国主义者之间必然因互夺中东路迟早要导入第二次大战。无论是那[哪]一种,都要在中国做战场,把中国做成塞尔维亚,在战争中最受直接蹂躏的自然是中国人民”。因此,他一再主张首先要提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卖国误国政策”的宣传口号,而不是“拥护苏联”的宣传口号。他还认为:“因为中俄都不利于轻率开战,尤其是帝国主义间都还未曾充分准备好,现在谁都不敢断然取独占的形式,会需要经过一些曲线的斗争”,“然除了恢复中东路原有的状态即中俄共管形式,国际纠纷是要继续发展的”。

后来的事实证明,中东路事件的发展,虽然导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在中苏边境发生了战事,但直到11月,苏联红军在军事冲突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未演变成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共同向苏联的进攻。中苏冲突的结局,是于1929年12月签订了《伯力协定》,恢复冲突以前之状态,即中苏共管中东路的局面。这一点,陈独秀是言中了,而此时他已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了。



三十六

还需要指出,在中东路问题上,当时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的立场也是“保卫苏联”。事件刚发生时,托洛茨基就指示苏联、中国及各国托派组织,“要完全牺牲自己来保护十月的胜利”,并在1929年8月4日的文章中引证他在1927年8月11日苏共中央与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的讲演说:“我们反对派对保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一点也不怀疑。我们不但自己要保护它,而且教人如何去保护它。”“我可以总结一句话:我们拥护社会主义的祖国,但不是拥护斯大林的路线。”他还批判了德、法等国托派中认为中东路事件是“苏联侵犯了中国自决权”的观点。^①

这也说明陈独秀虽然此时已经开始接受托洛茨基的思想,但他并不盲从,在具体问题上始终保持着独立的立场,只要他认为对的,就敢于和权威唱反调。后来,陈独秀与中国托派组织谈判统一时,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正确立场,还被托派视为坚持机会主义的“五大错误”之一揪住不放,横加指责。



现在看来,陈独秀与党中央发生争论,并不是什么都错误。当时他是以正当的方式向党中央提意见或陈述自己的反对派观点,从事情的本身来说符合组织原则,无可指责;他对党中央在中东路问题政策上的批评基本上也是对的,况且他本人事实上并没有从根本上反对中央提出的、在他看来“只有最觉悟的无产阶级分子能够接受”的观点。既然如此,党中央对于他的反批评就是没有道理的。至于陈独秀在第二封信中提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虽然体现了托派的观点,中央对他提出严厉批评也是对的,但当时托派观点本是革命阵营内部正常的意见分歧,其中自有合理的内核;退一步讲,即使是错误的,用正当的方式向党组织提出,也不违反组织纪律。

但是,由于当时中共不敢对共产国际的指令提出丝毫疑义,而陈独秀竟然公开反对把“保卫苏联”当作共产国际头等任务,这无疑是太岁头上动土,犯上作乱。于是,按照“凡是反对共产国际就是反党,必须坚决打击”的逻辑,中共中央从此把他当作敌人看待,开始有组织地对他进行批判。

^① 《苏共历史问题》(俄文版),1987年第10期。



在这场扩大化的斗争中,已从苏联回国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王明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先是一篇《论撒翁同志对中东路问题的意见》,使他得以跻身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的编辑行列,并一度成为《红旗》的主要撰稿人。接着,从1929年9月至次年3月,短短半年间,王明一口气在《红旗》上发表了30多篇文章批判陈独秀,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论陈独秀》,它成为中共中央开除陈独秀等人党籍决议案的先导。王明夸大陈独秀与中共中央在中东路问题上分歧的重要性,认为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的意见是“从共产主义者的观点堕落到社会民主主义者的观点”。^①他在党内第一个提出“革命的陈独秀变成了反革命的陈独秀”、“陈独秀自始至终是个自由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评价。^②王明的这一提法就连当时“左”得要命的李立三也觉得有些过分,所以并未采纳。但是,此说法一提,其负面影响立刻显现出来,有人马上发表文章,与王明遥相呼应,强调机会主义分子是“破坏党和分裂党的源泉”,提出“不顾惜的〔地〕与这些分子作战,并且丝毫不留情面的〔地〕驱除他们出党,这是无产阶级的党之发展和巩固的惟一出路”。^③显然,这两者都足以将陈独秀一下子置于被开除出党的境地。此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对陈独秀的批判逐步升级,这自然不能让陈独秀口服心服,只能加剧双方的对立情绪,最终不可挽回地使问题走向了反面。正如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士所说:“事情的悲剧在于人们对当代最重要的、最根本的问题不能说真心话,我们不能够说话。在这样一种气氛中,说明事情真相就会产生炸弹爆炸那样的后果。”^④

历史有时会出现类似的重演。1941年6月,苏德战争突然爆发。为了防止日军在背后偷袭苏联,莫斯科马上致电它在延安和重庆的代表,要求中共中央指示华北地区的八路军迅速采取牵制行动,向侵华日军发起全面进攻。然而,就在半年前,正当蒋介石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毛泽东准备奋力还击之时,莫斯科还一而再、再而三地来电警告他不要和蒋介石把关系搞僵,因为中共现在“还显得太孱弱”,其“在国内的地位还不巩固”,把枪口对准国民党必然使自己“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时隔仅半年,当莫斯科自身利益受到危险时,它却急忙要求毛泽东以“太孱弱”的八路军出击武装精良的日军,以达到“武装保卫苏联”的目的,全然不

① 《布尔塞维克》,第2卷第11期,1929年9月7日。

②③ 《红旗》,第57期,1929年11月27日。

④ 《共产国际文件》,第2卷,第625页。



顾中共将会由此“处于走投无路的境地”。

毛泽东彻夜不眠，几日后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回电莫斯科道：“由于……敌我军事技术装备悬殊太远，我人力，物力，地区，弹药日益困难。假若日本进攻苏联时，我们在军事上的配合作用恐不很大；假若不顾一切牺牲来动作，有使我们被打坍，不能长期坚持根据地的可能，这不管在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因此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战争的方针，而不采〔取〕孤注一掷的方针。”^①不信邪的毛泽东不惜冒犯共产国际，拒绝了全面出击日军的指令，成为继陈独秀之后又一位对“保卫苏联”的指示进行公开抵制的中国共产党人。

中共喊了十几年“保卫苏联”，可当苏联真的受到帝国主义侵略、需要中共“武装保卫”的时候，毛泽东似乎忘记了12年前陈独秀因为反对“武装保卫苏联”最终被开除出党的严重后果，竟然作出了拒绝执行国际指示的决定，这使许多人百思不得其解，似乎毛泽东此举有违国际主义精神。其实，只要联想到9年之后毛泽东毅然派兵“抗美援朝”的举动，就完全可以消除毛泽东所谓不尽国际主义义务的误解。一向以务实著称的毛泽东，绝不会为了什么虚假的国际主义义务置民族利益而不顾，做出于“哪一方面都是不利的”蠢事。换了王明、李立三、瞿秋白可能会这样做，但毛泽东绝不会。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不唯书，不唯上，这就是毛泽东最大的特点。

联想到当年陈独秀在中东路事件上“抗旨”的下场，毛泽东此举可谓意味深长。

后人将此事视为毛泽东公开违背共产国际旨意的开端。毛泽东与斯大林的裂痕也自此产生。在毛泽东看来，既然事已至此，肃清党内对莫斯科的盲目崇拜心理，就不仅是等待时机的问题，而且是迫在眉睫的问题。早在江西苏区就吃够“教条主义瞎指挥”苦头的毛泽东，比谁都更早、更清醒、更彻底地认识到这一点，由此催发了延安整风运动，加速了中共独立自主、走自己道路的步伐。

半个多世纪之后，就在苏联解体的前两年，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共产国际历史研讨会，世界各地的共运史专家学者云集莫斯科，共同反思总结共产国际的成败得失。在讨论到中东路事件的时候，与会代表高度评价了中国学者提出的“把‘保卫苏联’的口

^①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51页，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号当作共产国际的头等任务,不符合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利益”的观点。然而,这个研讨会忽视了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最早提出这种见解的,不是今天的“中国学者”,而是当“保卫苏联”这个口号一提出就对之进行批评的陈独秀。

这个研讨会,实际上是以最权威的资格,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范围内,为陈独秀在中东路问题上长期蒙受的冤屈平了反。

但是,中国国内的学者至今对这个问题没有形成共识,甚至可以说仍然是避而不谈。

王文元后来一语道破天机:“直到一九二八年秋天的中东路事件发生,陈独秀才静极思动,给中央写了那封所谓‘误国政策’的信,受到了曲解与斥责,这才使这只负伤之虎再度奋起从事搏斗。独秀那时还不曾和托派发生关系,信中所提意见,也不能说是错误……但那时由李立三主导的宣传机关,便借口对陈进行了疯狂攻击,认为陈独秀堕落到‘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泥淖中去了。独秀起而应战,同时在行动上也开始脱离一两年来的消极状态,有一群老干部逐渐在他的周围团结起来,其中有郑超麟、何资深、彭述之、尹宽、李季、马玉夫等。一个党内的思想派别就此形成了。”^①

这才是问题的实质。当陈独秀以三封信的形式同党中央发生重大争论时,他已经开始接受托派思想,并在中东路事件之后不久开始涉足托派小组织活动。这样,他与中央的矛盾裂痕越来越大,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最终导致被开除出党。



^① 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1977。

第

九

章

1929年春夏之交，陈独秀的政治思想完成了向托派的转变，中共中央在反复劝说无效的情况下，将他开除出党。

三十七

1929年春天的一个傍晚，陈独秀的寓所里来了一位年轻人，进门就冲着他直叫舅舅。陈独秀看了半天，才认出是大姐的儿子吴继严。^①

吴继严道：“我刚从莫斯科东方大学回来。”

陈独秀一听外甥是从苏联回来，忙说：“坐下，坐下，我正想了解苏联现在的情况。”

吴继严介绍说：“列宁去世前曾留下一份遗嘱，说斯大林性情暴躁，处事专横，不适合于当党的总书记，应另选一个适当的人。列宁在遗嘱中还说托洛茨基才华出众，在十月革命中立下功劳。这就使托洛茨基成为斯大林的眼中钉。1926年7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联盟，反对斯大林路线。今年2月，托洛茨基被斯大林驱逐到土耳其去了……”

陈独秀打断外甥话头，道：“说说斯大林想怎样决定中国革命的未来，我和托洛茨基没有关系。”

吴继严道：“太有关系了，您可能并不知道，您之所以被斯大林撤销总书记的职务，就是因为在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您的许多政治观点和托洛茨基完全一致

^①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吴继严，又作“吴季严”。



的缘故。”

陈独秀瞪大了眼睛：“真的？还有这样的事情？”

1924年革命导师列宁逝世之后，俄共党内分歧便显现出来，主要表现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

当时的俄共（布）政治局由总书记斯大林，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托洛茨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列宁格勒苏维埃主席季诺维也夫，莫斯科苏维埃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加米涅夫，《真理报》主编布哈林，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以及全苏总工会主席托姆斯基7人组成。

托洛茨基，1879年生于乌克兰赫尔松地区一个犹太农民家庭。他19岁参加革命，1902年被列宁邀请参加《火星报》编辑部，但不久与列宁分裂，动摇于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1905年参加俄国第一次民主革命，后流放国外。1917年2月回国，参加领导了彼得格勒武装起义。十月革命胜利后，他先后担任外交人民委员、国防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党内地位仅居斯大林之后。托洛茨基精力充沛，爱好写作，善于演讲，学识渊博，深受列宁器重，传说是列宁遗嘱中的接班人，这就为他和斯大林的斗争埋下了祸根。



1925年，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之间的第一次斗争爆发了，结果是托洛茨基遭到彻底失败，被撤销了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随后，联共（布）在全党范围内进行了“清党”，共将92000余名“托洛茨基的拥护者”开除出党。

1926年4月，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联合起来，同斯大林、布哈林、李可夫等人就党的理论和改革问题进行了激烈争论。斯大林主张一国能建成社会主义，号召各国共产党保卫苏联；托洛茨基则举起“世界革命”和“不断革命”的旗号，自称为“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简称为“左派反对派”，提出一整套政纲，反对在一国内建成社会主义。这个政纲的理论依据，就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

托洛茨基认为：农民从来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不可能成为无产阶级的同盟者，经济技术落后的苏联若得不到其他发达国家的援助，绝不能建成社会主义，只有“世界革命”的胜利才能挽救苏联。另一方面，他对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也都用“不断革命”来概括，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阶段，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都必须用十月革命的方式和方法，即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剥夺资产阶级，才能取得胜利。换言之，就是要用社会主义



托洛茨基与情人弗里达 (1937 年)

革命来代替民族民主革命。以上这些问题,起先是托洛茨基与列宁之间的争论,1924年列宁逝世后,转变为托洛茨基为首的苏联托派与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之间的争论。在具体事件上,中国革命是这场争论的焦点之一,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

第一,关于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的问题。1926年3月,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先后提出中共退出国民党的建议,遭到斯大林的拒绝。1926年11月,斯大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发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讲,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退出国民党将是极严重的错误。中国革命的全部进程、它的性质、它的前途都毫无疑问地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留在国民党内,并且在那里加紧自己的工作”。^①会议严厉批评了反对派要求中共退出国民党的主张,通过了《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强调要巩固和加强国共联合战线,并要求中共不惜一切代价留在国民党内。武汉政府时期,托洛茨基又提出共产党建立苏维埃的主张,像俄国二月革命后的策略那样,逐步由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过渡到一个政权,但也被斯大林否定。斯大林当时把全部希望寄托到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身上。1927年3月,托洛茨基再次提出:“由共产党公开坦白地提议,以两党底独立及协定为基础,重新考虑组织问题。”^②斯大林则认为:“主张退出国民党的说教,就是取消中国革命的说教。”^③大革命失败后,托洛茨基乘机发起猛烈进攻,攻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执行的是彻头彻尾的孟什维克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了中国革命的惨败。

第二,关于苏维埃政权问题。斯大林认为,武汉政权虽然现在还不是工农兵政权,但发展下去会成为这种机关;反对派认为,武汉政权是个“空架子”,把它说成是工农小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是不正确的,要立即组织苏维埃。

第三,关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斯大林认为,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基础是农民土地革命,中国革命必须发展为土地革命;反对派则断言中国革命主要的不是土地革命,而是争取关税自主的革命。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中国革命开始进入紧急时期,全国形势急剧恶化,出现了以武汉、南京、北京3个政权鼎立的局面。在新的形势下,反

① 《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9页,人民出版社,1954。

②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问题》,上卷,第2页,世界文化研究出版部,1930。

③ 《中国革命与国民党》,载《真理报》1927年3月16日。



对派更加猛烈地抨击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政策和策略。季诺维也夫在《关于中国革命的提纲》中认为,国民党就其实际来说,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政党,绝不是什么“四个阶级的联盟”。为此,他提出必须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完全独立”,如果共产党不惜一切代价留在国民党内,那就会导致迷失方向,并且认为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时刻已经到来,“只有建立苏维埃才能保证和准备中国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才会给整个运动以必要的推动力量”。斯大林则断然拒绝了反对派关于成立苏维埃和退出国民党的两项主张,提出“在目前成立苏维埃的口号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敌人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削弱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国民党”。^①这种争论在1927年5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上达到了高潮。

应该说,就双方的论点来看,托洛茨基提出立即在中国建立苏维埃的主张是错误的,因为当时中国还不具备这种客观条件,而斯大林等过分强调国民党左派和武汉政府的革命作用,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也是不妥的。两派的激烈争论,针锋相对,并通过他们各自的代言人鲍罗廷和罗易具体在中国贯彻,就使得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无所适从,不知听谁的为好了。

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关于中国革命的争论,先从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争到土地革命兴起,又从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高层争到联共(布)莫斯科活动分子会议、中山大学的群众集会上,最终在党内党外、上层下层、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公开进行。有时,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甚至面对面争吵。因此,在群众中尤其是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和列宁学院等校学习中国留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并导致了他们的分裂。当时中山大学校长拉狄克是托派中有名的人物,而且他请来的教授和教员大多数也是托派。他们在课堂内外引经据典,在马恩列的著作中断章取义,公开为托派宣传和辩护。一部分中国留学生渐渐受到了托派宣传的影响,从苏联托派那儿接受托洛茨基的文件,然后互相传阅,对托洛茨基由好感而同情,由同情而钦佩,由钦佩而信仰,由信仰最终加入托派组织。

1926年11月,联共(布)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宣布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开除出政治局,并撤销了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主席的职务,改由布哈林接任。

1927年11月7日,中国留学生区芳、陈亦谋、梁干乔、陆一渊、史唐

^①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16页,人民出版社,1955。



等人参加苏联军民庆祝十月革命10周年的红场游行。当他们经过主席台时,与苏联托派一起,当着斯大林的面,突然打开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字样的旗子,并高呼口号、散发传单。苏联两派群众也发生火并事件,联共党内斗争由此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1928年1月1日,联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举行会议,讨论红场上发生的严重事件,要求托洛茨基立即停止反党活动,被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拒绝。1月14日,联共中央将他们开除出党。

1928年1月,托洛茨基被斯大林流放到距莫斯科4000公里之遥的边疆城市阿拉木图。托洛茨基在流放地继续撰写文章攻击斯大林的政策。于是,1929年1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以压倒多数通过一项决议:将托洛茨基驱逐出境。布哈林投了反对票,但这已无济于事,反而为自己日后被清除埋下了祸根。

与此同时,苏联国内开展了大规模的肃托运动,托派活动开始转入地下。中国留学生梁干乔、史唐等人也于1927年底被遣送回国。

1928年12月,从莫斯科中山大学被遣送回国的梁干乔、区芳、陈亦谋、张特4人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为“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同时,仿照托洛茨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创办的刊物《我们的言论》,创办了一个油印刊物《我们的话》作为机关报。因此,这一组织被称为“我们的话派”。



“我们的话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简称“总干”),史唐任干事长,陆一渊任宣传部长,张特任组织部长,梁干乔、区芳、陈亦谋负责华南区,宋逢春、肖冰洋负责华北区,徐正庵负责江浙区,他们还在武汉、香港、苏州、广州、北平和哈尔滨等地建立了支部。

由于“我们的话派”人数较少,所以未及在党内大肆活动,对党组织没有产生什么大的影响,但他们却能够将托洛茨基的文章连篇累牍、源源不断地通过翻译介绍到中国来,到1929年秋开始逐渐在党内产生影响,最终酿成了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大分裂。

其实,早在1928年秋天,原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从苏联回来,向陈独秀汇报六大情况时,就曾劝他接受托洛茨基的思想,反对中央的路线。那时候,由于陈独秀一点也不了解托洛茨基的思想观点,因此对老托毫无兴趣,当场就拒绝了汪泽楷的建议。^①

时隔半年,外甥吴继严的到来,为他留下了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

^① 转引自唐宝林等编《陈独秀年谱》。

读完之后,他才惊喜地发现,原来在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上,托洛茨基的许多观点与自己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原来只听说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争斗,最后托洛茨基被打败、驱逐出境,可并不了解因为什么,一直认为和自己没有关系;看了托洛茨基的文章,才知道原来自己和老托“同是天涯沦落人”,同是反对斯大林路线,同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顿时有了亲近之感。

但是,陈独秀向来不是盲从之人,他在接受托洛茨基思想之前,必须了解托洛茨基的全部理论,他需要自己的判断。

三十八

1928年秋,党的六大之后,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六次代表大会,讨论和通过了斯大林和布哈林起草的《共产国际纲领》。会前,流放阿拉木图的托洛茨基写了《共产国际纲领草案批评》的文件,要求在大会上讨论,并恢复党籍。文件第三部分的标题是《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专门论述了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未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本质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共产国际六大只译了这个文件的第一、三部分,发给中国及其他少数几个代表团阅读,规定阅后收回,不准带回国。但是,参加大会工作的中共党员王文元、刘仁静、赵济等人是中国留学生中隐蔽下来的托派分子,他们看到此文件后被深深打动。于是,他们于1928年9月在苏联留学生中正式建立托派秘密组织“干事会”,安福任书记,王文元任宣传部长,范金标任组织部长,为国内托派组织翻译投寄托洛茨基的文章和托派文件等。到1928年冬天,莫斯科及列宁格勒中国留学生中的托派分子发展到了一百四五十人。不久,托洛茨基又写出《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详细论述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和策略。此文件和《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被中国托派组织视为托洛茨基论中国革命的两个纲领性文件,与中共六大制订的纲领、路线针锋相对,为中国托派规定了系统的理论、纲领、路线和策略。

1929年4—5月,彭述之、尹宽、郑超麟等国内“陈独秀派”的人从归国留学生托派分子手中首先接触到了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前托洛茨基批判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推行国共合作是孟什维克路线,大革命失败后又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材料;不久,他们又看到了



托洛茨基的《中国革命的总结与前瞻》、《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两篇纲领性文件。他们很快接受了托洛茨基的观点,并立即找到陈独秀,向他介绍这些文件。

这时候,陈独秀刚刚从外甥吴继严那里初步接触到一些托派文章,这次又读到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件,马上被托洛茨基关于中国大革命问题的论述深深打动。他特别注意到托洛茨基把大革命失败归咎于共产国际的那些论断:“过去5年中,没有一个共产党,受共产国际机会主义领导之害,有如中国共产党那样酷烈的”^①;“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始而完全帮助蒋介石,反对中国共产党之独立政策,继而又去援助汪精卫为土地革命的领袖”;“当反对派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陈独秀)在共产国际错误指导下进行一种机会主义的政策时,就说我们是‘诬蔑’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在当时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无疵的”。^② 这些文章使陈独秀明白了,他过去主要的错误就是“忠实地执行了由斯大林决定的命令”。同时,他惊喜地发现:大革命时期,自己多次指出的先是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来要求退出国民党的主张原来与远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的主张不谋而合,而正是这一主张被共产国际一再否定,才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见此恍然大悟道:“当你们(指共产国际——引者)将革命失败单独归咎于中共中央或‘陈独秀的机会主义’时,而托洛茨基同志却早已在你们背后指出真正的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这使陈独秀大有“英雄所见略同”之感。他极口称赞“托洛茨基同志所指出过去大革命失败的教训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至于托洛茨基目前的处境,更使他有一种惺惺相惜的感觉。这使他更加坚定了他原来的主张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正确路线”的代表。

从此,陈独秀不仅巩固了他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不满情绪,而且坚定了他对立三路线的怀疑和否定。他后来回顾说:“自一九二七年中国革命遭受悲惨的可耻的失败后,我因亲自负过重的责任,一时实感觉无以自处,故经过一年之久我差不多完全在个人的反省期间。我虽未能及时彻底认清这个失败的教训而找出新的出路,但我本着我亲历的经验,深深知道这种失败是过去整个政治路线之必然应有的结果。”“因为你们的蒙蔽与封锁,直到半年前我们才得到托洛茨基同志关于中国革命

① 托洛茨基:《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后的中国问题》。

②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信》。





问题及一些苏联问题之文件,从此以后我们才彻底地系统地了解在中国革命所犯的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之真正的根源所在。”^①

这时,当初使陈独秀勉强接受的六大对于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所作的结论已经远远不能使他满意了。但是,陈独秀毕竟已不是仅凭满腔热血就会一时冲动的青年,他是一个久经考验的老牌政治家。尽管他同意托洛茨基的结论,但他要严密的逻辑论证,要令人信服的理论根据,他从不盲从任何权威和理论,他需要自己的判断和分析。所以说,从原来基本拥护六大路线到彻底否定六大路线,对于陈独秀来说,自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旦他认定了是“真理”,就会义无反顾地去捍卫。

1929年春夏之交,陈独秀走出呆了1年多的小屋,开始频频出没昆明路提篮桥监狱对面的一幢不引人注目的楼房。那里住着彭述之和汪泽楷两家人,“陈独秀派”那帮人就经常聚集在那里阅读和讨论托派文件。陈独秀每次去,都会提出不同意见,然后就同尹宽、彭述之、汪泽楷等人辩论。每次辩论完毕,他并不能全部接受。但是,下次来时,他就不再提上次的不同意见,而是以尹宽他们阐述的托洛茨基意见为基础,提出新的不同意见。这样一层一层讨论下来,他一边学习与思考,一边写了七八篇书面意见和个人见解。到1929年夏天,陈独秀基本上接受了托洛茨基主义。中东路事件爆发后,他在8月5日给中央写的第二封信中,其观点不知不觉渗透了大量的托洛茨基理论。中央没有公开将他的文章登在党的刊物上,也是考虑到问题的严重性,对他关于中东路事件“三封信”的批评,措辞之所以一封比一封严厉,皆出于此。

三十九

这天深夜,陈独秀从彭述之家回来,一进门,便见有3个人坐在客厅里,定神一看,原来是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

陈独秀一怔,随后笑道:“稀客、稀客,今天三巨头同时驾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呀。是不是要在我这里开常委会呀?”

周恩来站起身道:“独秀同志,最近身体怎么样?今天有点空闲,我们3个便一起过来看看您。”

李立三道:“你到哪里去了?这么晚才回来,你可是蒋介石通缉的要

^① 《热潮》第7期,1932年1月23日。



犯。若出了什么事情，我们可担待不起。”

“难得你们还挂念着我这个无用之人，就算是被老蒋抓去，也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陈独秀感叹了两句，又道：“我到老彭那里去坐坐，聊聊天。这段路熟，又很僻静，不会有问题的。”

向忠发道：“独秀同志，听说你最近经常去彭述之那里？”

陈独秀道：“怎么，有什么不妥吗？”

向忠发一时语塞，半天才道：“独秀同志，我是工人出身，说话喜欢直来直去、开门见山，不像你们知识分子这么拐弯含蓄，半天不入主题。彭述之最近和苏联回国的托派分子打得火热，你最好少和他来往，免得天长日久，中了托洛茨基的毒。”

陈独秀毫不隐瞒地回答：“彭述之还是中央委员吧？我为什么就不能和自己的同志来往？再说，我也没觉得托洛茨基的思想有什么不对，我看过他的几篇文章，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

向忠发有些着急：“独秀同志，你怎么能接受托洛茨基的思想呢？那是很危险的，里面完全是反共产国际和反斯大林同志的东西。”

陈独秀坦然地道：“老向，你不要瞪眼。我看了之后，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对；相反，关于对中国革命的论述，我觉得十分精彩，看后顿觉眼前一亮。”

向忠发道：“托洛茨基那是一派胡言。”

陈独秀反问：“老向，你看过托洛茨基的文章吗？”

向忠发说：“那都是毒品，我可不敢看。”

陈独秀又道：“既然你没有看过，又怎知是一派胡言呢？”

向忠发无话可答，只好把求援的目光转向周恩来。

周恩来诚恳地说：“独秀同志，自中东路事件发生之后，你给中央写了几封信，提出自己的建议，我们都为你能为党献计献策感到高兴，不过里面有些观点，中央是不同意的。特别是你8月5日那封信，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明显带有托派思想，中央认为这是很危险的。所以，今天我和忠发、立三同志一起来，就是想和你交换一下意见。”

陈独秀冷笑道：“托洛茨基同志认为共产党应当退出国民党的建议我看就非常正确，若是斯大林早听了他的话，中国大革命就不会是失败的结局。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执行了国际的机会主义政策，以统一战线政策代替了无产阶级独立的领导革命的政策，步步投降资产阶级，毁灭了中共组织上政治上的独立性，这是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根本政策之错误。”



周恩来说：“独秀同志，你这个观点未免偏激。众所周知，中国的大革命正是因为有了共产国际的倡议和支持，这才实现了国共合作，建立了各革命阶级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大革命的深入开展，我们的党也才能从三大时只有几百名党员迅速发展到五大时拥有近6万党员的大党。否定共产国际在大革命中的作用是不公正的。”

陈独秀道：“若是不搞国共合作，我们党就不会丧失自己的独立性及领导权，就不会让蒋介石、汪精卫他们牵着鼻子走，大革命就不会失败。”

周恩来说：“独秀同志，你这个逻辑同样也是不能成立的。关于国共合作过程中是否一定要采取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不是不可以探讨，但采取‘党内合作’只是一个形式问题，它和党没有在国共合作中保持独立性及领导权并没有必然联系，大革命失败的真正原因是后者，而不是前者。”陈独秀一时语塞，便冷笑一声道：“愿闻其详。”

周恩来接着说：“现在回过头来总结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可以看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把国民党作为统一战线的组织，在国民党、政府、军队中争取领导权，更有利于发展工农运动，更有利于壮大以共产党为领导核心的人民力量，这是一条争取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争取领导权。而独秀同志，你在大革命时期就一再坚持认为国民党目前的使命是‘统率革命的资产阶级，联合革命的无产阶级，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并且一再强调‘国民革命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还说‘共产党取得政权乃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事，在国民革命时代，不会发生这类问题’。显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你根本就没有在民主革命中夺取政权的打算，即使当时国共合作采取了托洛茨基主张的‘党外联合’形式，你同样会放弃革命领导权的。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没有革命的领导权，大革命又怎能不失败呢？”

陈独秀听了有些恼怒，道：“恩来，你说了半天，还是认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在我，难道共产国际就没有一点责任了？”

周恩来耐心地说：“我并没有把大革命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到你头上的意思。说到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和作用，应该进行具体分析。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并不是错误，而是共产国际对于中国革命的贡献和功绩。回顾过去，将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完全归咎于你，是不足取的，这一点党的六大已有所纠正。但是，独秀同志，你作为当时党的总书记，反过来把责任完全推给共产国际，说你个人的错误都是来自国际，是遵守国际纪律、服从国际命令的结果，这恐怕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向忠发连连点头：“我看恩来说得对。”

“你懂什么？”陈独秀不屑一顾地瞥了一眼向忠发：“你那时候不过是武汉工人纠察队队长，中央的事情复杂得很，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有什么发言权！”

周恩来严肃地说道：“独秀同志，不管怎么说，作为一个党员，首先要服从组织原则。应该说，党的六大对大革命失败责任的界定是公道的。作为老同志，我们不应该总是纠缠过去，而是要多向前看，更不能搞小团体，散布和中央相反的言论。”

四十

陈独秀道：“恩来，我知道你是个公道人。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你能够一如既往地对待我，我很感激。但我也要声明一点，我从不迷信什么党派组织和权威，我崇尚的是真理。只要我认为对的，我是会坚持到底的，这也是对党的责任。既然你说到向前看，我就再谈谈对目前党的方针政策看法。我认为，我们的党如果再不纠正目前的方针政策，就有再次走上‘左’倾盲动主义的危险。”

李立三闻言马上阴下脸来，问：“你认为中央目前政策有哪些不妥？”

陈独秀振振有词地说：“首先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分析，中央的看法显然是超历史阶段的。大革命失败之后，资产阶级关系在中国已经是无条件占优势和直接统治地位，封建残余在这一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失去了统治全中国的中央政权形式，失去了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地位，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①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仍然坚持中国的经济还是农村支配城市的判断，把反封建的任务放在重要位置，把党的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是不对的。毛泽东甚至跑到山沟里去当李自成、山大王，还说什么这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这真是堂·吉珂德式的笑话。翻遍马克思的经典著作，哪一条哪一句写着在农村可以取得全国革命的成功？”

第二点，关于蒋介石南京政权的性质。大革命失败后，承认也罢，不承认也罢，无论是蒋介石也好，还是汪精卫、张学良也好，已经变成了资产阶级为中心领导的政权。因此，资产阶级是现在革命主要的甚至是唯



^① 《热潮》第7期，1932年1月23日。

一的对象,而中央却仍然认为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中国革命现在的阶段是资产阶级的民权主义革命,提什么要与民族资产阶级建立长期的革命统一战线。蔡元培、杨杏佛这些进步的资产阶级都投靠了蒋介石,跑到南京政府当部长骂我们去了。试问,我们怎么和民族资产阶级联合?

第三点,关于革命形势和策略。不可否认,目前资产阶级政权相当稳定,经济相当恢复,而过去的革命已经过去,将来的革命还未到来,中国革命高潮几时到来,谁也无法预言。在革命高潮没有到来的时候,我们党应该抓住大多数民众尤其是最下层民众对现状不满这一动力,向他们提出‘为召集国民会议而奋斗’的口号,以此推动群众向前斗争,动摇统治阶级的权威。像毛泽东那样在偏僻的山沟里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是绝不能消灭军阀战争的,也根本不能解决群众要求的实际问题。中央却天真地提出要‘变军阀战争为推翻军阀的革命斗争’等口号,这完全是无政府主义的空想,在实际行动上,等于一根鸡毛抛在空中,落到地上,一声也不会响。



第四点,关于革命性质和任务。稍有政治常识的人都看得出,中国经济比俄国落后得多,而正是因为这落后得多决定了中国将不会有一个‘民主’时期,将来的中国革命不是俄国的十月革命,也不是二月革命,而是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之总和。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将被逼于一开始就要最坚决地动摇与取消城市及农村中资产阶级的财产。所以,应该用‘无产阶级贫农专政’来代替六大确定的‘工农民主专政’。因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及中农在革命斗争激进时都必然动摇,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但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将来的革命中,只有最革命的无产阶级能够始终坚决地站在领导地位,坚决地领导一般的工农劳动者、中小农民以及城市乡村中的成百万成千万的劳苦饥寒奴隶,以不断的革命斗争,彻底扫荡一切剥削下层民众的反革命势力,建设无产阶级贫农专政的工农兵代表会议,统一全国的政权,才能够一面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一面走到社会主义的道路。”^①

陈独秀话音甫落,周恩来马上反驳道:“独秀同志,你能够在这一年的时间内认真反思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我很敬佩。但是,对你所得出的结论,我不敢苟同。

第一,我不同意你认为目前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在中国占据统治地

^① 转引自唐宝林等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位,而封建经济已是残余之残余的说法。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数千年,鸦片战争之后又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辛亥革命只是推翻了一个皇帝,却丝毫未触动这个经济基础。北伐战争时期,广大农民刚刚起来向封建势力进攻,就被国民党右派的背叛镇压下去了。这两次革命,你都是亲身参加的;尤其是大革命,你是我党的主要领导。在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和党的五大上,你亲自参与制订了反对农民土地革命的纲领,以制裁‘过火’行为,怎么因此而失败的大革命竟成了‘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封建残余变成了‘残余势力之残余’呢?这无论在事实上或逻辑中,都是说不过去的。试问,这和托洛茨基所说的‘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无条件地占优势和直接的统治地位’又有什么两样呢?

第二,我也不同意你关于‘国民党政权已成为资产阶级为中心为领导的政权’的判断。你的这个提法与托洛茨基认为国民党政权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关’有异曲同工之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确实一度依附了大资产阶级,但他们很快就醒悟过来,在宋庆龄的领导下,参加了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所以,我们必须建立长期的革命联合战线,反对和孤立蒋介石政权。

第三,你说目前‘资产阶级政权相当稳定’与托洛茨基提出的‘现在全国并无革命局势’如同一辙,并且你为中国革命设计的这种从议会斗争的合法运动过渡到暴动夺取政权的道路完全是闭门造车和自欺欺人。对此我也不同意。中国目前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内部没有民主制度,外部没有民族独立,根本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毛泽东在井冈山领导了工农武装根据,正是代表了中国革命的希望之所在,相反,说什么国民会议的主张,实质上是取消革命的主张。

第四,你认为中国革命应当以‘无产阶级贫民专政’来取代党所提出的‘工农民主专政’,更是错误之极,这同托洛茨基提出的下次中国革命将‘一开始就是社会主义性质’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实,这种‘一次革命论’是早已被列宁批臭了的机会主义理论。你一方面把民主革命混到社会主义革命中去进行,似乎极‘左’;另一方面又说‘中国的革命高潮几时到来,没有人能够预言’,这实际上又回到取消当前革命的立场上来了。”

陈独秀道:“恩来,你说我的政治观点和托洛茨基如出一辙,我不否认受了他的影响和启发;但你说我是取消主义者,我不能接受,我再一次



请求把我8月5日写给中央的信公开发表,谁对谁错,让同志们评说。”

李立三断然否决道:“这种典型的托派观点,中央是不会公开发表的。”

周恩来诚恳地道:“独秀同志,你对八七会议于你个人的评价有意见,我们理解,但千万不要因为有点情绪,看到托洛茨基在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上为你开脱,就接受他的思想,这是条走不通的路。你在大革命失败时说过,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托洛茨基同样是不了解中国革命实际情况的外国人。言犹在耳,南辕北辙,凭着一时感情用事,会走入歧途的。”

陈独秀道:“谢谢你的提醒。我有脑子,从不盲从别人和权威,提出的都是自己的观点或经过消化自认为是对的观点。我觉得这是对革命、对党的事业真正负责的态度。你们不让我说,我也是要说的,我会用自己的方式说的。”

李立三似乎预感到什么:“独秀同志,最近党内已经发现了一个自称为‘我们的话派’的托派小组织,他们很有可能会和党内一些落后的、消极的、离开工作、不满意中央的党员相结合,而形成中国的反对派。对托派问题的性质,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已经定性,它是帝国主义破坏者,反对世界革命的工具,是中国统治阶级反对革命破坏党的工具,所以党必须坚决地予以制裁。中央知道你没有介入江苏省委独立事件,更希望你能在未来的这场和托派的斗争中站稳立场,洁身自好,保持晚节。”

陈独秀冷冷地道:“谢谢关照,我知道该怎么做的。”

向忠发、李立三、周恩来互相望望,露出一丝苦笑,再也无话可说。

他们已明显感到,陈独秀已经彻底转向托派,和陈独秀之间的斗争即将升级,谁也不愿看到的结果就要出现。

陈独秀和周恩来的这次谈话是有史料记载的。它表明:1929年8—9月间,陈独秀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已完成向托派的转变。或许人们可以认为,既然如此,中共中央后来开除陈独秀党籍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历史并非想像的那么简单。在陈独秀的政治思想转变过程中,有几个问题必须搞清楚,这对后人为他接下来的所作所为定性至关重要。

第一,就托派思想而言,本是共产国际和苏共党内的正常的意见分歧,并不如斯大林后来所批判指责的那样;而且托派思想又是一分为二的,既有正确方面,也有错误之处。斯大林以特殊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并对托洛茨基等人作出了错误处理,导致共产国际内部的分裂并波及各国共产党。



第二,陈独秀虽然在政治立场和政治思想上倾向托派,当时却并没有在主观上要反对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及中共中央的想法,也并非有意在中共党内搞分裂、闹宗派,应该说还是属于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有意见分歧,所以并不具有反革命的目的;相反,这里面还含有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期待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认真汲取教训的意图。

第三,陈独秀当时因接受托派思想而强化了自己的反对派思想,具有明显的两重性,即从指责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文过饰非这一点来说是符合事实的,从反对中共中央当时推行的“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这一点来说也有合理性,但他过于强调中国革命的“失败”而竭力主张搞“议会斗争”,却不是对“左”倾路线的一种正确的积极的纠正,其中既反映了他“二次革命论”的痕迹,又带有“一次革命论”的色彩,理论上和逻辑上是混乱的。另外,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以及中共中央在感情上还有对立情绪,自然也不十分健康。

第四,由于此时陈独秀尚未有行动上的宗派主义活动,所以与党中央的关系仍未带有敌对的性质。虽然党内有一批人集结在他的周围,甚至有些人早已在莫斯科加入了托派组织,但这些人并非是陈独秀主动召集而来,而且这些人加入托派组织的直接原因正是在于斯大林错误处理了托洛茨基,即这种情况的出现乃是由斯大林的错误而在中共党内所造成的组织上、思想上的混乱的必然结果。

中东路问题上的争论,加剧了陈独秀的自以为是以及与党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对立情绪,中央也因此把他转向托派的问题看得更加严重。随着矛盾的升级,一帮与他意志相投的人迅速聚集到他的周围,名副其实的“陈独秀派”于是应运而生。

接下来,随着陈独秀和中共中央冲突的升级,问题的性质开始发生了变化。

四十一

1929年9月,陈独秀在政坛上沉默了两年之后,终于耐不住寂寞,开始主动出击,用他自己的方式宣传自己的主张。在他的指挥下,一部分政治上不得志的领导干部分头活动,一面对上海本地的党员和外地来上海的党员进行宣传,一面把原来的“陈独秀派”和新影响下的人编成小组,学习和讨论托洛茨基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张。在支部会上,他们



还就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同江苏省委和中央组织部派来的代表进行辩论,有的支部由此与党宣告脱离。

由于陈独秀在党内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和影响,中共虽然此时已召开六大并制定了基本路线,但一些基层支部并不了解,再加上当时以李立三为首的党中央执行的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以陈独秀等人的挑战立即在党内引起混乱,尤其是在中上层干部中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至此,中共中央不得不将解决中国托派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

1929年9月20日,中共江苏省委根据中央的指示,召开支部干事会及中央、省委、区委各代表联席会议,首先着手解决陈独秀的得力干将彭述之等人的问题,意在敲山震虎,对陈独秀做一明确警告。没想到,会上,彭述之3次发言,与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展开激烈辩论。

彭述之认为:陈独秀对过去机会主义路线是承认的,现在已不是机会主义者;中央一年来的政治路线是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之继续,是根本错误的。他指责党的“铁的纪律”是“废话”和“官僚们压迫群众”的工具。在谈到托派问题时,彭述之最后表示:“如果我是赞成反对派的主张,我便要公开地站在反对派的政治路线上奋斗。”^①显然,彭述之坚持了陈独秀给党中央“三封信”中的政治观点。

彭述之公开支持陈独秀的行动,进一步激怒了中央。

10月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决议指出:陈独秀8月5日致中央的信,是“完全推翻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一贯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完全推翻六次大会与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而走到了极可耻的取消主义”,也是“很明显的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反六次大会,反中央,反党的路线”,而陈独秀“在未经中央决定以前,把他写给中央的信,自由在同志中间宣传”,这是“一种小组织的行动”。为此,中央决定:各级党组织凡发现类似的小组织必须马上解散,并对参加者予以组织上的制裁;经过讨论之后,仍然继续坚持原来的立场的,应毫不犹豫地开除出党;至于陈独秀,“必须立即服从中央的决议,接受中央的警告,在党的路线之下工作,停止一切反党的宣传与活动”。

10月6日,中央撇开彭述之直接致函陈独秀,向他发出了措辞强硬的“书面警告”,指出:“在党的组织原则上不容许有两个路线同时存在,尤其不容许有少数同志与党对立,破坏党的组织系统。”“你以及和你意

^① 《陈独秀问题批判资料》,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刊印本。



见相同的人,在上海党的下层组织中有超越组织的活动”,“必须站在党的利益上立即停止这种活动”。中央还申明:已决定不公布陈独秀 1929 年 8 月 5 日致中央的第二封信,因为若公布将“有妨害于对敌人的斗争”。中央在信中发出最后通牒:“中央决定你在党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月内做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并编入中央直属支部中参加党的生活。”^①

陈独秀收到这封信,同样是愤怒至极。在陈独秀看来,中央这封信实际上是对他关于中东路事件致中央“三封信”的否定性的总回答,而且对他施以了强大的政治压力,这表明中央“固执掩护错误的政治路线”“已深到无可挽救的地步”;至于中央要求他写一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如同当年要求他写“悔过书”一样,是“发狂闹的笑话”,他根本不可能接受。于是,陈独秀于 10 月 10 日写信给中央,针锋相对地对中央“作一次最后的警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绝对没有理由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同志；在我，只知道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为无产阶级的革命利益，结合下层的革命群众和机会主义的上层领导机关奋斗，而不计其他……如因此造成党的分裂，是应该由你们负责的！”^②

陈独秀在信中使用了“开除”一词，并非没有由来，因为早在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代表中央与他谈话不久，中央就在 9 月 2 日出版的《红旗》第 43 期第 44 号通告中严厉训斥反对派道：“党除对于其思想给予严重驳斥外，并须将其活动的领袖毫不留恋地开除出去。”在这里，一意孤行的陈独秀为他所捍卫的“真理”做了最坏的打算。

10 月 25 日，中共江苏省委与上海各区党团书记联席会议作出决议，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和蔡振德 4 人的党籍。决议认为：彭述之等人一贯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六次大会的决议、中央对于目前革命的根本策略完全是出卖阶级的。他们完全推翻了列宁主义的路线而走到取消主义的泥坑。决议强调：党的全国大会的决议，同志必须服从，这是布尔什维克的基本原则……在目前党的任务加紧的时候，他们提出反对大会的决议的意见，且煽起同志对党的怀疑，经过党几次的解释，不仅不能接受，并且连省委限期要他们把意见写出交来，不能在下边自由地宣传的决议，他们都认为是“命令主义”。他们完全违反了列宁党根本的原则，取消了党的纪律。他们并且积极地进行小组织的活动，企图使党分裂。决议最后指出：“中央所指陈独秀致中央信中的一切错误”即是上述



^{①②} 《陈独秀问题批判资料》，中国人民大学 1956 年刊印本。

4人的“共同观点”，上述4人的主要错误正是“拿独秀的信来向党内作过宣传与活动”，所以“请求中央开除陈独秀”。^①很显然，这是中央借江苏省委之口对陈独秀发出了最后警告。

然而，中央低估了陈独秀对高压政策的承受能力，这一做法激起陈独秀更加过激的反抗。

10月26日，陈独秀和彭述之联名致函中央，再一次表示了他们坚定的反对派立场。信中说：近年来中央执行的是“盲动主义”、“机会主义”的政策，而“托洛茨基同志在一年前，已经预见到你们不正确的政治路线之发展和你们真正的政治面目”。信中最后公开打出“反对派”的旗帜，向党宣布：“你们说我们是反对派，不错，我们是反对派，我们的党此时正需要反对派……坚决的〔地〕不和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威吓手段腐败官僚的领导机关同流合污。”^②

这种情况表明，陈独秀等人与党的关系已经发展到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对抗，矛盾已无法调和。

是否开除陈独秀的党籍，斯大林一直在犹豫，因为陈独秀毕竟是中国共产党的开山鼻祖，是具有重大的政治影响的人物。于是，斯大林征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

王若飞坚决反对开除陈独秀党籍，他主张应先与陈独秀进行辩论，真理越辩越明，是非自有公论，并向党员进行解释。然而，他的意见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判。为此，他被停止了参加中共代表团和农民国际的工作，送到莫斯科列宁学院学习，紧接着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下放到莫斯科镰刀厂做铁工。

瞿秋白则坚决主张开除陈独秀党籍，尽管他本人因犯“左”倾盲动主义还在深刻反省，并已经开始受到米夫、王明的打击，其三弟瞿景白在莫斯科还因退出联共（布）而“失踪”，但他对陈独秀的取消主义和托派言行却深恶痛绝。于是，他专门写出一篇批判陈独秀的文章，在俄文刊物《中国问题》上发表，痛斥陈独秀的反党行为。

斯大林经过权衡利弊，终于将天平偏向了瞿秋白。说实话，斯大林从心底不能容忍有人支持他的政敌托洛茨基。他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谁支持和同情托洛茨基，谁就必然得到与之相同的下场。于是，他给中

^① 中共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及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决议》。

^② 《陈独秀问题批判资料》，中国人民大学，1956年刊印本。



中共中央发出指示：“在一切斗争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及托洛茨基派，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托洛茨基派。”^①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入党籍的决议案》。决议指出：陈独秀屡次拒绝共产国际及中央决定，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且在其最后两封信中“公开地揭出他及彭述之等反国际，反六大大会，反中央，反整个的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公开地承认已成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茨基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定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②

郑超麟在支部会议上抗议开除陈独秀出党，但已属螳臂挡车，毫无用处。

自此，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后被停止党的领导工作、撤销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之后，最终被开除出党，在组织上割断了与中共的最后联系。

其实，开除陈独秀党籍并非偶然，而是共产国际在世界范围内反托洛茨基斗争的必然结果。

早在1929年8月，共产国际六大就根据苏共十五大的决定，明确宣布：“凡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和宣传其观点的人，都不能留在布尔塞维克党内。”“在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对反对派的观点一再提出最坚决谴责的情况下，跟共产国际的敌人就托派的反革命政纲的内容进行辩论，是多余的。”^③尤其是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次全会马上作出决议，认为“帝国主义者对苏联的进攻，是主要的危险”，“不粉碎右的和‘左’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取消派分子，不坚决克服调和主义态度，就不能完成共产国际及其支部在新高潮的条件下所面临的任务，就不能完成防止战争的危险和保卫苏联的任务”。^④

可见，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陈独秀就中东路问题致中共中央的“三封信”，无论性质是右还是“左”，无论动机是好还是坏，无论观点是对还是错，其结果都只能是以卵击石，自取灭亡。

陈独秀没有想到，中央当真会作出将他开除出党的决定。更令他气

① 收入《中国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一）。

② 此决议刊《红旗》第57期，1929年11月27日。

③④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3册。



愤的是,党的机关刊物《红旗》紧接着发表了一篇王明的文章《论陈独秀》,把他说是无产阶级叛徒。对此,他做出了更加强烈的反应。

1929年12月10日,陈独秀写出了洋洋万言的《告全党同志书》,针对中共中央开除他的党籍的决议案里所列举的理由逐一进行了驳斥和申辩。

中央决议案称:陈独秀“根本便无诚意去认识自己在中国大革命时代之机会主义领导的错误。没有决心去认识过去的真正错误所在,便必然不可避免地要继续过去的错误路线,而堕入到更深的机会主义”。陈独秀答辩说:“其实我正因为根本的诚意的认识过去机会主义领导的真正错误所在,就决心反对现在及将来继续过去的错误而被开除了。”

中央决议案称:陈独秀“不满共产国际的意见”,“根本便不愿赴莫去接受国际的训练”。陈独秀辩解道:“我们受国际机会主义路线的训练已经够多了,以前因为接受国际意见而做了许多错误,现在因为不满意国际意见而被开除了。”

中央决议案指出:陈独秀1929年8月5日致中央的信中说“资产阶级与封建势力的矛盾也没有了”,“现在统治阶级不是走向崩溃,革命斗争不是开始复兴而是更加衰落”,还“主张应采用‘合法的方式’……”他1929年10月10日致中央的信和10月26日与彭述之联名致中央的信,“主张以‘召集国民会议’为目前的‘总的政治口号’来代替‘打倒国民党政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口号”。陈独秀答辩说:“同上面一样,也是对我的原文的歪曲性引用。”

中央决议案指出:陈独秀“以‘反对国民党误国政策’的口号来代替‘拥护苏联’的口号”。陈独秀答辩道:“我的意见其实‘正为帮助拥护苏联的口号能够深入群众’”。

中央决议案指出:陈独秀“在行动上,更于中央未决定与答复以前,便将他写给中央的信,作公开宣传,经过彭述之……极力煽动同志起来反党”。陈独秀答辩道:我给中央的几封信,“中央延搁起来久不发表,而且国际代表及中央向我明白宣告以不能公布党内不同政治意见为原则”,“由党员群众合法讨论以纠正中央错误这一方法,既已绝望,我不应再为寻常的组织纪律所拘囚,更不必阻止同志们传观我的信稿”。

中央决议案指出:陈独秀“完全不接受中央的警告,并拒绝中央指派他的工作”,还“公开地承认已为共产国际及联共党所开除的托洛斯基为同志”。陈独秀答辩道:“八七会议以后,中央不许我参加任何会议,未曾派我任何工作,直至本年十月十日……才突然来信说‘中央决定你在党



的政治路线之下,在中央担任编辑工作,限定你一月内作篇反对反对派的文章’,而我此时已根本承认托洛茨基同志的主张是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我如何能说和自己意见相反的假话。”

中央决议案指出:陈独秀称托派为同志,“这充分证明陈独秀〔、〕彭述之等已经决心离开革命,离开无产阶级,客观上就是已经开始转变他们的历史行程走向反革命方面去了”。于是,根据上述理由,决定开除陈独秀的党籍。陈独秀答辩道:“我们只知道托洛茨基同志是坚决地反斯大林、布哈林机会主义政策的,我们不能听斯大林派的造谣,便相信和列宁携手创造十月革命的托洛茨基同志真有反革命的事实。”总之,我承认“当时深深地沉溺在机会主义的大气中,忠实地执行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政策,不自觉地做了斯大林小组织的工具,未能自拔,未能救党,未能救革命,这是我及我们都应该负责任的”,然而“中央的这些无理由的理由剥夺我的党籍,这一切都是表面的官样文章,其真正的原因是在于我在党内发表各种意见,批评他们继续执行盲动主义和破产路线,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之故”。

一个政党的创始人被他所缔造的党的中央开除出党,不管原因如何,这一事实本身就极具戏剧性,它必然会带给人们深深的震撼和惋惜。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已经 70 多年了,但有关这一事件处理的是是非非,仍在史学界无休无止地争论着。

有人说,陈独秀曾创建中国共产党并连任 5 届总书记,中央在处理他的问题上过于听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而流于草率。应当说,中央在处理他的问题上还是比较慎重的,周恩来曾多次找他谈话,做了大量工作。在 1929 年阶级斗争那样异常复杂激烈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在处理陈独秀党籍问题上,不能说是仁至义尽,也是在做了教育和挽救之后,才不得已采取的组织措施。即使是这样,由于他的特殊地位,1930 年 2 月,共产国际在审批中央这一决议案时,还出面对他做了最后一次挽救,在给《中国共产党转陈独秀》的电报中说:国际“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局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的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①但是,这一次又遭到了陈独秀的拒绝。

也有人说,陈独秀在对中央提出的意见中,是打着反对中央机会主义和“左”倾盲动主义的旗帜进行的,却落到如此下场,实在是党的悲剧。

^① 陈独秀:《答国际的信》附件。





对此,我们必须看到:毋庸讳言,大革命失败之后,中央连续经历了3次“左”倾机会主义,而且一次比一次“左”,陈独秀对此是提出了批评意见,但他的主要锋芒不是落在那些真正的“左”倾错误上,而是指向八七会议、六大的基本路线。他的这种所谓反“左”,与当时毛泽东进行的抵制和纠正“左”倾错误的做法,是根本不同的。

还有人说,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与他不成熟的个人政治心态和倔犟的个性有关。从政治心态来说,陈独秀作为中共的创建人,又担任中共总书记长达7年之久,因而自负得很,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而这种政治心态又与他素来吃软不吃硬的个性有关。如果他仅仅是一个大学教授,或许还是长处;但作为政治领袖,这一个性便成为致命的毛病。表现在政治生活中,当受到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不够公正、合理的批评指责时,他就不懂得也绝不会像瞿秋白、李立三那样,或毫不争辩地承担与实际不相符的错误责任,或在承认错误责任后又心悦诚服地服从上级安排的工作。总观中共党史,在政治生涯中将其性格毫不掩饰发挥到淋漓尽致、登峰造极者,唯陈独秀一人耳。历史证明,在党派政治和阶级斗争的漩涡中,陈独秀的“泳技”是劣等的,其思维方式乃至其性格都是直线型的,易于冲动、奋进、摧枯拉朽,却难于周旋、把握、刚柔相济。这使他五四时期所向披靡,大革命时期则捉襟见肘,走上托派道路后就执迷不悟了,最后等待他的只能是行动越来越“非党派”、“超党派”,思想则愈来愈陷入“终身反对派”的泥潭。这就决定了他不是一个成功的政治领袖,决定了他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必然被开除党籍。这是一种合乎逻辑的结果。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中共中央和陈独秀对此都不可能有第二种选择。不能期望陈独秀不反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路线,并且在受到压制和打击的情况下不进行小组织活动,因为这条路线确实存在着缺陷和错误;也不能设想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能容忍陈独秀在党内进行反对派活动而不加以制止,因为在白色恐怖下,党的团结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必须加强组织纪律,甚至不惜矫枉过正。

绝不能用今天的眼光看待过去的历史。

陈独秀最大的悲剧在于,当别人都认为他是分裂党、破坏党、顽固不化、死不悔改的时候,他还自以为是在真诚地、坚持不懈地寻求救国救民和继续革命的光明大道,并且自以为找到了这条道路。这种中共党史上特有的主客观矛盾的强烈冲突所酿成的悲剧,是最值得后人深思的。



第

十

章

在与中共合作不成的情况下，陈独秀公开宣布自己“不隶属任何党派”，决心寻求“不拥国，不阿共，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的第三条路线。

四十二

往事不堪回首。8年时间，过眼云烟。

这一夜，陈独秀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中共代表董必武的到来，一下子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这8年里，他四面出击，到处树敌：一方面，拼凑了中国的托派组织，不断向中共路线提出批评，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成为孤独的“反对派”；另一方面，又将枪口对准国民党政府，猛烈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被抓进大牢，度过了5年漫长的铁窗生活。这些许多年前的是是非非、恩恩怨怨一下子涌到眼前，令他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要想在当今中国政坛有所作用，必须和国民党或者共产党合作，这一点他心里十分清楚。国民党杀害了他两个儿子，与他有血海深仇，势不两立，自是不能为其效力！共产党虽然将他开除，但共产主义毕竟是他的追求，这也是他为什么一再让罗汉与中共联系的原因。

白天和董必武的接触，使陈独秀基本摸清了共产党的底牌。要想回到延安，必须写一份“悔过书”，这就是先决条件。不写是很难“过关”的。虽然当年他反对过的瞿秋白已经牺牲，李立三也被囚禁在莫斯科，失去了人身自由，可王明还在，这个在莫斯科受过





抗日战争时期的陈独秀

正规训练的小个子留学生是反对托洛茨基的急先锋、中共党内“左”倾机会主义的倡导者、共产国际路线在中共党内的忠实代表。尽管陈独秀知道，毛泽东与他有过师生之谊，但碍于王明站在一旁虎视眈眈地挥舞着共产国际的大棒，是不能轻易触动托派这一“雷区”的，这是斯大林最敏感的一根神经。因此，陈独秀十分理解为什么毛泽东对他回党工作的前提条件是先写“悔过书”。这就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他要接纳陈独秀，但又不能惹怒了斯大林。可是，陈独秀偏偏不是瞿秋白，也不是李立三，他是绝不会写什么“悔过书”的。在陈独秀看来，什么都可以和中共谈，唯独这一条不能谈！这是他必须坚守的最后阵地、退让的底线。

矛盾的焦点就在这里，要是悔过了，岂不是证明陈独秀坚持追求多年的“真理”原来是错误的？陈独秀肯定不会答应；可要是不悔过就重新回到党内工作，岂不是证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陈独秀的处理是错误的？毛泽东肯定也不会答应。双方在这个原则问题上都不会妥协。谈判由此陷入了僵局。

不过，陈独秀和董必武的这次接触，虽然没有达到什么明显效果，但他抛出的橄榄枝中共毕竟接了过去，并对他报以友好的微笑了，这使他稍有些安心。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陈独秀和中共的联系并没中断，更没有发生新的公开冲突。周恩来不久接见罗汉时说：“中国‘托派’可分为几派，而陈独秀一派是主张抗日的，也是赞成民族统一战线的，所以以后对陈独秀这一派的人，可以将‘匪徒’二字停止使用。”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周刊》也曾发表署名文章，称“当陈独秀先生恢复了自由以后，大家都在为陈先生庆幸，希望他在数年的牢狱生活里虚心地检讨自己的政治错误，重振老战士的精神，再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中来。”该文甚至还说，陈独秀在武汉所做的抗日演讲“与中国的托洛茨基的主张已大有差别”。^①

中共和陈独秀似乎达成了一种默契，彼此保持着和平共处，都在小心翼翼地等待一个新的转机的到来。

四十三

1937年底，南京失守之后，中国各政治党派云集武汉，同仇敌忾，出

^① 《陈独秀先生到何处去》，载《解放周刊》第24期，1937年11月。





现了空前的民族大团结。在这种热烈、激动人心的氛围下,陈独秀似乎重新焕发了五四时期的革命精神。他将全部身心投入到抗日宣传中去,白天外出到大学、工厂演讲,晚上伏案写文章。面对国内外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陈独秀的思想也随之发生了微妙变化。他虽然没有明确承认过去加入托派组织的错误,却在许多文章中公开驳斥托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言论,特别是在有关抗战的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有意无意地和中共的政治主张达到了高度一致。

第一,关于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陈独秀认为:这次抗日战争的性质是近代中国继李鸿章改革、戊戌维新、辛亥革命和北伐战争以来的第五次(也是最尖锐的一次)对于帝国主义的武装冲突即民族解放运动,它不仅是“进步的”,而且是“革命的”;不仅是“反侵略战争”,而且是中国“六七十年来改革与革命的大运动之继续”^①，“是第一次革命——辛亥革命、第二次革命——北伐战争之继续”^②。这次战争的意义,不仅仅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而且“是推翻一切帝国主义的宰割,完成国家独立与统一”^③，“由半殖民地的工业进到民族工业,使中国的政治经济获得不断的自由发展之机会”^④。他还批判了托派认为中日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⑤、“南京政府和东京政府的战争”^⑥、“两个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的观点^⑦,并且愤怒地痛斥了日本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山川均、佐野学和铃木茂三郎等宣扬的“爱国主义”论调,指出:“被压迫民族的爱国运动是进步的,因为这一运动是给帝国主义者以打击;压迫国的民族主义和爱国运动是反动的,因为它是帮助自己的帝国主义政府压迫侵略被压迫被侵略的民族。”然而,山川均等“厚颜的先生们,居然狡猾地借口无产阶级利益来说谎话,以欺骗大众,他们认为资源贫乏的日本,从中国夺取得资源,于日本无产阶级现在的生活和将来社会主义的建设都是有益的,所以日本的无产阶级应该赞助对华战争”。他断言:“此次中国抗日战争,我们不能看作南京政府与东京政府的战争,而是被侵略的中国人民对于侵略的帝国主义战争”,抗战的胜利将“不但使本国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并且使侵略的被压迫人民也

① 陈独秀:《我的抗战意见》,第5页,华中图书公司,1938。

② 陈独秀:《言和即为汉奸》。

③ 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

④ 陈独秀:《告日本社会主义者》,载《政论》第22期,1938年8月5日。

⑤⑥ 《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第26页,1948年11月28日。

⑦ 陈独秀:《抗战中应有的纲领》,刊《我的抗战意见》第28页,华中图书公司,1938。



得到解放的机会”。^①

第二,关于抗日战争的前途。抗战之初,全国抗战气氛空前高涨,特别是平型关战斗、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挫败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使陈独秀很受鼓舞,对抗战前途充满信心。他说:“这一次的抗战,军人确实尽了他们最大的力量,勇敢牺牲的精神,是可钦佩的。”^②他在南京时,傅斯年曾很颓丧地说:“我对于人类前途很悲观,十月革命本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独秀则说:“不然,从历史上看,人类究竟是有理性的高等动物,到了绝望时,每每自己会找到自救的道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此时各色黑暗的现象,只是人类进化大流中一个短时间的逆流,光明就在我们的前面,丝毫用不着悲观。”他甚至自负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陷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傅斯年听了大为感动,说:“我真佩服仲甫先生,我们比他年纪轻,还没他精神旺,他现在还是乐观。”^③

第三,关于“主战”还是“主和”问题。陈独秀坚决反对妥协投降。他驳斥投降派说:“投降派唯一的理论及事实之根据,是中国在军事的经济的力量上都非日本之敌”,殊不知“中国政府中的军力和财力之弱点,是可以由全国民众之奋起及全世界革命的国家、革命的民众(日本民众也在内)之援助来补充的”。^④据此,他还接过国民党当局的话头而强调说:“今日而与日本言和,即为汉奸。”“中途妥协即是千古罪人。”^⑤

第四,关于抗战的纲领问题。陈独秀提出了10条:1.以推翻帝国主义者所加于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障碍为此次抗日战争之最终目的;2.在野各党派及一般人民都应有政治的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3.联合苏联及全世界(包括日本)的工农民众共同反对日帝国主义;4.没收日本帝国主义者财产和汉奸官吏的财产以救济伤兵和难民;5.强迫富人认购国家公债,征收财产累进税和加重因战事营业所得税,不把战费加在工人、贫农及小商人、小职员身上;6.解除人民痛苦,以提高民众抗战的热情和力量;7.恢复由各界群众选举各类团体;8.改组全国军队,直



①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刊《我的抗战意见》第5页,华中图书公司,1938。

② 陈独秀:《我们断然有救》,载《政论》第1卷第13期,1938年6月5日。

③ 陈独秀:《抗战期中的种种问题》,载《抗战》周刊第1卷第6期,1937年10月16日。

④ 陈独秀:《抗日战争之意义》,1937年11月6日。

⑤ 陈独秀:《言和即为汉奸》,1937年12月。

隶中央政府,加强军队中的政治教育,改良兵士待遇,实行军队和驻在地民众之亲密合作;9. 武装人民,尤其要武装工农民众,以肃清汉奸、巩固后方,组织训练前线失业工人的特殊军队加入作战;10. 迅速召集国民大众,集中全国抗战力量,支持抗战大局。^① 此外,他明确表示赞同国共合作,称“国共两党为了民族危机,停止多年的内战,在军事上合力抗日,这是无可非难的事”。^②

第五,关于发动民众问题。陈独秀提出,应坚持全民抗战,做“人力的全国动员和财力的全国动员”,因为抗战的一切活动“无一不需要民众的力量”,即“急需发动广大的真正的民众——主要的是参加生产的工农民众”。至于如何发动民众,他认为必须切实做到3件事:一是解除民众自身的痛苦;二是让人民有经常的组织;三是让人民有政治的自由。

第六,关于“游击战”和“持久战”问题。陈独秀认为,中国的抗战不可能“速胜”,而必须坚持“持久战”。他说:“日本对中国作战,利在用飞机大炮,速战速决,尽可能地不使战争范围扩大;中国对日战争,利在发动全国民众蜂起参加,持久抗战,尽可能地使战争范围扩大,以消耗敌人的军力和财力。”^③他还说:“这种最后的胜利,是不容易得到的,我们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能够支持长时期的抗战……至少是二年。甚至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可以。”^④他还主张“全民抗战”：“全中国人民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在坚持抗战到底的政府领导之下,对敌人作战,这是我们胜利之最大的保障。”^⑤“即令我们的正式军队节节失败,即令敌人能够占领中国的几个大城市,只要全国广大民众无束缚地自由组织起来、活跃起来、武装起来,敌人便无法摧毁它,到处蜂起的几千万武装民众,这几千万武装民众之游击战的洪流,不但能够使政府的正式军队有反攻之可能,并且使敌人已经占领的地方,一夕数惊,不能统治。”^⑥

陈独秀的这些观点顺应了历史大潮,自然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拥护和响应。随着他政治影响力的回升,不断有学校和民间组织请他去演讲,媒体对他的报道也开始增多。于是,他开始有些飘飘然,似乎又找到了五四时代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感觉。

然而,陈独秀的好心情没有持续很久,便被上海托派临委书记陈其

① 陈独秀:《抗战中应有的纲领》,1938年2月。

② 陈独秀:《抗战中的党派问题》,1938年2月。

③⑥ 陈独秀:《准备战败后的对日抗战》,刊《我的抗战意见》第32、34页。

④ 陈独秀:《怎样使有钱者出钱有力者出力》,载《宇宙风》第52期,1937。

⑤ 陈独秀:《我们要得到怎样的胜利及怎样保卫胜利》,刊《我的抗战意见》。



昌寄来的一封信搅乱了。

四十四

抗战爆发后,国内政治环境开始宽松,原来四分五裂的中国托派组织成员纷纷聚集上海,根据托洛茨基的指示精神,谋划筹备正式的中国托派政党。

这时候的托洛茨基和他所建立的第四国际,对托派在中国抗战中的政策有着明确的指示。托洛茨基认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正义战争,但蒋介石的抗战是违反自己意志进行的,是“被人推向前”的,“明天,他又要背叛”。有鉴于此,托洛茨基明确指示中国托派:“对于蒋介石和他的党,以及整个中国统治阶级,我们无需要存丝毫的幻想”;对于抗战,一面要“积极参加”,“一面政治上准备推翻蒋介石”。1937年8月,第四国际通过的中日战争决议案,提出了两个“打倒”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国共合作”,托洛茨基更是竭尽污蔑之能事。他说,过去“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遵照着莫斯科命令,抛弃了马克思主义,接受了反动的与学究气的‘孙文主义’,参加国民党,服从它的纪律……在目前的对日战争中,又在重复着这个同样致命的政策了”。

1937年11月,中国托派组织召开了“中国共产主义同盟上海党员代表大会”,选举陈其昌为托派临委书记,并通过了《目前抗战中我们的任务与策略的决议》,正式提出了他们的抗战纲领。《决议》认为:国民党抗战,一是“不能不以‘应战’来维护其统治权”,一是“以‘应战’作为达到它妥协投降目的的手段”。因此,托派的政策是:“全体民众立刻自动组织和武装起来参加抗战”;对于国民党各派,“号召群众监视他们的行动,并准备力量推翻他们”。对中共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托派更是杯弓蛇影,歇斯底里大发作,攻击中共是“彻底投降”,“今天的‘国共合作’,不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国共合作的重演,而且是自觉的叛变。斯大林党(指中共——引者)已经完全堕落为小资产阶级欺骗和压迫民众之天然工具”,并扬言:“必须无情地打击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以独立的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斗争政纲,去抵抗以斯大林党为首的欺骗虚伪的机会主义(放弃阶级斗争)的潮流。”很显然,托派的抗战路线是“极左”加反动,口头上参加抗战,实际上是破坏抗战。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托派组织发现陈独秀非但不反对“国共合作”,



反而主动去和中共“合作”，自然是恼羞成怒。陈其昌立即给陈独秀写信，对他与中共的接触提出了严厉批评。

对于陈其昌的来信纠缠，陈独秀同样十分恼火。

一则，陈独秀现在十分希望与中共和解，共同合作抗战，而他们之间最难逾越的鸿沟就是敏感的“托派问题”，陈独秀虽难以低下高贵的头颅向中共写什么“悔过书”，但总算是公开表示自己与托派没有任何关系，这也说明他希望和中共合作的心情是十分迫切的。然而，就在事情进展有些眉目之际，托派组织突然又像一个幽灵一样找到他，指责他不该和中共接触，就好像他一直是托派组织的一名成员，现在瞒着组织偷偷办了一件不该办的事情似的。这事要是传到中共方面，别说他不会低三下四向中共解释，就是浑身是嘴也解释不清。

二则，在陈独秀看来，现在的托派组织已今非昔比。他当年组建托派组织是为了反对中共党内的“左”倾路线和斯大林路线，而现在的托派组织根本不顾形势发生的变化，既反日，又反蒋，还反共，在社会上名声不佳，陈独秀从心底里不愿与之为伍，唯恐躲之不及。

陈其昌哪知陈独秀此时心里的真实想法，居然以领导的口吻大模大样给他发来7封长信，又是教训，又是指责，真的以为陈独秀就是他的一位下属了。这使陈独秀愈发恼火，一怒之下，将陈其昌的来信统统扔进了纸篓。^①



四十五

转眼到了年底，武汉的天气一天比一天冷。陈独秀在监狱落下的心肺病又犯了，躲在屋里不出门，依旧是咳个不停，喘不上气来，便只好辞了近日的演讲和报馆约的文章，躺在床上养起病来。

这天中午，天空突然晴朗起来。潘兰珍见天气好，便搬来一把竹椅子放在院中，扶着陈独秀坐在太阳下晒着，那阳光毒辣辣的，照在脸上就像针刺的感觉，却又不痛，只是微微有些发麻，非常舒服，似乎有些夏天的味道。陈独秀的心情顿时好了许多，看了一会报纸，觉得有些困倦，便合上眼，睡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他听见门响，朦胧中感觉进来几个人，睁开眼见是罗

^① 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1977。



汉带来两个年轻人，仔细看时，原来是托派组织成员濮德志、王文元。他们5年前和陈独秀同时被捕，又押在同一个监牢里，可谓是患难弟兄。陈独秀8月出狱时他们还没释放，这会儿见他们突然站在面前，陈独秀自然是十分高兴。

“原来是德志、文元，你们什么时候出狱的？前几天我还托人打听你们的消息呢。”

王文元说：“你出去不久，我们也出来了。先是到傅斯年家找你，听人说你去了上海。又到了上海，见到了陈其昌，才知道你来了武汉。”

“我是不会去上海的。”陈独秀挥挥手，突然意识到什么，阴沉下脸问：“是陈其昌派你们来找我的？”

王文元摇摇头道：“我们可不是他派来的说客。说实话，我们对他现在所作的很有看法。”陈独秀这才吐口气，又露出笑容：“那就好，我们还可以谈。”

王文元问道：“我看陈其昌对你和罗汉意见很大，说你向斯大林投降了。”

“妇人之见。”陈独秀不屑地说：“我从不向任何人投降。现在国难当头，各派力量必须联合起来，一致抗日，国家才有救亡之日。可他们在干什么？还抱着老一套不放，只会背诵老托的文章，坐在租界的亭子间里喊抗战，于实际的政治斗争一无所知，没有在实际行动上跨前一步，没有郑重地投身于政治的乃至军事的斗争。不论任何时候、任何条件，总是将革命之所有能事归结于办一张可怜的报纸。办报纸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吗？真是牛头不对马嘴。现在看，因循守旧，墨守成规，是没有出路的。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必须抛弃，要开拓新的局面，必须采用新的方法。”

濮德志道：“仲老，你和上海关系搞得这么僵吗？连见面都不愿见。”

陈独秀说：“道不同，不相为谋。他们反对我提出的抗日主张，一连来了7封信，向我兴师问罪、口诛笔伐，我为什么要见他们！”


濮德志问道：“你怎么回复他们的？”

陈独秀心烦地皱着眉说：“本想置之不理，但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给我写信。前两天我便给陈其昌回了一封信。我告诉他：首先，你们近来乱骂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言论是不对的。尤其是骂斯大林，虽然不是原则上的错误，但政策上则是非常的错误。如此错误下去，不知将来会走向何处去！其实，你们都是斯大林主义者，都是彭述之的朋友，和我非永久之伴侣。对彭述之等人，即使意见相同，我也誓不与之共事，况且根



本意见相差很远。其次,关于我和中共合作之事,我觉得,现在各派联合抗日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为了抗日救国,大家需要各自退让半步,捐弃前嫌,共同抗日。所以,我和中共合作在原则上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可是现在谈不上,合作必须双方都有点东西,此时并没有这样的条件。至于说我们已经在事实上合作了,这完全是胡说,罗汉也并未向我言及此,你们又何必神经过敏呢?第三,关于我将来向何处去的问题。我既不会倒向中共,也不会回到托派中去,更不会到蒋介石那里去做客。我只注重我自己独立的思想,不迁就任何人的意见,我在此发表的言论,已向人广泛声明过,只是我一个人的意见,不代表任何人,我已不隶属任何党派,不受任何人的命令指使,自作主张自负责任。将来谁是朋友,现在完全不知道。我绝对不怕孤立。”^①

濮德志用请教的口吻说:“仲老,依你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陈独秀道:“现在我们绝对不能依靠上海方面干工作。应当看到,自从卢沟桥事变之后,蒋介石已经被迫抗战了。共产党也以民族利益为重,改变了多年提出的‘推翻国民党’的政策,实行国共合作抗日,从而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但是,上海方面仍然坚持‘打倒国民党’的口号,反对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际上起到了破坏抗战、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再加上日本特务机关公开宣称要利用这种作用,帮助托派发展,于是现在的托派几乎就成了‘汉奸’的同义词,成了人人恶而远之的臭招牌,成了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这些人口里也说参加抗战,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析得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向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现在,在群众眼中所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共和国民党的文章,这使斯大林派‘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即使是同情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从开始一直到今天,这种状况仍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你们说,陈其昌把组织搞成今天这样乌七八糟,我们谁还敢凑边?”

王文元连连点头:“仲老说的是,陈其昌是自己给自己戴紧箍咒,到上海是没有前途的。”

陈独秀又道:“再说国民党。我们要看到,日本帝国主义的炮声已经

^① 陈独秀:《给陈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7日。

粉碎了蒋介石的一切幻想,为了他自身的利益,他现在也不得不站出来抗日。从淞沪战争来看,我们现在有理由相信政府确有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的。蒋介石不久前信誓旦旦地昭告全中国、全世界的人——‘中途妥协即千古罪人’,言犹在耳。这一次是民族矛盾不同于两党之争,分不出高低他是不会出尔反尔的。出尔反尔,言和即亡国,他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况且日本人也不会给他留什么退路。抗日就自然需要统一的领导。我们的表态应该是:谁能领导这样的战争,我们就拥护谁。从目前看,除了国民党之外,共产党和其他党派都没有这个力量,这就是我拥护国民党领导抗战的基本出发点。”

濮德志说:“可蒋介石这个政治流氓实在相信不得。”

“我比你更了解老蒋,我的两个儿子死在他的手下,我在他的监狱里蹲了整整5年大牢,论私仇我和他不共戴天。可现在民族存亡之际,必须拥护他出来领导中国的抗日统一战线。”

陈独秀接着说:“可拥护他抗日并不等于一切都依赖他、依附他。在其他问题上,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蒋介石要想真正成为全国各党派的抗日领袖,首先就必须改变一党独裁的统治,实行民主政治,减轻人民负担。要真正地而不是假惺惺地容纳其他党派。他现在提出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党派合作抗战的条件问题,这未免太过幻想了。思想信仰统一了,则只有一党存在,根本无所谓各党派,便根本无所谓合作、团结了。因此,国民党必须承认共产党及其他在野党派都公开合法存在,要求他们合力抗日,而不采取投降的态度,并且不妨碍在野党对政府党进行政治上的批评。为了全民抗战,在野各党派及人民群众都应有政治之自由、集会结社言论出版之自由。如果老蒋坚持要拿思想信仰之统一为各党派合作抗日的条件,那只有先从事内战,肃清了异己,然后才来抗日。这也就是老蒋过去一贯坚持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然而这对于党派只是分散而不是团结,对于抗日救亡的力量不是增加而是削弱,都在客观上帮助了敌人。其次,国民党还必须解除人民痛苦,比如减少工作时间,解决贫农耕地问题,限制高租高利,废除苛捐杂税的保甲制度,停止征工、拉夫等等,以此博得人民之欢心,使人民能够自愿地与政府合作抗战到底。再次,要整顿国民党内部以适应抗战。政府应该下大决心,严惩从高级官吏一直到保甲长的贪污分子,代之以奋发有为的青年,以利抗敌而挽人心;任何达官贵人,凡生活豪华、狂嫖滥赌,此等毫无心脾的亡国大夫,应一律发往前线,参加开挖战壕工作,或编入运输队,以示薄惩。政府最高当局应该下一决心,将政府阁员中妥协动摇分子立时除



去,而代以坚决主战的人物。”^①

王文元听到这里,忍不住哑然失笑:“仲老,你也太天真了,你以为老蒋会按着你开的药方治病?你这完全是对牛弹琴、缘木求鱼。”

陈独秀也笑了,说:“非如此中国便没有前途,抗战便没有希望。我也知道老蒋这个政治流氓一向出尔反尔、言而无信,但做不做是他的事,说不说则是我们的事。所以,我们不能让老蒋牵着鼻子走。”

濮德志道:“仲老,你的意思是要和中共合作?”

陈独秀摇头道:“中共毕竟实力有限,只能打打游击,敲敲边鼓,这对战争的胜负起不了决定作用。当今世界,近代国家已经是工业支配了农业,城市支配了乡村,大城市支配了小城市。敌人首先要占据的是我们的沿海沿江沿铁路的大城市,他们占据这些城市便可支配全中国,因为他们懂得大城市在近代国家之重要。如果我们不懂得这个,妄想拿农村来支配城市,妄想拿乡村来做抗日根据地,这正是敌人求之不得的事。过去红军及山上的苏维埃政府为什么到处失败,也正因为军事上、在经济上、在文化上,农村和小城市都不能够独立存在。在此次抗日战争中,如果我们执迷不悟,过分地估计游击队和游击战术,无意识地帮助敌人更容易地占据了我国全国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即使游击队布满了全国农村和小城市,甚至避开敌人的势力在偏僻地方建立了一些可怜的边区政府,仍然算是亡了国。”^②

濮德志又问:“依你所说,上海组织方面和国共两党都靠不住,那我们怎么办?”

陈独秀胸有成竹地说:“旧的一套工作方法得抛弃,今后如果还是在中国的政治斗争中起骨干作用,必须采取新方法,走新的途径。这是完全符合列宁主义的。列宁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不被马克思主义的现成公式所束缚,在不同的时间和环境,大胆地决定不同的政治口号和斗争的方法。”^③

王文元敬佩地道:“仲老不愧是老革命,越是面临复杂的斗争环境,越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具体地懂得政治斗争是怎么回事。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再不能以背诵‘教条’为能事,必须设法实实在在地投身进去,积极地起作用。”

^① 陈独秀:《言和即为汉奸》,1937年12月。

^② 陈独秀:《论游击队》,1938年7月21日。

^③ 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1977。



德志道：“具体说，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工作呢？”

陈独秀道：“自从淞沪战役之后，武汉成了政治、军事的中心以及群众运动新的策源地，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汇集到这里，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进行紧张的活动。而由于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不但工农群众，就是原来拥护国民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也都日益对国民党失望。毛泽东正是充分利用这种形势，指示周恩来在武汉广交朋友，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使中共的威望迅速提升。对这样难得的机会，我们绝不能错过。现在看，谁主张民主和自由，同时又拥有武装实力的党派，谁就能领导民众抗战。因此，托派过去那套单纯靠文字宣传，借此组织工人实行革命的老想法，已经过时，必须抛弃。唯一可行的办法是：一方面以自由及民主的宽广政纲去团结第三党、救国会及一部分民主人士，组织一个不拥国，不阿共，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的联合战线，与中共争夺反国民党的民主人士；另一方面则积极跑进抗日的武装队伍中去，为未来任何变化预先取得有利于革命的可靠保证。”^①

王文元想了想，心里虽不十分赞成陈独秀关于与第三党、救国会等民主党派“组成一个新的联合战线”的方针，不过他也知道，在目前托派组织旧活动方式失灵的情况下，也只好按照陈独秀提出走“新的途径”试上一试。于是，他和濮德志决定留下来，跟着陈独秀，走一走“不拥国，不阿共，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的第三条路线。



四十六

陈独秀突然宣布自己“不隶属任何党派”，并决心要走一条“不拥国，不阿共，在抗日阵营中独树一帜”的道路，与他自出狱以来主动寻求与中共合作、到处演讲撰文拥护国民党抗日的立场相比，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言语之间既带有一种埋怨的情绪，又包含一丝淡淡的无奈，其中内情，他无法对王文元、濮德志明说。其实，陈独秀的这种转变，确有不得已的苦衷。

从国民党方面说，他刚出狱时，蒋介石曾对他有所笼络，又是封官又是许愿，但见他软硬不吃，不为所动，觉得没有多少利用价值，也就慢慢失去了兴趣。当时陈独秀在武汉发表的一系列抗日演讲，除了个别演讲

^① 参见王文元著《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1977。

见报外,其余绝大部分均遭国民党当局“暂缓登载”的禁令而未能及时发表,最大限度地消除他东山再起的可能和在社会上的政治影响。陈独秀本来就与国民党势不两立,现在看国民党对他不冷不热,明里一套,暗中的一套,无论如何也不会靠向国民党。

从托派方面讲,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虽然派人来请他回上海,其实那也不过是做做样子,客套一番,绝不是真心实意要把他请回去坐第一把交椅。这一点,陈独秀心里像明镜似的,比谁都清楚,他太了解陈其昌他们“老子天下第一”、把谁也不放在眼里的政治心态了。再说,托派在抗日问题上的政纲是:既反蒋,也反共,否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陈独秀则主张拥蒋、联共,国共合作抗战。二者南辕北辙,相距甚远,自是坐不到一条板凳上来。为此,托派组织大骂陈独秀为“没有希望的”、“一个标准的机会主义者”,甚至污蔑他“出狱是以政治上某种方式的投降换来的”。陈独秀自然再不愿和这等人伍。

从中共方面看,陈独秀要回到党内,绝不会在“三项条件”问题上对他做出让步,再加上12月初王明自莫斯科回国后,马上在《解放》第26期上发表文章,斥责“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①,使他顿时有一种不祥之兆,再不敢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同中共的合作上面。

但是,陈独秀又不甘于从此在政坛上消沉下去,总想抓住机遇,再度辉煌一次。于是,他将目光盯到了国民党、共产党、托派之外的另一条独立自主的“第三条道路”上。在中国历史上,寻求第三条道路可以说是不乏其人,其探索真理的精神也无可非议,甚至应当得到鼓励。问题是,其他人在走不通的情况下势必最终靠向某一政治党派,或走阳关道,或走独木桥,大浪淘沙,总有自己的归宿,正可谓“识时务者为俊杰”。陈独秀却非常人,他在走不通的情况下,则宁可退出政治舞台,也绝不在思想上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愈到晚年,这一点他表现得越加明显,最终越来越如同一条孤独的小溪,远离革命洪流,默默流入荒无人烟的沙漠,渐渐干枯,直至消失。

这就是陈独秀晚年的悲剧。

陈独秀“独树一帜”的第一步棋,就是计划与第三党、救国会及部分无党派人士接触,组成一个新的联合战线,为政治上第三种势力的崛起

^① 王明:《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时期》,载《解放》第26期,1937年12月4日。



夯实基础。

第三党的实际领导人是谭平山。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谭平山是南昌起义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决执行者。起义爆发后，他与宋庆龄、邓演达、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共同被选为起义领导机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主席，他本人实际负责主要的工作。起义失败后，他与周恩来跟随兵败部队于9月底撤到汕头，随后与吴玉章到香港，躲藏3个多月后，于1928年1月回到上海，才知道自己已被莫名其妙地开除出党。谭平山愤怒之极，便响应邓演达的号召，联络一大批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于1930年8月在上海建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该组织以谋求建立一种既反对国民党统治，又反对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第三种政治势力”而得名。1931年，邓演达被蒋介石秘密杀害后，谭平山不得不亡命海外，并于1933年11月宣布退出这个组织。1935年，该组织易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即后来的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1937年秋，谭平山返回武汉，恢复了与该组织的联系。

至于救国会，全称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原是1936年在上海建立的一个爱国救亡团体，沈钧儒为首的“七君子”即为该组织的骨干。抗战初期，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邹韬奋等人正在武汉进行活动。

这两个组织的负责人大都是陈独秀的多年老友、早年同事和昔日部下，私交甚好，渊源较深。不仅如此，并且这两个组织当时的政治立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介于国共两党之间，与陈独秀有共同语言。与他们搞联合，既有基础，也有可能，可以说，陈独秀目标选得还是很准的。

除此之外，陈独秀还专门派濮德志去请罗章龙、高语罕等一些早年在政坛上十分活跃而现在已经“金盆洗手”的“独行大侠”，希望他们能重出江湖，支持他的“复兴事业”。

陈独秀“独树一帜”的第二步棋，是通过“军运来发展力量，扩大影响”，目标就是卢沟桥事变中一夜成名的抗日英雄何基沔。

何基沔原为国民党陆军第七十七军宋哲元部一二〇旅旅长。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打响抗日第一枪的即是他的所部吉星文团。1937年9月，已晋升为一七九师师长的何基沔参加大名府战役，因孤军无援，惨遭伤亡，愤而拔枪自戕，虽为卫兵所阻，但枪弹已中左肺，于是转来武汉治疗。陈独秀与何基沔早年相识，现在两人又在武汉朋友家中不期而遇，从此常有往来。何基沔无任何不良嗜好，无粗犷气，更没有虚矫的架子，夫妇俩住在一个厢房楼里，连个勤务兵都不用，给陈独秀留下极好的印



象。更重要的是,何基沣与陈独秀交谈中,明确表示坚决抗日,并对国民党的指挥无能感到痛心疾首。半年来转战华北,使他深感不将军队士兵的政治素养提高,明白为谁打仗的道理,无法有效地抗日,更无法取得胜利。陈独秀和他多次促膝交谈,使他茅塞顿开、受益匪浅。经过反复思索,何基沣向陈独秀表示,希望从武汉邀请一些革命青年到他的部队去做政治教育工作。陈独秀闻之大喜,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在何基沣驻防的辖区范围内进行土地改革,以此来发动群众,从而增强军队力量,谋取抗日的胜利。^①同时,派王文元、濮德志等人到一七九师做政治工作,王文元任秘书长、濮德志任参谋。这一方案实际上是将陈独秀抗战纲领中“减轻人民负担,以使人民支持抗战,有力者出力”思想的实践和具体化。

但是,王文元、濮德志对“军运”工作心有余悸,怕重演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的政治工作人员替军队做“姨太太工作”的悲剧。

陈独秀坚持认为,毫无理由把目前的行动当成“军事投机”。他对王文元说:“我们是穷光蛋,不是第三国际,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人家骗取。而且我们进入何基沣的军队,目的虽然不是‘篡夺’,可也不一味希望他本人变成革命家,有过以前和军人打交道的经验,今后我们应该很清楚地懂得,我们在现在军队中的首要工作是兵士群众的教育,以及竭力造成群众的革命环境,即在辖区内尽可能发动土地改革运动以便使军队同时革命化。我认为何基沣本人不是冯玉祥式的狡猾之徒,可能会真心转向革命的。倘如此,则不难使这不小数量的武力置于我们的政治领导之下;如果不然,那么我们既然一开始就坦白地表明了自己的面目与行动方针,自不难进退随意,不可能遭受任何损失。”

就在陈独秀信心十足地投身于“第三条道路”的艰辛开拓时,他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几乎置他于死地的大阴谋正在悄悄地展开。



四十七

1938年新年过后,武汉天气渐渐转暖。陈独秀的心肺病也好了许多,再加上和几个民主党派的联席会议如期召开,与何基沣谈得也十分好,顿觉心情舒畅,身上也有了力气,便开始外出演讲。

^① 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1977。

这一日下午，他应邀给武汉大学演讲，站在台上总感到下面的学生不像以前那样集中精力，而是时常有人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似乎在议论着什么。演讲完毕，掌声也不如以前热烈，就连师生目送他的眼光也露出一丝异样。他心里纳闷，却又不知为何。

回到家后，已是掌灯时分，正要吃晚饭，就见罗汉阴沉着脸进来，将手中几本杂志扔在桌上，问道：“仲甫兄，可曾读过最近几期中共刊物？”

陈独秀拿起一本中共中央理论机关报《解放》杂志，如数家珍地道：“这篇是去年12月4日王明亲笔撰写的文章《日寇侵略的新阶段与中国斗争的新形势》。文章称：在现在内战停止和全民族武装保卫斗争开始的条件下，日寇侦探机关必然更加设法安排自己的侦探、奸细、破坏者、暗杀者、凶手和暗害者等到共产党的队伍中来，他们首先是从暗藏的托洛茨基——陈独秀——罗章龙匪徒分子当中吸收做这种卑劣险毒工作的干部……”

罗汉气呼呼地说：“看看，同是这份杂志，11月份还发表文章称你是‘老战士’，仅仅相隔半个月，你就变成‘匪徒’了。”

陈独秀满不在乎地道：“王明骂我七八年了，不足为奇，都是老调重弹。”

罗汉见陈独秀并未生气，又拿起一份中共在国统区的机关刊物《群众》杂志，说：“还有这里面，章汉夫写了一篇《肃清敌人奸细托洛茨基匪徒》的文章，把你这个‘托洛茨基匪徒’‘破坏抗战’的言论骂了个狗头喷血。”

陈独秀不恼反喜：“看了，看了，这些我都看了。他们要骂我，我有什么办法，本来我就是‘托洛茨基匪徒’嘛。”

罗汉道：“可你不想想写文章的都是些什么来头。王明是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中共长江局书记，眼下正虎视眈眈想取毛泽东而代之；章汉夫是《新华日报》的副总编辑，中共重要的宣传干部。他们的文章可不是什么空穴来风。”

“我当然知道他们是些什么来头。”陈独秀依旧是不紧不慢地道：“这个王明当年从中山大学由米夫带到武汉，想向我讨个一官半职，我没答应，这些年一直对我耿耿于怀。中东路事件时，就是他发表文章说我给中央写信是反革命行为，把我开除党籍，他有一大功。现在是小人得志，自然不会放过我的，我还怕什么！他总不能再污蔑我是汉奸，说我吃里扒外、里通外国吧。”

“可他恰恰就是说你是汉奸，自己看看吧。”罗汉又从包中掏出两份



《解放》刊物，扔到陈独秀面前。

陈独秀闻言猛地坐起，问道：“什么，什么，谁说我是汉奸？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他急忙从桌上拿起刊物，只见里面连载了康生撰写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文章写道：“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们的东三省；同时，上海的日本侦探机关，经过亲日派唐有壬的介绍，与由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所组织的托匪‘中央’进行了共同合作的谈判。当时唐有壬代表日本侦探机关，陈独秀、罗汉代表托匪的组织。谈判的结果是：托洛茨基匪徒‘不阻碍日本侵略中国’，而日本给陈独秀的托匪‘中央’每月三百元的津贴，待有成效后再增加之。这一卖国的谈判确定了，日方津贴由陈独秀托匪中央的组织部长罗汉领取了，于是中国的托派和托洛茨基匪首在日寇的指示下在各方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就大唱其帮助日本侵略中国的双簧戏。”

罗汉气得脸色发青：“说我们自‘九一八’以后就开始领取日寇津贴了，可你我这几年一直被关押在蒋介石的大牢里，到哪里去领津贴？这简直是污蔑，凭空捏造。”

“沉住气，沉住气。”陈独秀定了定神，继续看道：“去年（指1937年——引者）六七月间……上海日本报纸登载：‘托洛茨基亲自派了一个美国的托洛茨基分子到上海来担任东方托洛茨基组织的指导员’……这个美国的托匪格拉斯……联合着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等老的托洛茨基匪徒和收买诱惑的几个新的败类，在上海、北方建立托匪日探的组织……他们受着日寇的指示派人到各方面去进行侦探、欺骗、麻醉、破坏抗战的工作，特别是破坏八路军的抗战，破坏边区，成为他们最中心的任务。”

陈独秀再也忍不住，骂道：“胡扯！去年六七月间，我们还在蹲蒋介石的大狱，如何建立日探组织，如何去边区？如何破坏八路军？”

罗汉现在倒沉住气了，提醒陈独秀道：“接着看，接着看，还有精彩的呢。”

陈独秀低头再看：“可是很可惜，虽然陈独秀从‘九一八’以来就与日寇勾结，然而他还可以在武汉演讲，使用其老奸巨猾的侦探技术，用‘中国抗战是为了发展工业科学’的烟幕来掩盖日寇对中国的侵略……这无怪鲁迅先生痛骂陈独秀等托匪是有悖中国人为人的道德；也无怪日本侦探机关称赞他们为最能‘帮助有利帝国的活动’、‘破坏南京的统一’、麻



醉群众最‘高明’的工具了。”^①

“可耻！卑鄙！”陈独秀没等看完文章，便气得两眼发花，血压升高，头晕目眩，嘴唇发紫，说不出话来。

罗汉问：“我们如何应对？”

陈独秀突然沉默了，半晌才说：“等等再说，国难当头，大敌当前，不要起哄的好。”

罗汉道：“仲甫，你是胆怯了吧？”

陈独秀一瞪眼：“我害怕什么，当年开除我的党籍，我也没胆怯，照样和他们辩论。”

“可现在你害怕了，你怕恢复不了党籍，你是一门心思想回到斯大林派去。”罗汉冷笑道：“你有顾虑，我没有，我是要声辩的，背上一个汉奸的骂名比没有党籍更可怕。”

罗汉走后，陈独秀一个人呆呆坐在窗前抽闷烟，潘兰珍小心翼翼地几次来叫他吃饭，只当没听见。直到夜深了，他才一声不吭地躺到床上。

这一夜，陈独秀怎么也睡不着，他和托派之间的恩恩怨怨像过电影般一幕幕又浮现在面前……



^① 《解放》第29、30期。

第


十

一

章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后，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反对派”的事业中去。在托洛茨基的支持下，他费尽心机，最终促成了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

四十八



1929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正式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时隔1个月，12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正式成立了名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名“中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托派组织，树起了“反对派”的旗帜。在这次会议上，陈独秀被推选为总书记，彭述之、尹宽为常委，何资深任秘书长。会议还决定出版刊物《内部生活》，因不久该刊改名为《无产者》，所以中共党史上将这一组织称为“无产者社”或“无产者派”。

彭述之很满意无产者社的领导班子结构。他对陈独秀说：“我们班常委是清一色的‘老干部’、‘元老派’，你原来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我当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尹宽曾任中共福建省委书记，任资深则当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上海总工会秘书长，我们这个班子完全有资格与现在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礼。”

陈独秀点点头道：“资格是次要的，关键是路线对头，我们坚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他们执行的是斯大林的机会主义，真理在我们手中。”

陈独秀原本是不打算单独成立组织的，而是准备加入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我们的话派。



早在1929年8月,陈独秀和我们的话派进行过一次谈判。但是,我们的话派的主要领导成员梁干乔自恃是中国托派的“开山鼻祖”和唯一受到托洛茨基接见的人,他以水泊梁山白衣秀士王伦的眼光看待陈独秀,深怕陈独秀加入进来,会危及他的地位,因此不但不欢迎,反而很厌恶,借口这是“没有出路的老机会主义向我们托派投降了”,主张不予理睬。我们的话派中的区芳、史唐、张师则认为,陈独秀在承认我们的话派是托派“正统”地位的前提下,可以“分别而非集体地经过审查,加入它的组织”。

陈独秀一口答应了这个条件,但是彭述之、尹宽坚决反对。彭述之认为:“‘我们的话派’成员都很年轻,没有政治经验,不能领导我们这些参加过大革命的老干部,只能受我们的领导。”尹宽提出:“我们的话派和陈独秀派应该在平等基础上实行联合。”对于彭述之、尹宽的条件,梁干乔等人自然也不同意。于是,陈独秀和我们的话派的第一次谈判就这样流产了。

恰在这时,在苏联已秘密加入托派组织的刘仁静、王文元、吴继严回到国内。

王文元、吴继严回国时还没有暴露托派身份,于是被分配到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宣传部任干事,而刘仁静则公开向中央表明托派观点,然后就宣布脱党,自由活动去了。

刘仁静是湖北应城县人,字养初,生于1902年。191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物理系,后又转入哲学系,继而又转往英语系。在此期间,他受陈独秀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时,他积极参与,为当日爬入曹汝霖住宅,打开曹府,痛殴章宗祥的5人成员之一。他是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最早的参加者,又是中共一大代表,一度还是团中央书记,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高,人送外号“小马克思”,在中共党内曾经也算是个显赫人物。刘仁静这次回国途中,曾绕道土耳其拜见过托洛茨基。因此,除了梁干乔外,他成了中国托派中受到过托洛茨基接见的第二个人。在土耳其,托洛茨基将亲自起草的中国托派“政纲”——《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派(反对派)》交给刘仁静,让他带回中国,并亲自给他起了个“列尔士”的假名,委他充当托洛茨基与中国托派之间的通讯员。因此,他回国后便以“老托代表”自居,自告奋勇地调解起我们的话派和陈独秀派之间的矛盾。

刘仁静回国后首先拜会了陈独秀,介绍了托洛茨基的近况。陈独秀和刘仁静虽然多年未见,但毕竟过去是老战友、老朋友,现在又多了托洛





刘仁静

茨基的共同语言,所以两人谈得甚是投机。言谈之中,刘仁静慢慢说明了来意。陈独秀当即表示,只要我们的话派同意和陈独秀派共同组织“联合委员会”,他将公开承认大革命时期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错误,接受托派理论和策略。

于是,几天后,在刘仁静的牵线搭桥下,两派代表在尹宽家再次举行了会谈。

尹宽家坐落在法租界一幢两层楼房里,四周僻静,十分安全。那天到会的陈独秀派代表是陈独秀、尹宽,我们的话派代表是史唐、宋逢春,刘仁静作为调解人列席会议。

史唐是浙江诸暨人,曾是中共中央在上海时的机要秘书。宋逢春则是河北景县人,出国前在李大钊领导的中共北方区委机关报《政治生活》工作。他们都是因参加莫斯科红场上的反斯大林游行而被苏联政府遣送回国的。论起来,大革命时都是陈独秀的部下,因此见到陈独秀倒也十分恭敬。

互相寒暄一阵之后,宋逢春问道:“总书记,大革命失败时,我们正在苏联学习,国内的情况不太了解,失败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陈独秀连连摇头说:“惭愧,惭愧,都是听了老毛子的话。唉,老毛子懂什么,他们根本不了解我们中国的国情。”

刘仁静说:“仲老,你别小看这些在苏联学习的年轻人,虽然没有经受过国内大革命考验,但回国后他们意志十分坚强,在十分艰苦的生活条件下仍然坚持干革命,没有一个退缩的。”

陈独秀十分感慨,道:“你们这帮青年人很有革命朝气,能吃苦,中国的未来要靠你们。”

史唐、宋逢春顿时受宠若惊:“总书记过奖了,和你们这些老前辈相比,我们做得还远远不够。”

陈独秀道:“我们这些老家伙的优势是斗争经验丰富,再加上你们年轻人的热情奔放,我们的事业就一定能成功!”

刘仁静接过话头道:“其实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和共同的理论策略,并没有什么原则分歧。在当前中国革命形势下,双方唯有求大同,存小异,联合起来,才能取得成就。大家以为如何?”

陈独秀当即表示:“我同意养初的意见。但对于合并,我有两点要求:一是请你们提供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和文件,以便大家共同讨论问题;二是我们要集体加入组织。”

宋逢春道:“我个人完全同意总书记的这两条要求,但最后结果还需



经‘总干’研究决定后才能作出正式答复。”

这次谈判陈独秀感到十分满意,不像上次那样,进退两难,总算有了初步结果。

但是,陈独秀万万没想到,当史唐和宋逢春向“总干”汇报谈判成果时,双方达成的协议不仅被梁干乔一口拒绝,宋逢春还因擅自同意吸收陈独秀派及两派联合的意见,被指责是“投降主义”,反而被“总干”开除了。

1929年9月,我们的话派在上海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刘仁静的再次努力之下,史唐、区芳主持大会,讨论通过了吸收陈独秀派的“三个条件”:1. 公开宣布斯大林的领导是机会主义;2. 公开与真诚地批判自己过去的机会主义错误,并承认反对派政纲的正确;3. 公开解散自己的独立小组。

刘仁静感到这“三个条件”太过苛刻,陈独秀恐怕难以接受,便提出修改“二代会”政治决议,改组“总干”,以扫除阻挠陈独秀、彭述之加入托派组织的障碍。他对梁干乔说:“我们的统一运动,可以说完全是为了独秀个人,其余诸子,碌碌不足道也。陈独秀是大旗不能丢,有了陈独秀,中国的托派组织才有希望发展壮大。”

但是,他的提议遭到梁干乔的断然拒绝。梁干乔不但反对刘仁静的提议,甚至反对史唐、区芳提出的“三个条件”。他说:“三个条件是区芳、史唐受了陈独秀的收买,接受他加入反对派是个阴谋。”就这样,刘仁静的调停终于彻底宣告失败。当刘仁静无可奈何地将梁干乔的意见转告陈独秀时,陈独秀火冒三丈,大骂:“乳臭未干的猴儿崽子,门罗主义,想学斯大林搞独裁,未免太早了。”

时隔不久,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他思考再三,终于下定决心,一不做二不休,来个“破釜沉舟”,自立门户。就这样,1929年12月15日,以陈独秀为核心的中国托派第二个小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便宣告成立了。

四十九

无产者社在成立的当天,发表了由陈独秀等81人联名签署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作为政治纲领。《意见书》指出:

(一)中国过去革命失败的原因在于国际机会主义的领导,“机会主



义是使中国革命失败,盲动主义是彻底完成这个失败,六次大会以后的路线是继续巩固这个失败并为下次革命准备新的失败”。

(二)党的现状与危机也是机会主义、盲动主义与官僚主义,“现在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所表现的是:国际及中共中央一致主张将来中国革命的性质仍旧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革命;将来的政权应该是工农民主政府,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现在盲动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的表现是:不承认资产阶级是胜利了,不承认过去的革命是完全失败了,在‘革命高潮快要到来’的前提下……无处无事不采用盲动政策,无处无事不举行‘自己失败主义’,弄得党内党外群众都感觉没有一点出路,党的下级干部同志都感觉着在中央路线之下无法工作”,至于“现在党的统治机关的官僚们钳制党员之最大武器,要算是‘铁的纪律’”,即“利用党内一般政治水平之低落,党员群众对于党的生活之隔阂及党的组织之残酷实行任意操纵、欺骗与威吓,实行以金钱维系党员及空洞的工会机关和雇人示威,实行制止党内的讨论和批评,以国际威信和党的权威强迫党员强迫群众相信‘中央政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并且胆敢凭借敌人进攻做护符以恐吓党”。

(三)国际机会主义的根源与苏联危机问题。国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是特别在中国范围内形成的,而是在世界范围内由斯大林、布哈林等所领导的整个的机会主义的国际政策之一部分”,即斯大林为解决苏联危机而采取一系列“左”倾政策,“遂经过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在各国党中形成了一般的机会主义路线”。

(四)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两个路线的斗争。针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错误,“世界无产阶级队伍中自然要产生反机会主义的反对派之斗争,即恢复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之斗争。托洛茨基同志就首先担负了领导这个斗争的责任”,换言之,“现在整个的第三国际中显然有两个根本不同的路线:一个是以斯大林所领导的机会主义官僚主义路线,即现在共产国际领导机关的路线;一个是以托洛茨基所领导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即国际左派反对派的路线”,“现在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也只有这两派路线之彻底的斗争”。

(五)我们的态度与建议:召回托洛茨基同志等,恢复其党籍和领导工作,公布近五六年来联共(布)及国际内部路线斗争的相关材料等,重审近五六年来联共中央及国际领导机关的错误并重新决定联共和国际的政策,恢复中共内部被开除党员之党籍并立即在党内公开讨论根本政治问题,重新审查中国革命过去的教训并决定新的政治路线,改组联共



和国际及各国支部的领导机关。

纲领既立,活动随即进一步展开。曾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名的虽号称 81 人,但实际上其中有 1/3 是为了虚张声势而杜撰的。真正加入无产者社的主要有陈独秀、彭述之、尹宽、郑超麟、马玉夫、何资深、汪泽楷、蔡振德、薛农山、罗世藩和吴继严等人。

鉴于陈独秀领导的无产者派明确表示拥护托洛茨基而反对斯大林,并尖锐抨击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现行政治路线,在国际上和中共党内造成十分恶劣的影响,斯大林改变了对陈独秀的策略态度。1930 年 2 月初,共产国际以审查中共开除陈独秀党籍问题为理由,发来给中共中央转陈独秀的电报。电报说:国际“决定予你以机会来参加本政治书记处审查中国共产党中央开除你的党籍决定的会议”,“如果你对此提议置之不理……这一问题将提到共产国际主席团的会议日程中去讨论”。

中共中央在转给陈独秀电文附言中说:“这是共产国际的来电,希望你于一星期内给以书面答复,好使我们有所准备,并对国际有所回答。”

但是,陈独秀再一次表示拒绝。2 月 29 日,他在给共产国际的回信中写道:“我的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问题,而是关于整个的政治问题”,而“政治问题,尤其涉及世界革命运动的问题,应该以党内公开的讨论来解决”。既然共产国际没有诚意采用这种方法来解决问题,如国际“不肯正式公布于各国支部加以讨论”托洛茨基的主张,“驻中国的国际代表曾以开除党籍当面威吓我禁止我发表政治意见,中国党中央仰承你们的意旨不允许把我屡次提出的政治意见交付党内讨论”,那么我和国际之间的“不可调和的不同意见”就“决不是调我个人到莫斯科便可解决的”。

至此,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最后一点联系割断了。他开始将全部精力用到反对派事业中去。

五十

陈独秀原本以为,斯大林路线在中共党内不得人心,已是怨声载道,只要他凭借着往日的威望,振臂一挥,便会有人一呼百应,蜂拥而来,取李立三而代之。但是,他没有料到的是,反对派的事业并没有他想像的那样乐观。无产者社刚成立,就面临着中共的猛烈反击和托派组织内部咄咄逼人的挑战。



首先,中共中央对他这种反对派行为采取了果断措施进行反击。

当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看到由 81 人签名的《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后,马上在中央机关报《红旗》上分别致函何资深、张以森、庄季贞、陆沉、刘毅然、彭桂秋、段浩、朱崇文、刘静贞、吴继严、王永庆等尚在党内的签名者,要他们公开表明对意见书的政治观点的态度。“是否你们自觉的列名,抑系取消派的假借名义,应立即作一声明书,并做反取消派的文章……否则,党认为你们已自觉地参加反党的行动,党员会给予最后的制裁,以巩固党的铁的纪律。”在遭到拒绝的情况下,遂将他们开除出党。接着,中央又逐个清除了从莫斯科回国隐蔽在党内很深的托派分子,并批准江苏省委开除了江苏省委委员罗世藩,批准中央直属支部开除了王平一,不久江苏省委又开除了郑超麟、尹宽、刘伯庄、李季、陈碧兰、林琳、谢庄、薛农山 8 人的党籍,纯洁了党的队伍。

在对陈独秀派成员采取组织制裁的同时,中共中央在党内层层做工作,召开各种代表会、座谈会,批判托陈派主张,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除托派运动。周恩来在分析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原因及其前途时说:“反对派在中国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大革命之失败与新的革命浪潮之复兴,存留在党内落后的小资产阶级‘同路者’形成了反对派发展的基础。”他指出:托派活动的策略路线是极“左”与极右的结合,即“口头上‘左’的革命口号而实际上右的革命形势估计与策略”;他们的作用是“帮助统治阶级反党”,“帮助敌人破坏革命”;他们的前途是“必然会整个卖给统治阶级”。^① 周恩来的精辟论述,及时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巩固了全党的阵地,顶住了陈独秀和整个托派来势凶猛的冲击。

陈独秀面临的另一方面压力是来自无产者社组织内部的混乱和矛盾。

先是两个主要领导人陈独秀、彭述之之间闹起了矛盾。彭述之说陈独秀是“机会主义者”、“封建家长”和“英美民主派”;陈独秀则骂彭述之为“不学无术,寡廉鲜耻”、“通天教主”和“孔夫子的生殖器”等,并讥讽他的文章“如王婆裹脚布,又臭又长”。搞实际组织工作的“四大金刚”马玉夫、罗世藩、蔡振德和薛农山与搞理论宣传工作的彭述之、郑超麟、尹宽、李季和高语罕之间也有矛盾。前者瞧不起后者,认为“这些书呆子写一百篇文章,还不及我们在工厂里搞一个支部来得有力”。甚至当无产者派受到其他托派组织的攻击时,内部也有人支持起哄。1930 年 3



^①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44~47 页,人民出版社,1980。

月,我们的话派发表文章批判陈独秀,马玉夫和罗世藩竟然公开表示赞同我们的话派的观点,并提议系统指出陈独秀的错误,以提交扩大会议讨论。

由于无产者派内部矛盾重重,加上一些人因生活困难而生计难以保证,因而意志消沉、心灰意冷,一切事情都推到陈独秀一个人身上,不肯积极参加活动。骨干分子蔡振德干脆不辞而别,到西安投靠杨虎城,当《西京日报》社长去了。

面对内部这种混乱局面,陈独秀并未气馁,而是于1930年春开始对无产者派进行组织整顿。他找到了刚刚被开除出党的曾任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何资深出任无产者派秘书长,又对本派成员的工作活动进行了调整,在上海新设置了沪东、沪西、法南3个区委,在纱厂和码头工人中建立了支部,同时在北平、香港两地分设了支部,摆出一副与中共抗衡的架势。

1930年6月,陈独秀主持召开了无产者派的代表会议,并做了《关于中国左派反对派过去及目前工作》的报告。会议通过决议,声称:半年以来,我们“总算草创了一条新的道路,并团结了一些重要部门的干部分子”。报告在攻击中共重视农村武装斗争是“机会主义”之后,强调托派要进行城市工人运动,领导群众做防御的斗争。

不过,这次会议之后,陈独秀并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到决议提出的工作重点上,而是按照托洛茨基的最新指示,开始运筹国内各托派组织的联合问题。



五十一

1930年夏秋,陈独秀在整顿了无产者派内部组织之后,面临着另外一个大伤脑筋的问题,就是其他托派组织对他的不信任。他明明是被中共以“托派分子”的身份开除出党,托派分子却坚持认为他并没有和斯大林派彻底划清界限,这就导致托派组织之间相互攻击,严重削弱了自身的力量。其中,最让他头痛的就是托洛茨基的联络员刘仁静对他的倒戈。

1929年秋天刘仁静从苏联回国后,曾经非常卖力地调停陈独秀派和我们的话派之间的矛盾,力促两派实现联合,这使陈独秀对他大有好感。然而,刘仁静这样做并非完全为了陈独秀,而是有着自己不可告人的目



的。他自认为自己原是中共一大代表，现在又是“老托代表”，应该在中国托派组织中仅居陈独秀之后，坐第二把交椅。但是，彭述之根本不买他的账。彭述之在中共党内的职务比他高，当过中共中央常委，自然不甘居他之后。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又态度暧昧，似乎还有点偏向彭述之，这使刘仁静感到非常寒心。

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之后，曾要求刘仁静帮助起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没想到，刘仁静将意见书起草完后，陈独秀又做了大量修改，将自己《告全党同志书》中的许多政治观点加了进去，这使刘仁静感到十分不快。他认为陈独秀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表面上承认错误，实际上反执之愈坚”，在大革命中是“自觉地执行”共产国际的路线，而不是像他所说的那样是“因屈服于共产国际纪律及国际代表和党中央多数人的压力”“盲目地执行”，他之所以这样说，完全是想“脱卸过去革命失败应负的责任”，“不彻底承认自己的错误”。刘仁静对陈独秀的这番指责，也正是我们的话派在和陈独秀谈判过程中为什么坚持让他完全承认大革命失败错误的原因。同时，刘仁静认为：陈独秀提出的“无产阶级贫农专政”口号，是与“无产阶级专政”对立的。他甚至宣称：“我们最初对于陈独秀曾不乏幻想”，但“短期合作”后，发现他“离开革命立场，精神衰败”，“堕落成为一个失意的政客”、“一个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集合于他周围的……都是些欺诈失意政客”，“我们应当丢掉他”。因此，刘仁静断然拒绝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上签字，并声明这个意见书比他原来起草的稿子“扩大了许多”，“没有一点革命的作用，只是替陈独秀巩固他过去的错误”。



在批评陈独秀的同时，刘仁静还竭力攻击我们的话派。他责怪梁干乔把持的“总干”之所以“拒陈”，“完全是为了地位”，而不是“路线分歧”。他又批评梁干乔规定托派组织“是党内的”，只“注重在党内进行反对派的工作”，而不是独立组织，同时在中共党外活动。由此他得出梁干乔执行的是“投降派路线”的结论。

就这样，刘仁静两面出击，先和我们的话派谈崩了，又和无产者社闹僵了，只好另起炉灶，同王文元以及从我们的话派中分裂出来的宋逢春、陆梦衣、紫亮、董汝斌、廖麟、黎白曼、周庆崇9人于1930年1月1日发起成立了中国托派第三个小组织——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同盟，发表了《告同志书》，宣布“总干”“已经死亡”，提议彻底批判我们的话派和无产者派的错误，“先由思想上、策略上的统一，再做组织上的统一”。由于他们出版的机关报为《十月》，于是又称“十月社”。

刘仁静成立十月社后,我们的话派马上做出强烈反应,召开大会,作出决议,宣布将刘仁静、王文元等人开除。但是,刘仁静与王文元等人的合作也并未长久。这年10月,刘仁静在批判陈独秀时,由于坚持认为1923年国共合作时他和张国焘主张“加入国民党而对国民党怠工是布尔什维克路线”的观点,被王文元等人将他开除出十月社。王文元他们的理由是,中共根本就不应该加入国民党。

刘仁静被莫名其妙地开除后,一气之下,开始单干,独自出版《明天》刊物,自称“明天派”,但因势单力薄,均未为其他各派所认可。

我们的话派在开除刘仁静的同时,内部分裂也愈演愈烈。由于史唐、区芳和张特主张在“三个条件”下可以吸收陈独秀派加入“总干”,梁干乔就攻击史唐等人“受了陈独秀金钱收买”,自动脱离“总干”工作,并煽动广东省干会市干会各支部各组长联席会议写信要挟“总干”：“誓死不同陈独秀派妥协,否则香港区全体同志脱离反对派”,致使该派工作一度陷入混乱。为此,“总干”作出了开除梁干乔和张师的决议。只是后来区芳被捕,梁干乔才又回来成为我们的话派的首领。

就在上述3个托派小组织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另外几个从苏联回来的托派分子赵济、刘胤、王平一、徐乃达、李逸民、严灵峰、陈岱青7人,还有刚刚被我们的话派开除的张师,又发起成立了第四个托派小组织。由于该组织出版机关刊物《战斗》,史称“战斗社”。

1930年夏天,中国的4个托派小组织就这样先后粉墨登场了。他们一方面各自称王,自命不凡,唯我独尊,勾心斗角;另一方面又都拥有同一个主子——托洛茨基。在争斗中,他们既频繁地向托洛茨基写信,互相倾轧,攻击对方,期待“以我为中心”来“统一”其他各派;在互相指责中,又常常不约而同结成暂时的统一战线,对付共同的“眼中钉”陈独秀,生怕陈独秀以其特殊的社会政治经历为资本,出面“统一”他们。这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混乱局面,也算是中国政党历史上的奇观了。

我们的话派因最早建立托派组织,于是自视为中国托派的先驱;十月派首领刘仁静则自恃在党内的资格很老,还与托洛茨基有过直接的接触,便自命为“中国托派天字第一号人物”,并以“托派在中国的代表”自居;至于战斗派之所以挂牌子,仅仅是出自这样的考虑:“与其参加他们的组织不如独树一帜,‘因为’想到这些派别不会长期单独存在下去,不是自生自灭,就势必会趋向统一”,而“到时在统一商谈中及统一组织中,我们也可占一个位置”,由此出发,他们也就事先极力地贬低其他各派,如称无产者派为一群“老机会主义”,十月派是一伙“空头理论家”,我们



的话派则是既无理论又无实践的群氓；陈独秀是中共的开山鼻祖，当然就更加看不起其他3派。在他看来，那3个组织“不过是乳臭未干”的“猴儿崽子”，“想学斯大林未免过早了”。

各派互不服气，就向托洛茨基打小报告。当时，我们的话派和十月派都与托洛茨基有直接的通讯联系，所以不时写信给他，除了相互攻击外，更多的是一致批判陈独秀，希望得到托洛茨基的最高指示来压服异己。

这个时候，托洛茨基的态度就对中国托派组织向何处去显得十分重要。

五十二

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素昧平生，从未打过交道，他只是曾就事论事地对陈独秀有过若干评论。1927年4月初，他曾赞扬陈独秀提出的“退出国民党”的主张是“无条件正确的”，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又认为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主张中国革命“扩大后再深入”的观点体现了斯大林的错误政策。因此，在陈独秀筹建托派组织之初，他对陈独秀的态度是审慎和暧昧的，既欢迎，又有疑虑。

1929年9月，刘仁静致函托洛茨基抱怨说：我们的话派不与陈独秀谈统一，所以我本人要与我们的话派决裂。托洛茨基则回信阻止道：“你说他们（即我们的话派——引者）反对陈独秀参加到他们的队伍中来，为了这一点，无论如何不能使我们分裂的。如果太性急地与陈独秀统一，然后又跟他们分裂，那简直是罪恶。我们与他（指陈独秀——引者）之间，在过去的政见（1924—1927年）是太深了，以致相互间没有事先的郑重考虑，不可能统一起来。无论如何，现在就搞左派统一，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与他们决裂，那是鲁莽的。”^①

1929年11月15日，我们的话派致函托洛茨基，说陈独秀不接受“三个条件”，“继续自己的独立活动，因此我们认为陈独秀不曾脱离机会主义，我们决定像反对一切机会主义者那样反对他”。

托洛茨基回信说：“直至现在我还没有读过陈独秀的纲领式的声明书，所以没有可能在此问题上发表意见。”为了弄清陈独秀此时的政治观



^①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



点,托洛茨基在信末提出了他与斯大林分歧的15个问题,作为衡量陈独秀“与我们是否原则一致”的标准。^①

甚至到了1930年2月,托洛茨基还对同陈独秀合作毫无兴趣。他给刘仁静写信说:陈独秀“这一派继续站在‘民主专政’的主张上”,即“站在斯大林及马尔丁诺夫的主张上”,其实质是“掩盖纯粹的孟什维克政策”,“那是很坏的;同他统一组织,全然谈不到,因为他的软弱,同他作实际的协定,是没有意义的”。^②

但是,从1930年4月开始,托洛茨基对于陈独秀的认识和态度有了重大的转变。这时候,托洛茨基为了进一步与斯大林领导的第三国际抗衡,同时也为了扩大各国共产党内的反对派力量,以加强相互联系、合作和统一行动,正在着手酝酿组织“共产主义反对派临时国际局”(亦称“托派国际”,1938年后改为第四国际)。当时参加这一组织的有俄、法、德、西班牙、意大利、美国、奥地利和比利时等国的托派团体,唯独没有东方国家。因此,托洛茨基开始将目光瞄准了中国的托派组织。4月3日,他在回答刘仁静2月21日批判陈独秀等81人意见书的来信时说:“你的信上说陈独秀的声明有81人签名,务请将他的声明忠实地翻译出来,寄给我。此事很重要,我请你翻译得尽可能地完美确切。”就在同一封信中,托洛茨基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问题,并要求十月派与我们的话派停止理论上的“渗入了太多的玄学和甚至有点学院主义”的争吵,先行联合。

很显然,托洛茨基此时已有意挑选陈独秀出来统一托派组织。

8月22日,托洛茨基再次致函刘仁静,热情赞扬陈独秀的《告全党同志书》,明确表示了选择陈独秀出面统一中国各托派组织的倾向性意见。

托洛茨基说:“直到今天我才得读陈独秀同志于1929年12月10日的信,我觉得这封信是一个极好的文件,在一切重要问题上都采取了完全清楚和正确的立场;特别在民主专政问题上。”“当我们有了像陈独秀那样杰出的革命者,正式与党决裂,以致被开除出党,终于宣布他百分之百同意国际反对派——我们怎么能够不理他呢?他在过去犯了不少错误,但他已经明白了这些错误。对于革命者与(革命)领袖来说,明白自己过去的错误是很珍贵的事。反对派中许多年轻人能够而且应该向陈独秀同志学习!”托洛茨基在信中还严厉批评我们的话派“要其他两派

^① 收入《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

^② 这封信刊《十月》第2期,1930年7月15日。



都须向你们承认错误,然后你们允许他们加入你们的组织……这种培植威望的政策,乃是莫斯科官僚们的特色”,“我无论如何是不同意的”。他还要求3派加速统一,“共同拟订一个简短的统一纲领,并依照人数为比例,召集一个统一大会”。

托洛茨基最后对刘仁静说:“我怕我这里的陈独秀的地址不能用。请你代我向他问候,并请告诉他,读到他去年12月10日的信我非常欢喜,我坚决相信我们在将来是能够一起工作的。”

9月1日,托洛茨基又致函十月社,更加明确地表示:“中国左派反对派的哪一派都不能认为自己是国际左派反对派的代表以反对另外的派别”,“对于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也是如此”,因为“陈独秀同志对于所有根本问题之立场完全与我们一般的立场相同。因此,我未看出为什么几个中国同志继续地称陈独秀同志的一派为‘左派’的理由”。在信中,托洛茨基还指出,中国的4个托派组织可以“组成协议委员会以拟就政纲的根本提纲和统一的组织方法”。

托洛茨基的这两封信对于中国托派的未来政治走向具有重大意义。他否定了我们的话派与十月派的正统地位,从根本上阻止了这两派长期以来对陈独秀的攻击和侮辱,这就迫使国内其他托派组织不得不把联合统一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同时,托洛茨基给予陈独秀极高的评价,不仅改变了陈独秀原先“妾身未明”的被动地位,而且一下子把他提到中国托派领袖地位上来,这就使之在日后的联合统一问题上掌握了主动权。

为了抬高陈独秀的威信,托洛茨基还直接写信给陈独秀,对陈独秀的文章推崇备至,称赞说从这些文章中看到“尽管中国革命遭到了溃败,而马克思思想却依旧活着,而且在发生作用”,甚至肉麻地表示,单单为了能阅读陈独秀的作品,“我就该学习中文”。^①

我们的话派和十月派自然明白托洛茨基的用意,虽然心里老大的不服,但又不便违抗托洛茨基的指示。不得已,到了1930年10月,4个托派组织终于组成了协议委员会,开始具体讨论统一问题,并专门委托王文元起草《中国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政纲草案》。

然而,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首先跳出来发难的是彭述之。彭述之主张以无产者派为中心,以便联合后他能坐上第二把交椅。这明显违背了托洛茨基要求的平等协议、平等统一的原则,其他三派当然不能接受。于是,彭述之就背着陈独秀暗中指示无产者派参加协议委员会的代表吴



^① 《托洛茨基档案中致中国同志的信》。



继严和马玉夫,千方百计地延宕和破坏统一,提出王文元起草的托派政纲中要对过去的政治原则和策略上的一切分歧“分清谁是谁非”,并且其他3派要检讨和放弃过去攻击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成见之后,才能谈组织上的统一,致使协议工作又受到阻碍。

1931年1月,陈独秀收到托洛茨基急切呼吁各派组织迅速统一的来信。托洛茨基在信中说:“你们的组织和报纸今天就确定地合并起来吧!不要太延缓了统一的准备工作,因为不然,你们就会不知不觉地去制造一些人为的分歧意见。”^①

读罢此信,陈独秀甚为感动,马上撰写并发表《对于统一运动的意见》一文,再一次诚恳地呼吁各派从大局出发,停止纷争,立即着手统一工作。他说:读了托洛茨基的来信,“使我惭愧无比”。“我们听了若仍旧毫不动心,便是庄周之所谓‘心死’!”“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工作的今天”,我们未能迅速实行统一,本是“罪恶”了,“若不痛改前非,若仍旧要搜索枯肠……来阻碍统一,这是罪恶之罪恶”。“我个人是彻头彻尾赞成国际意见的。”“我毫不顾虑我的意见会在‘无产者’中是最少数,少数未必即与真理绝缘,即使是人们所预祝的什么‘光杆’和‘孤家寡人’,于我个人是毫无所损,更无所惭愧!”他呼吁各派:“应该从大处着眼,从政治出发来快刀斩乱麻地解决过去及现在的纠纷。”^②



为了表示诚意,陈独秀首先在无产者派内部开刀。当他从尹宽那儿了解到彭述之指使吴继严、马玉夫破坏统一的情况后,马上召开全体会议,谴责彭述之等人的行为,向各支部揭露“我们无产者派当中,也有人在国际所指示的办法之外,提出了枝节问题,即是认为统一须以无产者社为中心”,“这分明和别派的正统观念,同样的不正确,同样的要阻碍统一”。接着,他断然撤换马玉夫和吴继严的代表资格,由自己和尹宽2人出任无产者派的代表。同时,他又采取了一系列组织上的措施:削弱了彭述之的势力,任命完全拥护他的何资深为中央常委秘书,代替吴继严;郑超麟为沪东区委书记,代替拥护彭述之的刘伯庄,马玉夫被迫退出了中央领导机构。

与此同时,陈独秀又主动与我们的话派的代表梁干乔和王文元交谈,诚恳地表示:“统一是中国反对派的绝对必要。如果不统一,则不但其他三派没有前途,‘无产者’也必然死亡,因为反对派今后的艰巨工作,

① 此信收入《中国革命问题》。

② 此文刊《无产者》第11期,1931年2月。

主要得靠年轻的革命者来负担,而‘无产者’中则‘老人’太多了。”

陈独秀之所以大刀阔斧地采取这些措施,不惜牺牲无产者派的利益,一再向其他各派做出让步,争取尽快实现统一,是有目的的。当时中共正处在第二次“左”倾路线统治垮台、王明刚刚上台的交接时期,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党内思想再次出现混乱。陈独秀是想借这个机会,乱中夺权,取王明而代之。因此,他迫切希望托派早日统一。他一再对大家讲:“现在正是正式党的领导陷于完全破产,党内同志及一切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都感觉无出路的时候……绝对需要我们各派摒除不必要的纷争,迅速统一起来,以集中力量并建立反对派在群众中的信仰。”他还说:“在正式的党陷于空前混乱,停止工作的今天,我们反对派各派小组组织还未能迅速地统一起来,集中力量来对付摆在面前的斗争,这已经是罪恶了!”


陈独秀在真诚促成各派组织统一问题上所表现出的姿态,令王文元等人十分感动,也深深打动了各派代表,终于使协商一帆风顺。至此,由于托洛茨基的亲自干涉、特别是陈独秀最后的推动,中国托派组织的统一工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



第 十 二 章

陈独秀三面出击，既严厉批评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现行政策，又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统治，同时拿出相当精力协调解决托派内部矛盾，表现出十足的“反对派”风格。

五十三



1931年5月1日至3日，中国各托派组织统一大会在上海大连湾路一座新盖的石库门房子里秘密举行。这里是无产者社法南区委委员王芝槐的住室。为了保密和安全起见，大会组委会规定，在这3天中，除了陈独秀1人外，所有代表都要住在会场内，开完会后才能出去。

根据事先协商，各派按每20人出一代表。无产者派的代表为陈独秀、郑超麟、汪常师、蒋振东、王芝槐；十月派的代表为王文元、宋逢春、罗汉、濮德志；我们的话派的代表为梁干乔、陈亦谋、宋景修、张九；战斗派的代表为赵济、来燕堂。彭述之起先不是代表，临开会时补选上，第二天参加大会。

刘仁静没有被选为代表。刘仁静在1930年与无产者派和我们的话派闹翻后，创建了十月社，不久又被十月社开除。当他看到托洛茨基来信有意推荐陈独秀为托派领袖时，觉得形势不妙，便马上写信给陈独秀，承认错误，要求加入无产者派。他说：过去反对陈独秀，完全是基于误会；“我以为我们中间已经没有重要争论，使我不能和你们共同工作，因此，我向你要求加入你们的组织，请你们提出讨论”。

不料,无产者派讨论的结果,却拒绝了他。陈独秀回信说:“你的要求,我们已经提出讨论过,一致以为现时已距离统一不远,希望你不必加入无产者社,以免别派误会,使统一运动发生小小的阻碍。”同时指出,“我们之间”并不是“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

刘仁静见遭到拒绝,恼羞成怒,一个人出版《明天》杂志,自称“中国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又称“明天社”,以此要求作为独立的一派,参加托派组织协商统一会议,但又遭到鄙视和拒绝,无奈,最后只好要求准许列席托派统一大会,也被拒绝。就这样,这位有点像中国托派运动鼻祖式的人物,竟然没有资格参加托派组织的统一大会。他一气之下,便进行多种捣乱行为,被称为“反对派中的反对派”。

统一大会进行得比较顺利,决定中国托派的正式名称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又叫“中国共产党布尔塞维克列宁派”,以示他们仍是共产国际及中共内部的一派。大会采用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举陈独秀、郑超麟、陈亦谋、王文元、宋逢春、罗汉、张九、彭述之、濮德志9人组成托派中央,并在5月5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选出陈独秀、陈亦谋、郑超麟、王文元、宋逢春为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陈亦谋为组织部长,郑超麟为宣传部长,王文元为机关报主编,宋逢春为秘书长。

选举前,陈独秀并没有要大家协商。他为了表示“民主”,让人自由选举。他说我们既要反对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也要反对第三国际的包办选举。可没想到,选举结果完全出人意料。

首先,战斗派中没有一人入选中央委员会。刘仁静和梁干乔两个重量级的托派人物也名落孙山。罗汉和濮德志为了顾全大局,便于内部团结,以免日后纷争,提出“退避让贤”,改由战斗派赵济占1名,刘仁静或梁干乔占1名。然而,陈独秀此时书生意气,说:“你俩的诚意是可嘉的,但是既然委员是大会选出,就不能随便更改。大会不能搞两次选举。如果有人认为自己没有当选就要重新选择,那我们这个大会岂不变成分赃会议了吗?所以我主张不能盲动,大会选举合法有效。”拒绝了罗汉和濮德志的建议。

陈独秀这种公事公办的态度自然引起战斗派以及梁干乔、刘仁静等人的不满,因为从资格和代表性方面说,赵济毕竟是一派的领导人,梁干乔则是中国第一个托派组织的发起人,而刘仁静不仅在党内资格老,而且与托洛茨基又有直接联系。此外,其他一些人也对选举结果深感不满。彭述之仅仅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这与他坐上第二把交椅的愿望相距甚远,而马玉夫虽然最早追随陈独秀参加“托派”活动,并且立下过汗



马功劳,但此次非但没能入选中央委员会,连会议也没有资格参加。这表明,托派组织从建立那天起,内部便埋下滋生新的矛盾和冲突的祸根。

当时,全国托派人数约有500人,其组织有沪东、闸北兼沪中、沪西、法南4个区委,另有以北平为中心的华北区委和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区委,华南区委主要在工人中活动,华北区委则在一些大学活动。这就是陈独秀领导下的全部人马。

即使是这样,陈独秀还是满怀信心地憧憬未来。他在托派统一大会的闭幕词中激情满怀地说:“中国人民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一天也不能忘记,他们在期待我们,我们应担当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他在给托洛茨基报喜的电报中称:“中国同志正完成了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旗帜不久就将飘扬在全国。”

就这样,陈独秀从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变成了中国共产党反对派的总书记。



五十四

正当陈独秀兴奋地写信向托洛茨基汇报中国托派组织统一的成果时,足以导致这一托派组织瓦解的内部分化开始了。统一后的托派组织,非但没有如陈独秀想像的那样兴旺起来,反而迅速地重新陷入不断的背叛、瓦解和衰败之中,原来隐藏着的那些矛盾又以更加激烈的形式迸发出来了。

先是在“中央委员会”中,少壮派成员对陈独秀并不买账,开会时争吵得很厉害。他们认为,陈独秀现在是托派的“总书记”,发表的文章的观点不应该仅仅是代表个人而是代表整个托派观点,因此要求他写的文章在发表前,最好先让大家看看,同意后再发表。陈独秀对此大发脾气,说:“文如其人,要有个性,大家同意,就没有个性了,还写什么文章!”

一些托派大将因为自己没有选上“中委”也大为不满。刘仁静大骂陈独秀:“你把我放在一边,看你们以后怎么办?你们不过是半托洛茨基主义者,我和老托的关系,你们没有足够的认识,对我的作用一点也不认识。我只要写一封信给老托,就叫你们垮台,你们等着瞧吧。”

尹宽由于向陈独秀告过彭述之的状,一直为彭述之所嫉恨。在这次大会上,由于彭述之做了手脚,连大会代表都未当上,于是就纠集几个人,控制了几个支部,搞起“独立王国”来。

梁干乔因为什么也没捞着,于是统一大会一结束,就跑到南京,以广州黄埔军校同学的身份,投靠戴笠,加入了军统特务组织,成为复兴社的“十三太保”之一,并公开发表声明,声称共产主义不符合中国国情。他在特务组织中,以研究反共政策著称,一度任特务处南京总处的书记长。

更为严重的是,无产者派的原四大金刚之一马玉夫自认为是陈独秀的一根铁柱,满以为陈独秀会念他劳苦功高,在统一大会上提他为中委,但结果出乎他的意料,于是一气之下,干脆跑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去告密,致使统一大会后不到1个月——1931年5月23日,托派中央即遭破坏。郑超麟和妻子刘静贞,何资深和妻子张以森,还有王文元、陈亦谋、宋逢春、濮德志、江常师、楼国华等被捕。因为马玉夫不知陈独秀、彭述之、罗汉的住址,他们3人才得以幸免。郑超麟等人被捕后,除刘静贞、张以森押了几周被释放外,其余一概引渡到上海龙华司令部受军法审判。国民党根据《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郑超麟有期徒刑15年,何资深12年,陈亦谋、宋逢春、王文元、江常师、楼国华各6年,濮德志因马玉夫不认识,摸不清身份,判了两年半。全案人犯押解到漕河泾监狱执行判刑。这次破获,托派9个执委被捕了5个,5个常委去掉4个,只剩下陈独秀1人,整个托派组织一时陷入混乱,濒于瓦解的边缘,史称“中国托派第一次大破获”。

马玉夫的叛变引起陈独秀的极大震动和痛苦,颇有寇准错用丁谓之悔,哀叹道:“我不识人!”

然而,陈独秀并未被白色恐怖所吓倒。他振作精神,吸收尹宽、蒋振东、宋景修为中央委员,企图重振旗鼓。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8月的一天夜里,尹宽受他之托正在上海英租界振华旅馆召集会议,巡捕突然包围了会场,尹宽、蒋振东、宋景修等人当场被捕,托派中央再度遭受重创。

这样,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被捕的托派领导人只剩下陈独秀和彭述之,而他们两个却根本闹不到一起。托派小组织协议统一期间,由于陈独秀果断地采取坚决措施,粉碎了彭述之破坏统一的阴谋,两人关系遂发生破裂,连私人间的友谊也不再存在了。陈独秀是性情中人,他容易信任人,容易过分估量所信任的人的价值,可是对这人失望之后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去。此时,他对彭述之的厌恶恰好同过去的信任一般,流于过火。于是,两个人不断争吵,相互攻击,闹个不休。统一大会前夕,彭述之因未当上代表,给陈独秀写了一封长信,斥责这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他“誓死不承认”。可临开会时,彭述之又被补选上代表,参加了大会,并在选举时当上“候补中委”。陈独秀便当着大伙



的面,拿出彭述之写的信,问他:“今天还认为此次统一是虚伪的、无聊的吗?”问得彭述之面红耳赤,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此后两人矛盾愈演愈烈,直至决裂。陈独秀去世后,彭述之还不肯罢休,写文章骂他“晚节不保”。

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陈独秀仍然努力开展托派中央的工作。1931年下半年,他创办了托派中央机关报《火花》和托派内部理论机关报《校内生活》。在这两个刊物上,陈独秀几乎每期都要以个人或托派“常委”的名义起草发表文章、宣言、决议、通告,协调内部关系,维护班子团结,指导各地开展工作,希望尽快振兴托派组织。与此同时,他把斗争的矛头直接对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现行政策,展开了猛烈的攻击。

1930年7月,陈独秀发表了一篇《所谓红军问题》的文章,首先对红军运动进行了猛烈抨击。

陈独秀认为:中国革命要靠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发展和胜利,而中国无产阶级在城市里,如果利用穷乡僻壤的农民去搞革命,则不会成功。换言之,“全世界几十国的共产党,一向都遵守恩格斯的遗训,不敢采用利用游民无产阶级的政策”,而现在中国共产党“正在利用此种游民无产阶级为卫军,为支柱,简直把它当作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力。企图扩大、凭借在游民无产阶级基础上的所谓红军,来领导农民做游击战争,除被统治阶级击溃和收买或自己内哄而溃散,或逐步与农村资产阶级妥协,变成他们的白军外,不能有别的前途”。^① 这一观点与托洛茨基曾经讲过的“必须等到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有必要的前提以组织红军以及建立苏维埃制度于乡村里面。谁不明白这点,谁就是不懂得革命”的论断大有异曲同工之处。^②

耐人寻味的是,陈独秀在大骂部分红军为“土匪”与“溃兵”的同时,唯独“忽略”了朱毛领导的红四军。红四军的家底是南昌起义部队和秋收起义的农民军,陈独秀在1927年7月4日召开的政治会议上举手赞成“上山”的。在这里,他显然是有意回避了对红四军的攻击,可见其在深处多少还有一点“恻隐”之心。

陈独秀对红军的污蔑,非常不得人心,在中国共产党内引起了共愤。1930年6—7月间,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专门组织了一批文章进行

^① 《所谓红军问题》,刊《无产者》第2期,1930年7月1日。

^② 托洛茨基:《国际共产主义左派反对派告中国及全世界共产党员书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及其任务》。



反驳。就连托洛茨基也不得不表示：“将‘红军’同土匪混为一谈，如果真有这件事，那是应该纠正的。”蒋介石对此却大加赞赏，他在江西苏区进行反革命“围剿”时，将这篇文章大量印出来，到处散发，产生极坏影响。

不管陈独秀动机如何，这篇文章在客观上确实起到了帮助国民党政府镇压红色政权的效果，这实在出乎他的意料。此后不久，他不得不修正自己完全排斥“红军”的观点，说：“革命的农民武装，自然有游民无产阶级分子和职业的土匪加入，但整个运动则有深厚的根基在中国农村条件里头，将来无产阶级专政也是应当依靠在这个根基上面的。”^①显然，陈独秀对于红军运动的看法，既是一种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只认定“十月革命”的形式），又是政治上脱离实际的纸上谈兵，而且带有污蔑的口吻，是完全错误的。这篇文章的发表使他和中共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接着，陈独秀将更大的精力用在了对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判上面。

五十五

1930年前，正是立三路线最为猖獗的时候。在革命性质上，立三路线不承认民主革命的长期性，认为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开始即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在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上，不承认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不平衡性，认为革命形势在全国各地和全世界各国都有同样的生长，全国各地都要马上起义，以中国革命的胜利推动世界革命的爆发；在革命道路问题上，主张中心城市要首先发动起义，以形成全国革命高潮的中心，反对毛泽东的“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来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

1930年5月，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发动了中原大战，李立三欣喜若狂，认为“毕其功于一役”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他在6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由他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中断言：“中国是帝国主义统治世界的锁链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世界革命的火山最易爆发的地方，所以在现在全世界革命危机都已严重化的时候，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

^① 托洛茨基：《一九三〇年一月八日给中国托派的来信》。



8月1日,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行动委员会,两天后正式下达决定,举行武汉、南昌暴动和上海大罢工。其结果可想而知。此次暴动给李立三的“左”倾路线写下了极其沉重的一笔。红二军攻打武汉,部队由16000人减少到5000人,丢掉了洪湖根据地;红七军攻打柳州,6000人的部队减员4000人,丢失右江根据地;红十军攻打九江,损失更惨重,精兵两万人败退,只剩下不足3000人;红三军攻占长沙后,彭德怀认为守不住,决意退出,受到了严厉批评,令朱毛红一军团再战长沙,因形势颇为不利,朱毛不得不擅自决定撤回江西,总算没有全军覆灭。白区损失更为严重,上海的地下党员由2000人锐减至不足千人;江苏和南京的暴动计划尚未实施,便被国民党侦破,牺牲了200名党员干部;武汉地区牺牲了包括多位省级干部在内的几十名党员;天津500名地下党员只剩下二三十人。

李立三在他的全国武装起义计划遭到党内一些同志及共产国际反对时,却公然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又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①这使共产国际大为恼火,在后来领导中共批判立三路线时,明确指出,立三路线是“半托洛茨基主义”。



对于国际的这个结论,陈独秀则另有一番高见。他认为:“国际现在的路线和所谓‘李立三路线’并没有什么原则上的不同,和它自己以前的路线也根本没有两样”;“站在盲动的国际路线上反对盲动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主义’”,“只有使党比立三时代更加混乱无出路”。一言以蔽之,立三路线就是国际路线。^②

时隔不久,这一切不幸被陈独秀而言中。借着反对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更加“左”倾的王明机会主义路线上台了。

1929年3月,年仅25岁的王明在莫斯科学成回国。对王明的回国,米夫竭尽全力推荐。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下达指示,要中共中央对其委以重任。然而,一向目中无人的李立三并未将米夫的指示放在眼里,只安排王明到上海沪西区委做宣传工作。7月,周恩来又将他调到中共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并兼任《红旗》报通讯员。这使王明大有怀才不遇之感,相当一个时期,情绪非常低落。

1930年6月后,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达到鼎盛时期。王明感到时

^① 《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1930年10月),刊《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三)。

^② 《解放周刊》第24期。

机已到,于是又振奋精神,披挂上阵,写了一篇又一篇鼓吹暴动的文章,为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摇旗呐喊,这使李立三对他的印象有了转变,便将他调到中宣部任秘书。不久,王明得知共产国际并不满意李立三的领导,便在7月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与何孟雄、王稼祥、何子述、博古等公开向李立三叫板,指责他犯了躲在“左”倾词句之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托洛茨基、陈独秀主义及布朗基主义的混合物。李立三一怒之下,撤销了王明中宣部秘书职务,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给了他6个月的留党察看处分。

7月16日,共产国际召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问题,于23日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批评中共犯了严重错误,并指派周恩来、瞿秋白迅速回国,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错误。

9月24日至28日,周恩来、瞿秋白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上一方面批评“立三路线”,一方面对何孟雄点名批判,王明虽然是因为反对立三路线受了处分,不但没加以褒奖和重用,而且连处分都没撤掉,这使他对瞿秋白耿耿于怀。

不料,共产国际在收到六届三中全会文件后,很不满意,认为三中全会“抹煞两条路线原则上的区别”,批评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的实质,犯了“调和主义”错误。这使王明喜出望外,马上精神起来,接连发表文章,攻击三中全会。

就在中央和王明之间闹得不亦乐乎的时候,1930年12月10日,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来到中国。早在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已经宣布,今后不再向中国派驻代表,这次破例完全和共产国际及米夫支持王明上台有关。米夫下车伊始,马上单独会见王明,并在王明的安排下,接见了罗章龙、徐锡根等反对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方面的人。之后,才同瞿秋白、周恩来见面。

12月16日,米夫亲自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他的高压之下,瞿秋白不得不检讨自己犯了“调和主义”严重错误,并同意公开向全党承认。会上,中共中央被迫发出了第96号通告,夸大立三路线的危害,并将三中全会说得一无是处。会议同时撤销了对何孟雄的处分。

12月25日,米夫任命王明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原省委书记李维汉被派到苏联学习。江苏省委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数省,地位显赫,这一职务使王明立刻一跃成为党内举足轻重的实权派人物。

1931年1月7日,米夫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上海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期前一天,为把王明扶上中共最高领导的宝座,米夫事先找了





何孟雄



罗章龙

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一个个谈话，要他们选王明。虽然如此，米夫还不放心，因为王明既不是中委，又不是代表，没资格参加四中全会。于是，他又采用高压手段，强迫中共增加 15 名非中央委员与会。

按照中共党章的规定，列席代表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而米夫利用其权力强行决定：王明等 15 名列席代表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开创了中共党内组织原则凭借手中权力可随意摆弄的先例。为了增加王明当选的概率，米夫采取事先尽量不通知反对王明的中央委员参加的策略，尤其是罗章龙派的中委和候补委员大都被米夫拒绝在外，许多代表在开会前几十分钟才接到通知，有的代表进了会场还不知开什么会。

会议一开始就发生了激烈争论。当向忠发宣布“今天召开的会议是六届四中全会”时，许多代表都目瞪口呆。罗章龙坚决要求解散中央，重新改组中共，何孟雄马上响应支持。当会议拿出米夫事先拟好的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名单时，全场又乱套了。罗章龙道：“政治局几乎百分之百都是立三路线执行者，应当彻底改选！”当听说所有参会人员都有表决权时，罗章龙气得站起来便要拂袖而去。

最终，在米夫的压迫下，四中全会终于通过了共产国际提出的中央领导机构名单。政治局委员是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王明、陈郁、任弼时。候补政治局委员 7 人，分别是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于是，原本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连跃两个台阶，直接进入了政治局。

1 月 10 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 3 人为中央常委。瞿秋白被罢免。半年后，向忠发被捕，叛变被杀，王明代理党的总书记，从此逐步确定了王明在全党的统治地位。

六届四中全会闭会第三天，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王克全等 13 名四中全会代表召开了“反对四中全会代表会议”，公开发表了《反四中全会代表团告同志书》，并通过了罗章龙主持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这次会议还推选罗章龙、徐锡根、王克全、王凤飞等 5 人组成了临时中央干事会，即“中央非常委员会”，也即是后来人们称道的“第二中央”。

罗章龙，湖南浏阳人，1896 年生，1919 年参加发起新民学会，后进北大哲学系学习，五四运动领导人之一。参加发起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共产党早期组织，是北大支部负责人。1921 年加入共产党，大革命时担任中共湖南省行动委员会执行委员、党的五大中央委员、六大中央候补委员，后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党团书记。这样一位“元老级”



人物带头反对四中全会，马上在党内产生了连锁反应，党内反对米夫、王明的浪头接踵而来，全总党团、上海总党团、上海工党团、上海沪中区委都相继发表了反四中全会决议案及声明。

米夫见势不妙，立即召集罗章龙、何孟雄等人开会，希望他们尊重王明，支持四中全会，但罗、何二人仍固执己见。米夫恼羞成怒，道：“此之后，谁反对四中全会，谁反对王明同志，就是反对国际代表，反对共产国际，就应受处分，以至开除党籍。”

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定》。几天后，又将王克全、王凤飞等人开除党籍，中央各省、市和上海各区委也纷纷将罗章龙分子开除党籍。

2月22日，米夫、王明正式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致电共产国际，报告了四中全会的经过。报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把王明夸了个天花乱坠，说王明是伟大的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同李立三作斗争的首屈一指的英雄，是中共的希望；第二部分报告了中央政治局一个半月斗垮了瞿秋白、何孟雄、罗章龙等反对派，取得了斗争的“伟大胜利”。

共产国际对此十分满意，8月26日专门发表决议，高度评价中共四中全会“在党的布尔什维克的事业中前进了一大步，修正了政治路线，更新了党的领导，从而使党的全部工作有了转折，这有利于实际而彻底解决党所面临的那些刻不容缓的任务”。

数十年后，罗章龙在谈到关于分裂中共及组织“中央非常委员会”事宜时说：“因为我们都是受过处分、被开除党籍的人，当革命工作停顿，大家很着急，为了把工作进行下去，才成立了‘临时中央非常委员会’。”

罗章龙被开除党籍后，便不再过问政治，以后便到河南大学、西北大学任教，解放后又先后在湖南大学、湖北大学、湖北财经学院任教。1995年去世，终年99岁。

王明上台后，马上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当他已从中央特科得到消息，知道国民党就要抓捕何孟雄时，却不让特科去通知何孟雄，致使何被捕，随后他又把在狱中的何孟雄开除了党籍。何孟雄英勇就义后，王明还说人虽然牺牲了，但对他们的错误还要严肃对待、彻底清剿。

对瞿秋白，王明也采取了绝不相容的态度。当时瞿秋白身患肺病，心力交瘁，已无力再与王明争高低，便于1931年1月17日写了《声明书》，将自己骂了一番，但仍不能过关。他自知落入小人手中，只得听天由命，于1月28日写下了第二份《声明书》，再次往自己脸上抹黑，表示



“今后一定要站在共产国际的立场上，拥护四中全会，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为党为革命事业而奋斗”。但是，王明依然对瞿秋白不依不饶，不但在政治上将其打倒，还在经济上进行制裁。当时瞿秋白重病缠身，王明却停发了他的生活费，每月仅象征性地给十几元钱。这些钱只能糊口，根本无法治病。后来，当瞿秋白意识到由于他的“不争”，使王明在不合法的情况下夺了权，给革命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时，内疚万分。这一重负，一直背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在《多余的话》中坦诚地表露了当时的心态：“1931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因为我对中央的理论政策不假思索了，偶尔我也有对中央政策怀疑的时候，但是立刻停止怀疑了——因为怀疑也是一种思索；我既然不思索了——自然也就不怀疑了。”他认为自己已经没有发言权，在这种境遇下继续抗争、反击都是不现实的。

1934年1月，瞿秋白奉命到江西苏区，担任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人民教育委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同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瞿秋白要求随队西行，但被博古拒绝。1935年，瞿秋白被捕，牺牲时年仅36岁。

中共四中全会同样也引起陈独秀的强烈不满。

1931年3月，陈独秀撰写了《告全党同志书——立三路线与国际领导的破产》的长篇宣言。宣言彻底否定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立三路线的批判和纠正，强烈谴责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小组织在米夫的帮助下把“立三派”和“秋白派”打下了台，把罗章龙开除了党籍，“这是共产国际分裂中国共产党的阴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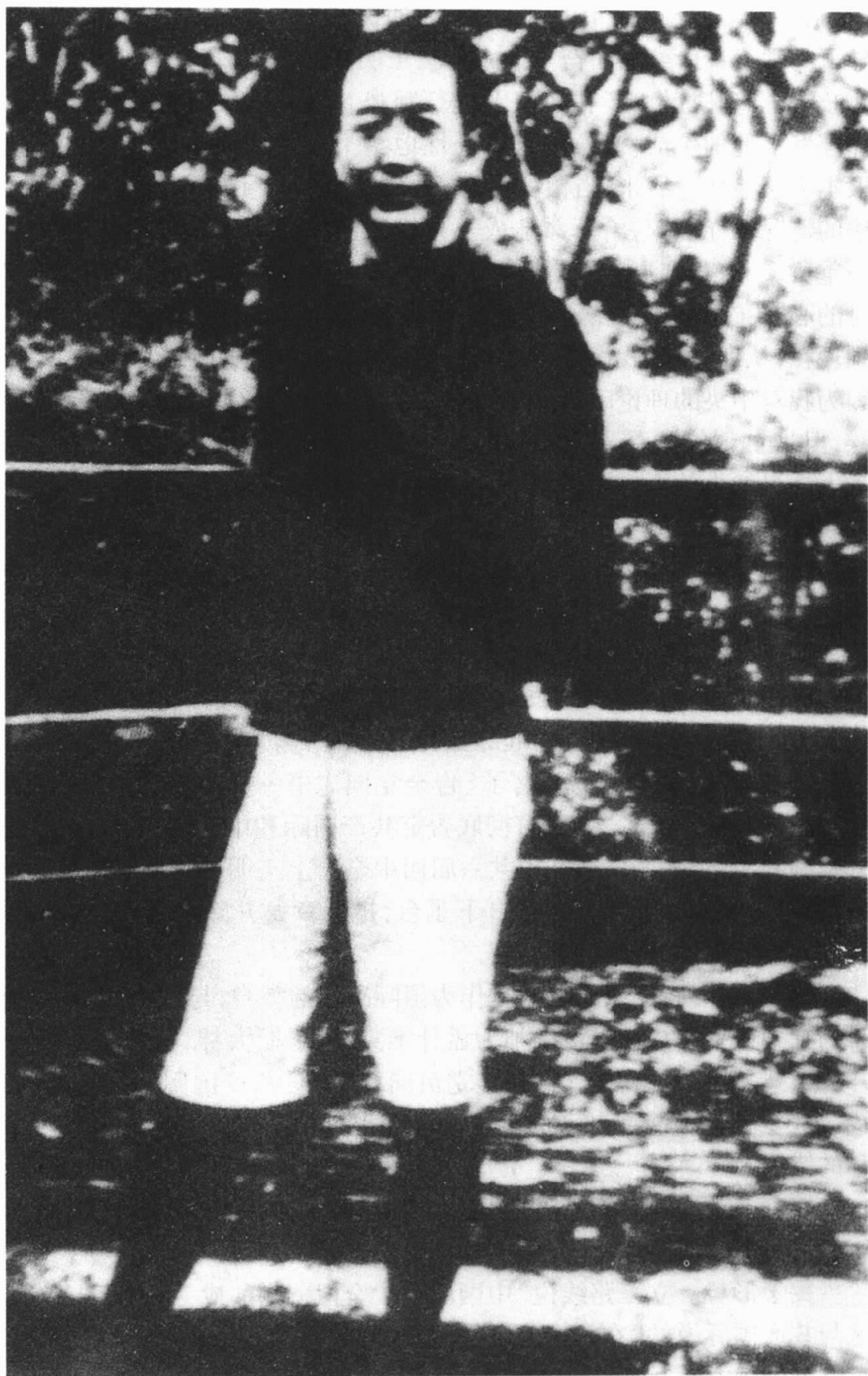
陈独秀认为：立三路线只是作为国际路线的替身，与1927年在24小时内宣布中共中央的模范领袖为孟什维克，做了斯大林、布哈林的替身，并无二致。“我们有权利向全体党员同志宣布：共产国际宣布‘立三路线’，完全是为了掩饰自己的破产，‘立三路线’的错误，根本就是共产国际的错误。”

接着，陈独秀把立三路线的主要错误与共产国际的路线逐条进行了比较。

关于形势。立三路线说“中国已有了全国范围的成熟的革命高潮”，这与共产国际说的“在两个浪潮之间”一样，“在政策上说，完全是一种没有结果的极左倾”。

关于革命道路。李立三不承认国内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认为





瞿秋白就义前留影

一省或几省的胜利直接就是全国暴动的形势,而斯大林承认“不平衡”,却又把中国南方的苏维埃视为“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已经胜利的标志”,“显然是极无根据的一种官僚的观点”。

关于革命性质。李立三强调“革命胜利的开始,革命政权建立的开始,一定就是资产阶级民权革命没有间隔地转变到无产阶级革命之开始”。共产国际说这是“立三路线”之“托洛茨基主义”的翻版。陈独秀认为“其实与托洛茨基对于革命的观点,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干的”,这种说法是共产国际路线受到打击之后又不敢公开接受“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的“一种诡辩的诠释”。

陈独秀接着对党的六大以来的路线进行了全面抨击。他认为:六大以来,党的领导之所以无出路的“基本原因”,在于“党的领导政策几乎完全依靠农民”,“斯大林派企图在农民身上打开一条出路,由农村转向城市发展,甚至根本企图在农村中建立政权的意识,完全是离开了无产阶级的一种标志”。他断言:“在工业城市中,工人尚未起来的条件下,希望在农村中揭起革命的企图而思有所成就,这简直是幻想。”他认为这就是共产国际“陷中国党于冒险盲动主义错误的真正根源”,其结果“我们很早就预言并警告过:单纯的军事投机,只有更加损害党的基础,使工人运动更加难于恢复”。陈独秀甚至说什么:“一贯的重视农民作用的路线,在理论上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是国际机会主义(俄国孟什维克主义在内)的典型思想。”

陈独秀没有也不会把农村武装斗争问题上“左”倾错误与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区别开来。在这一点上,他的洞察力和李立三、王明他们没有什么两样,很不敏锐,几乎等于零。

不过,这时候,他把自己过去完全否定红军、称红军是“土匪”的观点稍稍进行了一点修正。他说:“虽然我们仍是要说明中国南部存在着农民游击战争,不问是否有流浪无产阶级分子、职业的土匪及从国民党的反动军队中叛变出来的官兵参加在内,但它确是被欺骗的、被打溃的及流尽了血的中国革命依然存在的具体表现,其内部力量有伟大的可能及深厚的根基。”因此,他在毫不留情地攻击斯大林派的“官僚冒险主义的领导”同时,“对于农民游击队本身,是持绝对友谊的态度,旁观与仇视都不是共产主义的立场”。

陈独秀最后强调:“现在改造党的政策及党制已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了。”为此,他建议:规定日期召集全党的代表大会,对于政策及党制加以根本改变,必须完全采取左派反对派的路线;在大会之前,把一切主要



问题在一切会议上及机关报纸上发动党员群众讨论,不能拿任何罪状作开除的理由,以保护讨论正确地进行;一切事实及经验证明左派反对派路线完全正确,没有理由把我们排斥于党外,我们应当选举代表参加大会,并且在会上讨论左派反对派恢复党籍问题,使得我们立刻回到党内来;公布历来为领导机关隐藏的左派反对派文件及对于大会的提案。

这篇《告全党同志书》是陈独秀以托派观点批判“立三路线”(包括以前的瞿秋白盲动主义路线)的代表作,也是他要求以托派面目改造党的又一篇代表作。

不可否认,王明的上台给中共及中国革命带来灾难是不可弥补的,他在米夫的支持下对立三路线和所谓调和主义的瞿秋白的斗争也是错误的,因此陈独秀的批判在一定范围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问题是这些批判其实也是从另一种形态的“左”倾立场和“左”倾观念出发的,等于是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了,它与以后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判并纠正王明路线,清算历史上一、二、三次“左”倾路线错误,总结历史经验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陈独秀采取的对抗方式根本无补于问题的正确解决。他提出的建议,更是近乎天真、浪漫的荒唐。

就在陈独秀和中共关系越来越僵的时候,九一八事变发生了,民族矛盾的急剧上升,迫使陈独秀将斗争的矛头由中共转向蒋介石,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上。



五十六

九一八事变之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期间,由日本侵华引起的中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日本妄想独霸中国与欧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政策之间的矛盾、英美等国为了怂恿日本侵苏而牺牲中国东北的阴谋、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的军事和对日妥协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外交及其对抗日军民的高压政策、东北抗日人民义勇军及马占山等一部分官兵的自发抗战、以爱国学生为先锋的全国人民要求抗日和反对国民党不抵抗政策及其独裁统治的抗日民主运动汹涌澎湃、国民党反蒋派和地方实力派乘机进行的倒蒋运动以及蒋介石在此浪潮冲击下被迫下野……这一切都引起陈独秀的极大关注。

为了给抗日救亡运动以更大、更直接的影响,1931年12月5日,陈

独秀创办了一个类似《每周评论》的刊物——《热潮》周刊，并自任主编。这是他一生最后一次自办刊物。他在《发刊词》中宣称：“二十世纪是两种热潮的世纪，一种是广大的劳苦饥寒奴隶向一班寄生虫算账的热潮，一种是几十个被压迫民族向帝国主义算账的热潮；这两种热潮，虽有时有起伏而不是一直高腾，其结局将无物能与之抵抗，特别是两种热潮之合流，终要把全世界洗刷一新。”“今日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斗时期，在这一次决斗中，将是他们的凶焰熏涸我们的热潮，还是我们的热潮淹没他们的凶焰，这就要看我们的努力了！”他最后表示：“本期发刊之发行，便是要为热潮做一小小记录，也要供给热潮一点小小动力。”

《热潮》共出了7期，到一·二八抗战停刊。这期间，陈独秀在上面发表了大量文章，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揭露英美等国操纵国联袒护日本欺压中国的阴谋，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表示了明确的爱国立场。

陈独秀在文章中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和英、美帝国主义袒护日本、欺压中国的行径，主张“对日绝交”、“对日宣战”，指出“帝国主义强盗们所组织的国际联盟和美国，都是被压迫民族的敌人，不是我们的朋友”，要人们放弃“美国是中国之友”的幻想。^①

陈独秀猛烈抨击蒋介石、汪精卫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和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勾当。在日本侵略面前，蒋介石不仅令数十万东北军“严禁抵抗”，致使东北三省很快沦陷，还进一步指使中国驻国联代表顾维钧提出了中国军队从锦州撤兵，设立中立区，国际共管天津等卖国方案。消息传出后，国民党政府怕激起民愤，放出空气是“日方向国联要求”的。陈独秀立即在《热潮》上发表文章，揭露了国民党政府主动提出此案的真相，并在第2期封面上以大标题的形式发出“警告”：“大家还不醒觉吗？政府为避免和日军冲突，不惜提出中立区和锦州撤兵这件卖国政策。”后来，在美国谕旨下，中国政府与日本就“满洲中立区问题”直接谈判时，陈独秀又撰文抨击：“牺牲东北的政策实现了！”“城下之盟实现了！”

蒋介石被迫下野后，汪精卫上台打出“民主政治”的招牌，高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以欺骗群众。陈独秀马上指出：在对日避战求和的偷安政策和对民众反日运动的高压手段上，“汪精卫政府和蒋介石政府将没有什么不同”。

^① 《直接谈判之途径》，载《热潮》第1期。



果然,汪精卫上台后第三天就制造了屠杀爱国学生的“珍珠桥惨案”。陈独秀立即接连撰文从各方面报道评论这一事件,猛烈抨击汪精卫国民党政府,揭露汪精卫标榜的“民主政治”“只是以一部分人独裁代替个人独裁之装饰品,假面具而已”,他只是替蒋介石做两件事——“屠杀爱国民众”和“签订卖国条约”。他指出爱国学生的血将宣告“政府死刑”。^①

在抨击和揭露国民党卖国行径的同时,陈独秀还特别关注学生的抗日民主运动。他在多篇文章中批驳国民党反动派加在爱国学生头上的“越轨行动”罪名,指出:站在爱国民众反日救国的立场而言,学生捣毁国民党党部、喊出“打倒国民党卖国政府”、因封存和没收奸商的日货而“侵犯私有财产和干犯法律”等等“越轨行动”,都是“必要的”、“必需的”,应该“大于其‘越轨行动’”;“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人类史上一切革命都是‘越轨行为’。可以说,没有‘越轨行为’便没有人类进化”。因此,“我们应该高声大喊‘越轨行动神圣’”。^②



当学生斗争发展到捣毁国民党党部的暴力斗争后,陈独秀的态度大为转变,热情称赞“学生运动走出了‘只问外交不问内政’的迷魂阵,由反日运动走到反国民党,这本是运动发展之极自然的逻辑”。^③随着运动汹涌发展,冲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上层分子及黄色工会头目的束缚时,陈独秀禁不住大声喝彩,发出了“挤他们到后台去”的号召,指出这些动摇和妥协的分子“必然会被前进分子挤到斗争的后台去;同时也必须把他们挤到后台去,反日斗争才能向前发展”。^④他还进一步指出:只是“向政府示威,捣毁阻碍反日运动的(国民党)党部,殴打妥协卖国的官僚……还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要自觉地转换其方向,即是集中时间、精力和热忱于工人、农民和兵士方面来……才能使反日运动进行更高的阶段”。^⑤

在如何抗日问题上,陈独秀也有其独特的政治主张。

上海一·二八抗战以前,陈独秀认为抗日主要依靠两点:一是依靠中国人民尤其是“下层的劳苦民众”,“奋起自救”。他认为“千万不要依赖现在的统治者”,并且强调“我们相信,民众热潮具有大炮飞机以上的力量;被压迫民族能够而且也只有拿这一力量来淹没帝国主义的凶焰,

①③ 《热潮》,第4期,1931年12月29日。

② 《谈论越轨行动》,载《热潮》第5期,1932年1月7日。

④⑤ 《热潮》,第7期,1932年1月23日。



淹没它一切的敌人”。^① 他以为：“中国人民之不能及时奋起自救！我认为这才是此次反日运动中之真正危机！也就是中国民族之真正危机！”因此，“解决问题的道路，在现状看来，只有由反日的学生与市民，把对付政府和党部的力量，转到工人和兵士中去，‘越轨’的学生市民和‘越轨’的工人兵士结合起来，再和‘越轨’的农民结合起来，随地驱逐暴日势力和袒护暴日的势力”。^② 二是依靠国民会议。他主张必须在“反日反国民党的高潮中涌现出一个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对抗的国民会议，作为全国反日民众代表自动集合的总机关，组织武装，组织国家，以彻底反抗帝国主义，彻底肃清帝国主义的一切走狗的总机关”。^③

上海一·二八抗战爆发后，陈独秀极为振奋。他在事变爆发的第二天、第三天，接连以“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的名义起草和发表了《为“上海事变”第一次告民众书》和《第二次告民众书》，称“现在的事实已显然证明，中国的士兵及一部分下级军官，在民众反日的激烈空气下，在违反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之下，是可以抵抗帝国主义强盗军队的”。文件揭露蒋介石南京政府破坏十九路军抗日的种种活动，号召“上海一切被压迫民众立刻武装起来到前线去！一切巡捕义勇军及各地的士兵自动起来参战！十九路军的士兵及下级军官们坚决反对南京政府的不抵抗主义，防止上级军官的妥协，作战到底”，并大声疾呼“全中国的革命民众们，要抗日救国首先要推翻纵敌卖国的国民党政府”，“自动地召集全权的国民会议”。^④

九一八之后，陈独秀对形势进行了新的更加激进的估计。他认为九一八事变后的形势同他1929年被开除党籍到1931年5月任托派总书记的形势完全不一样了。那时，革命处于低潮，国民党统治日趋稳定，经济也会随之而有相当的恢复和发展，所以他反对党采取武装斗争的策略，主张开展以召开“国民会议”为中心的合法运动。现在，他则认为“正是中国民族的热潮和帝国主义的凶焰开始决斗时期”。尤其当全国的反日运动发展到反国民党、蒋介石下野、国民党政府发生统治危机时，他更进一步认为：“革命的民众都早已认识国民党政府根本是卖国政府，根本非推翻它便不能反日，不能救国。”“目前是国民党资产阶级的统治由动摇而走向崩溃，民众已经开始抬头的新时期，形成了无产阶级进攻的客观



① 《发刊词》，载《热潮》第1期。

②③ 《热潮》，第6、3期。

④ 油印传单。

环境。反日的民族斗争已造成了武装民众的特殊机会……我们一秒钟也不能放松抓住目前这一阶段的实际环境与机会,鼓动工人农民群众起来为这些口号(指‘武装群众打倒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等——引者)而斗争,以造成革命的高潮,以造成直接革命的形势。”^①

在另一篇文章里,陈独秀则更加明确地指出:目前形势与列宁描绘的俄国1905年时的革命形势相似,是“政治已开始恐慌和革命已开始发展的新时期;这一新时期就是大多数民众表示不能与国民党政府相容……且觉悟到有建设新政治制度之必要”,“因此,我们左派反对派应当觉悟到不仅限于‘国民会议’之形式的口号……(而且)要从速推翻国民党政府全部政权交国民会议,实现革命的民众政权”。^②从这样的估计出发,陈独秀于1932年2月10日起草了《政治决议案——目前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提出目前我们的任务是:“组织及参加各地工人、农民、城市贫民的义勇军运动,使之坚决地举起反日反国民党的旗帜”;“用全力推动城市工人自己的以至进攻的斗争。罢工运动一广泛起来,便应组织工人苏维埃,如果当地已有义勇军或我们能够影响的军队,更进而建立工农兵苏维埃”;“在适当地点召集全体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领导全国范围的反日反国民党的斗争”。^③



为了实现其“反日反国民党”的政治纲领,这期间,陈独秀主动缓和了与中共中央的对立情绪,呼吁与中共合作领导抗日运动。他在“决议案”中说:“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虽然犯过不少的错误,毕竟还是在群众中有权威的党。它不但是无产阶级的党,并且应该站在民族领袖地位;它此时即应号召民众自动地建立全权人民代表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政府领导全国的反日斗争。”“红军一与某一工业政治中心城市(如武汉)民众运动汇合起来,即应在那里召集国民会议,做反日反国民党斗争之总机关。”“在已有农民苏维埃的省份,城市苏维埃或义勇军一经成立,应即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为执行以上的任务,我们……积极要求我党的领导机关改变策略,召集紧急会议,以谋整个党策略上组织上的统一,在未统一前,力求在一切行动上的合作。”^④

在《告全党同志书》中,陈独秀更加明确地表示:在“所有工会运动中,罢工斗争中,学生运动中,反日运动中,国民会议斗争中,反国民党斗

①② 《火花》,第7期,1932年1月28日。

③ 《校内生活》,第3期,1932年5月20日。

④ 刊《火花》第7期,1932年1月28日。

争中,以至组织苏维埃运动中,一切共产主义者之联合起来行动,不加任何形式地阻止与破坏以便统一我们的力量,向阶级敌人进攻。我们左派反对派在一切行动中都准备和全党携手前进”。当托派组织内部有人不理解为什么要主张缓和与中共的关系时,他进一步解释说:“共产党是全无产阶级自己的先锋队,并且是全民族的领袖,革命的民众不应该因为党的领导者之错误而根本反对她,而是应该积极纠正党的领导机关之错误,甚至于改造党,以除我们道路上的困难,这正是我们左派反对派的立场。”^①

不仅如此,陈独秀还和彭述之、罗汉3人联合署名,直接写信给中共中央,提出“合作抗日”的建议,说“任何同志,谁还固执教派精神,拒绝合作,他将会在革命之前铸成莫大的罪恶。因此,我们向党提议,马上召开一个联席会议,以决定在群众行动中一致步骤问题。希望你们不要使革命的群众失望”。^② 陈独秀能够毅然挣脱“教派精神”的束缚,不记将他开除出党之辱,主动提出与中共联合行动的倡议,实属不易。这种立场和态度,与他当年开始转向托派、同党决裂以及直到九一八事变前的情景形成显明的对比。

但是,这种变化仅仅是在抗日问题上,陈独秀反对党的基本纲领的立场并没有改变。他要求中共党员“纠正党的领导机关的错误,甚至于改造党”的说法,多少带有“策反”的性质。王明认为:托陈派和国民党改组派、江苏耆老和第三党一样,“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所以,他要求与党合作抗日的呼吁,中共非但不响应,还对他痛加斥责。中共中央在向共产国际报告这件事时说:“取消派为要维持其在工人中的欺骗,在‘一·二八’后向党提出来要求联合,共同的〔地〕开联席会议。党向被取消派欺骗的少数工厂中的群众的回答是:号召他们了解取消派破坏反帝运动的罪恶,党愿意与他们在上海工人阶级一致的联合战线上共同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但是党不能与陈独秀派开联席会议,革命的共产党与反革命的陈独秀是不能联合在一起的。”^③

在当时那样特殊的历史背景下,陈独秀又是这样复杂的政治身份,中共中央拒绝他提出的“合作抗日”的意向是可以理解的,不过由于受



① 陈独秀:《谁能救中国,怎样救中国》,刊《先锋》第4期,1932年11月17日。

② 引自《上海事变中的取消派》。

③ 《中共中央政治报告选辑》(1927—1933),第208~209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



“左”的思潮影响,对陈独秀的抗日主张批驳得有些过头。比如:称陈独秀主张“对日宣战”的口号其实“是由南京国民党中央提出,而被一切反革命派别——从国家主义到托陈取消派罗章龙右派——拥护的”。^① 又称陈独秀主张“由工农商学联合起来”抗日,“是在幻想第二个五卅的民族统一战线”,事实上是要和资产阶级妥协,要引诱工人去投靠资产阶级,屈服于反革命和资产阶级的豪绅地主。^② 应当说,这样的批判指责既不符合事实,也曲解了陈独秀的原意。

五十七

客观地说,托派组织并非一开始就是反革命性质的。

1927年以前,托派是党内问题。由于他们在1927年十月革命节组织示威游行,遂使矛盾转化,成为党外问题。在同年12月召开的联共(布)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其他托派分子被开除出党。大会闭幕后,一些被开除出党的人呈递脱离反对派的声明书,要求恢复党籍。对此,联共(布)中央提出包括公开指斥托洛茨基主义,承认党的改革、服从党的决议等在内的恢复党籍的4项条件。在做到这4项条件下的情况下,包括季诺维也夫在内的绝大多数人恢复了党籍。这表明,那时的托派问题虽属党外问题,但还不是敌我问题。真正把托洛茨基定为敌我矛盾,是在1936年以后的事情。



现在回过头来考察陈独秀的托派问题时,也应做具体分析。从时间上看,他从事托派活动时,托洛茨基集团只是工人运动中的一个反列宁主义的政治派别。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托派还没有放弃反帝反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他们虽然反对共产国际、反对中共中央,但打的是路线斗争的旗帜。陈独秀从来都没有承认自己不是共产党。即使是在1932年被捕之后,在法庭上,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政治身份和立场。他说:“我们的党——中国共产党——领导者斯大林派的错误政策,是以延缓革命甚至绞杀革命……但共产党是全无产阶级自己的先锋队,并且是全民族的领袖,革命的民众不应该因为党的领导者的错误而根本反对它,而是应该积极纠正党的领导机关的错误,甚至于改造党,以除我们道

① 《红旗周报》,第21期,1931年10月25日。

② 《红旗周报》,第22期,1931年10月30日。



路上的困难,这正是我们左派反对派的立场。”^①

可以看出,陈独秀一直把托派和所谓斯大林派都视为共产党人,明确反对国民党反动派进攻江西红军。应该说,在敌我这个根本立场问题上,陈独秀还是站得对。说陈独秀加入托派后是反革命,确实言重了。

几十年过去了,陈独秀因为走上与托派相结合的道路,被定为取消派、反党、反共产国际、反革命、叛徒5项罪名,几乎成了铁案。即使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称赞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建党有功”时,也不得不说:“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走到反革命方面去了。”1952年12月23日,一声令下,全国一致行动,将大陆上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全部逮捕,接着搞了一个全国性的肃托运动,所有有关陈独秀和托派的材料从一切角落中彻底清查出来,作为绝密档案,被严格管理起来。托派问题成了无人敢触的“雷区”。

1981年,党史专家唐宝林先生在《历史研究》第6期发表《试论陈独秀与托派关系》一文,首次以大量无可争辩的原始资料,叙述了陈独秀从1929年到1942年逝世,与托派相结合、争吵、分离的复杂过程,以及在此期间他与共产党的矛盾、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从而得出了不能称其为取消革命的“取消派”,更不能视为“反革命”的结论。这个结论像一颗炸雷顿时震惊了史学界。

唐先生的理由是:在民主革命时期,衡量革命与反革命的标准只能是一个,那就是看是否反帝、反封建、反国民党独裁统治,而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毫无疑问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派。至于他与中共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反对党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他认为,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党,不能离开城市,不能离开工人阶级而到农村去与农民相结合,否则共产党就会农民意识化,革命就会像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那样没有胜利的希望,所以中国革命也应该像欧洲那样走城市暴动之路。后来的实践已经证明,陈独秀的看法是错误的。唐先生认为,这个错误的性质是革命阵营内部的思想路线分歧,不应定为“反革命”。

1989年,唐先生在《中共党史研究》第1期上再次发表了《简论中国托派》一文,进一步指出,不仅陈独秀任总书记时的托派是“反帝反国民党”的,而且在他1932年10月被捕后,直到1949年国民党垮台前,中国托派也是反帝反国民党独裁的,他们与中共的分歧也是革命阵营内部的路线分歧(虽然他们的路线是错误的),不是反革命。

^① 陈独秀:《辩诉状》,1933年2月20日。



1991年新版《毛泽东选集》对“托派”一词做出了新的注释：“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主张抗日，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把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是由于当时在共产国际内流行着中国托派与日本帝国主义间谍组织有关的错误论断造成的。”

这个注释，在指出托派错误的同时，第一次承认托派是“抗日的”，并指出了所谓近半个世纪以来说托派“汉奸、反革命”的来源，这实际上是非正式地为托派平了反。既然托派不再是反革命组织，那么当年因为“与托派相结合”而定为反革命的陈独秀自然也就不是“反革命”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由此可以认为，这是对陈独秀“反革命”罪名最彻底的平反。

五十八



就在陈独秀被王明骂为反革命的时候，他遭受到了来自另一方面的猛烈攻击。托派组织内部对他自九一八事变之后提出的要求与中共“合作抗日”等一系列方针政策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们在攻击陈独秀方针政策的同时，甚至在组织上搞起分裂。陈独秀不得不耗费相当的精力回过头来解决内部问题。

首先是理论上的争执。当时托派内部有一些人以“工人无祖国”等漂亮词藻反对陈独秀在九一八事变后发表的《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告民众书》中提出的政治观点，尤其是反对陈独秀提出的“对日宣战”口号，指责他的观点违背了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宣扬的是“机会主义路线”。

反对陈独秀的主张最厉害的是上海最有影响的托派区委——法南区委书记陈岱青、陈其昌、赵济、王平一以及自称是托派理论权威的刘仁静。他们认为陈独秀对形势“陷入了幼稚的过分的估计”，还说“十九路军的抵抗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表现，它对工人阶级影响只是一种欺骗的作用”，“没有丝毫抵抗主义或半抵抗主义的气息”，指责他对十九路军的“歌颂”和“原谅”“必然增加工人阶级对十九路军乃至其他左派资产阶级的幻想，充分表现尾巴主义的精神，必须严厉加以纠正”。他们特别猛烈地抨击所谓“共同行动”的策略“彻头彻尾是机会主义”，是“引导无产阶级和广大群众服从自由资产阶级当苦力”的“尾巴主义机会主义的道路”，“汇合苏维埃区域的红军占领城市”是“投降了斯大林派的

主张”。

对于这些批判,陈独秀撰文给予了严厉的谴责和回击。他认为拿什么“大同主义”、“打破国界”、“不要祖国”、“反对狭义的爱国和虚伪的民族主义”等等“高尚的理想”来反对对日宣战,“实际是反动的”。^①他还详细分析、严厉批判了这种反动的极“左”思潮,指出主张什么“工人无祖国”、“笼统的反日和对日宣战、救国、爱国,都是救资产阶级的国”等“不是我们的阶级立场”。他认为:“我们应该积极地领导中国的爱国运动,应该用我们的纲领领导爱国运动而充实其内容,一直到夺取政权。”^②同时,他以“常委”的名义,“警告法南区委扩大会议及一切同志:我们万分不应该因反对斯大林派全然不顾客观环境的盲动主义,遂走到客观主义取消主义之另一极端;我们万分不应该因为反对斯大林派依靠农民来代替无产阶级执行革命任务的错误,遂走到对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估量过轻之另一极端”。他解释说:所谓“共同行动”,是指特定事件之一时的协作,而不是长期的政治联盟;所谓“共同行动者”,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党派,其次才是资产阶级的自由派,而不是整个资产阶级。他认为:马克思、列宁、托洛茨基主张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是反对与资产阶级政党混合,“并不反对两党利害一时一致时,有一时的联合”;“我们是否做资产阶级的苦力,要看我们是否有独立的组织和政策,不在于拒绝任何共同的行动”。最后,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陈岱青、刘仁静等人曲解和反对常委决议案,反对“共同行动”的策略,是为了“辩护他们认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已经是我们主要敌人这一错误的观察”,而反对与苏维埃红军“汇合”则是“走到等待主义的道路”。

但是,法南区委仍然坚持反对陈独秀托派常委的意见和政策,甚至发展到拒绝执行常委的指令。在屡次“警告”不灵的情况下,陈独秀最后不得不采取组织手段,先是撤销陈岱青区委书记的职务,后又解散了法南区委。

托派组织北方最大的“北方区委”也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并因此分裂成两派:一派是以汪泽楷为书记的“旧临委”,一派是以任曙为书记的“临时工作委员会”。陈独秀采取了各打50大板的做法,3次作出决议,一面批评原北方区委执行的是“取消主义和等待主义的路线”,一面又批

^① 《论对日宣战与排货》,载《热潮》第1期。

^② 《被压迫的无产阶级应不应该领导爱国运动》,载《校内生活》第3期,1931年11月28日。



评“新临委”“极左”及分裂组织的错误,要二者在纠正错误的基础上立即合并统一,但遭到双方的共同抵制。陈独秀一看无法,便干脆取消“北方区委”,成立“北方特委”,但还是受到抵制,只好两度改组“北方特委”,仍无法平息两派的隔阂。最后他不得不提出,对于常委的决议,“必须绝对执行……否则即以违反纪律论”。^①他甚至说:“谁表示不干,就让谁滚出去。”

陈独秀之所以如此“十二道金牌”迅速坚决地处理这个纠纷,压平不同意见,是因为他估计北方的政治形势“在最近将来很有剧变之可能,就是日人很有攫取热河,甚至进攻平津之可能”。所以,他要求北方组织要迅速健全起来开展工作,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变化。

在这里,陈独秀再次显示了他对政治形势观察敏锐的卓越才能。不久,1933年初,日本就侵入热河,冯玉祥组织察北同盟军进行长城抗战,而国民党政府与日本达成《塘沽协定》。到1935年,日本又制造了华北事变,想夺取平津,学生奋起救亡,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

可惜的是,虽然陈独秀满怀激情,渴望乘抗日民主运动的高潮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再次大干一场,但由于托派内部四分五裂、相互攻击、各自为政、令行不止,他的政治主张无法顺利贯彻实施。

历史是这样惊人的相似。当年他以分裂的形式向中共中央提出抗议,当他担任托派组织总书记后,尽管一再强调组织纪律,但没想到他的部下也以类似他对中共中央的态度和方式来对待他本人了,这对他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中国共产党尽管经受了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统治,党的工作也遭受严重挫折,甚至出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等高级干部叛变的事件,尤其是在王明以不正常的手段篡夺党的领导权的时候,李立三和瞿秋白被撤职,罗章龙被开除党籍,出现了这样严重的政治路线分歧和党内斗争,但由于中国共产党始终强调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强调严肃了政治组织纪律,不但没有造成党组织的分裂,从整体上说,反而越来越发展壮大,坚强有力。在苏区,各路红军接连粉碎了蒋介石3次“围剿”,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等根据地迅猛发展,已成燎原之势。尤其是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范围扩大到28个县,总面积有5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250多万。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

^① 《常委对于北方问题的第三次决议》,载《校内生活》第4期,1932年6月27日。





1931 年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

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革命道路,为中国共产党日后的发展壮大乃至最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干部上和军事实力上的坚实基础。这和始终处于四分五裂状态下的托派组织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对于陈独秀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刺激。

1932年5月,由于狱中流行传染病,原托派“中委”濮德志、宋逢春等人保外就医。陈独秀几经催促,又把2人拉回来,加上自己和彭述之、罗世藩共5人,重新组织起托派中央临时委员会,陈独秀仍任总书记,谢德盘为秘书长,准备重振旗鼓,东山再起。

6月15日,陈独秀致函托洛茨基,报告了中国托派重整组织的情况以及九一八事变后采取的与左倾的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苏维埃红军、义勇军“建立联合战线”的策略,并请求对今后工作的指示。

9月22日至10月3日,托洛茨基两次给陈独秀回信,坚决反对和阻止陈独秀与中共“合作”的策略。但是,上述信件陈独秀已经无法收到。10月15日,陈独秀因为叛徒出卖,突然在上海家中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托派临时中央委员会常委的其他成员彭述之、宋逢春、罗世藩、濮德志和秘书长谢德盘。至此,陈独秀苦心经营的“临委”遭到毁灭性的打击。

这是陈独秀革命生涯中的第五次被捕,也是最后一次被捕。前几次被捕,经过多方营救,都很快获释,这一次他却被判刑,从此开始了长达5年之久的铁窗生活。



第

十

三

章

陈独秀在法庭上以三军不可夺志的气魄，高举自由、独立、解放的大旗，自撰辨诉痛斥国民党政府卖国腐败和专制独裁，义正辞严，脍炙人口，字里行间闪烁着五四精神的光芒，一时为进步青年所争相传诵。

五十九

陈独秀是1932年10月15日在上海岳州路永兴里11号家中被捕的。当时他正患胃溃疡，已经卧床两天没有出门。晚上7时左右，几名捕快突然闯进屋里，翻箱倒柜，搜出大量中、日、俄3国文字的托派文件，于是不由分说，将他押上囚车，带到嘉兴路租界巡捕房。进门后陈独秀才发现，彭述之、谢德盘、罗世藩、濮德志、宋逢春5人已关在里面，便笑道：“我以为就逮了我一个人，没想到你们都先来了。这下我们可以在这里开常委会了。”



陈独秀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托派成员的活动不慎和叛徒出卖所致。

原来，有一天，濮德志的爱人张颖新在路上碰到过去在莫斯科留学时的同学费克勤，便约她到家中玩，那天正好陈独秀借濮家约见友人，叫费克勤遇上，濮德志警惕性比较高，第二天马上搬家，可他不知道，费克勤回国后即被逮捕，叛变投敌。这次濮德志虽然搬了家，但已被中统严密监视。

10月15日下午，濮德志去东有恒路春阳巷210号托派中央常委秘书长谢德盘家开会，特务跟踪而至，来了个紧急搜捕，将正在开会的濮德志、彭述之、





90 陳独秀

1932年入狱时的陈独秀

谢德盘、宋逢春、罗世藩当场全部抓获。由于谢德盘被捕之后马上叛变招供,导致因病卧床在家的陈独秀当天晚上也被逮捕。到第二天,同案被捕的托派成员达到11人,其中包括陈独秀、彭述之、宋逢春、罗世藩和濮德志在内的5个全部“临委”成员。

虽然国民党知道陈独秀此时已是中国共产党的反对派首领,但是他们认为这只不过是共产党内部的路线斗争,而陈独秀在“九一八”、“一·二八”时期进行的“反日反国民党”活动,与共产党在农村进行的苏维埃运动如出一辙,都是反对国民党统治,没有本质的区别。在蒋介石看来,陈独秀仍然是危害民国的“赤党”头目。所以,陈独秀这次被捕,被称为捕到了“久缉未获之共产党领袖”,于是大肆进行宣传。

10月17日,陈独秀一行被押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受理,从他们家中搜出的10箱文件书籍也随汽车送到。11名托派成员每人胸前缀一个号码,因陈独秀是第六个被捕,故编号为“6”。

10月18日,陈独秀被引渡到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同日,《申报》刊登了“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等被捕”的消息。

上海市长吴铁城对如何处置陈独秀不敢擅自作主,便用快电报告了南京行政院。

10月19日,南京政府电令将陈独秀、彭述之两人谨慎押解南京。

是日夜晚,上海公安局临时安排保安大队一个排兵力在上海北站特别警戒。晚11时,陈独秀、彭述之被押上一专列车厢严加看守,向南京方向急驰而去。

陈独秀对彭述之说:“到南京恐怕凶多吉少。”

彭述之问:“为什么?”

陈独秀笑道:“你真是个愚夫子,在上海我们是民事法庭,到南京便归军事法庭,而且国民党自‘清党’以来,凡捕获的著名共产党人,莫不格杀勿论,从不进行任何形式的审判,这次十有八九要判死刑了。”

这一夜,彭述之心情沉重,无法入眠,而陈独秀却“酣睡达旦,若平居之无事者然”,到南京下关后还未醒来,当押解特务把他叫醒后,他还慢慢地伸胳膊打哈欠,处乱不惊,泰然处之,置生死于度外。此等“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的境界,一时传为美谈。^①

次日凌晨,火车到达南京,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特派专人到车站接车,将陈独秀暂交军政部军法司收押,等待蒋介石的裁决。

^① 《我对于陈独秀先生的印象》,摘自《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陈独秀的被捕,成为轰动一时的大案,社会舆论十分复杂。

一些国民党文职人员和社会名流知识分子主张从宽处理。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联名致电南京政府,鉴于陈独秀与工农红军实无联系,呼吁“矜怜耆旧,爱惜人才,特宽两观之诛,开其自新之路”。胡适致电蒋介石,要求“将陈独秀案付司法审判”而不由军法处理。柏文蔚专程进京,探询国民党政府对陈的处置态度。宋庆龄专门由上海到南京,旋又飞汉,为陈独秀事,欲访蒋介石夫妇。国际知名人士杜威、罗素、爱因斯坦等人也致电蒋介石,要求从宽处理。陈独秀北大时的学生傅斯年则公开发表文章,称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主张处置陈案应“考虑陈氏一生行迹,及近二十年来中国革命历史”,“希望政府将此事交付法院,公开审判”。

国民党军界和地方党部中的极右派却纷纷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党部,竭力主张对陈独秀“处以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托派组织则号召“中国的革命群众和一切左翼的社团,一切革命分子都应该立即起来,游行、示威、通电、开大会,坚忍不拔地为援救陈独秀而斗争”。

中共方面态度暧昧,没有做公开表态,但其内刊却著文认为,陈独秀被捕后,“蒋介石不一定念其反共有力网开一面许以不死……或者还会因祸得福做几天蒋家官僚呢”。《世界日报》曾经刊登一幅漫画:主人公是受尽皮肉之苦的陈独秀,共产党一拳把他打伤了,国民党两拳把他打昏了。

鉴于社会各界的不同反应,蒋介石在如何处置陈独秀的问题上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当时蒋介石正以50万大军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第四次“围剿”,为“剿共”事驻汉口行营。10月22日,他特令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派员赴汉当面向他报告捕获陈独秀经过,并携去捕获的各种重要文件,他要亲自审查和鉴别陈独秀目前从事的反蒋活动到底和中共有多少联系。同时,他也电令南京将叛徒谢德盘押解汉口,询问陈独秀与江西红军的关系。当认定陈独秀确实与中央苏区和中央红军无关后,蒋介石这才最后采纳了胡适等人的意见,认为陈独秀所犯之罪,系危害民国之生存,国家法律对此已有明确规定,为维持司法独立之尊严,可交法院公开审判。

10月25日下午,国民党军政部长何应钦招呼军法司长王振南在军政部会客厅传询陈独秀。^①

^① 《晨报》1932年10月27日第3版,摘自《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何应钦与陈独秀早在大革命时期就彼此熟悉，但那时因为信仰不同，没有过多的直接交往。现在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军政部部长，一个是生死未卜的阶下囚，这使两个人的会面带有一种特殊的意味，陈独秀后来称之为“半谈话半审讯式的”。

何应钦道：“陈先生这次被捕，各地党部纷纷来电要求严办，军方反响尤为强烈，这对先生十分不利呀。”

陈独秀哼一声：“独秀自投身革命那一时起，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只盼蒋介石早日成全我。”

何应钦道：“蒋委员长十分爱惜先生的才华，也珍惜与先生昔日的友情，怎会干出此等无情无义之事，反而是江西共匪似乎对先生被捕之事无动于衷，甚至幸灾乐祸呀。现在看，先生虽然已被共党除名，然先生毕竟是赤匪的创造者、始作俑者，照现行法规，似应正法，而无活命之可能。好在先生并非现役军人，且犯罪地点核与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七条前段规定不合，因而蒋委员长念你过去之贡献，特从武汉回电，将先生之案交地方法院公开审判，以示司法尊严。”

陈独秀道：“如此我倒要感谢蒋先生的不杀之恩喽。”

何应钦道：“感谢倒也不必，只是希望先生好自为之，从此能够真正和江西共匪划清界线，这才是国人之幸、先生之幸。”

陈独秀冷冷地道：“赣鄂共产党暴动均为干部派指挥，与我无任何干系。这一点请何先生放心，到时候我自会在法庭上阐明我与中共的政治分歧。”

何应钦碰了一个软钉子，很觉没趣，便转了话题，道：“听说陈先生的字近来越发炉火纯青，可否为兄弟题字留念？”

陈独秀也不推辞，提笔写道：“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何应钦明白陈独秀是在以字言志，心中恼火，但又不便表露出来，只得假笑着道：“好字，好字。果真是名不虚传，不愧是文学泰斗。”

会谈结束时，发生了一幕连陈独秀自己也不曾料到的情景。他刚走出军政部大门，突然有许多青年军官一窝蜂围上来，请他题字，其热烈场面犹如今日之追星。陈独秀大为感动，欣然挥毫，接连写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和“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条幅，借此抒发了自己的胸怀，表现了威武不能屈的气节。

1933年1月7日，陈独秀在给友人信中描述了当时的场面：“弟在军政部受何应钦半谈话、半审问后，许多青年军人纷纷持笔墨和数寸长之小纸条、索书纪念，情意殷殷（充满同情心，毫无敌视表示），令人欣慰，四



面包围(长官不能禁止),弟真应接不暇,幸而墨尽,才能解围。”^①

1932年10月26日,陈独秀、彭述之两人被移解到江宁地方法院,以备押到位于苏州高等法院公开审判。后来国民党中央政府考虑到押解到苏州有所不便,决定正式审判在位于南京市的江宁地方法院执行。

由于陈独秀名头太响,又常有国民党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前来探望,他在江宁看守所候审期间生活得倒也安逸,破例允许他看书并和外界书信来往。然而,也正是因为他的名头太响,案件又十分复杂,苏州高等法院谁也不愿审理这件既没油水,还要上下受气、挨人咒骂的倒霉案件,于是采取了来回推磨的办法,结果这一推就是半年多。日子久了,陈独秀竟然闲得烦了。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以为也许还是大辟爽快一点!”

对他这样豪爽的性格,有人大为欣赏。《大众报》发表短文认为,蔡元培等人积极营救陈独秀实在是多此一举,“陈独秀是一个领袖,自有他的信仰和风格,所以只须给予机会,叫他堂堂正正地公开申述,这正是尊重爱护他的道理。如果用哀恳式的乞怜,在法律以外去营救他,倒反转辱没了这位有骨头有意识的老革命家”,因此“大家应当成全陈独秀”。



六十

陈独秀的案件拖到1933年春天终于有了结果,高等法院煞有介事地组成了一个法庭,准备公开审判陈彭一案。

1933年4月14日上午,江宁地方法院在法刑二庭第一次开审陈独秀等人。审判长胡善称和检察官朱隽升座。辩护律师是陈独秀的挚友章士钊。^②

自从陈独秀案交法院审理消息传出后,蔡元培、胡适等人都曾向他推荐过辩护律师,但都被他谢绝了。章士钊听说后,专程从上海赶到南京,自告奋勇地义务任他的律师。没想到陈独秀却对传信人吼道:“我已与此人绝交,不见!”

章士钊,字行严,1881年生于湖南,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编,参加黄

^① 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手稿)。

^② 《陈独秀开审记》,载《国闻周报》第10卷第17期,1933年5月1日出版,转引自《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兴创办的华兴会。后到日本、英国学习法律。辛亥革命后回国，任同盟会机关报《民主报》主笔，首任孙中山广东政府秘书长。1933年起在上海做律师。

章士钊是陈独秀早年的诤友。1903年《苏报》案后，两人曾一起创办《国民日报》。1914年，陈独秀又在日本协助章士钊办《甲寅》杂志。那时，两人朝夕相处，志同道合，宣传新思想。陈独秀在《存歿六首绝句》中，曾以“章子当年有令名”的诗句赞扬章士钊。但是，当章士钊做了段祺瑞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后，两人便少有往来。特别是1926年北京发生了震惊全国的三一八惨案，章士钊充当了段执政镇压学生运动的帮凶，陈独秀更是义愤填膺，马上便给章士钊发了一封快信，将他痛骂一顿，宣布和他绝交。1927年，章士钊复活《甲寅》周刊时，陈独秀更是嬉笑怒骂，绝不留情。他发表文章骂道：“章士钊拿了黄兴的钱办《甲寅》，也只能算是放狗屁。后来拿了段祺瑞的钱，便是狗放屁。现在拿了张宗昌的钱办《甲寅》，更是放屁狗了。放狗屁的毕竟还是一个人；狗放屁固然讨厌，或者还有别的用处；放屁狗只会放屁，真是无用的废物。”其实章士钊当年办《甲寅》时，陈独秀本人就是他的重要助手，现在一时气愤，骂起人来，连自己也带进去了还不觉得。不过，章士钊倒是十分有涵养，从未公开辱骂陈独秀，相反，当一些思想保守的青年学子在《甲寅》周刊上刊登文章批评陈独秀时，反而劝说青年学子，对于当世名儒大师，“不必因取舍而定毁誉”。这便是章士钊与陈独秀待人接物的不同。

尽管两人早已分道扬镳，但是私人友情尚在。所以，这次陈独秀被捕，章士钊不计前嫌，毛遂自荐，赶到南京主动要求为陈独秀辩护，没想到陈独秀拒绝见他，便不顾一切冲进看守所，劈头就问：“为何不见？为兄辩护，只尽义务，不收铜板！”陈独秀道：“倘若弃暗投明，我欢迎你这样来为我辩护！”章士钊见陈独秀性命都难保，还要他投降，大为感慨，便赋诗一首，曰：“王气只今收六代，世家无碍贯三孙，廿载浪迹伤重到，此辈清流哪足论？独有故人陈仲子，聊将糟李款牢门。”他对陈独秀的为人表示了无限的钦佩。两人从此重归于好，私人友谊一直保持到陈独秀去世。

开庭这天，闻讯前来参加公审的各届人士百余人，挨肩擦背，挤满了旁听席。

社会各界之所以如此关注陈独秀这次审判，一方面是由于自五四以来他所处的重要历史地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目前所处的尴尬地位。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但现在他已经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成



为中共反对派的总书记；拘押他的当局是过去曾与中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国民党，而现在国共两党正在进行第四次军事“围剿”与反“围剿”的殊死争斗。陈独秀在两军对垒、激烈残酷的国内战争中处于一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他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同时也反对中共所执行的革命路线；他既不容于国民党，也不容于共产党。如果说这时的陈独秀是中共的异端，那么他也绝不是国民党的同伙。他没有因为反对中共革命路线而被国民党奉为上宾，飞黄腾达，也没有因为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被共产党重新接纳。这是一种非常尴尬的政治地位。在生死关头，他将怎样对付这次审判？是做蒋家的走狗，还是坚持他既有的政治立场？许多人都拭目以待。因此，这次公开审判就格外引人注目。当时报界曾登文评论道：“陈独秀被捕，乃是目前中国政治史上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件……全国青年以及党中人，无论其近来思想变化如何，他们在过去的时候大半都受过陈独秀的影响，因此，对于今日的陈独秀案也就加以特别的注意。”

上午9时，陈独秀被带进法庭，只见他面色红润，已无病容，站在被告席前后，四面瞻顾，神情自若。

检察官朱隽首先宣读起诉书。起诉书以陈独秀“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中央执行常委委员首席，是一党之主脑”为由，说“其个人行动及发表之反动文件应负责任……即以中共反对派名义刊行之反动传单、宣言书及其指挥之行动，亦应由其完全负责”。起诉书列举了陈独秀近年来发表的一系列文件、文章，是“一面借口外交，竭力宣传共产主义，一面则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讽，肆意攻击，综其要旨，则谓国民党政府威信堕地，不能领导群众，应由其领导农工及其无产阶级等，以武装暴动，组织农工军，设立苏维埃政权，推翻国民党政府，由无产阶级专政，并欲打倒资本家，没收土地，分配贫农”，“其意在危害民国，已昭然若揭。唯查共产党进行之程序，原有组织团体、宣传主义、武装暴动、设立苏维埃政权等各阶段。察检被告所为，仅只共产主义宣传，尚未达于暴动程序，则证凭确定，自应令其负责”。起诉书最后决定以“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二条第六款对陈独秀等人起诉。^①

宣读完起诉书后，审判长胡善称问道：“被告，你为何要组建共产党？”

^① 《陈独秀等危害民国案起诉书》，载陈东晓编《陈独秀评论》，1933。转引自《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陈独秀站起来,不慌不忙地道:“我今年已经 55 岁了。自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抗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者,于今 30 余年。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走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为什么会发生这个转变呢?这是因为一战后受十月革命之感召和世界大势之所趋,使我不得不有此转变。”

说到这里,陈独秀开始激动起来:“试看今日之半殖民地的中国、经济落后的中国,外困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内困于军阀官僚。自辛亥革命以来,共和招牌高悬,实则一事无成,而连年军阀混战,都以争夺地盘、搜刮人民为目的,弄得工业凋敝,农村破产,国家将亡,民不聊生。众所周知,中国推翻帝制的革命,先于苏俄 7 年。而今日二者之荣枯,几不可比拟,这不能不令有志之士深思。我不忍眼见中国人民辗转呼号于帝国主义与军阀两重枪尖之下,而不为之挺身奋斗。求民族解放、民主政治之成功,绝非懦弱的、妥协的上层剥削阶级全躯保妻子之徒所能完成以血购自由的大业,唯有最受压迫、最革命的工农劳苦人民与全世界反帝国主义、反军阀官僚的无产阶级势力联合一起,以革命怒潮,对外排除帝国主义之宰割,对内扫荡军阀官僚之压迫,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与统一、发展经济、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才有可能得以实现。这就是我于五四运动以后开始组织中国共产党之原因。”

胡善称又问:“你组建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陈独秀毫不隐瞒地说:“自然是实现无剥削、无阶级,人人‘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自由社会。共产主义在经济学上是一种比资本主义更高度发展的生产制,这就好比资本主义较高于封建生产制一样。这种生产制,绝非空想主义的‘乌托邦’。经济落后的俄国,已有初步试验,并且获得初步成功。试看今日全世界所有资本主义生产制的国家无不陷于经济恐慌的深渊,只有苏俄日渐繁荣,这就雄辩地证明共产主义的生命力。”

胡善称拍案喝道:“不要进行赤色宣传。我再问你,你们当前的任务是什么?”

陈独秀不慌不忙道:“中国共产党目前的任务主要有 4 项:一是反抗帝国主义以完成中国独立。现在中国的海关、矿山、工厂、金属、交通等经济命脉都直接、间接地宰制在帝国主义之手,列强的军队威吓着全国大都市,日本更是以武力强占了中国 1/5 的领土,若非采取革命行动,击碎这些宰制我们的镣锁,中国民族的大业将无自由发展之可能。二是反



抗军阀官僚以实现国家统一。军阀官僚,危害极大,他们肆意发动内战以破坏经济,任意增加苛捐杂税以饱私囊,随便制定法律以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甚至自由乱种、贩卖鸦片以毒害人民。军阀官僚政治如不彻底肃清,所谓国家统一,所谓民力伸张,所谓抵御外患,所谓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一切都无从谈起,中国将终于是半殖民地,终于落后而已。三是改善工农生活。在农业的中国,农民之衰落,无疑等于民族之危亡。倘若不没收地主的土地归诸农民,农民终岁勤劳只能供地主之剥削,则不独无以挽回农业之衰及农村之破产,进而直接影响到城市工商业。四是实现彻底民主的国民立宪会议。况当外患空前之今日,人民无组织即无力量,无政治的自由即无责任心,亦不应科以责任。若不立即实现全国人民的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等完全自由,实现普选的、全权的国民立宪会议,以制裁卖国残民的军阀官僚,一切政权归诸人民,集合全国人民的力量以解决全国危急问题,其何以立国于今日!这就是共产党为中国民族利益,为中国劳苦人民利益而奋斗的大纲。我从来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共产党不是少数人的英雄主义,更并非阴谋分子的集团,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的政党。我前之所思所行,即此物此志;现在及将来之所思所行,亦此物此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一息尚存,便要为之挺身奋斗!”



胡善称道:“你既如此顽固不化,为什么反被共产党开除?”

陈独秀道:“因和斯大林派意见不同。”

胡善称道:“既被开除,为何还要打倒国民政府?”

陈独秀道:“我确实已被中共开除,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为何还要坚持打倒国民党政府,理由可以分3点,简单说明之:一、现在国民党政治是刺刀政治,人民既无发言权,即国民党员亦无发言权,不合民主政治原则。二、中国人已穷至极点,军阀官僚只知集中金钱,存放于帝国主义银行,人民则困苦到无饭吃,此为高丽亡国时的现象。三、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接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根据以上三点,人民即有反抗此违背民主主义与无民权实质政府之义务。”^①

这次审讯,一直持续到中午时分。第二天,继续开庭审判,胡善称只是随便询问几句,便草草收场。陈独秀知道,真正的较量是在最后的法庭审讯。

^① 《陈独秀辩诉状》,引自《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六十一

1933年4月20日,江宁地方法院第三次开庭,也是最后法庭审讯。根据法律程序,这次开庭允许律师辩护和陈独秀等人自辩,因此旁听的人特别多,不少人专程从镇江、无锡、上海赶来,法庭容量有限,不得不按先来后到的顺序签发旁听证,进不来的只好站在庭外。一时间,法庭门厅、过道、窗外、记者席都挤满了人。

上午10时40分,法警将陈独秀等10人带上被告席。

审讯正式开始后,先由朱隽宣布陈独秀等人的法庭审问结论。朱隽闭着眼睛、拖着长腔说:“被告陈独秀等人被中共斯大林派开除后,并非完全脱离共产党。托洛茨基派和斯大林派的争论分歧都是共产党内部问题,在法律点上,他们主张打倒国民政府和无产阶级专政,是一样的目的,都是共产,都是危害民国。所以被告负有两个责任:一、组织左派反对派是主脑,被告个人之言论著述当然亦要负责;二、宣传部分,他们有一个系统,向一个目标进行,著作很多,被告当然亦要负责。综合所述,被告实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第六条及第二条第二款。”

朱隽宣布讯问完毕后,胡善称问:“被告是否尚有抗辩?”

陈独秀道:“有抗辩。”

胡善称道:“既有抗辩,请讲。”

为了应付这次审讯,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朽、反动本质,对国民党进行合法斗争,早在2月20日,陈独秀就撰写好了一份书面的《辩诉状》,除了送交国民党的法院之外,还设法将底稿送出监狱,让友人在社会上广为传扬和印发。文中慷慨陈词,阐发了自己平素的政治主张,扼要地总结了自己一生中追求救国真理的历程,指出中国革命的终极目的是实行共产主义,更列举大量事实,征诸中外古今,来证明国民党政府的腐朽与反动,是一篇既辩护自己又攻击敌人的杰出文献。自辩则义正辞严,攻敌则尖锐有力,虽然经过“托陈取消派”的侵蚀,仍以其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和泼辣酣畅的激扬文字,再现了五四时期的勇敢精神。

此时,陈独秀大声道:“今天国民党政府因为我始终尽瘁革命之故,而加以逮捕,并定我的‘危害民国’及叛国之罪,我不但绝对不能承认,而且政府之所控者,恰恰与我所思所行相反。国者何?土地、主权、人民之总和也,此近代国法学者之通论,绝非所谓‘共产邪说’也。以言土地,东



三省之失于日本，岂独秀之责耶？以言主权，一切丧权辱国条约，岂独秀签字者乎？以言人民，余主张建立‘人民政府’，岂残民以逞之徒耶？若谓反对政府即为‘危害民国’，此种逻辑难免为世人耻笑。再说‘叛国’，何为叛国？卖国于外敌，毁坏民权之内政，才是‘叛国’。若认为在野党反抗不忠于国家或侵害民权之政府党，而主张推翻其政权，即属‘叛国’，则古今中外的革命政党，无不曾经‘叛国’。即国民党亦曾‘叛国’矣。孙中山、黄兴曾反对清廷和袁世凯，而后者曾斥孙、黄为国贼，岂笃论乎？如认为反对政府即叛国，就是危害国家，那么孙中山、黄兴岂非已叛国两次，此荒谬绝伦之见也。”

这时旁听席上发出一阵笑声。胡善称忙喝道：“旁听者不得喧哗，被告陈独秀不得有鼓动言辞。”

陈独秀说：“你不要我讲话，我就不讲了。那何必还要装模作样搞什么辩诉程序呢，干脆判我刑就是了，岂不痛快。”

胡善称忙说：“不是不要你讲话，是要你言辞检点一些。当此国家内忧外患之际，我们要万众一心，上下一致，精诚团结，共同御敌，不要计较一些枝节末梢、鸡毛蒜皮。”

陈独秀接着说：“刚才你说团结，这是个好听的名词，不过我觉得骑马者和马讲团结，马是不会赞成的，它会说你压在我身上，你相当舒适，我要被你鞭打还要跑，跑得满身大汗，你还嫌慢。这种团结，我敬谢不敏。”

旁听席顿时又爆发了哄堂大笑。

胡善称哭笑不得，只得说：“讲你的辩诉，不要讲骑马不骑马的了，它与本案无关。”

陈独秀道：“好，闲话休提，书归正传，我遵命讲我的辩诉了。若说‘叛国’，若说‘危害民国’，确实大有人在。请看今日之国民党，对日本侵占东三省，始终节节退让。抵抗徒托空言，且制止人民抵抗，摧毁人民之组织，钳制人民之口舌，甚至驯羊般跪倒日帝之前媚颜投降，宁至全国沦亡，亦不容人有异词、家有异说，而我则主张由人民自己扩大其组织与武装，对帝国主义进行民族解放战争，以解决东北问题，以完成国家独立，试问谁为‘叛国’？再看国民党政府，以党部代替议会，以政权代理民权，以特别法（如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及出版法等）代替刑法，以军法逮捕、审判、枪杀普通人民，以刺刀削去了人民的自由权利。视自己为诸葛亮与伊尹，斥人民为太甲，而我则力争表现民主共和国实质的人民自由权利，力争实现普选全权的国民立宪会议，力争民主制扩大至其历史的



最高阶段,过去、现在及将来都无篡夺民国为‘党国’之企图,试问谁为‘危害民国’?

若认为加入共产党即属犯罪行为,则欧美民主国家均无此事,各国中之共产党人莫不有集会、出版、参加选举之自由权利,与一般人民无异;若认为人民发言反对政府或反对政府中某一个人即为有罪,则远在两千年前周厉王有监谤之巫,秦始皇有巷议之禁、偶语之刑,汉武帝更有腹诽之罚,那时没有言论自由无足为奇,而20世纪之民主共和国,似乎不应有此怪现象;若认为宣传共产主义即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即为‘危害民国’,此乃欧洲中世纪专横黑暗的宗教法庭迫害异教徒、迫害科学家以阻塞思想信仰自由之故事,岂容复见于今日之民国!

总之,我生平言论,无不光明磊落,无不可以公告国人。予固无罪,罪在以拥护中国民族利益、拥护大多数劳苦人民之故,开罪于国民党而已。今之国民党所仇视的并非帝国主义,而是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军阀官僚、始终致力于民族主义革命的共产党。如今日本帝国主义方夺取山海关,急攻热河,而国民党军队却向江西集中,其对待共产党人,杀之、囚之犹以为未足,更师袁世凯之故智,威迫利诱,使之自首告密。此并不能消灭真正共产党人,只以破灭廉耻导国人耳。冤狱世代有之,但岂能服天下后世。余身许工农,死不足惜,唯于法理之外,强加余罪,则余一分钟呼吸未停,亦必高声抗议。法院若思对内对外维持司法独立之精神,即应毫不犹豫地宣告予之无罪!”^①



六十二

陈独秀抗辩完毕,章士钊立刻从律师席上站起,开始为陈独秀做了长达53分钟的辩护。他的辩护词洋洋5000余言,逻辑严密,分3层,针对起诉书以及审讯事实,逐款批驳了检察官加给陈独秀的罪名:

第一,陈独秀“肆意攻击国民党政府”并不构成犯罪。章士钊首先指出:陈独秀一案,必须要区分言论与行动。近代文明国家,莫不争言论自由。所谓言论自由,主要是指公的方面。在私的方面,个人的言论自由是不得诽谤攻击他人的;而在公的方面,任何一个执政党的方针政策、作为,都是人民评说的对象,“以言论反对或攻击政府,无论何国,均为不

^① 《陈独秀辩诉状》,转引自《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罪。即其国应付紧急形势之特别法规,亦未见此项正条”。起诉书以陈独秀“对于国民党政府冷讥热骂,肆意攻击”入罪,可谓不明公私之别,其理论“无中无西,无通无别,一切无据”。

第二,陈独秀要推翻国民党政府并不构成犯罪。章士钊指出:在民主国家,政权是可以从一个政党手中转移到另一个政党手中的,“移之者绝不以为咎,被移者亦从不以为耻”。民主国家的反对党就是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夺取政权有两种形式,一是通过合法选举来推翻政府,一是通过暴力革命来颠覆政府。从法律上说,颠覆有罪,而推翻无罪。陈独秀主张的是通过选区争取选民来推翻政府,因此以推翻政府而定陈独秀有罪,滑稽可笑。又,起诉书指控陈独秀主张“应由其领导农工及无产阶级等,武装暴动,组织农工军,设立苏维埃政权”。对此,章士钊说:其一,陈独秀所说的“暴动”,与国民党打倒北洋军阀所用之策略完全相同,而与杀人放火则风马牛不相及。其二,陈独秀所说的暴动,只是“应”如何而已,“是理想,不是事实”,只是将来之规划,非现在之行为。而且陈独秀一再供称力量不足,并无何项暴动,亦始终未曾参与江西的红军。法律只讲现在,不课将来。章士钊接着指出:孙中山在世时“即倡言共产主义者也”。“若州官可以放火,百姓不能点灯,绳之法律平等之谊,又焉可通?”故以行为论,法律不能科陈独秀之罪。

第三,陈独秀并未叛国,也没有危害民国。章士钊提出的理由是:其一,国家与主持国家之机关(即政府)与人物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攻击主持机关或人物之言论,遂断为危及国家,于逻辑无取,即于法理不当。其二,起诉书将陈独秀鼓吹共产主义,欲打倒资本家,没收土地,分配贫农,列为其危害民国之罪证,同样不能成立。他认为:陈独秀的共产主义与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本如一鼻孔出气”。孙先生讲民生主义,开宗明义就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又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所以我们对于共产主义,不但不能说是和民生主义相冲突,并且是一个好朋友。”又说:“国民党既是赞成三民主义,便不应该反对共产主义,因为三民主义中之民生主义大目的,就是要众人能够共产。”章士钊进一步指出:“今孙先生之讲义,全国弦诵,奉为宝典,而陈独秀之杂志,此物此志,乃竟大干刑辟,身幽圜圜。天下不平之事,孰过于斯?”又,起诉书指责陈独秀“打倒资本家,没收土地,分配贫农,其词背谬,显欲破坏中国经济组织、政治组织”。然而孙中山民生主义第一讲便说:资本家和工人的利益,总是相冲突,不能调和,所以便起战争。最好是分配之社会化,消灭商人的垄断。“同盟会之



四大政纲,第四即曰平均地权。既曰平均,当曰分配,后有分配,其先必有没收。没收者何?取之地主之谓。分配者何?给与贫农之谓。孙先生平均地权之策,至今迄未实行,唯其如是,故孙先生时时以‘革命尚未成功’一语强聒于众。盖平均地权之业,须以革命之力成之,理势则然也。”章士钊责问:“孙先生之革命,与陈独秀之暴动,一贯之论尔。孙先生之书,既为国人所诵习,即其革命方略,亦谆嘱同志努力为之。独陈独秀以含义悉同之‘暴动’字样,乍一启口,陷阱生焉。”其三,陈独秀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理由是:这个政府实行刺刀政治,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搜刮手段层出不穷,贪官污吏横行,民生破产;抗日无诚意。这些论调与共产党无关,只是一般的讥切时政的言论,这样的言论即便是专制时代,专制皇帝也可能不但不责怪,反而优旨嘉奖的。可是,在中华民国,陈独秀同样的言论,却成了罪状,国民党何以面对天下后世?

第四,为了证明陈独秀不仅没有危害国民党,反而对国民党有功,章士钊说:陈独秀在国共合作中,“其地位与当今国民党诸要人雅无二致”,也曾经在《汪陈宣言》中苦口相劝“主张打倒国民党的人”。而且陈独秀“党籍之被开除,与联合汪精卫发表宣言一事之不见悦于莫斯科干部人物,不无草蛇灰线、因果相导之迹,明眼者不难一目得之”。特别是“清共而后,独秀虽无自更与国民党提携奋斗,而以己为干部派摒除之故,地位适与国民党最前线之敌人为敌,不期而化为缓冲之集团。即以共产党论,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少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要无不可。即此以论功罪,其谓托洛茨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且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

第五,章士钊说陈独秀“所谓叛国危害民国”之罪皆“甚然无据”,强烈要求法庭“依据法文,谕知无罪,以保全读书种子,尊重言论自由,恪守法条之精神,省释无辜之系累”。^①

章士钊辩完,大家都暗赞辩得有理。其实明眼人看得十分清楚,章士钊之所以极力将陈独秀描绘成国民党的功臣、三民主义的信徒,说他已经和共产党分道扬镳,无非是想为他洗脱罪名,真可谓为陈独秀绞尽脑汁、煞费苦心,其严密的推理不能不让人拍案叫绝。

然而,陈独秀对国民党的法院会不会判自己有罪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借公开辩论的机会,宣传自己的主张,批评国民党政府的腐



^① 《陈独秀案开审记》,原载《国闻周报》第10卷第17期。

败,打的是一场政治战。因此,章士钊辩词中说他“有功于国民党”这一点,很让陈独秀不满。没等章士钊话音落地,他马上拍案而起道:“章律师辩护词只代表他个人意见,我的政治主张,要以我的辩护状为准。”

此话一出,顿时台下哗然。有人伸出大拇指称赞道“风骨嶙峋”;也有人不以为然,“想当英雄豪杰”,“不识时务,太倔”。

陈独秀之所以当即否定章士钊的辩词,自有他的道理和苦衷。

应该说,章士钊的辩护词在主观上是强调陈独秀无罪,殊不知,这样的立论实际上却是把陈独秀看作了“反共者”,也是把陈独秀推到了反对共产党一边。这是陈独秀无论如何不能容忍的。章士钊历数的陈独秀的所谓“功绩”,在陈独秀看来,恰恰是他历史上的耻辱、败绩。而且,他一向认为,托派“反共”与国民党反共有本质的区别;他转向托派的本意,自认为是为了“挽救”共产党,“复兴”中国革命,而且他从来就没有承认自己脱离了共产党,应该说,至死他也是信仰共产主义的。但是,他的意图和所作所为却被社会各界各政党派别完全“误解”。中共早已批判他成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反对共产党、破坏革命的工具;国民党反动政府则明白表示要利用他这个工具;他的那些老朋友也以他已“反共”为借口为其辩护,奔走营救。他被捕时,蔡元培、杨杏佛、柳亚子、林语堂等8人署名快邮代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党政府,也说“念其反对暴动政策,斥红军为土匪,遂遭共党除名”云云,他觉得即使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他要章士钊将辩护词中“托洛茨基派多一人,即斯大林派少一人,斯大林派少一人,即江西红军少一人,如斯辗转相辅为用,谓托洛茨基派与国民党取犄角之势以清共也。即以此论功罪,其谓托洛茨基派有功于国民党也且不暇给,罪胡为乎来哉”这段文字删去,别人则劝他修改供词,不要搞得太锋芒毕露。他的老朋友、国民党元老柏文蔚事后对他的儿子陈松年说:“你父亲老了还是那个脾气,想当英雄豪杰,好多朋友想在法庭上帮他的忙也帮不上,给他改供词,他还要改正过来。”就这样,陈独秀努力表现出刚直不阿、维护自己独立的政治立场,但别人都不理解他,甚至嘲讽他,这使他感到迷惑和痛苦,就像一只罩在网里的小鸟,不管他怎么挣扎,总是改变不了一切后果。他非但不能改变老朋友的想法,更改变不了国民党要利用他的企图。

1933年4月26日,江宁地方法院再次成为媒体追踪的焦点。宣判的最后时刻来到了。

下午2时,检察官朱隽宣判道:陈独秀等“乘日本之侵略,妄诋政府不抵抗,借反日救国名义,欲将建设中华民国之国民党国民政府推翻,其



反动文字之尤显著者”，但鉴于陈独秀“为刻苦深思之学者，其犯罪原因，盖由于研究社会主义误入歧途……且反对斯大林派利用土匪溃兵领导乡村农民为武装暴动，时时加以抨击……审按情节，尚可矜原，自应量子减科”，最终以“危害民国”罪判处陈独秀、彭述之有期徒刑13年，并剥夺公权15年。其他被捕者宋逢春、濮德志等各判5年、两年半不等。

法庭内一片寂静。突然，陈独秀咆哮着吼道：“我是叛国民党，不是叛国，裁决不公，我要上诉！”

律师和旁听席上的人也纷纷叫道：“判得太重。”

胡善称见势不妙，连忙宣布：“宣判结束，退庭。”

被斯诺称之为滑稽戏一样的公审陈彭案就这样结束了。

6月15日，陈独秀亲自写下《上诉状》，驳斥所谓“政府即国家”之谬说，揭露国民党政府卖国独裁种种罪行，阐明工农苏维埃政制乃“民主制之最后最高阶段”，“对待剥削阶级少数人以专政、以实现被剥削者大多数人民行使统治权之真正民主国家”；批驳法院的判罪是莫须有，“侵害思想言论自由，阻抑民主政治实现”，“于理于法两俱无当”。^①

6月22日，国民党最高法院将他的《上诉状》驳回，维持原判。

6月23日，陈独秀再次递上《再抗辩书》。6月30日，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仍认定陈独秀、彭述之犯有“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之罪，驳回上诉，但为稍稍缓和社会舆论，把两人的刑期改为8年。终判之后，陈独秀和彭述之等人马上被移送到南京第一模范监狱（又称“老虎桥监狱”）执行。从此，陈独秀开始了他5年的铁窗生活。

当无产阶级利益被资产阶级的法律侵害时，法庭就是宣告阶级利益和政治主张的政坛。这次法庭斗争，陈独秀以不久前抒发的“三军不可夺志”之气魄，高举民主自由独立解放的大旗，变被告为原告，痛斥国民党政府卖国腐败和专制独裁，淋漓尽致地发挥了这一“特殊”政坛的作用。法庭3次公审，旁听者一次甚于一次。特别是他那篇自撰的辩诉状，洋洋数千言，义正辞严，脍炙人口，文言、白话并用，极尽推敲之能事，轰动社会，一时为进步青年所争相传诵，在法庭内外产生很大的影响。事隔几十年，许多人尚能朗朗背诵。

历史过去了70多年，打开布满灰尘的卷宗，陈独秀自辩状的字里行间仍然不时闪烁着五四精神的光芒，也给后人留下无尽的反思和遗憾。


^① 《陈独秀上诉状》，载《法治周刊》第1卷第33期，1933。转引自《陈独秀被捕资料汇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第十四章

陈独秀把囚室当研究室，潜心著书，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但由于他拿出相当的精力协调狱外的托派组织活动，这使他最终没能实现最初拟定的写作计划。

六十三



陈独秀判刑后，被关押到江苏第一监狱服刑。由于陈独秀身份特殊，一个人住一间牢房，其他同案犯则住普通牢房，监狱专门为他申请了一大笔款，特意将他住的牢房翻修一新。开始管制较严，不准亲友探监，不准通信，不准读书看报，完全失去人身自由。他本人被捕时正值胃病复发，一度不能进食，身边又无人照顾，真的感到生不如死。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以弟老病之躯，即久徒亦等于大辟，因正式监狱乃终日禁闭斗室中，不像此时在看守所中尚有随时在室外散步及与看守者谈话之自由，狱中购买药品和食物当然更不方便，所以我以为还是大辟爽快一点。”^①

由于陈独秀原来在社会上的影响太大，虽被判刑入狱，但探视关心他的朋友一直络绎不绝，这些朋友除了早年的共产党或现在的托派成员外，多为国民党上层人士和社会各界名流。他们对陈独秀的帮助各有侧重，像蔡元培一直致力于对他的政治营救；高语罕主要是帮助他处理上海的家庭事务；章士钊除了苦心孤诣地为他出庭辩护外，还十分关心他的身体健康，

^① 陈独秀致胡适信，1932年12月1日，载《胡适来往书信选》。

经常介绍医生到狱中为他看病；汪原放则主要是为他寻找和寄送所需的各种书籍。另外，陈独秀北大时的学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政务处长段锡朋对他的帮助更大。段锡朋是最早前来探监的人。在陈独秀正式判刑后，他又一度成为陈独秀与其他友人书信往还的代转人。平时，他还经常去探监，多次赠送衣物食品。由于他们的这种关心帮助不含有任何政治目的，纯粹是私人友情，陈独秀也就都坦然受之了。^①

这期间，蒋介石还专门派夫人宋美龄以及国民党政府铁道部长顾孟余、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前来劝降陈独秀，但都碰了软钉子，无功而返。顾孟余大发牢骚：“这老头子，给脸不要脸，他以为他是谁呀，都当了囚犯了，还充好汉。”徐恩曾则感慨道：“我原以为经过这几年的变故，可以使陈独秀放弃过去的政治主张，可是交谈之后，我才发现，他的态度仍然是一如既往地倔强，不可救药了。”

这一日，刚从欧洲回国的国画大师刘海粟到狱中看望陈独秀，他刚刚走进牢房，便紧紧握住陈独秀的手大声说：“仲甫先生，我在国外就听说了你在法庭上精彩的自辩状，身处险境，还敢和恶势力斗，真是宝刀不老，你伟大。”

“还是你伟大，敢画模特，和封建势力斗。”

陈独秀说完，两人都会心地笑了起来，仰慕敬佩之情尽在不言之中。

刘海粟与陈独秀相识于五四运动中，他对独秀高擎“打倒孔家店”的旗帜十分敬佩；陈独秀对刘海粟在上海艺校不顾社会封建守旧势力的攻击，大胆指导学生画模特儿、搞画展，也给予很高评价。两人惺惺相惜，相见恨晚，成为挚友。1922年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刘海粟马上找到当时上海滩的头面人物李征五，将陈独秀从法捕房保释出来。

此时，刘海粟向陈独秀讲述了他在法国举办画展的情况后，拿出一幅册页请陈独秀题签，道：“我去黄山时，遇雨躲到文殊院，天气寒冷，披裘拥火犹不暖，夜深更冷，至不能寐，看到院前有孤松10余株，联想到自己孤身一人在此，借景生情，即兴画了这幅古松图。”

陈独秀见画上树干龟裂，簇叶盘丫，满纸荫浓，不禁触景生情，大发感慨道：“大有茂叶风声瑟瑟、紧枝月影重重的意境。好松！好松！”

说话间，摆开纸墨，不假思索，提笔挥毫，已题好了款。那题词是：“黄山孤山，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图。”

刘海粟点点头：“好，有哲理，突破了我所画所题的意境。”



^① 综合参考多种文献资料和唐宝林等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陈独秀观赏了一会,又提笔补了几个字:“此非调和折衷于孤与不孤之间也。题奉海粟先生,独秀。”

刘海粟见陈独秀行书流畅,便请他写幅字作纪念。陈独秀略一思索,疾笔写了一副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刘海粟大加赞赏道:“文如其人,表现了仲甫兄坦荡的胸襟和昂扬的情绪。有骨气!有胆魄!这字我一定好好珍藏。”^①

典狱长见这么多国民党要人和社会名流来看望陈独秀,才知道老头子余威尚在,再不敢小瞧,对他的态度也好了许多。陈独秀身体不好,典狱长便破例同意濮德志和罗世藩每周去做一次看护,发病时则可以守在身边。另外,还允许他的房间里放置两个大书架,也允许他从狱外带进书籍,从此他有了看书、写信、甚至每日接见亲友的自由。慢慢地,陈独秀的两个书架堆满了诗、书、史、学,狱室几乎成了书房。有了书读,他的心情渐渐趋向平静,身体也康复了许多。到了1934年之后,他开始将狱中生活的重点转到写作上面。



六十四

入狱之初,陈独秀犹如一头惯于驰骋在原野的猛兽,突然囚于铁笼之中,心情压抑,难以适应。他对被捕、审讯、判决不服,不断进行抗争,心烦意乱,根本无心写书。1年之后,他的心绪慢慢平静下来,便根据自己所学之长,拟订了一个庞大的著述计划,准备在二三年内,撰写《古代的中国》、《现代中国》、《道家概念》、《孔子与儒家》、《耶稣与基督教》和《我的回忆录》等书稿。他扬言“拟谋中国学术长足之进展”,自诩欲“制造中国五十年新政治学术之结晶,以谢国人”。^②

陈独秀博学多才,治学严谨,对历史、哲学、文学、文字音韵学等都有精深的造诣、独到的见解。他还通晓日、美、法、德、拉丁语。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就誉满天下,但他从不傲才恃物、固步自封,他深知“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和“学无止境”的道理,于是充分利用在狱中的时间读了很多书。

非常有趣的是,陈独秀在学术上是个天才,可他偏偏对此不感兴趣;

^①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

^②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223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他对政治十分投入,可在政治运动中屡屡失败。他每次政治上受挫,便会把精力集中到非政治的纯学术领域中去,潜心进行研究和著述,并且总是硕果累累。辛亥革命之后,革命曾一度陷入低潮,陈独秀心情十分烦闷,写出了第一篇文字学著作《字义类例》。大革命失败后,他在党内遭到冷落,又躲在上海写出了颇有学术价值的《中国拼音文字草案》。这次入狱判刑较长,他更是打了长谱,准备深入研究。他甚至不断给胡适写信,希望胡适和他一起进行研究。1932年12月,他致函胡适,说胡适“著述之才远优于从政”,为胡适因从政而中断了文学革命而可惜。他又赠以“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诗句相勉励,望其从著不从政,重新焕发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青春。他还建议胡适可从推广拼音文字入手。他致函胡适道:“坑人的中国文字,实是教育普及的大障,新制拼音文字实为当务之急,甚望先生能够拿出当年提倡白话文的勇气,登高一呼”,掀起中国文字拼音的运动。^①

陈独秀哪里想到,此时的胡适已非彼时的胡适。他既要从著,更要从政,二者兼得。胡适心里十分明白,虽然人们在提到五四文学革命时,常将他与陈独秀齐名,其实这是对他的溢美之言,真正的旗手当之无愧的是陈独秀,自己那时只是留美的学生,充其量只能坐“第二把交椅”。对陈独秀提出的“拼音文字”,他并不感兴趣。他也清楚陈独秀在这方面的才能远甚自己,两人合作,最终结果还是陈独秀的头功;再说今非昔比,自己已是身居高位的大学问家,而陈独秀学问再大,也不过是囚犯身份,他岂能自贬身份再干为陈独秀“抬轿子”的傻事!

陈独秀一再为胡适弃文从政痛心,而胡适和陈独秀的学生傅斯年、王森然等也时常为陈独秀弃文从政而惋惜,认为他若是专心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王森然在1934年得知陈独秀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评论说:“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故其学,求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己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故每当大会讨论之际,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常使满座震惊奇绝,或拍掌称快,或呆目无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使先生终



^①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144页。

为政治家不能成为革命理论家，可胜惜哉。”^①

六十五

陈独秀在狱中的研究成功主要体现在音韵学和文字学领域。

在音韵学方面，他撰写了一批具有极高学术价值的文章、书稿，主要有：

《中国古代有复声母说》一文。这是一篇有独特见解的音韵学论文。陈独秀在深入研究中国古代语音后认为：“人类语言之起源，或由于惊呼感叹，或由于拟物之音，日渐演变孳乳，遂成语言，惊呼感叹多演为韵及韵母，拟物之音多演为复声母。”论文对音韵学研究中传统的“叶韵”（即“押韵”）和“通转”之说表示异议，提出以“复声母说”取代之。在他看来，300年来，中国音韵学者，知古韵读音不同今韵，无所谓叶韵，然仍为广韵韵目所拘，对许多字的读音不能解释，并以一字一声为天经地义而无可疑，于一字具有数声不得其解，乃造为通转之说。他指出这些都是荒谬的，“正确之解释，唯依古音有复声母之说，一字之音本有数声母；古代文字声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通转，犹之古代文字韵母之音素与后代不同，无所谓叶韵”。陈独秀最后强调：“笃守成说者，或目复声母之说为怪诞不经，余则以为此说乃追求中国原始语音新途径之一，其前途虽犹待芟夷开辟，而比之旧说语意含糊无发音学根据之任意通转，不失为踏实可寻之途径也。”^②

《连语类编》一文。这是为其“古代有复声母说”提供证据的一篇文章，里面汇编了古籍中遗留有复声母痕迹的连语（即转语、连绵词），“辟华语单音节之说”。陈独秀在自序中说，作“此书非徒以考古”，乃为推动中国拼音文字的推广，“中国拼音文字之难行，单音及方言为二大障碍，古今语皆多复音之义明，拼音文字之障碍去其一矣”。^③此稿在狱中时未出版，随陈独秀辗转到江津，因北大同学会资助其晚年生活费，1941年春陈独秀取出此稿，做短序赠北大的报答，但因战时困难，一直没有出版。

《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一书。此书将古音分成4类10系，将《说

① 王森然：《近代二十家评传》，第223-224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

② 《东方杂志》第34卷第20、21号。

③ 《连语类编》手稿。



文》、《至篇》、《广韵》、《集韵》所收之字依类录入，见古音阴阳入三声之互相通转，其条理至为明晰。此表在狱中写成初稿，1941年初重订，做自序，油印25份。陈独秀的学生、文字学家魏建功、陈钟凡、顾颉刚等看后大加赞赏，均认为“此作开古音学界一新纪元”。^①

此外，他撰写的《荀子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和《广韵东冬种江中之古韵考》等书稿均弥补了前人在这方面的缺陷、失误和不足，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陈独秀逝世后，他的北大学生何资深将这些音韵学论著汇编成第一本《陈独秀遗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取名《古音阴阳入互用例表及其他》，得以传世。

在文字学方面，陈独秀取得很大的成就。

文字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历代学者甚多，归纳起来大致分3派：一是以字形为主，如许慎的《说文》；二是以字音为主，如王念孙的《广雅疏证》；三是音形结合起来，如近代有些文字学家。陈独秀对这3派各取所长，形音义均作全面的研究，融以己意，独成一家。他的文字学著作最大的特色就是独创性。陈独秀认为汉字存在着难认、难记、难写的问题，但只要找到汉字的规律，也就不那么难了。因此，他一生探索汉字规律，每有政治活动的余暇，就孜孜以求。1913年他撰写了第一篇文字学著作《字义类例》，着重以“分析字义的渊源”，探寻字义产生、发展的规律，不少地方见人所未见，发人所未发，但未能探寻到整个汉字的发展规律。陈独秀入狱后，有了充分的时间研究问题，先是写出了《干支为字母说》一文，接着写出《实庵字说》一书。该书进一步解剖麻雀，逐个解析汉字，比《字义类例》有了较大的进步。这部文字学著作在《东方杂志》连载后，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有人评价说：“《实庵字说》于金石甲骨文字，多所发明。”又说：“其书最大成就，即在将有关联之字，分别释例，而所举间附以英语学名，于九经文字，鼎彝刻词，及音韵诸书，均有摭拾……此较孙诒让所著《名原》，仅录古文者有别。”^②最后，陈独秀在狱中完成《识字初阶》一书初稿。出狱以后，特别是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他更是以主要精力修改补充，更名为《小学识字教本》。

《识字初阶》（《小学识字教本》）一书，其内容集陈独秀毕生文字音韵学研究之成果，致力于寻找汉字的规律，以解决汉字难认、难记、难写



^① 陈钟凡：《陈仲甫先生印象记》（未刊稿），1942年1月。

^② 《实庵字说》，载《新民报》（晚刊）1942年6月9日。

的问题,是陈独秀在竭力鼓吹汉字拼音的运动一时不能实现的情况下,另觅蹊径之为。此稿分上下两编:上编解字根及半字根共 544 个字,共分 10 大类。下编是字根孳乳之字,目录上列了两章,第一章为字根并合者共 366 字,第二章为字根或字根并合字之附加偏旁者。第一章又分为(甲)复体字、(乙)合体字、(丙)象声字。其中甲、丙两种在书稿中已完成,(乙)合体字写到“抛”字,未来得及注释便去世了,乃成绝笔。因此,实际上下编第二章只留下了目录。

即使这样,陈独秀在临终前几天说过:“本书之体系业已完成,即上编亦可单独问世。”^①当时有人提议请他人代写,以完成书稿。他坚持不允,说:“学力太差者,不能写;学有深造者,皆有自己的见解,又不愿写也。”于是,这本书稿就这样残留人间。

陈独秀晚年对这本书倾注了大量心血,花费了相当精力。书稿吸收了前人成果,正如他在自序中说:“本书解字颇采黄生、顾炎武以来诸人之说。”但是,他不是亦步亦趋,随声附和,更不是拾人牙慧,而是经过长期系统深入的研究后,大胆地建立了一套科学的体系。他提出的“字根说”,虽然古已有之,但最终使之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后人评价说他“是第一人,这也是他最大的创见”。^②

陈独秀的独创性绝非故逞臆说,以示特异,而是始终坚持以历史的观点、辩证的观点来从事文字的研究。他没有把眼光盯在一文一字上,而是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展开视野,从古代的生活、典章制度、文物习俗、自然科学成果等方面的联系上来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而得出不一般的结论。更可贵的是,他并非为学术而学术,而是着眼于实用。因此,他的著作,不仅对古文字学研究,而且对文字改革、识字教育以至整个文化教育,都有颇高的学术价值。

陈钟凡评论这部书稿时说:“其以形声义一贯解释文字的方法可谓缜密,是为文字学上有价值之著作。”

可惜的是,陈独秀的这本《小学识字教本》的命运同他本人一样坎坷。1939年,国民党教育部所属国立编译馆曾约陈独秀编一部教师用的《中国文字说明》,并预支给他 5000 元稿费。陈独秀便把《小学识字教本》上编交给编译馆,嘱先行出版。但是,为了书名问题,陈独秀与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发生了争执。“小学”本是“文字学”的古称,后来又

① 陈独秀致魏建功、台静农的信,1942年5月1日。

② 文天谷:《陈独秀文字学研究评介》,载《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



广义为“语言文字学”。陈独秀这部著作，特点就是形、声、义合一，集一生音韵学、文字学研究之大成，因此无论从狭义或广义上说，称此稿为“小学识字教本”是最确切不过的。但是，陈立夫怕引起读者误会，是“小学生”用的识字课本，主张把“小学”2字改掉，陈独秀坚决不肯，并表示“若教育部有意不令吾书出版，只有设法退还稿费，别谋印行。”结果，直到他逝世，该书也未出版，预支的稿费也按他的嘱咐，未动一分。后来为了缓和矛盾，编译馆将此稿油印了50册，分赠学术界人士，从而使此稿得以流传下来。1971年，该书由中国“台北文字研究中心”正式出版，赵友培题签，梁实秋做序，形式堂皇。这本是一件幸事，但此书出版却不记作者是谁，也没登陈独秀写的序，成了一本无作者的书。此也算是出版史上的一大怪事。

一个身陷铁窗的囚徒，精神上受着各种折磨，把囚室当作研究室，写出旷世之作，这怕在世界监狱史中也属罕见。陈独秀没有成为革命理论家，却成了一名负有盛名的文字学家。就连蒋介石对此也不得不表示赞叹。1934年10月，蒋介石督战第五次“围剿”获胜“回朝”，问及陈独秀在狱中的情况，说：“鄙人历来赏识独秀先生之才华，要不是他误入共产歧途，在中国文化史上可是一大怪杰。”



六十六

陈独秀不仅对文字学有研究，而且对古代诗词也有很深的造诣。他喜欢写五言诗、七言诗和对联，不喜欢规矩严格的词，就是写五言、七言格律诗，有时对仗也不工整。“七绝”中还会突然冒出一个8字句来，只要能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他是不受任何限制的。诗如其人，这与他本人放荡不羁的性格相符。诗言志，就其狱中所写而言，不管是送人的，还是自存的，所写的内容都不是风花雪月、卖弄文采，也不是无病呻吟、顾影自怜，而是鲜明地表示他积极向上、坚持革命的志向，刚直不阿、威武不屈的风骨，同时也表现了他泼辣尖锐、生动幽默的文笔。

最有名的，是陈独秀1934年所写的一组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金粉泪》56首。^①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华北形势已万分危机，而这时国民党

^① 刊《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4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



政府的首都南京,达官贵人仍置国家与民族的存亡于不顾,在六朝金粉之中,歌舞升平,纸醉金迷。陈独秀对此感慨万千,愤然写出大型组诗《金粉泪》,针对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政策,不拘一格,或咏史,或纪实,或写人,或议事,或批驳,或讥评时政,或冷嘲热讽国民党要员,嬉笑怒骂,淋漓尽致地揭露、讽刺、痛斥、控诉了国民党的罪恶统治和必然灭亡的前途。全诗感时伤事,倾吐了陈独秀胸中的感愤,抒发了他抗日反蒋、忧国忧民的情思。

由于《金粉泪》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及蒋介石之流,自然不能让人看到。陈独秀便今日有感今日吟,有时一天一首,有时几天一首,写完之后便深藏抽屉之中,连照顾他的濮德志、罗世藩也不知他这些日子遮遮掩掩在写些什么。

一次汪孟邹来看他,两位老友寒暄几句后,陈独秀突发奇想,道:“请你给行严捎信,请他找4个朋友各写一幅字,拼成一小屏。我也好朝夕瞻对,以释消愁。”

今年冬天,汪孟邹又来探监时,果然捎来了章士钊新近写的一首诗,并且已经裱好,陈独秀十分高兴,急忙挂起来欣赏,诗中写道:

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扞虱找谈兵。
伯先京口长轰酒,子谷香山苦嗜物。
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杂博泉声。
红叶聚散原如此,野马风棂目尽迎。

陈独秀感慨地道:“行严这是在回忆与我30年的友谊。”

汪孟邹道:“行严先生的诗有些像你的‘存歿六绝句’,尽谈人世沧桑,读起来有些悲凉。”

陈独秀道:“这诗倒合我现在的心境。行严和曼殊不同,曼殊是个隐士,从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他眼见举世污浊,看透了世间百态,厌世的心肠很强烈,于是装作疯疯癫癫的样子,抛开荣华富贵,出家去了,以佯狂免祸罢了,别人还真以为他是个傻子。只可惜这么一个奇才死得太早。行严虽才高八斗,但致力于政法,涉政太频,是个十足的官迷。”

汪孟邹笑道:“世人皆知仲甫兄与章行严、苏曼殊最好,我看你们三人性格各异,唯一相同的就是才气过人。”

陈独秀抬起头道:“我与他们二人又有所不同。曼殊是厌恶尘世,行严是热衷尘世,而我是以拯救尘世人的苦难为己任,活得最苦,也最没成



就，一生奋斗基本是失败的。”

汪孟邹见他说着说着又有些伤感，忙引开话头，环顾着他的书架道：“你现在闲居斗室，可真把监狱当成研究室了，令人敬佩。”

陈独秀叹口气道：“孟邹兄，著书藏之名山，则非我所愿。我这些年奔波革命，特别是现在身陷大牢，家中之事多亏你照料，我知道已欠你亚东的钱实在不少，心里也是十分过意不去。这些书稿你看看能不能出版？如可以，版税还你的债。”

汪孟邹见陈独秀提到“钱”字，有些尴尬，说：“仲甫兄，你我兄弟几十年了，亚东能有今天，全仗当初你的支持。过去的钱，我一文不要，朋友有难只当相助。只是你这些书稿实在是……”

陈独秀见汪孟邹为难，忙说：“孟邹，你不要太为难。我知道以我目前的囚犯身份，出版社都不敢出我的书。你回去留心，向其他出版社推荐一下也可。”

汪孟邹这才松了一口气：“你放心，我回沪后一定极力向有实力同仁推荐。”停了一会儿，又道：“仲甫，最近可还写诗？”

“诗倒是写了一些，不过怕是发不出去。”陈独秀说着向室外瞅瞅，见并无人影，便打开抽屉，拿出厚厚一迭文稿，又道：“近来眼看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企图我之中华，东北沦亡，华北危机，人民在痛苦中挣扎，而南京的达官贵人们却置国家民族的存亡于不顾，在六朝金粉之中，歌舞升平，纸醉金迷。历史不能忘记，南京本来就是亡国之都，再不警醒，我看当亡国奴的日子不远了。这是我近几个月有感而发写的56首诗，命名为《金粉泪》，孟邹，你给提提意见。”



六十七

汪孟邹接过文稿，翻开一页，见上面写道：

飞机轰炸名城堕，将士欢呼百姓愁；
虏马临江却沉寂，天朝不战示怀柔。

长城以外非吾土，万里黄河惨澹流；
还有长江天堑在，贵人高枕永无忧。



汪孟邹一惊，轻声道：“仲甫，你这诗明明是在嘲讽政府和老蒋呀，要是被人发现了要坐牢的。”

陈独秀笑道：“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这诗是在牢里写成的，他老蒋还能把我怎样！往下看，好诗还在后头呢。”

汪孟邹一想也对，陈独秀在法庭上也没有隐瞒反对政府的动机，老蒋对他无可奈何，便暗嘲自己胆子未免太小了，低下头看去：

苏马幽居蒋蔡逃，胡儿拍手汉号啕；
儿皇忠悃应无失，母事皇军汗马劳。

陈独秀见汪孟邹面露疑惑，便解释道：“‘苏马幽居’是说东北义勇军的将领苏炳文、马占山因举旗抗日被罢贬官职，投闲置散。‘蒋蔡逃’是指二十九路军的蒋光鼐、蔡廷锴成立福建人民政府，主张抗日，被蒋介石赶跑了。”

汪孟邹不再吱声，接着往下看：

人心不古民德薄，中夏亡君世道忧；
幸有安排谢邻国，首宜统一庆车邮。

汪孟邹问：“这‘庆车邮’做何解释？”

陈独秀道：“蒋介石表面上不承认‘伪满洲国’，实际上又指使北平当局派代表和伪满洲国签订与关内通车运邮。这不是变相地承认吗？”

汪孟邹又低下头，下面一首写道：

两载匆匆忘四省，三民赫赫壮千秋；
中华终有新生命，海底弘开纪念周。

他又有些不解道：“海底又是何意？”

陈独秀道：“去年国民党代理行政院长宋子文装模作样地对热河抗日将士说：‘诸君打到哪里，子文跟到哪里。诸君打到海里，子文跟到海里。’‘九一八’一枪不放就丢失了东北，若是这样‘抵抗’，恐怕宋子文真的要被日本人赶到南海去办公了。”

汪孟邹再看：



关东少师如兄弟，淮上勋臣师道尊；
钦慕抒诚承雅教，何郎软语最温存。

虏民夺地数千里，使节依然笑语迎；
无力复仇应报恨，如何握手进香苹。

健儿委弃古疆场，百姓流离半死伤；
未战先逃恬不耻，回銮盛典大铺张。

汪孟邹道：“‘回銮’在这里可是指老蒋在‘一·二八’战起第三天宣布迁都洛阳，直到《淞沪协定》签字后才又回到南京？”

陈独秀道：“正是，比当年慈禧太后弃京西逃有过之而无不及。”

汪孟邹不敢肆意评论蒋介石，便低头再看：

清党倒党一手来，万般复古太平哉；
当年北伐诚多事，笑倒蓝衫吴秀才。

经正民兴礼教尊，救亡端赖旧文明；
投壶雅集孙联帅，不愧先知先觉人。

木鞋踏破黄河北，救国三民有万能；
革命推新皆反动，祭陵保基建中兴。

四方烽火入边城，修庙扶乩更念经；
国削民奴皆细事，首宜复古正人心。

德赛自来同命运，圣功王道怎分开；
忤除犯上无君罪，齐到金刚法会来。

汪孟邹心里明白：诗中“孙联帅投壶”是引用孙传芳当年在北伐军挺进韶关时还在南京邀集社会名流搞投箭入壶的古礼，不知灭亡将至，暗喻国民党达官要人们面对日本人进关仍然麻木不仁；“祭陵保墓”是讽刺国民党官僚戴季陶指责考古学家发掘古墓，以为祭陵保墓就可以挡住日寇铁蹄，保全中华；“金刚法会”则是指戴季陶在北京雍和宫举行“时轮金



金粉泪 李太首
 寂寞凄凉 空殿几 空胡地 残草
 倚空 铺此身 难奈 寂寞 苦身
 衰 空在 天涯 卷
 要人 就要 就生活 食 更 能 招 奴
 国 魂 空 国 奥 之 亦 亦 管 满 地 中
 看 海 风 等
 浩 堂 仙 堂 一 身 美 美 报 何 亦
 太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亦

1934年陈独秀在狱中写《金粉泪》56首手迹

刚法会”，邀请班禅主坛念经，祈求上天保佑平安的闹剧。陈独秀这几首诗分明是借古喻今，讽刺国民党丧失革命意志，复古、倒退的行为。

他心中暗赞陈独秀文笔锋利，嘴上又不敢赞扬，再往下看时，见下面几首是指责蒋介石不要民主、实行独裁统治的：

世事由来似弈棋，黄龙青白要斯梯；
红袍不及蓝袍好，行酒青衣古有之。

庶人议政干刑典，民气消沉受品弹；
莫道官家难说话，本来百姓做人难。

民智民权是祸胎，防微只有倒车开；
赢家万世为皇帝，全仗愚民二字来。

严刑重典事唐皇，炮烙凌迟亦大方；
暴虐秦皇绝千古，未闻博浪狙张良。

关门闭户两争执，佝偻主人佯不知；
幸有雄兵过百万，威加百姓不迟疑。

感恩党国诚宽大，并未焚书只禁书；
民国也兴文字狱，共和一命早呜呼。

法外有法党中党，继美沙俄黑百人；
囚捕无须烦警吏，杀人如草不闻声。

汪孟邹问：“仲甫，这首诗中‘博浪狙张良’是引用的古代张良曾遣人用铁碓狙击秦始皇于博浪沙的典故。你用在此处，不知是何用意？”

陈独秀咬牙切齿地道：“秦始皇的暴政历史有名。依我看，现代秦始皇蒋介石集卖国、独裁、复古、腐败于一身，暴虐更是千古少有，却没有听到有像张良这样的壮士去刺杀这个独夫民贼。”

汪孟邹知他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都先后死在蒋介石手中，心中恨极，又不便安慰，只好装作没听见，低头再往下看，只见下面这些诗几乎把国民党所有重要军政要员都揪出来示众，蒋介石自不必说，是全诗



集中攻击的目标,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何应钦、胡汉民、戴季陶、吴敬恒、孙科、陈公博、张人杰、陈济棠、李石曾、邵元冲、杨永泰等都在其中,一个个骂得活灵活现。首先是汪精卫,诗中写道:

姍姍媚骨吴兴体,书法由来见性真;
不识恩仇识权位,古今如此读书人。

汪孟邹笑道:“仲甫,汪兆铭一向与你私交不薄,你这样损他,不怕他日后知道怪你?”

陈独秀哼了一声:“正因为我与兆铭相交数十载,才对他有着入木三分的了解。他这个人华而不实、一身媚骨,日本人真来了早晚会当汉奸。”

汪孟邹不以为然地摇摇头,再看下去,原来是为宋子文、孔祥熙画相,谓宋孔相继为财长。诗曰:

一门亲贵人称羨,宋玉高唐结主欢;
几见司农轻授受,乃知裙带胜衣冠。

下一首诗描写的是陈立夫:

专制难期政令宽,每因功业震人寰;
未闻辱国儿皇帝,亦欲伊周一例看。

写戴季陶的诗云:

宝华山上暗生春,春满书斋不二门;妒病难医今有药,老僧同榻尔何能。戴传贤有惧内癖,营金屋于宝华山僧舍,颜曰不二书斋,以与僧同宿诳其妻。

关于吴稚晖,诗云:

只怜虎子风流甚,斩祀汪汪长叹声。吴敬恒以子有恶疾绕室长叹,曰吴氏之祀斩矣!



汪孟邹知道：陈独秀早年在拒俄运动中，与吴稚晖并肩战斗，同为反帝战友。可是，曾几何时，吴稚晖参与策划四一二政变，力主清共，杀害了独秀的两个儿子延年和乔年，可现在他的儿子染上了花柳病，断了吴家烟火，陈独秀欣喜之情跃然纸上。

关于早年跛足的张静江，大革命时期，与蒋介石一起挤走汪精卫后，一度任国民党主席，但不久也被挤下台。在南京政府分赃中，争监察院长而不可得，为此大发雷霆。陈独秀对这个老气横秋的腐败分子极为不齿：

分肥不及暗生填，蹩脚先生老气横；惟一辉煌新建设，前朝灯火万家明。张人杰长建设委员会，所建设者，李纯遗留之电灯公司而已。

再往下几首是描写在国民党贪官污吏残酷压榨下，民族经济凋敝，人民家破人亡的诗：

虎狼百万昼横行，兴复农村气象新；
吸尽苛捐三百种，贫民血肉有黄金。

鸦片专营陆海军，明严烟禁暗销行；
州官放火寻常事，巢县新焚八大村。

苛捐榨尽民间血，百业凋残袖手看；
商贾不知遗教美，但愁歇业忍饥寒。

汪孟邹看罢组诗，禁不住拍案叫绝：“好诗，好诗！尤其是这第一首：‘放弃燕云战马豪，朝儿醉梦倚天骄；此身犹未成衰骨，梦里寒霜夜渡辽。’还有最末这首：‘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两个‘骨’字，首尾相顾，遥相呼应，把56首诗组成一个整体，一气呵成，整组诗虽然这样的自我表白只有两句两‘骨’，却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其他54首诗都为这两首诗两字铺垫，颇有‘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雄心壮志。确是好诗，不仅内容深刻，而且形式新颖，别具风格，嬉笑怒骂皆成诗。这种风格的诗文，可以说开风气、开先河。”

陈独秀道：“过奖，过奖。孟邹兄若是觉得还有点价值，就拜托你带



走收藏好,或许将来有重见天日的一天。”

汪孟邹与陈独秀是世交,但他历来胆小怕事,从商不从政,在白色恐怖下,对陈独秀创建的共产党及后来的托派从不问津。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四处通缉陈独秀,他与陈独秀交往都很害怕。然而,这次他见了独秀的《金粉泪》,却爱不释手,胆子不知从何而来,听到陈独秀的托付,一口应允下来道:“仲甫兄,你这组诗是绝世之作、无价之宝,拼了老命我也要给你带出去收藏起来。待你出狱后,我再完璧归赵。”

陈独秀苦笑一声:“我不敢奢望有出狱那一天,只要这组诗不随我老死狱中,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这组“反诗”《金粉泪》就这样被胆小怕事的汪孟邹神秘地携出监狱,收藏起来。1952年,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一边倒政策指导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肃托运动,上海军管会在亚东图书馆搜出陈独秀的《金粉泪》手迹。汪孟邹在检查中回忆道:“1936年或1937年,我因事来到南京,便到监狱里看托匪独秀,他拿这《金粉泪》56首给我看。后来我对他说:‘你给我拿去,让我的侄辈和同事都去看看罢。’他便给了我这个册页,有一个时期,很不容易收藏,有时东收西收的,有时连自己也记不得是藏在哪儿了。今天拣出十分难得,故把来历写下。独秀不曾署名,也无印章,我也应该为之证明。”^①

汪孟邹将这份检查交上去后,马上便后悔自己将已故老友违心地骂为“托匪”,此后整日唉声叹气,身体每况愈下。同年10月26日,忠厚老实一生的汪孟邹郁郁而终,享年77岁。

后人对这组诗给予了高度评价,称“全诗是感时伤事之作”,“诗中涉及的面颇广,有军政大事,有生民命脉,有要人隐私,探幽阐微,言之有物有据,可以当史诗读。就诗的内容来说,反映了陈独秀虽历经艰险,失去自由,但字里行间似流露着早年爱国革命的豪情。组诗宣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国民党反动派毫不抵抗的危险局势,指出了国民党反动派厉行法西斯的倒行逆施,斥责了其对革命人民的迫害和压榨,揭露了国民党要员的无耻行径。全诗所陈者,皆国家民族的安危所系,无一个人的失意呻吟,语不求工,娓娓道来,发自内心,不难窥见作者自诩‘依然白发老书生’的意志”。

陈独秀这组诗包含的意义其实远不止于此,最值得指出的是:以陈独秀的革命经历和政治活动的体验,加上对于中国社会政治历史的独有



^① 《党史资料》总第16期,第13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的认识,通过对现实局势的审视,客观上揭示了政治斗争的一般规律,也总结了某种类型的政治斗争的特点和经验,从而突破了中国文学史上一般的“咏史”之作的樊篱,而具有更普遍的意义。诗中或是反语正说,或是正语反说,嬉笑怒骂皆成诗,其弦外之音更是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这种风格的诗文,是陈独秀所开创,后来由鲁迅继承和发展,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这样的作品陈独秀五四时代是写不出来的,直到逾“知天命”的年纪他才以南冠之身吟出这样的诗句,足以表明这组诗篇确是陈独秀以几十年来的社会政治活动的体验而换得的。

六十八

陈独秀虽然在狱中潜心钻研学问,在文字学方面取得了成就,但他仍然拿出相当的精力协调狱外的托派组织活动,这使他最终没能实现最初计划要写的全部书稿。

1932年冬,郑超麟的妻子刘静贞到南京军人监狱探望郑超麟。此后,陈独秀就指定刘静贞为交通员,与狱外的托派组织恢复了联系。^①

陈独秀等原托派临委成员全部被捕之后,中国托派顿时群龙无首,一片混乱。于是,上海托派马上召开紧急会议,宣布重组托派“临时委员会”,成员有刘仁静、陈岱青、严灵峰、陈其昌、任曙、刘伯庄,刘仁静任书记。这就是中国托派史上的第二个“临委”。^②然而,第二个“临委”并不积极参与营救陈独秀,而是依然像以前那样热衷于内部的权力和“路线”之争。不久,内部又发生严重分裂,刘仁静和陈岱青退出,任曙接任书记。他上任后,便擅自将“上海临委”改名为“全国临委”,这一做法立刻遭到陈其昌等人的坚决反对,任曙无法,只好弃职。1933年10月,托派再次改组,成立了由陈其昌任书记的托派临委。不久,尹宽出狱加入,由此形成了中国托派史上的第三个“临委”。^③

陈独秀对第三个“临委”是支持的。这时候,他已被初步判定刑期,于是与狱外托派组织的联系也就加强了。刘静贞基本上一两个月来一次监狱,传达临委的文件、刊物和书信,带出陈独秀的文章、意见和信函。这年9月29日,陈独秀致函“临委”,并附上他为“临委”起草的《目前形

^① 参见郑超麟的《回忆录》,1945年手稿。

^{②③} 参见林茂生著《中国托派》。



势与反对派的任务》，不曾想，这篇文章立即遭到刘仁静、彭述之等人的强烈反对，由此又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旷日持久、毫无意义的理论争论，这场争论一直延续到1934年春。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4个问题：

关于形势问题。陈独秀认为：“至少在1935年以前，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国家，如果没有意外的大的事变发生，这两三年中还只能是反革命抬头革命低落的时期，在此革命低落期间，不应该采用过高的自欺的口号，如‘苏维埃’等，我们的力量，应该集中于后年3月国民大会的斗争。”刘仁静则致函反对他的说法，讽刺陈独秀对形势的估量常常是“动摇的”，“一时轻浮乐观地认为苏维埃革命快要到来，一时又改变成沮丧的悲观，认为革命无抬头的可能，叫人们如何对他发生信仰”。^④

关于国民会议问题。陈独秀认为，在中国，国民会议已经成为“无产阶级打击资产阶级的武器”，“在国民会议口号下武装暴动夺取政权”与革命高潮时“在苏维埃口号下夺取政权”并不对立，二者结合，才是托洛茨基真正的“不断革命论”。他以此反复批判彭述之把国民会议口号只看成是资产阶级的，“把国民会议和苏维埃对立起来”，“在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等观点，是“用左的辞句掩饰阶段路线的本质”，是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令人惊异的背叛”。^⑤

关于经济复兴问题。刘仁静认为：托派“应当负起肃清资本主义发展障碍的责任”。他还认为：必须经济复兴到同先进国家接近的程度，无产阶级才能担负起革命任务。陈独秀严厉批判刘仁静的观点“纯然是改良派和阶段论者的路线”。他认为：不管经济状况如何，“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运动，只要那里有了无产阶级之有力的同盟军，那里便有了无产阶级革命之可能”。“像中国这样经济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能通过民主运动——国民会议道路，比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早些得到政权。”^⑥

关于“共同行动”问题。陈独秀认为：“在阶级斗争未达到最后决胜负以前，资产阶级中之自由主义者，往往因外国的侵略或国内的军事独裁之专横，而表示所谓‘左倾’。”“当他们向左盘旋时，我们可以和他们共同行动，以打击共同的敌人，例如抗日与倒蒋。”陈独秀也批评了小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对群众的欺骗。刘仁静则说他这种主张是抹

④ 陈独秀：《我们走哪条路》。

⑤ 陈独秀：《国民会议与苏维埃》。

⑥ 陈独秀：《肃清列尔士毒害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载《校内生活》第9期。



杀两个阶级之间的“鸿沟”，是“偷运过去的革命资产阶级的理论”。对此，陈独秀生气地说：“笼统的对于任何形式的阶级联合或共同行动以全盘否定，这简直是胡道八道！”^①

这次争论一直延续到陈独秀支持的陈其昌、尹宽“临委”与格拉斯、刘仁静等支持的北方区委史朝生等人之间又发生严重的宗派主义冲突，才暂时告一段落。

六十九

1933年春，托洛茨基开始筹备独立的托派国际——第四国际，以示与共产国际彻底决裂。在这种背景下，他十分关心中国托派的命运，便委派美国托派组织社会主义工党成员格拉斯（中文名字李福仁）来到中国，帮助重振托派组织。

格拉斯在中国公开的身份是上海《密勒氏评论》周刊的副主编，实际上充当托派国际与中国托派组织的联络员。当时刘仁静虽然早已离开“临委”，但因与格拉斯的关系密切，取得了格拉斯的信任，因而两人合为一体，对陈其昌、尹宽主持的第三个“临委”横加责难。他们以“临委”太保守、应增加年轻成员为理由，将托派统一组织北方区委的史朝生调来上海，加入“临委”，任宣传委员。1934年4月，史朝生在格拉斯的怂恿下，致函狱中的陈独秀，先是批评陈其昌主持下的“临委”工作不力，继而建议推举“特别委员会”，担负过渡时期的全国性指导工作。5月，史朝生列席“临委”常委会议时，突然提出改组“临委”，公开向陈其昌、尹宽及其支持者陈独秀发起猛烈攻击，引发了又一场理论上的混战。6月，他又擅自将托派统一组织北方区委负责人刘家良调到上海任沪西区委书记，加大了牵制陈其昌、尹宽的力度。

1935年1月，史朝生和刘家良在格拉斯、刘仁静的支持下，背着陈其昌发出《临委紧急通知》，要求各支部10天内派出一名代表参加“上海代表会议”，并向陈独秀、陈其昌、尹宽发出最后通牒，要他们放弃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上层集团成立“反战”、“倒蒋”等联合战线主张。

1月5日，陈独秀复函史朝生，企图阻止他的分裂行为。他说：“整纪和清党，应该‘行之以渐’和‘去之太甚’，并且必须于代表大会后举行



^① 《雪衣来信论对宋庆龄史大林集团的策略》，载《校内生活》第13期。



之,目前万不可操切!!!”他还针对格拉斯在背后鼓动分裂的行为严肃指出:“外国同志倘在中国鼓动分裂运动(望你们将我这句话明白告诉他!!!),如果他算是国际代表,最后国际必须负责,分裂运动不是任何人可以任意儿戏的,特此提出警告!”^①

就在陈独秀苦口婆心地劝说史朝生要团结、不要分裂的时候,史朝生等人已于1月13日按计划匆匆忙忙召开了“上海代表会议”。会议认为,必须向“资产阶级在无产队伍中的说客”陈独秀、陈其昌、尹宽等人作“无情的斗争”。会议还宣布将中国托派组织正式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选举了史朝生、刘家良、胡文章和格拉斯等10人为中央委员会,史朝生、胡文章、刘家良为常委,刘家良为书记。

1月25日,“同盟”中央委员会致函陈独秀,系统列举批判了陈独秀关于“共同行动”、放弃“保卫苏联”及“联合苏联”的口号、把红军看作“流寇土匪”、组织问题上“拉拢调和的中派主义立场”四大机会主义错误,并说“或者纠正错误,或者马上分裂,任何拖延的办法都是有害的形式主义”。

2月4日,中央委员会“同盟”宣布开除陈其昌、尹宽的党籍,并要求陈独秀对此表态。陈独秀当然表示反对,于是史朝生“又贸然决定开除陈独秀”。^②至此,陈独秀支持的由陈其昌、尹宽主持的第三个托派“临委”彻底为格拉斯、刘仁静支持的以史朝生为首的“同盟”所取代。这就是中国托派的第四个“临委”。^③

然而,仅仅两个月后,新的托派中央又被国民党破获。刘家良、史朝生等人在上海被捕,旋即格拉斯和刘仁静也在北平被捕,于是“同盟”又被陈其昌接手。

格拉斯由于是美国人,很快被保释出狱。他来到上海,找到陈其昌和尹宽,表示愿意合作,以重建托派组织。为表示诚意,格拉斯还打算去南京拜访正在服刑的陈独秀。此时陈独秀对格拉斯成见已深,坚决拒绝会见格拉斯,并几次致函陈其昌,告诫他不要和格拉斯合作,主张由陈其昌、王文元和赵济组成新的领导机构。不过此时陈其昌有意重组“第四国际中国支部”,需要借重格拉斯这位与托洛茨基有联系的外国人,于是多次去信向陈独秀解释。此时,远在挪威的托洛茨基听说格拉斯支持的

① 此信后刊《校内生活》第13期。

② 参见王文元著《双山回忆录》。

③ 参见林茂生著《中国托派》。



“同盟”开除陈独秀党籍一事，马上致函格拉斯说：“陈独秀是知名的，而且业已证明为绝对可靠的。”“他是国际的人物，他现在被监禁在牢内，他不仅仍忠于革命，而且仍旧忠于我们的倾向。”托洛茨基坚决认为：“不管他和中国支部有什么重大分歧”，陈独秀“可以而且必须有其位置在第四国际领导机关之中”。他强调说：“我们如果抛弃了陈独秀的合作，那对于第四国际的权威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①可以说，托洛茨基在陈独秀最困难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支持了他，并给予他最高的评价和“荣誉”，这使陈独秀大有知遇之恩的感觉，因此也就谅解了托洛茨基派驻中国的联络员格拉斯。

1935年12月，托派统一组织又在上海召开代表大会，选出陈其昌、尹宽、蒋振东、王文元和格拉斯5人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即第五个“临委”。^②

陈其昌领导的第五个“临委”是在陈独秀的协调指导下产生的，然而陈其昌一旦被扶上“第一把交椅”，又开始忘乎所以起来。他先是以胜利者自居，逼着史朝生等人承认错误，接着又将斗争矛头对准陈独秀，对陈独秀从狱中发出的指示横挑鼻子竖挑眼，目的就是想淡化他对新临委的影响，这使陈独秀对陈其昌大为失望。而此时，陈独秀已服刑多年，名义上已不是托派组织的首领，客观上对托派活动的指导也是力不从心、鞭长莫及。面对陈其昌等人不断地进行派性斗争，他也只能干瞪眼没办法；再看看中共中央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纠正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国共产党空前团结。相比之下，陈独秀不免有些灰心丧气，简直对托派失去信心，干脆便不再过问托派之事，由他们折腾去了。

这就是陈独秀出狱之后坚决拒绝陈其昌派人请他回上海重振旗鼓的原因。



① 托洛茨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谈话》，收入《中国革命问题》。


② 参见林茂生著《中国托派》。



第十五章

正当陈独秀将全部精力和热情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王明却无中生有地挑起了轰动一时的陈独秀“托匪汉奸”案，最终导致他与中共关系彻底破裂。

七十



应该说，陈独秀组织中国托派的历史是一段不光彩的历史，尽管他的主观愿望是想纠正中共所谓的“错误”，尽管他自始至终从不承认自己脱离共产党，尽管他一以贯之地坚持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并且为此而被捕判刑入狱。但是，不管动机如何，他成立托派小组织并不断攻击中共的行为，毕竟为党的组织原则所不许，客观上起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用飞机大炮无法达到的效果，这是无可争议的历史事实。

然而，公平地说，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上，陈独秀一直是积极的、坚定的、毫不动摇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全国掀起了第一个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他积极响应，发表了大量文章，支持全国人民抵制日货和对日宣战的要求，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他说：“在此次抗日救国运动中，只有排货和对日宣战这两个主张，不但是多数人民的意志，而且比较的〔地〕正当。”^①

被捕之后，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打倒国民党政府的理由就是：“全国人民主张抗日，政府则步步退让。

^① 《火花》第3期。

十九路军在上海抵抗，政府不救济。至所谓‘长期抵抗’、只是‘长期抵抗’四个字，始终还是不抵抗。”^①

他对汉奸行为恨之人骨，在《辩诉状》中驳斥国民党强加给他的“叛国”罪。他出狱后，更是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之中，发表了大量抗日的演讲和文章。甚至为了联合抗日，他宁可低下“高贵”的头颅，主动向中共中央伸出友好之手……

陈独秀前思后想，实在想不出自己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有过和日本人亲近的事情。可为何有人突然一口咬定他是领取日本侦探机关“津贴”的汉奸？他越想越觉得事出有因，便干脆从床上爬起来，坐到桌前，拿起《解放》杂志，仔细读起来……

“康生”，好熟悉的名字，陈独秀皱起眉头在大脑中搜索着和这位作者在什么地方见过。突然，他想起来了，大革命时期，他在上海领导工人运动时，康生是上海总工会一名不起眼的小干事，没想到今非昔比，到莫斯科喝了几年洋墨水，摇身一变居然成了中共要员。可是陈独秀还是不明白，当年自己与康生共事时根本不在一个层次上，何来的矛盾？何来的恩怨？看来，康生只不过是一个马前卒，他的背后肯定有唆使者。那么，是谁对自己有如此深仇大恨，竟然想拿一顶“汉奸”的大帽子将他置于死地？

陈独秀苦苦思索着，慢慢地，一个梳着小分头的青年形象在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他恍然大悟：真正的后台老板是王明。

陈独秀清楚地记得：1927年初，米夫率联共宣传工作者代表团到中国访问，将当时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的王明推荐给陈独秀，希望安排他主持中央宣传部工作。对此，陈独秀十分反感，可又不便推辞，于是就让王明在中宣部当了个干事。王明对此大为不满，耿耿于怀，从此便和陈独秀记了仇。进入7月后，武汉已是一片白色恐怖，汪精卫开始磨刀霍霍，王明见势不妙，又跟着米夫返回了苏联。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撤销了总书记职务，王明第二次回到中国，他落井下石，多次发表文章，攻击陈独秀，直到顾顺章、向忠发叛变，白区形势空前紧张，王明便又返回了莫斯科。这次王明刚从莫斯科回到延安，便得知了中共中央曾与罗汉秘密联系意欲和陈独秀合作抗日之事，大为恼火，便要抢先一步，借斯大林反托派这把刀，置陈独秀于死地而后快，让他在国人面前永世不得翻身。



^① 《国闻周报》1933年第10卷第17期。



康生



王明

陈独秀的判断是正确的。诬陷陈独秀为“汉奸”的始作俑者的确是王明。王明在这件事情上之所以大做文章,里面自然有他心胸狭窄、公报私仇的成分,但还有更加重要的原因和深层次的政治背景。这却是陈独秀万万想不到的了。

首先是联共党内斗争以及第三国际指示的影响。

在联共党内,斯大林击败了托洛茨基等人后,为进一步巩固现实的政治局面,继续奉行坚决“清洗”的方针,以期把党内一切不满于斯大林的所谓托派分子肃清,绝灭后患。1936年8月,苏联先是审判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分子恐怖中心案”,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等16人处以死刑;1937年1月,苏联又审判“反苏托派中心案”(或称“托洛茨基派危害苏联案”),皮达可夫与拉狄克等15人又被枪决。紧接着,苏联在国内开展了更大规模的“肃反”运动,成千上万的异己分子被逮捕流放、失踪、枪毙。1937年3月3日,斯大林在联共中央全会报告中正式宣布,托洛茨基派“已不是工人阶级中一个政治派别了,现在已变成外国侦探机关所雇佣的匪徒侦探、破坏者、危害者和杀人犯的卑污的无原则的匪帮了”。^①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1937年4月21日,共产国际召开紧急会议,作出了《共产国际关于与法西斯主义的奸细——托洛茨基分子作斗争的决议》,指出:“共产国际各支部在会场上以及报章上开展有系统的斗争,以反对法西斯的走狗——托洛茨基主义。”“各支部在党的各组织中,从党的高级机关起,至党的初级组织止,讨论并研究本决议,同时须顾及反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② 出席这一会议的有17个国家的共产党(支部),代表中共出席的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正副团长王明和康生。会议结束不久,王明、康生就受命回国贯彻上述指示精神,把矛头直指陈独秀,也就十分自然了。

其次是中共内部的矛盾斗争。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王明、康生制造“陈独秀托匪汉奸案”,打击陈独秀还在其次,主要矛头却是指向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1931年初,王明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采用不正当的手段升任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顾顺章、向忠发相继被捕叛变,王明成了惊弓之鸟,于是函谒米夫,要求到共产国际任职。1931年10月18日,几乎就在陈独秀被捕的同时,王明离开上海,乘日本客轮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

^① 斯大林1937年3月3日在联共中央全会上的报告。

^② 此决议后刊《解放》第32期,1938年3月5日。



代表团团长。鉴于此时周恩来已决定前往中央苏区任书记，张国焘、陈昌浩也受派到鄂豫皖苏区建立中央局，留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所剩无几，王明离别前召开会议，成立了由博古、张闻天、李竹声、卢福坦、康生、陈云6人组成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3人任常委，博古负总责。这6人中，除卢福坦、陈云外，其他4人均不是中委和候补中委。

延安整风时，博古回忆过这一任命的产生过程：那是在向忠发被捕后，王明、周恩来、卢福坦、博古到一个酒店开会，会上决定不设总书记，决定我为书记，“我的实权是总书记，但是在中央会议上并没有决定我是总书记”。

王明临行前再三叮嘱博古，万事都要请示共产国际，绝不可擅自行动，更不得听信他人。此后，王明一直遥控着国内的政治走势达4年之久。这也是为什么中共中央在博古的把持下丢失了中央苏区，党史上却以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命名的缘由。1935年1月，红军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召开了遵义会议，这才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做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按照独立自主的原则和山地游击战为主的方针，以转变军事战略，这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争取抗日战争的人民胜利结局奠定了基础。不久，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夜袭阳明堡飞机场，东渡黄河，开辟了晋绥抗日根据地。这些战斗和战略举措，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在洛川会议制定的抗日战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符合中国抗战实际的，是行之有效的，因而也是可行的。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也随之而逐渐为全党认可。对此，王明看在眼里，急在心上，无奈身处异乡，鞭长莫及，再也无法遥控指挥国内局势。直到国共第二次合作，王明受共产国际之命回国，终于盼来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这次回国，王明踌躇满志，得意洋洋。在苏期间，王明一直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5年又当选为共产国际七大执委会委员、主席团成员和书记处候补书记，而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在这次大会上仅被选为执委会委员。很显然，从中共隶属共产国际的组织原则看，毛泽东又变成了王明的下级。而且，王明清楚地知道，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实行的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并不同意。1937年8月10日，共产国际召开专门会议，讨论中国抗战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时任



共产国际总书记的季米特洛夫认为：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线”的经验，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他提出：中国共产党面临政策和策略上的“180度的大转变”，能否适应新的环境和新的任务，“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王明。

王明和季米特洛夫的关系非同一般。王明在共产国际待了整整6年，同季米特洛夫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季米特洛夫唯一的儿子当时已在战争中牺牲，因而十分喜欢王明的大女儿王芳妮，常常把她当作亲生女儿看待，王明夫妇临回国时，就把王芳妮留给季米特洛夫做养女，这使他大感欣慰。王明认为，如果毛泽东和他发生了争执，从感情上讲，季米特洛夫的天平无疑会偏向自己。其实，王明在这一点上显然低估了季米特洛夫的政治觉悟，6年的相处使得季米特洛夫十分了解王明喜欢“争权”的性格，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他绝不会无原则地帮助王明。曾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秘书的师哲后来回忆说：“季米特洛夫在王明回国前，专门提醒过他说：‘虽然你在国际工作多年，而且是执委成员和书记处书记之一，但你回去并不代表国际，而且你长期离开中国，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所以回去以后，要以谦逊的态度，尊重党的领导同志，中共党的领袖是毛泽东，不是你，你不要自封领袖。’”^①然而，王明此时已被喜悦冲昏了头脑，季米特洛夫的提醒根本听不进去。况且，行前就连斯大林都专门接见了王明，对如何纠正中共现行的政策作了明确指示。因此，王明可以说是怀揣尚方宝剑、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回国的，他就是认为自己代表共产国际，他就是要回去和毛泽东争领袖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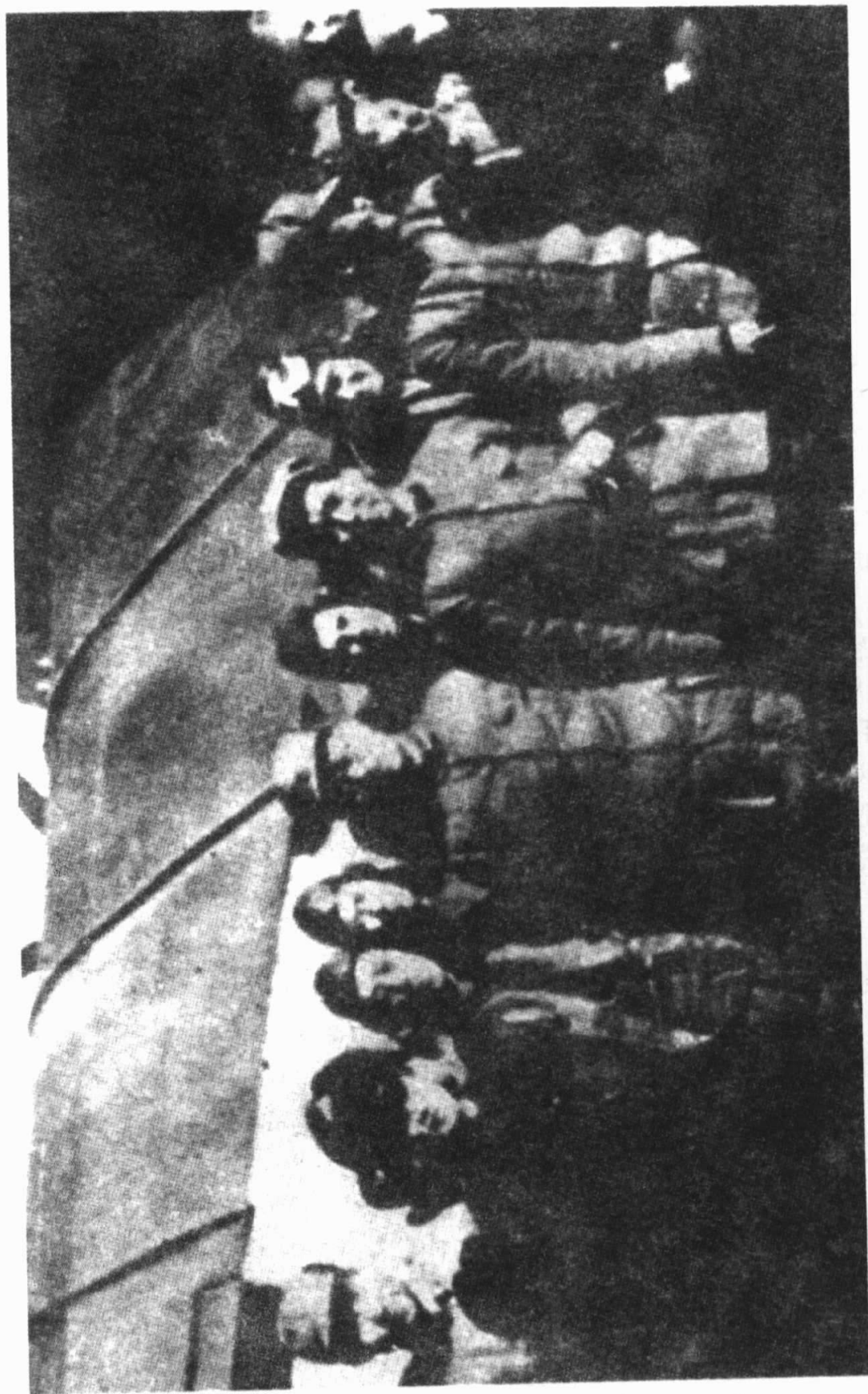
1937年11月29日，王明和康生乘飞机从莫斯科取道乌鲁木齐抵达延安。他野心勃勃，拉开架势准备向毛泽东发起进攻，再次篡夺中共大权。毛泽东亲自率全体中共党政要员冒着严寒到机场欢迎，并当即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欢迎从昆仑山下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

但是，王明这位“国际神仙”并没有让毛泽东高兴多久，便将从苏联带回来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倾路线倾注到中共方针、政策中，接着抓住毛泽东、张闻天与陈独秀、罗汉商议联合抗日之事大做文章。^②

^① 《红管家——回忆任弼时同志》，载《中共党史六十周年纪念文选》第363页。

^② 转引自周国全等著《王明评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





1937年11月29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等由苏联回延安，毛泽东等到机场迎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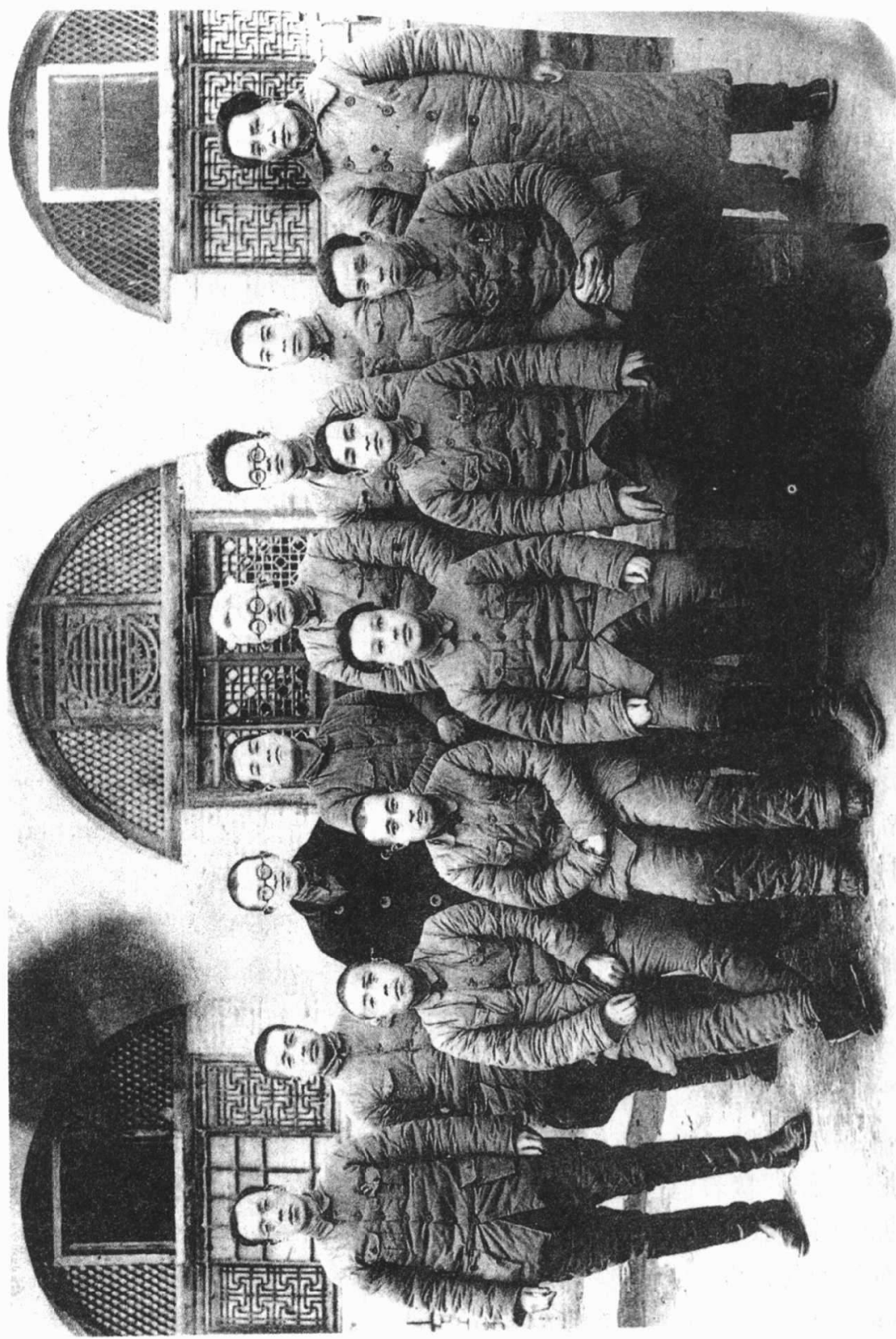
12月4日,王明在《解放》杂志上发表文章,一方面大肆诬蔑陈独秀为“土匪”,一方面在党中央开会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之前,擅自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透露了共产国际的指示精神,以敲山震虎的手段向毛泽东、张闻天施加政治压力,意图在于表示自己具有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的特殊身份,唯有自己能够先得国际指示又最有资格来传达乃至贯彻国际的指示。

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政治局会议。王明做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右倾口号,否定毛泽东过去制定的许多防范国民党的策略主张,公然与同年8月毛泽东、张闻天主持召开的洛川会议精神唱起“对台戏”。在王明的“高压”之下,多数领导人对以往的工作做了检讨,认为过去“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夸大了对右倾的危险”,“王明对许多问题的提法很好”。张闻天甚至承认说:这些错误,我与毛泽东要负责的。会上,王明没和任何人商量,私自提出一个“七大准备委员会”名单,把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下降到第六位,把自己上升到第二位,只在毛泽东之后,企图取张闻天而代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与毛泽东党、政分权。鉴于王明特殊的政治背景和政治身份,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书记处书记,连同以前的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博古5位书记,使中央书记处书记达到8位。同时,接受王明的提议,决定成立党的“七大准备委员会”,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5人组成秘书处,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会议还决定王明兼任新设置的长江局书记,并以中共中央代表团团长的公开身份驻武汉。在王明赴武汉后,又出任新创刊的《新华日报》董事长,掌握了中共中央在国统区的宣传大权。很显然,刚刚回国的王明一跃成为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共党内第二号人物。

会上,王明还就毛泽东、张闻天与陈独秀商议合作抗日之事大发雷霆:“我们和什么人都可以合作,只有托派是例外。在国际上我们可以和资产阶级政客、军阀、甚至反共刽子手合作,但不能与托洛茨基的信徒合作。在中国我们可以与蒋介石及其属下的反共特务本人合作,但不能与陈独秀合作。”接着,王明以斯大林提出托派“已变成外国侦探机关所雇佣的匪徒侦探、破坏者、危害者和杀人犯的卑污的无原则的匪帮”为依据,对陈独秀恶毒进行人身攻击,大骂陈独秀是“杀人犯”、“汉奸”、“每月领取300元津贴的日寇间谍”。

有人忍不住提出:“陈独秀与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说陈独秀是日本间谍并非事实。”王明更加蛮不讲理地说:“斯大林正在雷厉风行地反





1937年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图为与会者合影。前排中间就座的是王明。

托派,而我们却要联络托派,那还得了!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反对托派,不能有仁慈观念。陈独秀即使不是日本间谍,也应说成是日本间谍。”

张国焘后来回忆说:王明还进而主张加强对托派及其他反党分子的斗争。他说联共党内有许多托派和反党分子,难道中共内部就太平无事吗?中共内部必然隐藏着许多托派和其他反党分子,只是我们两条战线的斗争不够彻底,没有发现出来罢了。因此,现在绝不是和陈独秀恢复合作,而是加紧反托派。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①

为了把陈独秀彻底搞臭,王明在会后立刻加大了宣传攻势。1938年1月,罗汉在武汉见到周恩来,曾提出章汉夫的文章称陈独秀为“匪徒”不妥,周恩来解释说,原稿中的“匪徒”两字,是他亲笔勾去的,后来不知怎么搞的,又被误植上去了。^②“误植”是不可能的,显然是编辑背着周恩来贯彻王明指示的结果。同时,王明回国后发现美国作家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译本,书中记载了毛泽东对于陈独秀早年活动(建党前后)的客观评价等,认为这不符合反“托匪汉奸”运动的政治形势,马上命令各地禁售。几天后,王明抛出了杀伤陈独秀的重磅炸弹,康生那篇文章迅速发表,在社会上产生强烈反响。接下来,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指示,2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做了开展“反托匪汉奸”运动的动员,发布党内通告,公布“中国托匪”名单,首当其冲的就是陈独秀^③,这无疑对正在兴致勃勃忙于抗日宣传的陈独秀当头一棒,最终导致中共中央与陈独秀的合作谈判告吹。

应该说,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使得王明暂居上风。此后,王明变本加厉,公然在武汉另立“第二中央”,与延安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分庭抗礼,向毛泽东的政治地位发出挑战。他拒绝在武汉发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不经毛泽东同意就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并以王明、周恩来、博古的名义直接向各地及八路军总部发布指示性意见;当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王明应留在延安时,政治局却出人意料地否决了毛泽东的提议;更让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在张国焘叛变,朱德、彭德怀、项英经常去武汉,王稼祥、任弼时常驻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420~424页,东方出版社,1991。

② 参见罗汉致周恩来等人的公开信。

③ 此文件为国民党方面所收藏,转引自郑学稼著《陈独秀传》。



莫斯科的情况下,王明居然提出延安中央书记处不具合理性的问题,指责毛泽东、张闻天等不应以中央书记处的名义发布指示和文件。后来毛泽东曾感慨地说:“十二月会议后中央已名存实亡。”“我的意见出不了我的窑洞。”“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是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好在中共党内矛盾很快就被反映到莫斯科。1938年6月,季米特洛夫在听取了任弼时关于中共的情况介绍后,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王明等人不要再吵了。”王明“这个人总有些滑头的样子”,“在莫斯科时就总是好出风头,喜欢别人把他说成是中共领袖”。^①

季米特洛夫这时对王明态度的转变,有着一个微妙的政治背景。不久前,王明的后台老板米夫已经在斯大林“肃反”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遭到清洗,米夫的倒台不仅使王明失去了一个强有力的保护伞,而且促使斯大林对米夫一手扶持起来的干部表现出严重的不信任。

193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这一指示。紧接着,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第一次在党中央的会议上代表中共中央做政治报告,康生、陈云明确提议应当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总书记。王明意识到大势已去,不得不急忙见风使舵,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今后要像众星捧月一样拱卫在毛泽东的周围。王明争夺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权的企图就这样彻底失败了。此后,王明离开了党中央的领导岗位,而此时身受王明迫害的陈独秀已黯然离开武汉,迁居四川江津,远离现实政治斗争的漩涡了。

再次是中共与托派组织之间对立斗争的影响。

中国的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居住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多次发表文章,指责中共搞第二次国共合作是“要把中国工人运动在政治上交给蒋介石及国民党,这是一种更可怕的罪恶”。中国托派第五个“临委”马上贯彻托洛茨基的指示,通过了《目前抗战中我们的任务与策略的决议》,再次攻击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一种“彻底投降”,“完全堕落为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派”,“是依附于一派资产阶级以反对另一派资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欺骗和压迫民众之天然工具”。针对王明1937年12月在《解放》杂志上发表的污蔑陈独秀是“匪徒”的文章,一些托派成员在武汉《大美晚报》上发表文章,称王明的言论“显然是斯大林指令的”,“他从莫斯科回来的重大任务,就是……用捏造、罗织、绑架、暗杀等

^① 参见金冲及等著《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



一切惯用的手段来有组织的〔地〕杀害一切异己”。

托派的这些言行,在中共党内造成了一定的思想混乱,对于其他进步人士则产生了一定的欺骗性和煽动性,也给中共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政治影响。于是,为了反击托派攻击中共的言行,中共中央最终默许了王明等人对陈独秀采取的过火行动。王明在12月会议上那番话,之所以使得“举座默然”,原因正在这里。之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反托匪汉奸运动”,康生这篇文章的发表更是对这一运动起到了火上加油、推波助澜的作用,许多地方“肃托”扩大化,产生了很坏影响。

1938年秋,湖西(江苏、山东、河南、安徽)边区根据地在“肃托”过程中,发现了所谓“托派暴动计划”,有600多名党政军干部被捕受审,300多人被杀,整个苏鲁豫皖边区根据地的党组织一度陷于瘫痪,损失极其严重。直到次年11月一一五师挺进湖西,罗荣桓政委采取了紧急措施,才制止了这一事件的蔓延和发展。

1983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下发17号文件,对湖西根据地“托派暴动”案正式进行了平反昭雪,指出:“这一次以肃清‘托派分子’和‘托派组织’为目的的肃托运动,是毫无事实根据的。因此,这一事件不是扩大化的问题,而是一起严重的冤假错案。”^①

这种复杂的历史背景,注定了陈独秀必定再一次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七十一

第二天一早,罗汉便领着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国民党教育部次长段锡朋前来探望陈独秀。

王星拱道:“仲甫兄,我们从报上看到诬蔑你是日本间谍的文章,甚感吃惊。众所周知,你为人一向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你的生平事业和抗战言行国人尽知。罗先生说你不愿出来辩解,那是你心胸豁达,可朋友们会为你站出来主持公道的,这件事总有水落石出之时。”

段锡朋道:“所谓汉奸一说,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和诬陷,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根据。仲老清高一辈子,蒋委员长诺政府部长职位,

^① 中组发〔1983〕17号文件转发山东省委《关于对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



仲老都不为所动，岂能为区区300元收买，捏造的手法也太拙劣了。”

罗汉道：“康生的文章说我从‘九一八’之后便开始领取日寇津贴。我那时刚从国民党监狱出来，住在上海连饭都吃不上，这种情况中共党内有许多同志亲眼目睹，他们可以出来做证。还说我和仲甫兄在1937年6—7月间勾结美国侦探在上海、北方建立托匪日探组织。事实上，那时候仲甫兄尚在南京狱中，我则早已脱离托派，在上海工厂做工，从未去过南京，也未见到仲甫兄，如何‘勾结’？”

陈独秀恨恨地说：“他们提到的那个美国侦探肯定是指格拉斯，这个外国佬一向和我合不来，就是他将我开除出托派的，说与我合作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罗汉又道：“每月接受‘300元津贴’的说法更是荒唐。半个月前，王明发表文章还说，托派分子张慕陶、徐继烈等每月从日寇的华北特务机关部领取5万元津贴。收买一般分子每月尚需5万元，而收买他们的领袖却只花区区300元，岂不怪哉？仲甫兄也太廉价了吧。众所周知，仲甫兄一篇论文的稿酬就可得300元，他又怎能为区区300元出卖人格，完全是胡说八道。”

段锡朋道：“文章说仲老和唐有壬谈判更是荒唐。唐有壬早在1935年就被刺身亡，现在又突然说他和仲老谈判，来一个死无对证，让你有口难辩，其用心甚奸。康生其人实在歹毒，将来必成大奸。”

陈独秀道：“非常感谢各位这么信任我，我是不准备声辩的，也没什么好声辩的，说多了倒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当年中共让我声明退出托派，我没声明；现在说我是‘汉奸’，我同样不准备声明。随他去吧，自有公论。”

王星拱道：“仲甫，我看你气色不太好，千万不要上火，要注意保重身体。这件事我们会为你作主的。”

陈独秀感动地道：“疾风知劲草，日久见人心。每逢我遇难，各位总是站出来为我奔波，独秀真是感激不尽，无以回报，只能倾尽全力，宣传抗日，以报答各位相互知遇之恩。”

康生这篇《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的文章发表后，顿时舆论大哗。然而，他又拿不出陈独秀是“日本汉奸”的证据，这就使社会各界人士对中共及其执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一时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也为那些热心反共的人提供了口实，别有用心地乘机搅浑水，唯恐天下不乱，使得事件更加复杂，矛盾愈加升级。

首先站出来为陈独秀辩诬的是国民党上层人士和无党派进步人士。



他们均是陈独秀多年好友或当年的学生。1938年3月15日,汉口《大公报》、《武汉日报》、《扫荡报》等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发表了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国防参议会参议员、江苏省教育厅长周佛海,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所长、中央大学教授傅汝霖,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梁寒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高一涵,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张西曼,国防参议会参议员陶希圣,国民党中央立法委员林庚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段锡朋9人联名的公开信。信中指责说:“中国共产党内部理论之争辩,彼此各一是非,党外人士自无过问之必要。近来迭见共产党出版之《群众》、《解放》等刊物及《新华日报》,竟以全国一致抗日立场诬及陈独秀先生为汉奸匪徒,曾经接受日本津贴而执行间谍工作,此事殊出情理之外。独秀先生生平事业,早为国人所共见,在此次抗战中之言论行动,亦国人所周知。汉奸匪徒之头衔可加于独秀先生,则人人亦可任意加诸异己。此风断不可长。鄙人等现居武汉,与独秀先生时有往还,见闻亲切,对于彼蒙此莫须有之诬蔑,为正义,为友谊,均难默缄,为此代为表白。凡独秀先生海内外知友及全国公正人士,谅有同感也。”

这封公开信发表之后,立刻在武汉三镇引起强烈反响。王明控制的《新华日报》迅速做出反应。

3月16日,《新华日报》即针对上述联名信发表短评《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称:“陈独秀是否汉奸,首先应该看陈独秀是否公开宣言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行动以为断。”“由别人越俎代庖,均是无济于事。”短评还说:“陈独秀虽然声明了他与托派汉奸没有组织关系,可是直到今天还是与托派思想结在一起,不是没有道理的。”短评甚至武断地说:“陈独秀自从被中国共产党开除以后,随着整个托派的堕落反动而走入完全反革命的道路。”^①

这篇短文有3点地方在明显地强词夺理。

首先,悄悄地把“托匪”改称为“托派”,但又把“托派”与“汉奸”混为一谈,概称之“托派汉奸组织”,模棱两可。同时,将思想认识问题变成政治上的敌我问题,偷换概念。

其次,文章因为无法提供陈独秀的“汉奸”证据,便强调证明正伪的方法不在于证据,而在于当事人的言论态度,这显然在逻辑上是说不通的。

再次,暗示别人无权为陈独秀辩诬,否则便是越俎代庖、多管闲事。

《新华日报》同时刊登了另一篇短评,说:“当此国共两党亲密合作的



^① 《新华日报》1938年3月17日。



时候,国民党同志不应把反对托派汉奸的斗争视作共产党内部理论之争辩”,而应“视作是全国人民的责任,同时也是国民党同志的责任”。

3月17日,《新华日报》又一次发表短评《再论陈独秀是否托派汉奸》,但依旧是老调重弹,以攻击为主,并未拿出事实证据。

王明、康生这种强词夺理、以势压人的蛮横行径,更加引起公愤。民主人士沈钧儒对此愤而不平,也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不赞成给陈独秀扣上汉奸帽子。接着,张西曼又给《新华日报》写信声明他为什么敢负责地为陈独秀辩护。他说:“因为他出狱后,做过数度的访问。由他那抵抗倭寇侵略的坚决态度和我所创中苏文化协会的伟大使命以及中苏两友邦联合肃清东方海盗的热烈期望中,可以证明他至少是个爱国的学者……大难日殷,我们一般许身国事的志士,应该痛定思痛,互相谅解……万不能稍存意气,重蹈覆辙,骨肉相残,殃民祸国。这是我频年最诚恳的希望和努力之点。”

此时,性格倔强、不怕打、不怕压的陈独秀,见到朋友们在他蒙受如此之大的不白之冤时,敢于站出来为他进行辩护、主持公道,心中大感欣慰,更觉友情之重。然而,当他看到《新华日报》一而再、再而三、变本加厉、连篇累牍地刊登短评,对他进行恶毒攻击诬蔑时,他越发愤怒,终于不再沉默,决定自己出来辩诬。



七十二

3月18日,陈独秀奋笔疾书,给《新华日报》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公开信,但《新华日报》拒绝发表。3月19日,《武汉日报》全文发表了此信。

信的开头叙述了他出狱初期在南京、武昌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友好地接触以及“还有希望我回党的意思”,而现在“忽然说我接受日本津贴充当间谍的事,我百思不得其故。顷见本月贵报短评,乃恍然大悟,由此短评可以看出,你们所关心的,并非陈独秀是否汉奸的问题,而是陈独秀能否参加反对托派运动的问题”。

接着他满腔激愤地说:“你们造谣诬蔑的苦心,我及别人都可以明白了。你们对我的要求是:‘他如果不甘与汉奸匪徒为伍,他应该公开坦白地宣言他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并在实际上反对托派汉奸行动。’我坦白地告诉你们:我如果发现了托派有做汉奸的真凭实据,我第一个要出来反对,否则含沙射影、血口喷人地跟着你们做啦啦队,我一生不会干这样昧



良心的勾当。”

他又反驳道：“受敌人的钱充当间谍，如果是事实，乃是一件刑事上的严重问题，决不能够因声明脱离汉奸组织和反对汉奸行动，而事实便会消灭。是否汉奸应该以有无证据为断，决不应该如你们所说，陈独秀是否汉奸，要由陈独秀是否公开声明脱离托派汉奸组织和反对托派汉奸行动为断。除开真实的证据而外，声明不声明，并不能消灭或成立事实呵……在政府机关未断定是否汉奸以前，任何私人无权决定他们为汉奸，更不容许人人相互指他人为汉奸，以为政治斗争的宣传手段。”

信中还说：“经过长期入狱和战争中的交通梗塞，中国是否有托派组织存在，我不甚知道。”“来武汉后……为避免增加抗战中纠纷计，一直未参加任何党派，未自办刊物，我所有的言论，事实胜于雄辩，我以为任何声明都是画蛇添足。”

他又说：“有人要求我公开声明脱离‘赤匪’，我曾以为这是画蛇添足而拒绝之。我现在对于托派，同样也不愿做此画蛇添足之事。你们企图捏造汉奸的罪名，来压迫我做这样画蛇添足的事，好跟着你们做啦啦队，真是想入非非。”

信的最后，他言词极为激烈地斥问王明、康生：“你们向来不择手段，不顾一切事实是非，只要跟着你们被牵着鼻子走的便是战士，反对你们的便是汉奸，做人的道德应该这样吗？”

应该说，陈独秀这一自辩，至少在否认自己为“汉奸”的问题上，是理由充足、逻辑严密、富有驳斥力的。

3月20日，《新华日报》针对陈独秀这封公开信，又发表《关于陈独秀来信》的短评说：“以曾经是中国托派首领身份的陈独秀，声明他今天未参加汉奸党派……在托派汉奸已经成为全国人民公敌时，陈独秀有这种表示，足见其尚有羞耻之心，这是值得赞同的事。”接着，短评指责陈独秀要求拿出证据，是“无赖的口吻”，“装腔作势佯作不知道”。又狡辩道：“陈独秀虽然声明了他与托派汉奸没有组织关系，可是直到今天还是托派思想的俘虏，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把陈独秀和托派联结在一起，不是没有道理的。”

这种依据意识形态和政治态度来强行指控陈独秀为“汉奸”的说法，更加引起公愤。不久，罗汉发表了一封很长的致周恩来的公开信，详细叙述了1937年8月至10月间他与叶剑英、博古、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共领导人“很融洽”的会见情况，驳斥了王明、康生对陈独秀和他本人的诬陷。这时，不仅陈独秀与中共已是剑拔弩张，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也乘机



对共产党发起围攻,事态日趋扩大与严重。

后人在评价这段历史时写道: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并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时候,王明等人以中共负责干部的身份把陈独秀打成“汉奸”,“使广大有正义感的人们十分费解和不满,从而对我党及其执行的统一战线政策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并为那些热心反共的人们提供了口实,致使我们党的威信蒙受严重的损失”。^①

在这种十分困难和复杂的形势面前,时任中共长江局委员兼宣传部长和军事部长的周恩来,为了捍卫党的利益,对各方面人士做了大量的调停工作,以求事态的缩小乃至平息。他几次托陈独秀的老友重庆《新蜀报》主编周钦岳去看望陈独秀,希望他“不要行动,不要发表文章”。^②另外,又专门派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从长沙请来一位神秘人物调解纠纷。此人便是陈独秀当年的学生、部下何之瑜。何之瑜的出现,最终对事态的平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何之瑜原名何资深,生于1898年,湖南安乡人,是刘少奇前妻何宝珍的哥哥。他早在北大上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做过湘潭县委书记、湖南省委书记,是党的五大代表。秋收起义时任湖北特派员,后参加党的六大,历任山东省委组织部长、山东省委书记、上海总工会秘书长等职。



何之瑜对陈独秀可谓是忠心耿耿。当年陈独秀公开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时,何之瑜和夫人张以森是81个签名者之二。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中共中央为了挽救他们,曾在1930年3月出版的第86期《红旗》上刊登致签名者的一封信,希望他们在“一星期内立即作一声明书,并做反取消派的文章,限一星期内必须交到中央”。何之瑜、张以森拒绝发表反陈文章,便被开除出党。之后,他便跟随陈独秀从事托派活动,曾任托派“临委”秘书长,1931年5月被捕,直到1937年才获释,出狱后厌倦了政治,便隐名埋姓,将何资深改名为何之瑜,躲到长沙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去了。但不久,何之瑜又和陈独秀走到一起,从四川重庆到偏僻小城江津,始终照顾陈独秀的生活,直到陈独秀病逝后为之送丧。

何之瑜和毛泽东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大革命时期他和毛泽东同在湖南省委工作,何之瑜任省委组织部长,毛泽东任省委书记。马日事变后,他接替毛泽东出任湖南省委书记。他们又同是秋收起义的负责人,毛泽东是中共中央特派员,主持整个湘鄂赣边区起义工作,何之瑜是湖

^{①②} 唐宝林:《旧案新考》。

北省委特派员,在岳州负责湘北暴动工作。分别时,何之瑜还专门送给毛泽东两样礼物,一本《水浒传》,一张湖南农村的“邮政图”,后来这张图给毛泽东在井冈山打游击帮了大忙。何之瑜的妻子张以森和毛泽东也非常熟悉,大革命前她曾与母亲一起在长沙掩护过做地下工作的毛泽东,后来又在武汉为毛泽东抄写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由此可见,在陈独秀和中共的王明等人闹得不可开交的紧要关头,周恩来想到把何之瑜请出来调解纠纷,可以说是费尽苦心,其意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来这种真心解决问题的态度,使陈独秀深受感动。陈独秀一向对周恩来印象不错,认为他是有政治头脑、善于处理问题的人。所以,他听了周恩来的话,采取了较为克制的态度,不再就此事公开发表言论。到1938年4月后,公开的论争渐渐趋于平息。

但是,平息只是暂时的,由于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所以无论是王明等人还是陈独秀,都耿耿于怀,心存芥蒂,并不时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周恩来就当时所处位置只能将事态控制在不公开化的程度,其他的,他也就无能为力了。

不久,新中国出版社出版了陈绍禹(王明)、徐特立等人所著的《托派在中国》一书,书中收入了宣传反“托匪汉奸”运动的文稿10篇,其中即有陈绍禹的《托洛茨基是什么》,也有康生的《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的托洛茨基匪徒》,其他文章也大多贯穿一个共同的主题,即谓陈独秀为代表的托派不仅是共产党的敌人,而且也是国民党的“敌人”,说陈独秀“现在一切的言论和行动,完全是于日寇有利的,完全是为日寇服务”,由此要求国民党方面把陈独秀的文章“作为汉奸的东西”来加以查禁。^①

陈独秀马上反唇相讥,在《我们为什么反对法西斯特》一文中,采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笔法讥讽《新华日报》:“凡是攻击法西斯特的人们,便应该自己反省一下,有没有和法西斯特同样的行为,不要在别人是‘暴行’、‘横行’、‘钳制’、‘封锁’、‘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在自己便是政治斗争的正当手段,说什么‘只问目的,不择手段’!”^②

1938年4月8日,陈独秀余怒未消地给何之瑜写信说:“徐老先生所说‘事情是解决了的’,真使我莫明其妙!罗汉的事,有他自己与你们的信,我不愿多说。关于我,恐怕永无解决之一日。他们自己虽然没有继



① 普丁:《彻底肃清托洛茨基匪徒》,载《托派在中国》,新中国出版社,1938。

② 此文刊《政论》第1卷第29期,1938年11月15日。

续说到我,而他们正指使他们汉口及香港的外围,在刊物上、在口头上仍然大肆其造谣污蔑。我在社会上不是一个初出茅庐的人,社会自有公评。他们无情理的造谣中伤,于我无损,是他们自暴其丑陋而已。我拿定主意,暂时置之不理,唯随时收集材料,将来到法庭算总账。”^①虽然此后陈独秀信守了对周恩来的承诺,不再在公开场合就此事发表言论,但他在以后的有关抗日文章中明显增加了攻击中共路线政策的言论。

这一曾经轰动一时的“托匪汉奸”案,在陈独秀早已千疮百孔的心灵又划上一道难以愈合的伤痕,对他晚年的思想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案虽然主要是由王明、康生等人挑起,但因为当时王明的地位决定了他的言行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是代表中共中央的,因而陈独秀也就完全把这看作是中共对于自己的诬陷。这就彻底粉碎了他原想与中共“合作抗日”的愿望,加深了对中共的敌对情绪,同时也加剧了他对指使王明发起反“托匪汉奸”运动的后台老板斯大林、共产国际的强烈不满,促使他形成了以否认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体制和共产党民主集中制组织原则为核心内容的“最后的政治意见”。从此,他与党的关系再一次也是永远地破裂了。托洛茨基则乘机加紧拉拢他,也就在客观上再一次使他靠近了本来不想再发生联系的中国托派组织,最终使他离党越走越远。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托匪汉奸”案给了陈独秀晚年政治生涯以致命一击。



^① 此函内容转引自唐宝林等编《陈独秀年谱》。



第十六章

“托匪汉奸”案使得陈独秀声誉大损，寄予厚望的“独树一帜”政治活动也付诸东流。无奈之中，他不得不离汉入川，隐居小城，苟度余生。

七十三

王明、康生诬蔑陈独秀为“汉奸”带来的负面效应是两方面的：既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中共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又使陈独秀的声誉大大受损。它给陈独秀带来的直接负面影响就是“独树一帜”政治活动的流产。



首先，组建联合战线的努力失败。1938年初，陈独秀在武汉和谭平山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及沈钧儒、邹韬奋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进行了接触。由于这两个组织的政治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介于国共两党之间，陈独秀和谭平山、沈钧儒、邹韬奋又是几十年的朋友，因此商议之初，一拍即合，决定三派联合，组成“联合会议”，共同抗日。但是，此时王文元、濮德志对他的计划不理解也不支持，陈独秀让他们去出席“联席会议”，他们均表示拒绝。陈独秀只好又请罗汉去参加会议，罗汉也没有兴趣，应付了两次便不再去了。到了“托匪汉奸案”突然发生，虽然第三党和救国会并不相信陈独秀是汉奸，沈钧儒就曾发表声明，不同意中共的指控，但无奈他们深知此案绝非空穴来风，政治压力太大，得罪不起王明等人。邹韬奋在跟陈独秀谈及此案时，就意味深长地暗示说：

“这是政治问题。”^①于是，他们不得不割断与陈独秀的联系。

其次，联络民主人士毫无结果。陈独秀还想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拉拢部分无党派人士加入自己的联合战线行列。他曾经派濮德志专程到郑州，找到时在河南大学教书的罗章龙。罗章龙、何孟雄当年曾经因为反对开除陈独秀党籍，最终和王明、李立三闹翻，另立中央，被开除党籍。陈独秀原以为请罗章龙出山不成问题。不曾想，罗章龙对濮德志说：“陈先生的好意我非常感谢。不过我现在正致力于教学，无意搞政治运动。”濮德志回来后把罗章龙的话告诉了陈独秀，并说：“我看他房间有一个摩登女士，两人像是谈恋爱。”陈独秀回想起罗章龙当年冲锋陷阵的英姿，怎么也想像不出他会变成这样的夫子形象，只好无可奈何地道：“人各有志，随他去吧。”^②他接着让濮德志到长沙去找同样被中共开除党籍的老朋友高语罕，又碰了软钉子。那些原来跟他来往密切的民主人士，碍于政治斗争的微妙，纷纷对他敬而远之。



再次，“军运”活动中途夭折。陈独秀“独树一帜”政治活动寄予希望最大的是策反国民党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本来事情进展得十分顺利，双方已达成协议，由陈独秀派王文元、濮德志等人到一七九师做政治工作。可就在王文元等人已经买好火车票临动身的前夜，何基沣突然接到“着毋庸回任”的调令。不久，国民党政府将七十七军与张自忠的五十九军组成三十三集团军，何基沣被任命为七十七军副军长。这使陈独秀的“军事图谋”半途而废。至于何基沣的情况为何突然发生变故，原因有二：一是陈独秀虽然被释放，但仍受着国民党特务严密的监视，而且这个监视任务是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布置给当时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的，因此陈独秀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国民党特务的眼睛。这样，蒋介石十分严密地掌握着陈独秀与何基沣的联络，终于在关键时刻掐断了这种联系。二是中国共产党得到类似情报后有意做了相应的工作。这期间，周恩来几次亲自找何基沣谈话，并安排他于1938年2月间秘密赴延安，1939年1月何基沣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独树一帜”政治活动的流产，对他来说是一种不小的刺激。这时的陈独秀，可以说真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无限怅惘。此时抗战形势趋紧，国民党正面抗战的主战场节节败退，这使陈独秀对国民党坚持抗战的希望完全破灭，哀叹“开战前国民党政府没有作战的意志，仓促应

① 参见郑学稼著《陈独秀传》。

②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1期，中华书局，1980。



战,最不可少的准备太不够,甚至某些部分简直没有。开战后,复以反革命的方法,来执行民族革命的任务,所以军事失败”。对共产党,他则是满腹怨恨。他认为,若不是王明、康生凭空来一场“托匪汉奸”案,他的“第三条道路”绝不会中途夭折。对民主党派,他则哀其不争,太容易动摇,软弱无能。

然而,即使在遭受如此严重失败和从未有过的孤独的时候,陈独秀也没有放弃做人的原则,绝不依附任何政治势力。

不久,又发生了一件出人意料的大事情,使他大受刺激。

1938年4月4日,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的张国焘借祭黄帝陵之机,经西安跑到武汉隐藏起来。4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其中讲到张国焘脱党前“曾见过陈独秀一次”,在党外寻找反党的同盟者。

陈独秀听到这种说法后嗤之以鼻,给长沙的何之瑜写信说:“张特立到武汉事,你们想已在报上看见,我并未遇见他,有人造谣他已来看我,真可笑。”

然而几天后,张国焘在武汉警察局长蔡孟坚的帮助下,果真找到了已搬到汉口德润里居住的陈独秀。

张国焘又名张特立,和陈独秀的关系非同一般。北大时,一个是老师,一个是学生。五四运动时,一个是总舵手,一个是学生领袖。党的一大时,一个是总书记,一个是组织部长。一直到大革命失败,他都是陈独秀班子中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被撤销总书记职务,张国焘也因南昌起义失败受到处分。不同的是:陈独秀因为反对党的六大路线,最终被开除出党。张国焘则几经沉浮,一度成为中共党和军队的主要负责人。长征时期,他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党和红军,受到党中央的严厉批评和处分。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心中不满,终于背叛了中共,当了可耻的叛徒。

这次两人10多年未见,今非昔比,都是被中共开除党籍之人,见面时不免唏嘘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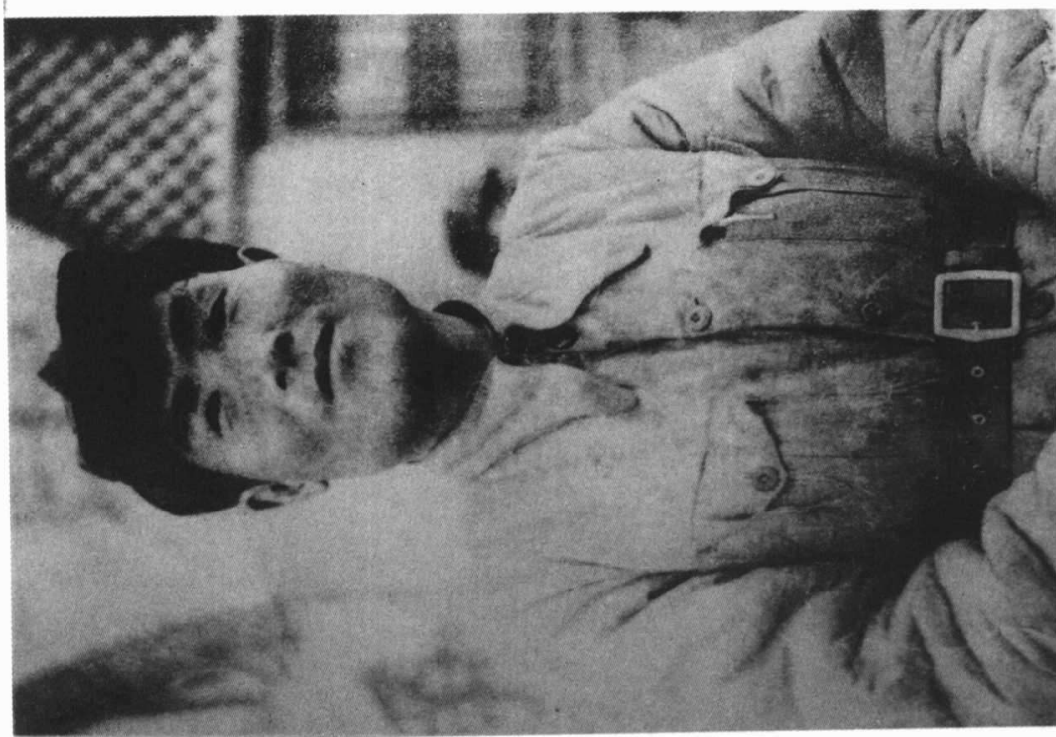
陈独秀问:“你不是在那边一直干得很好吗?”

张国焘唉声叹气,将长征途中另立中央之事说了一遍,接着说:“一个毛泽东我就不是对手,现在王明回来了,我的日子就更加不好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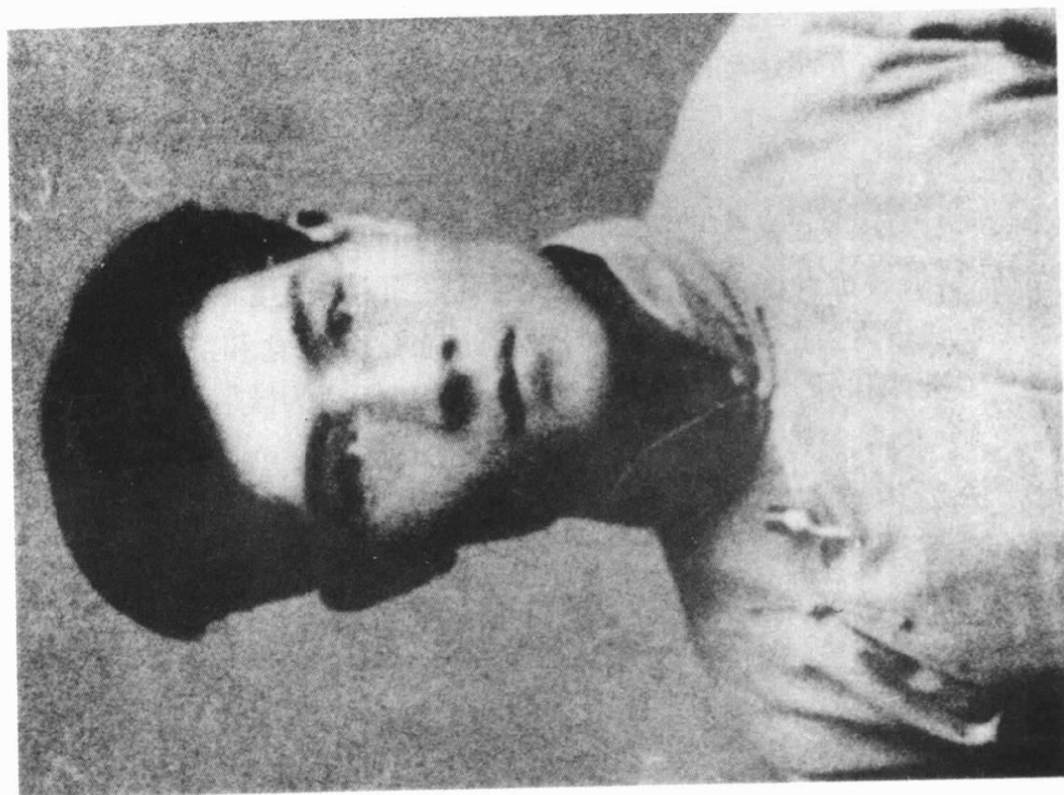
陈独秀问:“王明又能把你怎么样?”

张国焘道:“你可不要小瞧这个王明。他回来就说我长征途中另立中央是受托派利用。斯大林最恨托派,王明把我和托派挂上钩,明摆着





延安时期的张国焘



学生时代的张国焘

是要将我置于死地。他在新疆迫害俞秀松定的罪名就是托派。再这样下去,我只有死路一条。”

陈独秀又问:“王明不是正和润之争权吗?”

张国焘冷笑道:“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哪里是毛泽东的对手。别看他现在张牙舞爪的,早晚是老毛的手下败将。我连王明这小子都斗不过,哪里还敢再和老毛过招,只好三十六计走为上。”

陈独秀从张国焘自叹弗如、甘拜下风的态度上,感到了毛泽东政治地位的稳定,暗赞毛泽东的高明。他愣了半晌才问:“那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我还能怎么办,前两天去见了蒋先生,只好说兄弟在外糊涂多时。”张国焘说着,见陈独秀阴沉下脸,知道他十分反感蒋介石,忙解释说:“走老蒋这条路子我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陈独秀断然道:“走投无路也不能投靠老蒋。”

张国焘没注意陈独秀的冷淡,又兴致勃勃提出重建第三党的事情。他说:“我还是10年前那个意见,由你出山再发起成立一个新的共产党,我们从头再来。”

陈独秀摇摇头,淡淡地说:“你我都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成立一个党谈何容易,我们当年费了多么大的劲,几起几落,牺牲了多少同志,才有今天的局面。现在看来,一个阶级只能有一个政党。我们再搞,能搞得比毛泽东更好吗?”

张国焘发现,和以前相比,陈独秀不但衰老了许多,思想上似乎也更加消极,便问:“你好像没有信心?”

陈独秀冷冷地说:“没有信心,也没有耐心。”

话不投机半句多,张国焘说了一会闲话,便扫兴地告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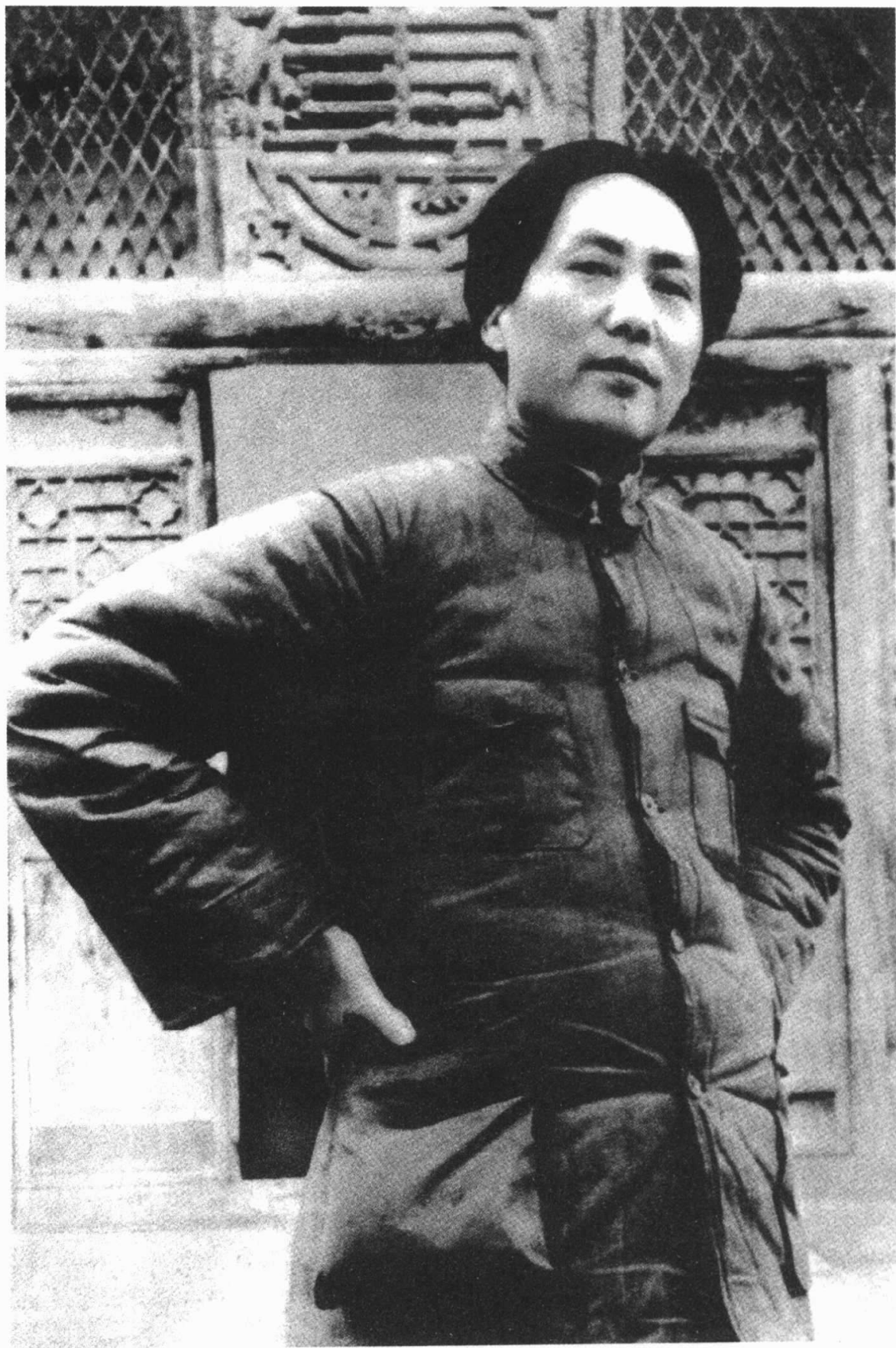
张国焘走后不几日,刘仁静突然登门拜访。刘仁静在1935年被托派“临委”开除“党籍”之后,一直单枪匹马,独往独来。此时两人寒暄一番之后,陈独秀便听出刘仁静的来意,他是想乘陈独秀目前政治设想失败之机,拉他一起重返托派工作。

刘仁静说:“你公开发表给陈其昌的信后,彭述之他们十分生气,认为你采取了‘超党’、‘超阶级’的立场,等于叛变了组织。”

陈独秀自然听得出话外之音。刘仁静单指“老彭他们”,是说此事与他无关,显然是要和陈独秀套近乎。

陈独秀不冷不热地道:“我知道。老彭不是骂我是托派的败类吗?我不怕,现在有人骂我是汉奸,有人骂我是叛徒,随他们骂去,我和老彭





抗战初期的毛泽东

到此为止,再不会一起共事的。”

刘仁静走后,陈独秀对潘兰珍说:“他今天没有达到目的,明天还会来的,我不想见他,明天到外面去看朋友。”

潘兰珍说:“他要是坐等不走,那可怎么办呢?”

陈独秀略一思索,写下一张条子,递给潘兰珍,说:“他若不走,你就把条子给他,他就不会再等我了。”

第二天一大早,陈独秀便出了门。不一会,果然刘仁静又来了,见陈独秀不在家,又看了他留下的条子,上面写道:“我不是托派,也不愿和有托派关系的人来往。”^①

刘仁静明白陈独秀有意避他,怅然无言,便转身离去了。

七十四

何去何从?自从蒙受“汉奸”冤屈大耻之后,陈独秀一片茫然,心如火燎,思绪紊乱,茶饭不思,甚至彻夜难眠。他深感武汉是个是非之地,再也不能呆下去了。

陈独秀出狱之后,一直在考虑自己晚年的生活基地问题。作为一个政治活动家,他仍然想借举国抗日之机,重整旗鼓,再干一番事业。因此,他对落脚地的选择,首先是最能适应自己政治活动的地域为原则,而没有过多地考虑生活舒适、安度晚年的问题。

胡适曾邀请他去美国,到大学谋一个客座教授,被他拒绝。^②王文元等人建议他去香港,以摆脱国民党对他的严密监视,他也未同意。^③他曾经想去延安,可突如其来的日本“间谍”案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1938年3月间,何之瑜从长沙赶到武汉调解他与中共关系时,邀请他到长沙去专心研究文字学,他看到国民党节节败退,战局变化不可预测,便谢绝了何之瑜的邀请,说:“湖南非乐土,城市将难免为战区,乡间亦不无土匪害,故决计入川。”^④

不久,国共两党之间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交锋,在武汉和重庆引



^① 参见《刘仁静谈托派问题》,转引自夏立平著《陈独秀被开除出党以后》,载《党史研究资料》第1辑。

^② 周仁生:《中国早期托匪情况之三》,载《党史研究资料》第15期。

^{③④} 转引自唐宝林等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吴玉章

起一阵风波。由于事件间接涉及陈独秀,使他的自尊再次受到伤害,直接导致了陈独秀最终“决计入川”的去留意向。

1938年6月3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举行第14次常委会,形成决议,决定恢复中共党员毛泽东、周恩来、林祖涵、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以及被中共开除党籍的陈独秀、张国焘等26人的国民党党籍。当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即发出这一决议的电讯,重庆各大报纸马上在显著位置转载。

国民党之所以有此举,是因为蒋介石并不满意目前的第二次国共合作形式,他的真实打算是通过国共合作形式使国民党吞并共产党,从而突出他一贯推崇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政策,故而出其不意,采取既成事实的做法,给中共施压。

周恩来在武汉得知这一决议后,立即致电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同时与国民党方面交涉,抗议其强加于人的单方面做法。6月4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立即起草《毛泽东、周恩来等七人紧急声明》,拒绝承认国民党监委恢复他们党籍的决议,同时派吴玉章专程赴重庆与有关报馆交涉,公开发表《声明》。

吴玉章飞抵重庆后,立刻在山城举行记者招待会,应邀到会的有《新蜀报》主编周钦岳等重庆数家报馆负责人及记者。面对重庆新闻界,吴玉章神情严肃地郑重声明:国民党恢复我党领袖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党籍,我党不能接受,其理由有三:第一,两党合作关系是否恢复民国13年之办法并未商定。第二,事先未通知与征求我党中央及我们的意见。第三,这恢复党籍的名单中,有张国焘、陈独秀等为我党开除了的人,和我们同类相待,未免滑稽,更不能容忍。鉴于以上理由,吴玉章告知报界,针对国民党这一武断决议,中共毛泽东等7人决定发表《紧急声明》。

当日晚,国民党监委张继闻知此事,立刻打电话请各报缓登《紧急声明》,并紧急求见吴玉章。他对吴玉章苦苦相求,称《紧急声明》万万不可刊登,否则将会影响国共两党合作。吴玉章回答说:“重庆各报既已公布决议,我们不能不表示态度。”张继道:“好在监委决议必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批准才能生效,尚可补救。”

于是,吴玉章、张继分别致电周恩来、蒋介石,经过一番磋商交涉,中共方面终于同意缓登《紧急声明》,作为条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此后间接声明取消监委决议。一场风波始告平息。

这次交锋的最终胜利者是毛泽东。蒋介石自作聪明,搬起石头砸了



自己的脚,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自然在背后又骂了不少娘稀匹。陈独秀则是这一事件的间接受害者。在拒绝恢复国民党党籍的态度上,陈独秀和毛泽东是完全一致的,蒋介石的尴尬和窘态更使他感到痛快至极。但是,他没有想到,中共会以蔑视的态度,公开声称“不能容忍”与他和张国焘“同类相待”,这就如同在打了蒋介石一记响亮耳光之后,又狠狠在他的屁股上踹了一脚,不免使他感到大大丢了面子,对和中共的合作也因此彻底丧失了信心。陈独秀最后坚定了入川的决心。

七十五

1938年6月,华中日军沿长江水路从东部发动了强大攻势,芜湖、安庆接连失守;北部日军攻占开封之后,从陇海路继续向西推进,郑州岌岌可危。武汉以北千里大平原已无险可守,而国民党主力部队经过台儿庄会战和徐州会战的拼搏消耗,已经疲惫不堪。蒋介石知道:日军目前正处在锋芒锐利阶段,往往利用中国军队死守城池,而将其聚歼,因此死守武汉是对日军有利。蒋介石心里更清楚:武汉之战必须要打,而且要狠打;武汉三镇必须要守,而且要高喊死守。这不仅是为了从战略上吸引日军,消耗其战斗力,更是为了向国人和世界证明,他蒋介石对抗击侵略者是尽心尽力了。



6月初,日机开始轮番轰炸武汉三镇,中国空军起飞迎击,规模空前的武汉空战拉开了序幕。在武汉空战中,中国空军将日军有名的木梗津轰炸机联队几乎全歼,而本来就很弱小的中国空军也在空战中消耗殆尽,无力再战。华中平原似已成日军囊中之物。

1938年6月9日,再也无计可施的蒋介石使出最后的“杀手锏”,在河南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以遏止日军的进攻势头。瞬间,黄河之水天上来,似万马奔腾,汹涌咆哮,一泻千里。第二天,不知是天公震怒,还是雷神助战,突然雷霆大作,暴雨倾盆,整整一天,暴雨不住,河水猛涨,浪高三尺,远远望去,一片汪洋。猛兽似的洪水,见人吞人,遇村毁村,豫东皖北44个县市54000平方公里的土地顿成泽国,民众死伤者和无家可归者不计其数。

黄河决口前,日军之第1军的4个师团各一队人马已切断郑州以南的平汉路线。决口后,这两路日军没有了退路,被中国军队围而歼之。日军第2军主力师团此时正好推进到开封以南地区,突被黄河拦住去

路,只好望洋兴叹。

日军陆路被阻,便加大了空中力量。7月初,大批轰炸机连续两次轰炸武昌军事委员会驻地。

蒋介石完全明白,敌人突然出动这么多飞机,集中轰炸这小小的地方,是要将他置于死地,不由得怒火中烧,大骂日本鬼子娘稀匹。但是,骂归骂,打是打不过的,他只好强压怒火,加紧将国民党政府从武汉迁移重庆。

陈独秀正好住在武昌被炸区附近,一家人每天东躲西藏,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此时,他的故乡安庆已经沦陷,养母谢氏和三子松年一家也逃到武汉,与他住在一起。6月6日,包惠僧费尽周折,好不容易为陈独秀弄到去重庆的船票,一家人正要离去,阔别30年没见面的大姐突然携家带口,出现在他的面前。姐弟相见,悲喜交加。3年后,陈独秀在《挽大姐》一诗中还历历在目地描写了此时此刻的心情:“三十未见姊,见姊在颠危。相将就蜀道,欢聚忘百罹。”

陈独秀为难地对包惠僧说:“我怎忍心撇开30年未见的老姐姐,自己先行。”

包惠僧焦急地说:“可是形势愈来愈紧,再拖下去,怕走不了啦。”

陈独秀道:“我自自有分寸,只好拜托你受累,照顾我母亲先走一步,我安排就绪,马上去赶你们,我们在宜昌会合。”

当时入川少有公路,更没有铁路,只有走长江。宜昌以上的三峡航道又十分狭窄,弯曲复杂,滩多浪急,险象丛生,有的地方仅容1船通过,1吨以上的轮船根本不能沿江而上,所以从上海、南京、武汉来的大船都不能直达重庆,乘客和货物必须去宜昌下船“换载”,转乘能走峡江的大马力小船,才能继续沿江进川。宜昌成了进川的必经之路。

于是,只有10万人口的宜昌城被滚滚而来的难民和源源不断运来的战时物质撑满,滞留人员最多时达到3万。人多船少,许多人为等船票一等就是半个月、1个月。从城区到码头,大街小巷都是人,所有的旅店客栈、学校都挤满了人,不少人只能露宿街头,栖身屋檐下。

7月2日,陈独秀将大姐一家安排走了以后,在北大同学会的帮助下,携夫人潘兰珍,告别生活将近1年的武汉,搭乘“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包的专轮入川了。罗汉、夏松云夫妇为了照顾陈独秀,也随船同行。

沿途险滩多达数百处,敌机还不间断地在峡江一带轮番轰炸。这艘轮船是四大银行所包,虽是逆水行舟,却比其他轮船航速快了许多,一路



上危机四伏,终究是有惊无险,不日就到了重庆。只是因为沿途码头均未停靠,便错过了和包惠僧他们商定好在宜昌会面的机会。

陈独秀到达重庆朝天码头时,周钦岳、张恨水、高语罕等人早已等候多时,见船靠岸,一起登船迎接。下船后,一行人乘坐滑竿拾级而上高低落差几十米的码头台阶,坐上停在新华路上的汽车,进入市区,在上石街15号川源公司楼前停下。这里是禁烟委员会主任李仲公的办事处。陈独秀夫妇被安排住在楼上。

次日晚,张恨水设宴为陈独秀夫妇接风洗尘。张恨水有40多岁,脑门宽阔,梳着大背头,长相不俗。他的祖籍是安徽潜山,与安庆接壤,说起来和陈独秀还是老乡。陈独秀在金陵监狱中读过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对他不藏书于名山大同感。张恨水对陈独秀更是仰慕已久。因此,两人虽是初次见面,却谈得甚是投机。

陪同做客的有高语罕、周钦岳等人。高语罕也是安徽人,早年赴日留学,回国后受陈独秀的影响,一直在安庆从事秘密反清活动,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秘书长,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1929年由于同情陈独秀被开除出党,随后参加托派活动。周钦岳则是陈延年的留法同学,早年是四川省共青团组织的筹建人之一。说起来,两人既是陈独秀的老友,又都曾是他的部下。

陈独秀一辈子浪迹天涯,唯独没有进过天府之国,因此对于重庆的一切都感到好奇和亲切,张恨水便热情地将他所知的有关重庆风土人情讲给他听。

张恨水道:“重庆有三绝。山多为一绝。开门见山,抬头见山,走路见山,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山城。它四周青山环抱,城下绿水围绕,南有滚滚东去的长江,北有滔滔不息的嘉陵江,两江汇流,重庆便成了一个弯月形的半岛,好似两条长龙托起一座变化多姿的海市蜃楼。雾多为二绝。重庆又称为‘雾都’,寒暑易季,江雾缭绕,天水一色,山城又时隐时现在一片神秘飘渺的雾海苍茫之中。燥热为三绝。大雾过后,红日高照,炎热夏季,气温可达摄氏40度以上,号称长江流域‘三大火炉’之首。”

陈独秀问:“‘重庆’之名从何而来,可有典故?”

张恨水道:“重庆是个历史古城,是巴渝文化的发祥地,相传禹生于四川,娶妻于江州涂山,就是今日的重庆。早在公元前11世纪西周时代,这里曾称为‘江州’、‘渝州’。唐朝诗人李白在《峨眉山月歌》中吟唱的‘夜发青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指的即是重庆,重庆简称‘渝’即来源于此。南宋赵淳受封恭王,镇守这里,后来他当了皇帝,将恭州升为



重庆府,取其双重喜庆之意,这就是‘重庆’名字的由来。”

陈独秀赞道:“巴渝文化源远流长,有时间我一定向您多多请教。”

张恨水道:“请教不敢当,不过陈先生既已到了重庆,有时间研究研究巴渝文化倒也不失为一种乐趣。重庆不同于中原,这里地域闭塞,道路坎坷,气候湿热,使四川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像春节拜年、十五观灯、清明祭祖、仲秋赏月以及悬酒幌、赶庙会、坐花轿、放风筝等民俗,还有重庆川江号子、铜梁龙灯、秀山花灯等,都富有浓厚的地方特色,处处反映出巴渝特色。”

高语罕道:“重庆人古怪的事情多着那,爽直中带几分鲁莽,热情中带几分狡猾,幽默中带几分土俗,认真中带几分滑稽,闲逸中带几分急躁,宽容中带几分排外,民间将其归纳为‘重庆十八怪’,很有意思的。”

陈独秀饶有兴趣地问:“哪十八怪?快快道来。”

高语罕不紧不慢地道:“70岁叫‘女娃儿’不为怪,80岁喊‘崽儿’很自在,说话着急像比赛,方言又多又古怪,火锅越热越要卖,女人的肚脐眼露在外,等等,其他我也记不住了。总之,怪得很呢。”

周钦岳也插嘴道:“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要真正了解重庆,最好的办法就是从饮食着手。重庆的川菜博采全国各大菜系之长,兼收并蓄,妙味无穷。到重庆领略巴渝饮食文化,必须品尝堪称独秀天下的重庆火锅。今天便要让仲老开开眼界。”

陈独秀担心地说:“这么热的天还能吃火锅?”

张恨水笑道:“火锅越热越要卖嘛,辣得冒汗,那才够味过瘾呀。”

陈独秀本来不爱吃辣,但被张恨水一番话,鼓动得动了心,先小心地尝了尝,虽然辣得舌头发麻,但果真是美味无穷,便放开胆子吃起来。这一顿饭直吃到月上树梢才散。

七十六

陈独秀的生活暂时倒还安然无恙。北大同学会和一些老朋友时常接济他,他自己应《时事新报》之邀担任主笔,一篇稿子三四十元,他便隔几日写一篇文章,无非是团结抗日之类。7月14日,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邀请他去演讲,他就把四川军队歌颂了一番,临了劝同胞戒掉鸦片烟。他时刻不忘记周钦岳对他的告诫,在公开场合不发表自己的观点,要写文章发表演讲无非是大路货,大家都愿听、谁也不得罪的内容。



但是,张恨水说的“重庆三绝”,对于患有高血压、十二指肠溃疡等多种疾病的陈独秀来说,大不适应。7月的酷暑闷热,令他头晕恶心,浑身无力,难以忍受。日本飞机则连连空袭,四处轰炸,令白天黑夜不得安宁。再加上这里的国民党特务多如牛毛,虽然陈独秀已脱离中共,并公开表示以抗日为重,不反对蒋介石,但国民党显然对他仍不放心,处处监视他的行动,使他总有一种如梗在喉、如芒刺背的感觉。他真有些后悔当初到重庆来的决定,但现在后悔又有何用,如今半个中国都已被日本人占领,哪里又有太平之处。每每想到这里,他就叹息不已。

陈松年在宜昌滞留了半月,好不容易也到了重庆,虽然没有和他住在一起,但经常过来看望他,这使他的烦躁的心多少得到一丝欣慰。

这一日,陈松年又来看他,闲谈之中,陈独秀又提到不愿在重庆居住之事。陈松年突然想到一人,道:“我们这次从宜昌到重庆,正巧和葛康瑜同行,听说他的舅舅邓仲纯在江津开了一家医院,混得还不错,要不我们到那里去。”

陈松年提到的葛康瑜是陈独秀二姐的小女婿。他是大户人家出身,舅舅邓仲纯是清代书法家怀宁人氏邓石如的后裔邓绳侯。那边邓仲纯是葛康瑜的亲舅,这边陈独秀是葛夫人的亲舅,算起来这门亲戚也不算太远。但是,陈独秀并不认识邓仲纯,更不愿意过寄人篱下的生活,便摇摇头说:“我们过去和邓家少有往来,怎能贸然前去打扰。再说江津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一无所知,去了之后,万一再不行,悔之晚矣。”

父子俩正说着话,一位戴着眼镜、身穿长衫的老先生推门进来。此人姓沈名尹默,浙江湖州人氏,著名学者、诗人、书法家,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任北大文科教授,五四时期是《新青年》编委,现任国民党政府监察院委员。

陈独秀和沈尹默的友谊始于30年前,那时候陈独秀刚刚和高君曼结婚,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一日无意之中在朋友家看到沈尹默写的一首五言古诗,便找上门去,张口就说:“我叫陈仲甫,昨天在朋友家看到你写的诗,诗做得极好,其字俗入骨。”沈尹默被当头棒喝,傲气尽去,从此每日闭门发愤临摹汉碑,3年之后转而临摹北魏唐体,直到俗气全无,风骨挺立,才研习行草,最终创出自己俊逸典雅的书法风格,成为一代大师,自此也与陈独秀结下深厚友谊。陈独秀到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就是他向蔡元培力荐的结果。^①

^① 沈尹默:《我和陈独秀》,载《五四运动回忆录》(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



此时陈独秀看到多年未见的老友，自然十分高兴，顿感病情好了许多。沈尹默看他憔悴的样子，劝道：“仲甫兄，你英雄一世，现在老了，身体又不太好，就不要过多参与政治、计较声名，还是安心养病为好。重庆太热，对你身体不利，若是能找一凉爽的山中居住，过一段世外桃源生活，对你是有益处的。”

陈独秀连连点头说：“尹默兄言之有理，这几天我也一直在考虑换个环境，好好调养身体。蹲了几年老蒋的大牢，弄了一身病，什么高血压，胃肠炎、心脏病，非常讨厌。我现在已是无用之人，还能跟谁计较声名，保住老命就不错了。”

沈尹默开玩笑道：“仲甫兄一辈子争强好胜，现在有了与世无争的境界，我看离大彻大悟不远了。”临别，他即兴作诗一首赠给陈独秀，诗曰：

声名晦已久，不挂齿颊间。
时乘遂入市，曲尽宜归山。

沈尹默的来访，使得陈独秀远离重庆的念头越发强烈起来，只是一时不知何处是理想的归隐之地。



七十七

说来也巧，正当陈独秀在山城不知何去何从之时，邓仲纯突然登门拜访。陈独秀见到邓仲纯大喜。他原来一直以为不认识邓仲纯，没想到这个邓仲纯就是当年与他一同留学日本的朋友邓初，只是回国之后，他改了名字。一晃30多年没有见面，两人叙起旧谊，回想当年意气风发，青春年少，而今都已双鬓发白，年过花甲，便感叹光阴如梭、年华似水。

邓仲纯道：“仲甫兄，你我这些年虽然未曾见面，但你的丰功伟业却是响彻神州，如雷贯耳。小弟不才，行医一生，碌碌无为，但每每和人谈起，却是一向以与兄为同乡、同学而自豪。”

陈独秀听罢直摇头：“仲纯兄你这样说真是折杀我也，我不务正业，从政一辈子，多以失败而告终，如今已成孤家寡人，流落他乡，无颜见江东父老，惭愧得很哪。”

邓仲纯道：“非也，仲甫兄早年反清抗俄，发起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名垂青史，后又创建中共，更是石破天惊，何谓多以失败而告终，太过

谦虚。如今激流勇退，远离政界，乃是上上之策。我这次来就是专门请仲甫兄到江津居住，也好安心养病做学术。仲甫兄真正的才华还是做学问，如有几年时间潜心著书，定成不朽之作，留传后世。”

陈独秀道：“我正不想住重庆了，只是不知江津情况怎样？”

邓仲纯介绍道：“江津距重庆只有180里，水陆都通，交通便利。国府迁都重庆后，到江津避难的安徽文教人员和学生也日益增多，教育部为此还专门在江津县德咸坝为安徽的流亡师生设立了国立第二安徽中学，由我三弟邓季宣任校长。”

陈独秀插嘴道：“季宣我记得，当年与我也有同窗之谊。”

邓仲纯又道：“潘赞化先生则在那里任总务处主任。”

陈独秀闻之大喜，道：“原来赞化也在江津，我们可是多年的生死之交。1902年，我从日本回到安庆，和潘赞化、柏文蔚一起创设藏书楼，组织励志社，创办《安徽俗话报》，鼓吹革命，遭到清政府通缉，只好又赴日本，并和他一起发起组织青年会。辛亥革命后，文蔚任安徽省都督，我任都督府秘书长，赞化在芜湖任海关监督。二次革命失败，我俩再次结伴逃亡日本。赞化就是在芜湖任职期间，邂逅名妓陈秀清，并纳为小妾，这件事在社会和他的家庭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当时有许多人借机大肆攻击赞化，只有我是坚决支持他的，我觉得他是将陈秀清从火坑中赎回，是正义和同情之举，无可指责。后来他们2人在上海结婚时，我与夫人君曼是唯一的来宾和证婚人。当时陈秀清为感激赞化再造之恩，要改姓潘名遇良，还是我给她改为潘玉良，后来又是我建议赞化送她进美术专科学校学习，到法国深造。民国25年，潘玉良从法国回南京举办画展，听说我被判刑的消息，不怕惹祸上身，坚持展出了我的一幅油画肖像，并且注明是非卖品，可见她果真是个知恩图报的奇女子。咳，年轻的时候，书生意气，总觉得振兴中华，舍我其谁。没想到，几十年后，又和赞化同时避难来到江津，这世界真是太小了。”

俩人感叹了一番世事难料、人生苦短。邓仲纯又道：“我在江津县城开了一个‘延年医院’，行医治病，在当地还算小有名气。仲甫兄若是能来，我和季宣不胜荣幸，住所和生活费用不用担心，均由我们兄弟承担，咱们有福共享，有难同当，待抗战胜利，再同返故乡，如何？”

陈独秀听了十分高兴，但有些担心，问：“江津比重庆怎么样，也这么热吗？”

邓仲纯道：“江津是小城，比重庆凉快，目标小，敌机轰击也少，比较安全。”



陈独秀又犹豫着道：“若是犯病怎么办？”

邓仲纯笑道：“仲甫兄真是骑马找马，我就是开医院的，早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院，行医30余年，小病小灾尚能对付。若是大病，我送你来重庆，坐船半天就可到达。”

陈独秀不好意思地也笑了起来：“真是老糊涂了，神医在此，还愁生病之事。谢谢仲纯兄的热情邀请。这样吧，晚上我与夫人商议一下，明天一定答复你。”

陈独秀原来以为，重庆是国民党政府的陪都，朋友多，报刊多，信息传播快，便于从事抗日宣传。来到之后，他才发现，重庆政治和生活条件都不宽松，甚至比武汉还不如。现在看，虽然江津地方小，消息闭塞，但有故友热情邀请，而且老乡甚多，能够互相照应。再加上自己近来身体确实每况愈下，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调养一下。于是，他便下了去江津的决心。

潘兰珍一向对陈独秀言听计从。这几年她随陈独秀辗转漂泊，多少也见过些世面，接触过不少社会名流，越来越感到老先生是个神秘的大人物，他到哪儿，哪儿都有做大官的朋友帮助他，衣食住行都不用担心，即使是蹲监狱的时候，就连蒋总统的夫人也亲自去看望他。这使她从内心深处崇敬陈独秀，对他的情爱也越来越深。她知道，他虽然平时对她大多板着面孔、少言寡语，但内心是很爱她的。眼下见独秀征求她的意见，便道：“阿拉自嫁罢先生，就与先生相依为命。阿拉想，既然依的好朋友一番好心相邀，重庆这个地方依又不习惯，别的地方又无处可去，到江津去避难，也是蛮好的嘛。”

陈独秀点点头道：“我也是这样想的。那就这样定了，你看行吗？”

潘兰珍道：“依已拿定了主意，何必还问阿拉？”

陈独秀深情地道：“这事关咱俩今后生计的大事，岂能我一人说了算？”

潘兰珍顿时露出幸福的笑容，孩子似的依偎在陈独秀怀中。

七十八

1938年8月3日，陈独秀和潘兰珍告别山城重庆，乘“民惠”号轮船，再度溯江而上。

8月的天气，正是重庆最热的时候，“民惠”轮的客舱里挤满逃难的



难民,更是空气污浊,燥热难忍。陈独秀站在甲板上,默默凭舷凝视着那滚滚流逝的江水,想到此去江津,或许可以避开日机轰炸和无休止的政治纷争,恢复昔日那挥毫写作、安逸平静的生活……他的脸上不禁浮现出一丝饱含希望的微笑,抬头眺望,只盼望那江津城早点跃入眼帘,早一刻踏上那陌生的异乡之地,开始他隐居的田园生活。

江津县紧依长江,建于汉献帝建安六年,有80余万人口。一条形如“几”字的江水把它一隔两开,北为德咸坝,南为县城几江镇,山峰峭拔、形如金鼎的“鼎山”高耸江畔,成了它的标志。江津山水映衬,景色壮丽,江水滔滔,水势奔涌,水天辽阔,飞舟直下,气势磅礴。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于淳熙三年在成都任知府,因病回家乡江苏休养,在泸州上船顺江而下,路过江津城时,曾写了一首赞美江津的风景诗:

西风扶橹似乘槎,水阔滩沉浪不花;
梦里竹间喧急雪,觉来船底滚鸣沙。



江津县城距重庆仅90公里,水陆交通十分方便。只是全国抗日以来,川黔公路忙于支前,加上燃料紧张,汽车少有客运,人们来往重庆与江津之间主要是乘坐轮船。江津的物价也比重庆便宜,市场繁荣,文化发达,因此自去年疏散到这座僻静小山城的机关、学校、难民以及知名人士特别多,素有“小重庆”之称,俨然成为陪都的小后方。

正午时分,“民惠”轮汽笛长鸣,缓缓停靠在江津通泰门外的几江码头,陈独秀在潘兰珍的搀扶下,小心翼翼地走过摇晃的木跳板,好不容易登上岸来。

早已迎候在码头的同乡好友潘赞化、邓仲纯、邓季宣、方孝远等穿过拥挤杂乱的人群,疾步走上前,多年不见的同窗好友热烈握手相拥,相互寒暄一番之后,向江津城里走去。

邓仲纯的妻子早已迎候在门前,可是当陈独秀领着一个二十几岁的姑娘跃进她的眼帘,她原本笑吟吟的面庞顿时阴沉下来。她原来听丈夫说陈独秀的妻子年少,原以为顶多年龄相差十来岁罢了,谁知一见,一个年届60,一个才20多岁,做女儿还嫌小,这成何体统。邓氏是个大家族,虽逃难客乡,但在江津也是很有名望的,今天若让这等老夫少妻住进家门,岂不是伤风败俗、大逆不道!想到此,邓夫人厌恶情绪陡生,感到街坊邻居指指点点都好像是在嘲笑她。

当陈独秀夫妇在邓仲纯等人的簇拥下,有说有笑地来到黄荆街83

号邓氏“延年医院”门前，正要上前与邓夫人说话时，邓夫人突然脸色骤变，一转身进大门，“咚”一声把大门紧闭，将大伙都关在门外。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大伙都惊呆了。陈独秀不知邓夫人火从何来，站在门前，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十分尴尬。

忠厚老实的邓仲纯不知所措。陈独秀来住，夫人明明是同意的，可不知一下子为什么突然翻脸，这般无礼，让人下不来台。他虽说是留日名医，在江津人品医德有口皆碑，但唯独惧内。面对此状，他虽然气得浑身发抖，但也只是敢怒而不敢言，只能向陈独秀连赔不是，表示歉意。

陈独秀毕竟是九死一生、闯过世面、见多识广的人，虽当众吃了邓夫人的“闭门羹”，十分难堪，但还是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连声对邓仲纯说：“仲纯兄，我们都是同乡好友，这算不了什么。嫂夫人一定有自己的难处，你不必太自责。”

方孝远见此窘状，忙上前解围道：“大家都不是外人，不要为一点小事伤了感情。我看，还是先找一个客栈让仲甫先生暂时歇息，再从长计议。”

“我看也好。”潘赞化表示同意。

邓仲纯面带愧色，连声道：“那就拜托孝远兄了。”

此时，各地来江津避难的人达数万，县城内本来有数的几家客栈早已挤得满满的，又大多为包房，很少有流动。许多本地住户都将空房租给了难民，但仍有不少人露宿街头。

方孝远领着陈独秀夫妇一连找了几家客栈，总算在东门城内郭家公馆暂时安顿下来，有了流亡的家。^① 陈独秀对此感慨万端。他万万没有想到，他一踏上江津这个偏僻的小地方，就吃了一个女人的“闭门羹”，让他当众出丑，人格上受到莫大侮辱。幸亏危难之时能得到朋友相助，不然的话，即使马上重返回重庆，当日恐怕也要露宿街头了。

他在给重庆的三子松年信中写道：“三日抵此，不但用具全无，屋也没有了。方太太（即方孝远之妻——引者）到渝，谅已告诉了你们，倘非携带行李多件，次日即再回到重庆矣。倘非孝远先生招待（仲纯之妻简直闭门谢客），即有行李之累，亦不得不回重庆也。幸房东见余进退两难，前日始挪出楼房一间（中午甚热），聊以安身。总比住小客栈好些，出门之难如此，幸祖母（即养母谢氏——引者）未同来也。”

.....

^① 沈寂：《再谈陈独秀谈话记录》，载《安徽革命史研究资料》第1辑，1980。



这天夜里，陈独秀突然心脏病和胃病一起发作，心闷、胃痛交加，脸色苍白，双目紧闭，满头大汗，嘴里不住地呻吟。潘兰珍吓得不知所措。他们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又不知医院在哪里。潘兰珍虽然知道邓仲纯是医生，但一想到他老婆凶巴巴的样子，心里就打怵，可不去又不行，只好硬着头皮跑到邓仲纯家报信。邓仲纯一听陈独秀病了，知道和昨日吃了“闭门羹”有关，心中万分内疚，急忙背着药箱赶到郭家公馆。他给陈独秀看过病后，对潘兰珍说：“仲甫兄主要是劳累过度，天热烦躁，血压有些高，心律不齐，腹部发胀。没什么大的关系。我给他打一针，再吃点药，明天就会好转的。”潘兰珍听了这才放下心来。

第二天一早，邓仲纯又背着药箱来到郭家公馆，顺便还带来了一些生活用品。潘赞化听说独秀病了，也赶来探望。此时陈独秀已经好了许多，见到两位朋友来了，心中高兴，便坐了起来。

邓仲纯道：“仲甫兄，你这次发病，全由内人引起，真是惭愧得很。”

陈独秀笑道：“仲纯兄，你我肝胆相照，这么说可就见外了。嫂夫人自有她的难处，我并无责怪之意。”

潘赞化见潘兰珍出去买菜，便悄悄问道：“仲甫，邓夫人那天显然是冲着嫂夫人耍的脾气。你什么时候找了这位？君曼呢，离婚了？”

陈独秀听了面色黯然，半晌道：“君曼早已去世了。兰珍是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来到我身边的，我们是患难夫妻。我在南京坐了5年监狱，她侍候了我5年，默默为我奉献了自己的青春。我一生3次婚姻。原配高晓兰是父母包办，没有共同语言，不理解、不支持我的事业，终于分手。与高君曼是自由恋爱，她对我的事业确实给予了很大支持，但她是想过一种安逸的教授太太生活，而我不会满足她这一切的，我们只能同甘苦，不能共患难，最终还是分手了。阿珍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她出身苦，心地善良，温柔贤淑，是真正的患难夫妻。如果说我一生所求大都是失败的，到了晚年，能娶她就是我最大的一个成功。”

说着，陈独秀向邓仲纯、潘赞化讲述了一段情意绵绵的爱情故事

……



第十七章

在经历了穷困潦倒、世态炎凉、丧母失友等一系列打击之后，倔犟的陈独秀为了维护仅存的一点尊严和人格，躲进深山僻壤。唯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情深意重的潘兰珍始终与他患难与共、相互支撑。

七十九

1930年后，陈独秀的政治环境每况愈下，先是因为中东路事件，与中共中央发生了争执，后又参加托派活动，被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开除党籍。在此之前，他虽然被撤销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但每月还是按中央领导人的待遇领取生活补助，现在则断绝了一切经济来源。而且，由于他身份特殊，虽然脱离了共产党，但国民党仍然悬赏3万大洋四处通缉他，他不得不隐名埋姓，东藏西躲，生活十分窘困。



1930年秋，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的追捕，陈独秀搬进了上海提篮桥附近的熙华德路一幢石库门房子隐居下来。在这里，他遇到了后来成为他的妻子、陪伴他走完人生最后岁月的纺织女工潘兰珍。

当时陈独秀住前楼，潘兰珍住后楼，两人隔门相望，开门相见。起先两人并不相识，所以虽然同住一层楼，碰面时也只是出于礼貌打一声招呼而已，并没来往。

在陈独秀印象里，这个姑娘单身一人，20出头，身材丰满，亭亭玉立，梳着入时的短发，脸庞浑圆，大大的眼睛，尽管衣着朴素，但剪裁得体，倒也有几分摩登。每天早出晚归，见人只是腼腆地抿嘴一笑，像个



陈独秀的第三位夫人潘兰珍

良家妇女。在潘兰珍眼里,这位新搬来的邻居虽年过半百,胡子拉碴,脸色苍白,像是有病的样子,但气度非凡,一看便知是个有学问的先生。一来二往,两人朝夕相见,慢慢也就熟悉了,彼此交谈也多了起来。

原来这潘兰珍是苦命人。她生于江苏南通一个贫苦农民家庭,4岁那年,南通遭受一场来势凶猛的台风和暴雨的袭击,庄稼和房屋都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人们被迫携儿带女,背井离乡,外出逃荒,潘兰珍的父母也不得不抱着她来到举目无亲的上海滩,寻求一条活路。

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根本没有穷人的立足之地。为了养家糊口,潘兰珍的父亲不得不在外滩码头上当挑夫,为上下轮船的旅客运送行李、货物,赚点脚力钱,后来经人介绍,进英美烟草公司仓库当了装卸工。不久,母亲又为她添了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仅靠父亲一个人做工更加难以维持生活,于是母亲不得不带着她四处拣破烂、拾煤渣。

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潘兰珍13岁便去一家纺织厂当了“包身工”,每天做工十几个小时,稍有不慎,就要遭到工头的毒打,小小年纪就饱尝了人间痛苦。过了几年,又来到父亲做工的英美烟草公司当女工,境遇才稍有好转。

这时候,潘兰珍已由一个瘦小的女孩长成十七八岁的大姑娘,颇有几分姿色。然而,美貌又给她带来了新的不幸和灾难。一些不三不四的家伙成天纠缠着她,想占她的便宜。潘兰珍谁也不敢得罪,只能在眼泪和屈辱中默默忍受着。有一个流氓工头为了得到她,经常甜言蜜语,装出一副关心她的样子,天真善良的她于是轻率地与这个流氓同居了,以为从此后会过上幸福的生活。不久,她怀了孕,生下一个孩子,但很快便夭折了。这时候,那个流氓工头已对她不感兴趣,经常非打即骂,任意践踏。最后,她实在无法忍受,一个人搬到熙华德路独居,从此与那个流氓一刀两断。潘兰珍没有想到,正是在这所新居里,她这个普通的女工邂逅了在中国政坛上赫赫有名的陈独秀,并最终将自己的命运和他紧密地连结在了一起。

听完潘兰珍的那段痛苦的经历,陈独秀深感同情,但他却不能将自己的身世以实情相告,只能编了一套假话告诉潘兰珍,自己姓李,是南京人,夫妻离异后独居于此,以卖文为生。潘兰珍天真烂漫,涉世不深,大字不识一个,自然不会怀疑这位邻居有什么需要隐瞒她。接触多了,潘兰珍对这个她从未遇见过的读书人产生了敬意,对他的孤苦和清贫也产生了怜悯之心。于是,这两个身份和年龄相距甚远、遭遇却相近的人彼此渐渐产生了好感,并开始互相帮助。陈独秀教她读书识字,她则帮陈



独秀烧饭洗衣,两个人取长补短,相得益彰。一来二去,两颗孤独的心越靠越近,最后终于贴到了一起。

当时陈独秀已年过半百且穷困潦倒,而潘兰珍还不到20,正是青春年华。潘兰珍不顾彼此年龄悬殊,对陈独秀以身相许,显然是看中了他有知识、有学问,是个可以依靠的读书人。陈独秀则认为潘兰珍忠厚朴实,虽无文化,却天资聪颖、勤快能干。因此,两人同居之后,倒也相处得十分融洽。虽然物质生活上十分清贫,但精神上充实,彼此都不再感到孤独。潘兰珍精心照料着陈独秀,使他身体渐渐地恢复,重新感受到了久违的家庭温馨;陈独秀则经常教她识字,给他讲道理,使她第一次感受到了做人的尊严,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美好向往。

潘兰珍万万想不到,这个她所信赖的老头子此时跟她竟是“同床异梦”。陈独秀虽然对潘兰珍有一定的感情,但他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和身份,他所从事的反蒋事业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他们两人的同居只能是权宜之计,不可能成为长久夫妻。正因为如此,他始终没有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告诉潘兰珍。他以为,一旦潘兰珍知道了实情,即使不向国民党政府告发他,也不敢再和他这个危险的通缉犯生活在一起的。尽管他知道这一天早晚会到来,但他还是希望尽可能地晚一点到来。

有一天,潘兰珍下班回来无意中对陈独秀说,听邻居讲他们楼上住着一个共产党,陈独秀马上警觉起来,第二天就借口房子漏雨,托郑超麟找房子搬家。他们先换了一个地方,因不理想,不久又搬到岳州路永兴里11号楼住下来。

潘兰珍自然不了解陈独秀反复搬家的真正原因。她对他向来是百依百顺,从不违背他的意愿,只是觉得老头子的脾气有点古怪而已。

直到陈独秀第五次被捕,潘兰珍才知道了陈独秀的真实身份。

八十

1932年10月16日,报童的叫卖声打破了上海滩清晨的寂静:

“特大新闻,共产党首领陈独秀等,昨天在上海被捕……”

刚刚下夜班的潘兰珍听到这个新闻,马上挤进人群,抢购了一张《申报》。为陈独秀购买报纸,已成为她每天必办的事情。

潘兰珍前几天和陈独秀拌了两句嘴,一赌气跑回浦东娘家,住了两天没回来,心里又惦记着陈独秀,今天早上下了夜班,便匆匆往回赶。当



她买好报纸,无意中瞅了一眼,照片上那熟悉的面孔跃入她的眼帘,她一下子惊呆了。此刻潘兰珍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老头子的行为有时候古古怪怪、遮遮掩掩,原来这个和她朝夕相处、同床共眠的男人就是国民党政府悬赏3万大洋通缉的“共产党首领”陈独秀。出事那天,如果不是阴差阳错,她正巧回了娘家,否则也要受到株连,枉受牢狱之苦了。

这一惊非同小可。震惊过后,潘兰珍又变得出奇的冷静,她必须作出一个重大抉择:或者畏缩回避,就此与陈独秀断绝关系,免得受到牵连;或者自找麻烦,与他共患难,至死不渝。这一天,潘兰珍站在黄浦江边,望着江面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回想着两年来与陈独秀共同生活的一幕幕情景,心中似江水波涛翻腾不息。直到日落西山,她终于下定决心,爱情战胜了恐惧,她要与陈独秀共渡难关。

拿定了主意,她心中反而轻松了许多。回到家中,见房门大开,人走屋空,一片狼藉,她又是一阵心酸,便强忍着眼泪,收拾好残存的衣物,书籍,到处托人打听陈独秀的确切下落。

陈独秀这次被捕,自知与前4次被捕不同,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绝不会轻易放过他,恐怕是凶多吉少,但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在被押往南京的列车上,处危不惊,毫无惧色,竟鼾然大睡,如此胆量和气魄,连押送他的军警也深表佩服。他在狱中唯一牵挂的,倒是与他朝夕相伴两年的女人潘兰珍。

被捕以后,陈独秀一直对以前未将自己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告知潘兰珍感到十分内疚。在南京狱中,他曾多次写信给老友高语罕谈及此事,并要求高语罕就近照应潘兰珍。在被捕的当年11月30日,他在给高语罕的信中写道:“书桌抽屉内藏有一小袋,系女友潘君之物,她多年积蓄,尽在其中,若失去,我真对她不起,务请先生再去探望一次……如幸而尚存,望携先生处……函告潘女士亲自前往领取。”

12月7日,陈独秀又在信中同高语罕谈及潘兰珍。他说:“潘女士浦东有父母,她能在香烟厂做工,不需我们帮助,并且事已揭开,她必不敢受我们帮助也。”12月13日,陈独秀再次要求高语罕转告潘兰珍“鄙人生活情况,且语以案情无大危险,免她惧虑”。次年4月14日,陈独秀又致函高语罕,托他转告潘兰珍,将原先他们送入当铺典当的羊皮袍、驼绒被的当票拣出,以备赎回,并询问高语罕:“她对于我,以前未曾告以真姓名,及她此次失去衣服,有怨言否?”当他得知潘兰珍要来南京探监时,再一次致函高语罕,嘱咐“婉言劝她不必来看我”。陈独秀并非对潘兰珍没有感情,而是怕连累潘兰珍。他这样做,完全是为潘兰珍着想。



然而,陈独秀显然低估了潘兰珍对他的爱情,也低估了潘兰珍的胆识。潘兰珍在得知了陈独秀的确切消息之后,毅然辞去了在上海的工作,只身一人来到南京老虎桥监狱探望。几经周折,她终于以亲友身份见到了分别数月的陈独秀。

潘兰珍的到来,使陈独秀十分感动,也十分高兴。但激动过后,他还是劝说她回到上海好好过日子,以后不要再来看他。陈独秀认为,他的年岁已大,又被判了13年徒刑,前途未卜,而潘兰珍正当妙龄,日子还长,他不能只顾自己而连累她。谁知潘兰珍铁了心,坚持要留下来照顾他,与他共患难。她说:“阿拉已辞去上海的工作。阿拉决定在监狱附近租一间房子,陪伴依,照顾依。阿拉和依既然是夫妻,阿拉就要伺候依,和依同生死!”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陈独秀见潘兰珍如此情真志坚,不由得老泪纵横。他做梦也想不到,在自己不幸的晚年会遇到这样一个知己女伴,他再也找不到拒绝潘兰珍的理由,只好同意她留在南京。

就这样,潘兰珍留了下来。起初,她住在陈独秀的北大学生、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次长段锡朋家里,但她总觉得自己是穷人家出生,住在大官家里不便,不久便搬了出来,在老虎桥监狱附近租了一间破旧房子住下。每日她都要到监狱送饭,整理房间,缝洗衣服,几年如一日,风雨无阻。陈独秀之所以能够在几年的监狱生活里进行艰巨的学术研究和繁重的著述工作,与潘兰珍的精心照顾是分不开的。

在照料陈独秀的过程中,潘兰珍也看到以往从未见到的情景:众多的亲友宾客,包括许多国民党的达官贵人和社会名流,不断地来监狱探望陈独秀,并馈赠各种衣物和钱财,这使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潘兰珍大开眼界,更加认识到陈独秀的声望和地位绝非一般“犯人”可比。也正因此,她对陈独秀更加敬重,照料得更加体贴入微。这一待就是5年,直到七七事变之后,陈独秀提前释放出狱。

潘赞化、邓仲纯听完陈独秀这段奇特的老少黄昏恋,都感叹不已,赞扬潘兰珍对爱情的坚贞不渝。邓仲纯回想起妻子对她的偏见,耳根阵阵发红。两人又聊了一会闲话,见独秀有些疲倦了,便告辞了。

回到家中,邓仲纯将陈独秀犯病的事情以及潘兰珍的经历对夫人讲了。邓夫人听了,沉默半晌,道:“原来她的身世这么可怜,而且对爱情如此坚贞,倒是我错怪她了。其实我也并不是有意为难她,只是看街坊邻居都在指手划脚,觉得有伤风化,面子上过不去,一时急躁,就关了门。”



我知道你和陈先生是多年的交情，不会让你为难的。等明天你再去看陈先生时，多带些礼品就是了。”

邓仲纯听了妻子这番话，甚感欣慰，半悬的心才落了地。

八十一

陈独秀住在郭家公馆的日子里，邓仲纯几乎每天都来为他看病。邓夫人虽然碍于面子没有来，但每次都让丈夫捎过一些米面、水果之类，也算是变相地和陈独秀缓和了关系。这样，经过邓仲纯的精心治疗，陈独秀的病渐渐好转。但是，这一场病勾起了他思念家人的情结，而且这种情结一天比一天强烈，直搅得他食不能安、夜不能寐。

陈独秀自1913年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离开安庆，逃亡日本，在外风风雨雨飘泊了几十年，就再没有回过故乡，也没有见过养母谢氏。只是最后这次被捕后，三子陈松年和儿媳窦珩光到南京老虎桥监狱去探望过他。1938年5月底，日军开始进攻安庆，养母谢氏及松年一家逃至武汉，终于和他相逢。然而，就在一家人准备一起离汉赴川的时候，他的大姐一家突然又逃难到武汉，陈独秀只好让母亲、儿子先行入川，在宜昌等候他，可没想到他后来乘坐的是四大银行的包船，一路不停直达重庆。等到母亲好不容易从宜昌赶到重庆和他见面时，他又搬到了江津，这样一家人始终没有团聚在一起。这场病后，陈独秀的儿女情长比任何时候都强烈，总盼望着一家老小团聚在一起，安安稳稳过日子，不想再过颠沛流离的生活，便几次捎信到重庆，让松年一家到江津定居。

这一天，陈独秀突然接到松年的来信，说他们明日便到江津。陈独秀看了信，悲喜交加。喜的是，山河破碎、国难当头之日，一家人尚能侥幸在大后方团圆，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悲的是，想当年他离家出走时，风华正茂，血气方刚，有着鸿鹄之志，而如今穷途末路，病魔缠身，好端端一个人丁兴旺的大家庭也因受他连累，迅速败落，自己无颜见江东父老，养母和松年一家三口果真要是来了，恐怕连安身之地也没有。想到此，心中十分难过，夜里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次日中午，陈独秀的养母谢氏和儿子松年一家三口在罗汉护送下，乘船来到江津。早已在码头等候多时的陈独秀迎上前，扑通跪倒在谢氏面前，哽咽着说：“母亲大人，请受孩儿一拜。”话音未落，潘兰珍也忙着叩头道：“阿婆，受儿媳一拜。”



双目失明的谢氏，用颤抖的手抚摸着儿子的头和手，老泪纵横，泣不成声：“庆同，这些年你在外面受苦了。”说着，又摸着兰珍的手道：“孩子，我听说了，这些年多亏了你照顾庆同，跟他吃了不少苦。别看我眼睛看不见，可心里头明白，你心眼好，知道疼人，我们陈家要感谢你。”

听到婆母的夸奖，原本还担心婆婆不肯与她相认的潘兰珍顿时泪如雨下：“阿婆，依老人家别这么说，能侍候先生是阿拉前世修来的福气。”

当日，陈家喜气洋洋，热热闹闹吃了一顿团圆饭。

到了晚上，松年一家在郭家公馆的客栈住下，兰珍在楼房里为婆母搭了一个铺，一家人就算安顿下来了。

陈独秀的生活本来就十分贫寒，现在一下子增添了4张嘴，日常生活就更难维持了。陈松年从安庆逃难出来时带出的一点积蓄，也早已花销干净，幸亏罗汉时常从重庆带来北大同学会和朋友们的接济，日子才勉强过得下去。

转眼到了1938年秋，江津暴雨成灾，大片农田受淹，产量锐减，粮荒像洪水猛兽似的扑来，谷价飞起咬人，军粮和政府机关、学校、工厂用粮四处断源，而大批外来难民蜂拥而至，使本已紧张的粮食更加紧张。一些粮商则囤积居奇，闭门不售，引起民愤，甚至发生了抢米风潮。不断飞涨的物价，使得依靠朋友资助度日的陈独秀生活更加窘迫，常常吃了早餐无中餐，能当的东西大都进了当铺。

日子最艰难的时候，潘兰珍不声不响地连手上的两只金戒指和一副耳环也送进当铺了。陈独秀知道后，心中难受，却也无奈，只能叹着气安慰道：“待我稿费来了，再把它赎回来吧。”

这番话被儿媳珩光无意中听到，心里也十分难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使她对潘兰珍的为人有了深刻的了解。虽然婆婆年龄和自己相仿，但为人忠厚，尊老爱幼，能干勤快，眼看着潘兰珍日渐消瘦的脸庞，珩光心中也暗暗思忖着如何为她分担忧愁，减轻家庭负担。

陈松年来江津不久，就通过潘赞化推荐，到江津德咸坝九中当了一名教师，由于九中与县城隔江，所以陈松年每天早出晚归，中午不回来。这天晚上他下班回家，珩光便悄悄对他说：“松年，家里人口多，开销大，日子实在难过，婆婆连戒指耳环都当了。我看，你明天同潘叔叔说说，能否在学校弄一间房子，我们自食其力吧，也好减轻家中的负担。”

不久，窦珩光在德咸坝附近一所小学找到一份代课教师的差使。于是，小两口便告别父亲，搬到德咸坝九中居住。

陈独秀这时已穷得买不起报纸，只好常常到一家小书店，站在书架



边看免费书,店老板心中十分不快,但碍于他是知名人士,也不好意思下逐客令,只是时常对他翻白眼。陈独秀心中自然知道自己不受欢迎,但囊中羞涩,书又不可不读,只好厚着脸皮装作不知。

这一日陈独秀照常来到书店看书,由于几天没吃饱肚皮,体弱无力,站得时间久了,看着看着,突然昏倒在书店里。这可吓坏了书店老板,忙叫伙计把邓仲纯喊来抢救。邓仲纯一见陈独秀躺在地上,嘴吐白沫,脸色惨白,如死人一般,想到当年风云一时的挚友,英雄气概,震天撼地,今天竟沦落到如此穷困潦倒的地步,不禁阵阵心酸。一番抢救之后,陈独秀才渐渐苏醒过来。

有了解他底细的人便悄悄说:“看见没有,这就是当年大名鼎鼎的中共领袖陈独秀,如今成了这副落魄样子。”围观的人们便不住地摇头晃脑,感叹人生多变和无常。

晚上,一向惧内的邓仲纯鼓起勇气对夫人说:“看样子仲甫活不了多久了。我们邓陈两家是世交,我和仲甫又是同窗好友,现在又都流亡在外,他现在穷困潦倒,如果我们不帮他一把,于心何忍。”

邓夫人叹口气道:“是怪可怜的,以后你勤跑着点,再多给他送些钱去。”

邓仲纯摇摇头道:“你不了解仲甫,他一向自恃清高,洁身自爱,若总是送钱去,他宁愿饿死,也不会收的。”

“那你说怎么办?”

邓仲纯吞吞吐吐地道:“我想还是请他们一家三口住到医院来,照顾起来也方便些,也省得他犯起病来,我黑灯瞎火、刮风下雨往郭家公馆跑。”

邓夫人迟疑一下说:“我倒不是心疼吃喝,就是看见他那小老婆,心里别扭。”

邓仲纯一看有希望,忙哄着说:“气量放大一点嘛,别说人家是明媒正娶,就是二房、三房,这年头也不足为奇。再说,仲甫这些年也多亏了那个小潘,人家又没招你惹你,就只当是为了仲甫,你菩萨心肠行行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得了。”

邓夫人嗔怪道:“反正好人都是你来做,我当黄脸婆。”

邓仲纯见夫人同意了,一颗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笑道:“哪能呢,我就说是你请他们过来的,人情自然是你的喽。”

就这样,在邓仲纯的再次热情邀请下,陈独秀勉强搬进了邓仲纯开办的延年医院,与邓氏兄弟生活在一起,不再为一日三餐而担忧发愁了。



陈独秀虽然心里并不愿意,但为了母亲、妻子,眼下也只能寄人篱下屈辱而生。潘兰珍手脚勤快,经常帮着邓夫人做些家务,两个女人虽然心中有鬼,但总算维系着面子上的关系,外人看来,倒也显得十分亲热。

陈独秀的生活有了着落,病情也大有起色,于是又铺开笔墨,重新开始撰写《小学识字教本》一书。

八十二

这一天是星期日,包惠僧从重庆来看陈独秀。见到昔日的得意门生,独秀十分高兴,便放下书稿,与包惠僧说起话来。正聊在兴头上,邓仲纯领着一老一少两位陌生客人走进书房。那老者年近7旬,白发苍苍,气宇轩昂,脸色慈祥,身着布衣长袍;那少者有30出头的年纪,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一表人才。陈独秀见此,忙站起相迎。未等他开口,邓仲纯便向客人介绍道:

“蟾老,这位就是我常同你谈起的同乡好友陈独秀先生。”

“陈先生,久仰大名。”

“不敢当,请问老先生是……”

邓仲纯又介绍道:“仲甫兄,这位是重庆洪顺祥盐号经理、江津工商银行董事邓蟾秋老先生。这位公子是蟾老的贤侄、江津工商银行经理邓燮康先生。”

陈独秀忙拱手道:“幸会,幸会。”

邓蟾秋道:“陈先生,鄙人和侄儿虽然从商,不问政治,但仰慕你陈先生大名已久,当年先生发起新文化运动,领导五四运动,影响巨大;抗战爆发后,你又积极宣传抗日主张,爱国精神有目共睹,令人敬佩。如今你偕家人来到老朽的家乡,日后若有什么需要我们叔侄效力的地方,直说不妨,千万不要客气,老朽定当鼎力资助。”

陈独秀听罢,十分感动,道:“独秀乃一介无用书生,如今逃难到此,能得到蟾老这样热心关照,实在是不胜感谢。”

邓仲纯说:“仲甫你不要客气,蟾老叔侄一贯乐于急人之难,十分开明,得到过他接济的数不胜数,我的延年医院也曾得到过蟾老的扶持,我们还相识同宗,结为金兰。大家都是自家人,不必太客气。”

邓燮康道:“陈先生,说起来,当年我还得到过你的教诲,做过你的部下呢。”



陈独秀有些奇怪,问:“此话怎讲?”

邓燮康又道:“小辈早年在上海复旦大学读书时,曾亲耳聆听过先生慷慨激昂的演讲,深受鼓舞。北伐时期,经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介绍,加入过 C. Y。大革命失败后,邵志刚去了苏联,我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只好回到家乡经商。”

陈独秀听说邓燮康加入过共青团,顿觉关系又近了一层,同时又联想到自己眼下的处境,不住地摇头道:“民国 10 年我在上海创建共产党时,邵力子是《民国时报》经理兼总编,那时我常在他主办的副刊《觉悟》上刊登文章,他也常坐着黄包车到我家中探讨马克思主义。邵志刚那时还是毛头小伙子,如今 20 年过去,大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惭愧,惭愧,不提当年,不提当年,后生可畏,国家的希望和未来要靠你们年轻人了。”

邓氏叔侄在江津赫赫有名,无人不晓。邓蟾秋,字鹤年,江津白沙镇人,能诗善文,一生经商,却能出污泥而不染,不嫖不赌,衣着俭朴,为人正派,在重庆商界有着极高的声誉,被工商界尊称为“蟾老”。他虽有万贯财富,却十分开明,博施济众,散其财而不留,把钱用于发展当地教育,先后资助由其父邓在泉所创办的“聚奎学校”15 万元,出钱筹建江津救济院并担任首届院长;在故乡白沙举办“石泉义仓”,储备稻谷 200 石,以赈济受灾群众;储备货款 2000 元,以无息贷给生活急需的贫苦群众。老先生还十分爱国,冯玉祥将军到江津宣传节约献金购机抗日,他带头捐献巨款,还经常宣传抗日,激发人民群众的抗日救国热情。



邓燮康 1929 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北伐时期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革命斗争,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大革命失败后,因和组织失去联系,他回到江津,任石泉中学校长兼新本女中董事长。1932 年,他与叔父邓蟾秋等征股集资 10 万元,创办了江津农工银行,任经理,旨在使工农群众免受地主及高利贷者的盘剥之苦。抗战爆发后,江津农工银行发展为四川商业银行,分支行遍及国内各大商埠,邓燮康任总经理,在金融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后又与人筹划合众轮船公司,他任常务理事,以适应当时运输的需要。他还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竭力为外省迁移到江津的文化机构和公私立大中学校解决生活和住地等实际困难,像佛学家欧阳竟无、文学家台静农、翻译家曹靖华、延年医院院长邓仲纯兄弟等名流学者都曾得到过他的帮助。

陈独秀自从和邓氏叔侄相识后,过从甚密,友情日渐加深,进而得到过他的多方面的照顾。甚至陈独秀逝世后的丧事,都是邓氏叔侄出资操办。可以说,他们二人成为陈独秀晚年最要好的朋友之一。这是后话。

正说话间,潘兰珍进来道,傅斯年和罗家伦专程从重庆前来看望陈独秀,正在客厅等候。陈独秀闻之大喜,忙将两位弟子迎进书房,介绍给邓氏叔侄。

罗家伦与傅斯年同是陈独秀北大时的得意门生。罗家伦是浙江绍兴人,1917年入北大文科,新文化运动时与傅斯年共同发起成立《新潮》杂志,五四运动中又与傅斯年同被选为北大学生代表,到各国驻华使馆递交意见书。1920年赴美、英、法、德4国留学。1928年,他刚过而立之年便出任清华大学校长,4年后又担任中央大学校长。

邓蟾秋一听原来是中国学术界两位炙手可热的人物,十分高兴,就道:“仲甫先生,今日包先生、傅先生和罗先生专程前来看你,是个大喜的日子。不如你将江津县城的其他好友一同邀来,咱们到假东门外欧阳竞无大师的支那内学院一聚,让老朽尽一次地主之谊。那里靠近江边,风景宜人,是个饮酒作诗的优雅之处,大家正可叙旧尽兴。”

陈独秀稍一犹豫,见邓蟾秋满脸真诚,确是豪爽之人,便道:“也好,今日便将流落到此的名流叫到一起聚一聚。”说罢,写了几封短信,邓蟾秋便派家丁速去送信。江津县城本就不大,半个时辰之后,高语罕、梁漱溟、曹靖华、何之瑜、潘赞化先后赶来支那内学院。邓蟾秋大喜过望,忙吩咐管家将江津名厨周清云请来主厨。邓蟾秋道:“周师傅,只管拿出绝活,不要考虑本钱,让各位吃遍了中西大菜的名流学者、高官要员开开眼界,品味一下我们巴渝饮食文化。”

不多时,临江亭里已摆好酒菜。于是,邓蟾秋做主陪,欧阳竞无做副陪,陈独秀坐了主宾之位,然后其他几位好友依次坐好。

酒过三旬,菜过五味,周清云的看家本领“青筒鱼”端上来了。罗家伦尝了一尝,好奇地道:“这青筒鱼没有竹笋,怎么会有满口鲜笋的清香?”

邓蟾秋笑道:“这道菜,我略知一点门道,先要找几根刚由竹笋长成的新竹,连节把砍成筒状,然后把二三两重的大河鲫鱼剖腹洗净后,加上调料剪一下,便和发好的海味一起塞入竹筒内,密封后,一节一节地拿到板炭火上慢慢转动,一直烤到竹筒蔫萎皱皮,然后倒出上席,竹笋味香四溢,鱼肉也鲜嫩可口了。”

刚吃罢“青筒鱼”,周清云又端上一道“白水豆腐”。只见青花瓷碗里,满盛着雪白的豆腐墩儿,还漂着些碧绿的嫩木耳菜叶子,清汤寡水的,连一点油花花也没有。

邓蟾秋又道:“这‘白水豆腐’,你们莫看它貌不惊人,实在是用一只



鸡、一只鸭经过十几道手续，沥了又熬，熬了又沥，才吊出来的精汤。豆腐虽不值钱，但鲢鱼贵，要用几斤重的大鲢鱼开成薄片子，仔细地贴在每一块豆腐上，用小蒸笼垫上新鲜荷叶，蒸上一段时间，然后弃去鱼片不用。这时鱼肉的鲜味已经被豆腐吸收了，尔后再加入高汤，细火煨一下，配上木耳菜叶子，就可上桌了。”

潘赞化道：“蟾老，这道菜，怕是不便宜吧？”

邓蟾秋道：“不贵，不贵，只需2块大洋。法币嘛，哈哈，就不好说了。”

一听价格，满座愕然，随即叹道：“贵是贵了些，但确是值。”

喝罢“白水豆腐”，周清云又端上“三巴汤”。那汤看上去清清亮亮，间以无数红玛瑙珠珠似的宁夏枸杞子以及许多炖得极软和极糯的肉段肉块。用银勺轻轻一搅，方知那汤稠得粘勺，那香味也浓烈无比，妙不可言。接着，又送上来几个盛有用本地泡红海椒舂成稀状物的调料碟子。

傅斯年尝了一勺汤，连声叫好，遂对邓蟾秋道：“此物如此美妙，为何却取了个土俗名字？”

邓蟾秋又道：“这三巴汤，乃是一道极宜滋补的药膳。至于这‘三巴’名字的由来嘛，是指牛尾巴、牛下巴，还有一‘巴’指牛鞭，这物件四川人称它也带一个‘巴’字，哈哈。此种高雅场合，便只能意会不可言传了。”

众人闻言，哄堂大笑。

说笑间，傅斯年掏出几百块钱，暗中递到陈独秀手中，低声道：“仲老，这是我和家伦的一点心意，务必收下。”

陈独秀见状脸色顿变，本要发作，碍于学生大老远专程来看自己，便又忍了回去，只是冷冷地道：“孟真，你们来看我，我心里高兴，你这是干什么，把我当成要饭的啦？你们做你们的大官，我当我的难民，钱我是绝不能收的。”

罗家伦忙道：“仲老，我和孟真没别的意思，只是觉得你现在生活窘困一些，当学生的心里不好受。”

陈独秀道：“你们拿这几个钱来打发我，我心里就好受了？快收起来，不然休怪我无礼！”

傅斯年无奈，深知老师的脾气，只好又把钱收了起来。

这动作均在暗中进行，却被一直默然无言的梁漱溟瞅在眼里。梁漱溟和陈独秀一样个性刚烈，最看不惯趋炎附势之人。这次来本是想和朋友们见见面、说说话的，可席间见罗家伦这位近来在蒋介石面前走红的



学生言谈之间总掩饰不住得意之态,就觉得气不打一处来,此时二人拿钱无疑是有辱于陈独秀,更不高兴,见陈独秀坚决不收,这才有些解气。于是,酒宴未罢,他便拿定主意,要挫挫罗家伦的骄气。

包惠僧哪知梁漱溟此时的心情,偏偏把话头扯到他的身上,说起了笑话:“当年我们那班从北大毕业时,请仲老和梁老来照集体相,仲老将一条腿横撇伸到了梁老面前,相片印出来后,同学们见了都大笑不止,我拿上相片,给两位老师各送一张。谁知仲老看了后还说,照得不错。只是这个梁漱溟也太霸道,把腿伸得太远了嘛。”

众人一听,乐不可支,问:“仲甫,果有其事吗?”

陈独秀也笑道:“那日惠僧说:陈先生,你看清楚了,这是你的腿,可不是梁先生的腿。我再细看,连连大呼:啊,是我的腿吗?难道真是我的腿吗?”

潘赞化笑道:“梁兄,这是真的吗?”

众人便将目光转到梁漱溟身上,没想到梁漱溟却答非所问地说道:“鄙人教了一辈子书,教出的学生做官的也不少了。过去以为学者入仕的角色,总喜欢把帽翅儿抖得哗哗响,唯恐别人忽视了他头上的那顶乌纱。这次就到重庆,方知天下乌鸦也并非一般黑,这个中也有极个别例外。蒋廷黻就算得上一位刚直之士。那天我去找他聊天,恰巧是星期天,蒋兄是行政院政务司司长,其位也算是不低了吧?傍晚他送我出门,刚走到庭院上,就见几辆轿车开了进来,车停下,蒋委员长从车上下来了,见了蒋兄就说:‘你来得正好,我有事和你商量。’谁知蒋兄却回答他:‘对不起,你没看见我正在陪客人吗?今天我休息,有事明天我到侍从室找你。’说完,就陪着我出了大门,连蒋介石也拿他无可奈何。看看当今党国中那帮高官要员,还有谁敢像他一样,心底无私天地宽。”

陈独秀听罢,拍案赞道:“这个蒋廷黻有骨气。”

梁漱溟转脸又对陈独秀道:“我梁某人一辈子清高,从不服人。仲甫是公认的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但我当年就是爱和他争论。他认为西优中劣,我只承认中西有别。他主张移植西方文化,我倾向于中国旧文化的自我更新。那时候,我们经常争吵,甚至吵翻了天,但我始终佩服你老兄的为人和品德。仲甫从政数十年,其中成败我不敢妄以评论,单就做了老蒋5年大牢,却矢志不移,宁可到这江津小城来喝西北风,也不到老蒋那里当什么部长,我就敬佩得五体投地。不像有些人,骨子轻得四两重,做了官就浑身轻飘飘,找不到东西南北!”

梁漱溟这话来得突然,几近于当众骂人了,但毕竟是老师对学生,罗



家伦满脸通红，尴尬万分，也无话可说。

邓蟾秋一见大家都满脸尴尬，忙圆场道：“仲甫先生的为人自然无话可说，正因为此，老朽才慕名前来结交。各位都是为了仲甫先生聚到一起，来来来，各位同喝3杯，为仲甫先生的为人干杯。”

众人都忙举杯，这才冲淡了刚才的尴尬。

八十三

1939年开春之后，天气渐暖，邓蟾秋和其弟聚奎中学董事主任邓缜仙专程派人给陈独秀送信，邀请他到白沙镇小住。这已是邓老先生多次恳请，陈独秀实在不便推辞，便将松年夫妇临时叫来照看母亲。这一日清晨，他偕夫人兴致勃勃地登上西去的客轮。

白沙镇位于长江上游南岸，离县城约45公里。它靠山面水，沿江而建，上接叙泸，下通渝涪，南驰黔滇，北走永壁，交通方便，经济繁荣，是四川著名大镇。抗战全面爆发后，这里又变成文化重镇，国立中央图书馆、国立编辑馆、审计部、战区教师服务团以及大中小20多所学校疏散到这里，原本不过2万人的镇子，骤然增加了1倍多人口，仅学生就有近万人。

接近正午时分，陈独秀乘坐的客轮到达白沙镇。邓蟾秋、邓缜仙及侄儿邓燮康等人亲自到江边码头恭候。大家在码头上寒暄了几句，便各自坐上备好的轿子，在一队乡丁的护送下，悠悠荡荡地穿过白沙镇，惹得人们纷纷驻足而观，不知又来了什么大人物。

当晚，邓蟾秋举行家宴为陈独秀夫妇洗尘，席间气氛热烈，宾主频频举杯，酒兴盎然，直到深夜方才散去。

第二天一早，邓蟾秋约陈独秀一起出去散步，两人有说有笑，信步走到一片桃林，但见这里背依青山、面临大江，四周万树桃花，遍地橘林，风景十分幽美。陈独秀赞道：“这么优美的景色，真正让人流连忘返。”

邓蟾秋笑道：“先生既然喜欢这里，干脆搬过来定居如何？”

陈独秀道：“将来我死后，蟾老给我三尺地皮，能葬于此，也就死得其所了。”

陈独秀小住白沙镇的消息不久便不胫而走，不少当地或避难于此的社会名流纷纷慕名来访，但他大都谢绝不见。聚奎中学校长周光年邀约他前去给学生演讲，他却欣然同意。这其中自有情理：一来聚奎中学是



邓家所办；二来请他前去是宣传抗日，并非和沽名钓誉之辈清谈；三则他一见学生便天然产生一种亲近感。所以，他答应得非常痛快。

聚奎中学坐落在白沙镇南部约3公里处的黑石山上。到了约定之日，周光年一大早就带着轿子来请他进山。

这一日春光明媚，天气甚好，正是踏青的好时候。一路上，黑石山上林木郁郁，绿阴如盖，楼堂亭宇隐约其间；平畴之中，一峰崛起，犹如一个巨大的绿球；一条羊肠小道从山角蜿蜒山巅，沿途但见满山石头皆黑，大小不一，千姿百态，形状各异，星罗棋布，与碧水绿树相衬，煞是好看；山石中挺立着高大繁茂的林木，以樟树最多，也最古老；樟树丛中，松、柏、杉等间杂，山花怒放，色彩斑斓，幽香四散，数千只洁白的鹳鹤以树为巢，在林中飞翔。

陈独秀赞道：“巴蜀美景，真是名不虚传。”

周光年道：“黑石山以石奇景美佳誉巴蜀。幽谷石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二郎石传说是二郎神为了驱石填海，把石头变为羊群赶跑，路过此山休息时天渐亮，羊群还原为石，再不能动。二郎神大怒，用力一坐，高石上便留下了二郎神的屁股印。”

不多时，一行人到了黑石山顶。陈独秀抬头望去，一座高楼展现在眼前，这就是聚奎中学的礼堂。这座仿罗马歌舞剧院的礼堂是邓蟾秋1929年捐资1万多银元修建的，故以他的名字命名为“鹤年堂”，堂匾是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佑任先生所书。陈独秀登上鹤年堂高楼，俯览长江及四周群山景色，但见山间小溪环绕，两岸翠行幽幽，绿草如茵，溯溪而上不远处有瀑布三重，飞流直下，白练腾空，颇为壮观，令人心旷神怡，不觉赞叹道：“贵校校园如此优美雅静，真是难得的教书育人好地方。”

周光年道：“这是蟾老先父邓石泉老先生有远见，他在创办本校前身聚奎书院时便选址于此。”

说话间，上课铃声响起，周光年便陪同陈独秀走进鹤年堂，顿时全体师生起立，鼓掌欢迎。

周光年说：“今天我们荣幸地请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先生。陈先生早在五四运动之前就是北大文科学长，是教育界的老前辈。下面我们请陈先生给大家演讲。”

陈独秀这天特意刮了胡子，理了发，虽然面容清瘦，但显得十分精神。他身穿蓝布长衫，外套一件马褂，讲话慢条斯理，依稀可见当年教授学者的大家风范。他操着浓重的安庆普通话，先从匡衡凿壁偷光讲起，



引劝青年学生要惜时如宝,努力学习,为民族作贡献;然后,又讲到抗日中要一致团结对外,反对卖国投降。他的演讲像拉家常一样,通俗易懂,引经据典,旁征博引,风趣幽默,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不时还发出一阵笑声。演讲完毕,师生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次演讲使陈独秀一时成为白沙镇议论的话题。

时光过得飞快,转眼到了夏天,陈独秀不知不觉在邓氏别墅悠闲自得地住了两个多月,不好意思再住下去。这时松年捎信来说祖母近来身体不好,他心中惦念着母亲的病情,便提出要回江津,邓蟾秋一再挽留不成,只好将他送到码头,临行时又赠送了一些钱物。

这次白沙镇之行,使潘兰珍又一次大开眼界,备感陈独秀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觉得自己的选择没有错,如果不是沾他的光,她这个普通女工哪有机会接触这些社会名流。

八十四

陈独秀自白沙镇回到江津县城之后,便很少出门,整日和妻子在家中守候卧床不起的母亲,虽然邓仲纯免费精心为母亲治疗,无奈病入膏肓,纵然是医术高超,也无力回天。眼看着母亲病情日渐加重,直急得陈独秀茶饭不思、夜不能寐。

78岁的谢氏,是陈氏家族中“贾母”式的人物。早年陈家家境贫寒,为安庆绅士们瞧不起,自从陈独秀养父陈昔凡升官之后,一跃成为安庆名门望族,才为人们另眼看待。1913年陈昔凡病逝后,家中重担就完全落在谢氏身上。她虽是妇道人家,却通情达理,心地善良,善于疏财,乐于公益,因此陈家虽是五世同堂,却被她打理得井井有条、上下和睦。老太太说一不二,讲出去的话就是“圣旨”,在族人中享有崇高的威望。《陈氏家谱》赞曰:“妣居巾幗,而识大义,能继公(即陈昔凡——引者)未了之愿,慷慨捐资,重建祠宇,族人怀德。”

陈独秀反袁失败及大革命失败,祸及家门,一个兴旺的大家族转眼之间衰败下来,儿子亡命在外,家里只由谢氏支撑残局,过度的操劳和焦愁使她双目失明。特别是安庆沦陷后,她流离失所,寄人篱下,如同乞丐,备受穷愁和心灵的折磨。在赴重庆的途中,她便患病在身。到江津后,刚过了几天安稳日子,随着时局的紧张,敌机在频频轰炸陪都重庆的



同时,也多次空袭江津,过度的惊吓,使她精神极度紧张,从此一病不起。

1939年3月22日(阴历二月初二),历经陈家由破屋发家、兴旺衰落的谢氏,走完了她喜悲参半的人生旅途,凄凉地客死异乡。她弥留之中,用尽全力留给了儿子最后一句话:“你们要带我回家。”顿时,陈独秀一家嚎啕大哭,悲声震天动地。

噩耗传出,邓仲纯夫妇忙过来安慰陈独秀,他们知道陈独秀现在家境贫寒,便出资为老人买了寿材。潘赞化、方孝远、邓蟾秋、邓燮康等人也纷纷慷慨解囊。罗汉听说后,专程从重庆赶来,以北大同学会的名义,资助他办理丧事。

邓蟾秋见他说得伤感,便引开话头,说起诗文。

母亲的去世对陈独秀打击很大。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他整日呆坐在桌前,没精打采,更无心意著书。他在给友人杨鹏升的信中,深沉地表述了当时的悲痛心情:“弟遭丧母以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倘长久如此,则百事废矣。先母抚我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①

耐人寻味的是,陈独秀当年以反封建礼教著称于世,几十年后,母亲谢氏去世,居然也披麻戴孝,遵守中国人传统的“丧制”,以尽孝道,寄托对母亲的怀念和哀思。^②他在给杨鹏升的信中又道:“形式丧制,弟固主短丧,免废人事,然酒食应酬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③

祸不单行,陈独秀尚未从丧母的悲痛中恢复,又一次沉重打击袭击了他。1939年5月3日,日机狂轰滥炸重庆,数千人丧生于大隧洞倒塌,罗汉在此空袭中不幸遇难。这使陈独秀遭受了更大的刺激。

罗汉是他北大时的学生,中共早期党员。大革命失败后,随他参加托派组织,因不肯与他划清界限,被开除党籍。1938年,又和他共同经受了武汉“汉奸案”的磨难,直到他穷途末路之时,仍然代表北大同学会照顾他的生活。可以说,罗汉一生忠心耿耿追随他革命,是他晚年患难与共的挚友。这次出事前几天,罗汉还来江津看望陈独秀,问他住在邓仲纯家中是否习惯。他说:“恐怕不是久留之地,邓太太和潘兰珍相处不好。”罗汉当即表示,尽快想办法找一处住宅。没想到,事未办,人先去。回想起罗汉这些年对他的关照,陈独秀禁不住心中阵阵隐痛。

① 陈独秀致杨鹏举函,1939年5月5日。

② 沈寂:《再访陈松年谈话记录》,收入《陈独秀评论选》,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③ 陈独秀致杨鹏举函,1939年5月5日。



罗汉的不幸遇难使得陈独秀顿时又衰老了许多,更加沉默寡言。

高语罕见他心绪一直不好,便几次过来拉他出去散散心,陈独秀拗不过朋友好心相劝,这一日便随同高语罕到江津公园,见欧阳竞无、邓燮康等老友早已在一亭子内等候他一起打牌,陈独秀推辞道:“谢谢各位好意,弟遭丧在身,玩牌应酬必在百日之后,你们玩吧,我随便走走。”

邓燮康等人听了,也不再勉强,便随他去了。陈独秀独自在公园内游览一番,看见前面围着一群人,便凑过去,原来是一个唱小曲小姑娘,只听那小姑娘婉婉唱道:

世事茫茫,光阴有限,算来何必奔忙?人生碌碌竞短论长,却不道荣枯有数,得失难量。看那秋风金谷,夜色乌江,阿房宫冷,铜雀台荒。荣华花上露,富贵草头霜,机关参透,不虎皆忘,夸什么龙楼凤阁!说什么利锁各疆!闲来静处,且将诗酒猖狂。唱一曲归来未晚,歌一调湖海茫茫。逢时遇景,拾翠寻芳,约几个知心密友到野外溪旁,或棋琴适兴,或曲水流觞,或说些善淫果报,或论些今古兴亡。看花枝堆锦绣,听鸟语弄笙簧。一任他人情反复,世态炎凉,优游延岁月,潇洒好时光。

他听着听着,觉得曲中词句可谓参透历史玄机,勘破人生红尘,再联想到自己一生大起大落、恍如梦幻的身世,一时呆了,再无兴趣游玩,便提前告退。

高语罕道:“仲甫自老太太去世后,消沉了许多。”

转眼到了7月,天气渐渐炎热。重庆是全国闻名的“三大火炉”之一,更是热得使人难以忍受,尤其是到了正午,骄阳似火,烤得大地生烟一般。陈独秀尽管足不出户,扇不离手,仍然是汗流浹背、胸口发闷,只得经常光个大膀子,下身只穿一条大裤衩。如此这般,三家男女老少十几口人挤在一起,确实既不方便,又不雅观。邓太太虽然对陈独秀一家在吃喝治病上从不吝啬,毫无怨言,但她毕竟是旧式的妇道人家,总是看不惯陈独秀老夫少妻在一起亲亲热热的样子,觉得有损邓家声誉,只是看在丈夫的面子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能忍则忍,能让则让,只盼抗日早一天胜利,各自返回家园就是了。入夏以来,看到陈独秀赤身露体,觉得实在是丢人现眼,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这天午后,天气燥热异常,一丝风儿也没有。陈独秀光着头,打赤膊,穿着裤衩躺在竹楼上,一手摇着扇子,一手不时用夫人递来的毛巾擦



汗,还是止不住地大汗淋漓。邓季宣的小儿子只有六七岁,十分顽皮,看到他这副样子,觉得有趣,便跑到陈独秀身后,用手摸着他的屁股,连说“好玩”。

陈独秀本来就心烦气躁,经小孩子这一摸,更是火冒三丈,用力拿开孩子的手,瞪着眼大声斥责道:“走开,没有教养的伢子!”

小孩被这突如其来的训斥吓得呜呜大哭。邓太太闻声跑了出来,一看这情景,再也忍不住,指着陈独秀的鼻子,破口骂道:“你说别人没教养,还是先看看你自己吧,都60多的老头子,还骗娶人家20多岁的大姑娘做老婆,你这是什么教养?三家十几口人挤在一起,男女老少一大屋子,你一个老头子赤身裸体在中间转来转去,你这又是什么教养?”

陈独秀被邓太太这一顿抢白闹得狼狈不堪,无声以对。潘兰珍见丈夫被她如此辱骂,真想上前舌战一场,把平日的怨气统统发泄出来,但想想寄人篱下,又怕给老先生添乱,只得忍气吞声、泪流满面。

邓仲纯闻声赶来,还未开口,便又被太太骂得狗血喷头:“你当大爷一样白吃白喝供养着人家,倒落得个‘没教养’的名声,你真是个窝囊废!”

邓仲纯被骂得脸面通红,不敢吭一声,只是望着陈独秀不住地摇头叹气。

这次风波,陈独秀的精神和人格受到从未有过的刺激,血压升高,一病不起。邓仲纯给他看病时,一再向他表示歉意:“仲甫,真是对不起,请你看在我们兄弟面子上,千万不要跟她一般见识。”

陈独秀只是听着,一言不发,闹得邓仲纯十分尴尬。邓仲纯心里明白:太太这次伤透了陈独秀的心,将他彻底得罪了。

果然,时隔不久,陈独秀便搬出了邓仲纯的延年医院,来到离江津县城30余里的鹤山坪隐居下来,在那里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4年时光。



第十八章

亲友的相继去世和文稿印章的被窃，使陈独秀已是千疮百孔的心灵又遭重创，身体每况愈下，思想也日趋固执消沉。贫苦之中，他再次拒绝了蒋介石的诱惑利用和中共的善意援助，以此来保持自己最后的一丝尊严。

八十五

陈独秀是应约到鹤山坪为清朝进士杨鲁承整理遗稿的。

1939年初夏的一天，陈独秀在街头一个旧书摊发现一本《皇清经解》手稿，署名为江津杨鲁承。他随手翻看，觉得文笔不错，便问作者是谁。卖书人说：“只知道是江津鹤山坪人，是个清朝进士，其他情况就不清楚了。”陈独秀见再问不出什么，便花钱把书买下。隔日，邓燮康来探望他，两人闲聊之中提及此事。邓燮康道：“我倒是听说过杨鲁承，此人乃前清二甲进士拔贡，很有学问，在江津很有名望，写过不少书，家中有一箱子手稿，只可惜来不及整理就过世了。”

陈独秀道：“我看了这本《皇清经解》，写得不错，很有价值。”

邓燮康道：“当年号称经史大家的章太炎来川时，杨鲁承曾把手稿拿去请教章太炎，但章太炎并不欣赏他的作品，批了‘杂乱无章’几个字，气得杨鲁承书未写完就一命呜呼了。”

陈独秀笑道：“章太炎未免也太主观，杂乱无章没关系，只要稍加整理，就会有章可循了。”

邓燮康道：“你若有意为其整理，我就帮你打听一



下杨家后人。”

杨鲁承有一孙叫杨宾淑，在江津中学做教员，听说陈独秀愿代祖父整理遗稿，十分感动，专程跑来拜访陈独秀。

杨宾淑说：“我家祖宅在鹤山坪，那里夏天比县城凉快，又安静，房子宽敞，先生若不嫌弃条件简陋，就搬到那里住。”

这时，陈独秀已和邓太太闹翻，正想离开邓家，便满口答应下来。

鹤山坪离城大约 15 公里，属江津县五举乡辖区。这里到处高山丛林，地广人稀，远看似仙鹤挺立，故而得名，民间流传有“鹤山名不著，地僻人罕寻”的说法，通往县城只有一条曲曲弯弯的羊肠山路。

前清进士杨鲁承的旧居“杨氏山庄”石墙院坐落在鹤山坪的最高处。它背山面水而立，青瓦石头高墙，石砌的八字门楼高大，院内绿树成荫，院外景致幽美。杨家建造石墙院时，正是官运亨通、家业兴旺的时候。这座山庄建成后，便成了山里人荣华富贵的象征。然而，随着杨鲁承的过世，后辈子孙大多在外读书谋职，谁也不愿回山沟来厮守这山庄。天长日久，这山庄便渐渐失去往日的光彩。因为久无人居住，两扇大门早已油漆斑驳，墙皮亦已多处脱落，院内正房、客厅、厨房 20 余间，只住着杨鲁承的二孙媳杨二太太和几个女佣人，显得十分冷清。



陈独秀到来后，热情的杨二太太忙叫女佣让出一间正房和一大一小两间厢房。房子虽然宽敞，但毕竟年久失修，阴暗潮湿，顶上又没天花板，而且四处透风。屋内家具很简单，仅有一大一小两张木床、一张书桌、几把木椅以及几个装满书稿的旧箱子。然而，陈独秀已经感到很满意了，家虽破，但幽静安谧，与世隔绝，悠闲自得，深居简出，再不受世俗烦恼的干扰，可以潜心研究学问。潘兰珍是穷苦人出身，幼年过惯了贫困生活，这些年又随陈独秀四处漂泊无定，对生活条件更无挑剔。住下来后，陈独秀便静下心来整理杨鲁承的遗著，潘兰珍则在院内开了一块菜地，两人各得其所，倒也自在。

杨鲁承家藏书很多，开始，陈独秀整理杨鲁承的遗稿十分仔细，慢慢地便没有了兴趣。

一日，邓仲纯和邓燮康一起来看他。闲谈中，邓燮康问起书稿整理得怎样，陈独秀说：“开始看还不错，看多了，就不对胃口了，杨鲁承对群经的创见不如四川的廖季年，对诸子的阐述不如胡适之。”

邓燮康笑道：“你这是以人之短比人之长，若是杨鲁承的见解达到廖、胡水平，还用你来整理？”

陈独秀听罢也笑了：“是我的要求太苛刻了。总之，比我想像的要

差。”

邓仲纯掏出一封信递给陈独秀说：“我来时，松年托我带来一封信函，里面似乎还有寄来的钱。”

陈独秀拆开信一看，里面果然有300元汇票，道：“原来是蓬生寄来的钱。这怎么好，又让他破费了。”

邓燮康问：“这个蓬生是谁？”

陈独秀道：“此人叫杨鹏升，是你们四川渠县人，早年留学日本，后在北大求学，也算是我的一个学生。”

接着，陈独秀将他和杨鹏升的交往讲述了一遍，又道：“我和蓬生自武汉一别，他调到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高参，我逃难到了重庆，他是步步高升，我是日渐穷困潦倒，可他总是牵挂着我的生活，几次给我寄钱，少则300元，多则上千元。其实蓬生一家经济上并不宽裕，却总是想着我这个无用的老头子，真是让我不好意思。”

邓仲纯听罢，无限感慨地说：“这年头物价飞涨，一个少将的薪金也不会太多，他能几年如一日在经济上帮助你，想来定是仗义之人。”

陈独秀道：“正如同二位一样，我陈独秀能交到你们这样的朋友，此生足矣。”

邓仲纯红着脸直摇头：“仲甫，你这是在骂我呢。”

其实，杨鹏升那时生活确实并不宽裕，一家老小20余口全靠他一人供养。尽管家中开支紧张，他还是慷慨解囊，仗义救助处境极其困难的陈独秀。杨夫人包和平对丈夫说：“蓬生，人在得势时，要想到落势的朋友。陈先生乃一代人杰，落得这样的凄凉结局，实在令人心酸。你过去在北大受教于他，正所谓，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经济再紧张、再困难，总比他好过些。我们勒紧裤带，也要救助他。”

于是，杨鹏升每月发薪金后，第一件事就是给陈独秀汇钱，数年没有间断。他深知陈独秀一向清高，不吃嗟来之食，便假借索取字条、字联、碑文、金石篆刻为由，分期分批给他寄钱，一直到陈独秀逝世。1949年12月，杨鹏升在成都率部起义后，先是受聘任重庆西南美专任国画、雕刻教授，兼西南博物院筹备委员等职，后调成都任市政协委员，1954年以“残余历史反革命”罪被捕，判有期徒刑20年，1966年病逝狱中，1983年被平反恢复名誉。现北京图书馆收藏有他的篆刻精拓印谱7函28册。

几个人感叹了一番杨鹏升的义举，邓仲纯又道：“仲甫，你的身体状况不是太好，我看不如到重庆去检查一下。几家大医院我都有朋友和同学，非常方便。”



陈独秀道：“谢谢仲纯兄的关心，行严兄前两天也来信邀我去重庆查病，并说已为我找好了名医，约我过了元旦就去。”

邓仲纯道：“这样更好，到时候我来接你。”

几个人说了会话，看看天色已晚，邓仲纯和邓燮康便告辞了。

八十六

1940年元月4日，陈独秀夫妇由鹤山坪来到江津县城，正准备乘船去重庆，不料又接到章士钊的来信，说约好为他看病的大夫临时去了歌乐山，要他推迟几天再去重庆。邓仲纯便力邀他在延年医院小住等候，陈独秀心中不愿，但又不便再回鹤山坪，特别是看到邓仲纯一副将功赎罪的样子，又不忍拂了他的好意，心想反正是临时住几日，便答应了。他原本担心邓太太再给他脸子看，不曾想，一进门，邓太太像是彼此之间从未发生过争吵一般，热情得很。陈独秀暗叹女人变化就是快，若再拘谨，倒显得自己小气，便也拿出笑容，于是大家亲热得又像是一家人似的。

在邓家这一住就是1个月。到了年底，章士钊才又捎信来，让陈独秀速来重庆。1940年2月6日（阴历腊月二十八日），何之瑜陪同陈独秀夫妇来到重庆，住进了仁和医院。自从罗汉去世后，北大同学会将照顾陈独秀的担子交给了何之瑜。

陈独秀刚刚住进医院，章士钊便赶来看望，并请陈独秀夫妇到他家过春节。

陈独秀道：“现在乱哄哄的时候，哪有心思过春节。我也不去打扰你。再说外面一放鞭炮，我血压就高。就在医院过年，既安静，还能养病。”

章士钊想想也对，也不勉强他，便道：“那你先安心养病，不要想得太多，出院后再到我家住一阵子。”

第二天，章士钊替他约的两位名医周纶、曾定天一起过来给陈独秀会诊。两位大夫非常认真地替他做了全面检查。

陈独秀问：“周先生，我的病很难治的吧？”

周大夫已从章士钊那里知道陈独秀的真实身份，因此对他十分客气，说：“不像你想像的这么严重。你的病，不在药好药孬，关键在多休养，多调理，生活要有规律，少生气，不要受刺激，尤其不要熬夜和抽烟喝酒，回去一定要安静休息，不要再过问政治。”



周大夫检查完病情,临出门时,对何之瑜使了个眼色。何之瑜心领神会,便跟了出来。

何之瑜问:“周先生,你看陈先生的病很严重吗?”

周大夫说:“何先生,你是他的学生,可以告诉你,陈先生恐怕活不了3年。”

何之瑜大吃一惊:“有这么严重?”

周大夫说:“陈先生的心脏不能再扩大半指了。”^①

何之瑜呆了半晌说:“当年陈先生的身体好得很,都是这几年坐牢把身体坐坏了。周先生,陈先生是名人,请你多多想想办法给他治疗。”

周大夫道:“我也久仰陈先生大名,对他很是佩服。不过,这病确实……我只能尽力而为。”

何之瑜沉重地点点头,说:“那请周先生千万不要告诉陈先生和陈太太。”

过了春节,包惠僧听说陈独秀在重庆治病,便赶到医院看望,说:“先生来重庆一趟不容易,出院后,务必到我家住几天。”

陈独秀摇摇头:“不去了,本来打算到行严家住几天,也不想去了。”

包惠僧问:“为何不去了?”

潘兰珍插嘴道:“重庆太吵,乱糟糟的,再加上日本飞机三番五次来轰炸,先生烦躁得很,天天吵着要回去。”

包惠僧仔细端详陈独秀的面色,果然是满脸通红,心浮气躁,的确需要静养,便道:“回去休养也好,到时候我来送你。”

1940年2月22日,正月十二的上午,陈独秀办理了出院手续,没有到朋友家住,由章士钊、包惠僧一直把他送到码头,何之瑜陪同,坐船回了江津。

陈独秀回到江津,邓仲纯早在码头等候,邀请他到家中再居住一段时间,邓仲纯道:“你刚刚出院,需要调整,住在我的医院,治疗起来比较方便,也省得我隔几日爬30里山路到鹤山坪去看你。”

陈独秀想想也是,反正是临时小住,想走随时都可以,便没再推辞,在邓仲纯家住了下来。

这一住,便是3个多月。



^① 张永通:《我们对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点了解和认识》。

八十七

陈独秀从重庆看病回来后,身体一直时好时坏,心情也不好,令他不愉快的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

3月的一天,何之瑜来看他,带来了蔡元培先生去世的消息,这使陈独秀郁郁寡欢了许多日子。

何之瑜说:“先生当年与蔡校长情同手足。我临来时,北大同学们托我捎个口信,希望先生有空能为蔡校长写篇纪念文章,以寄哀思。”

陈独秀道:“我每次入狱,蔡先生都发援救电文。此次在金陵狱中,又承蒙蔡先生照顾。今蔡先生先我而死,是心中无数伤疤又多一伤痕。请转告同学们,我一定要写纪念文章的。”

何之瑜走后,陈独秀坐到桌前,铺开稿纸,沏了杯浓茶,又点了根烟,写下标题《蔡子民先生逝世后感言》,便再也写不下去,和蔡元培交往的往事一幕幕涌上心头……

蔡元培生于1868,清光绪十八年(1892年)进士,授翰林院编修。谁也想不到,这位深受四书五经熏陶的书生,居然举起反清旗帜,于1904年组织革命团体光复会并任会长,第二年又加入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上海分部的负责人。辛亥革命后,他被孙中山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袁世凯篡权后,他愤而辞职,游学欧洲,1916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校长。当时的北大,封建余孽猖獗,有的教授言必称孔孟,有的老夫子居然拖着长辫子去上讲坛。蔡元培为了改造和振兴北大,求贤若渴,广纳贤才。当时陈独秀因在上海创办《新青年》杂志,已是名声鹊起。于是,蔡元培决定聘任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事有凑巧,就在蔡元培急于见到陈独秀的时候,陈独秀为了给亚东图书馆招股,募集资金,从上海来到北京。蔡元培听说后,几次登门,都未遇见,最后索性冒着寒风,一大早来到陈独秀下榻的中西旅馆,坐在门口等候。

陈独秀早上起床,看见年长他11岁的蔡元培等候在门外,大为感动,便答应到北大任教。

消息传出,北大震动,青年学生无不欢欣鼓舞。在蔡元培的大力支持下,陈独秀将原来设在上海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搬进北大校园。自此,《新青年》更加红火,一时成为中国思想界最耀目、最绚烂的杂志、全





蔡元培

国进步青年必读的经典。同时,在北大,陈独秀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陈独秀创建中国共产党后,虽然和蔡元培政见不同,但友谊并未间断。陈独秀几次被捕,蔡元培都四处呼吁、积极搭救。可以说,在陈独秀人生道路的转折点上,蔡元培是起了重要推动作用的,对陈独秀是有知遇之恩的。如今,挚友先他而去,陈独秀怎能不痛彻心肺。想到此处,陈独秀先下笔歌颂了蔡元培坚持大节和容纳异己这两点美德,又写道:“我对于蔡子民先生之死,于公义,于私情,都禁不住有很深的感触!四十年来社会政治之感触!”文中还回顾了蔡元培、胡适之和自己在五四运动中的作用:“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①

文章不长,仅2000多字,但情真意切、催人泪下。同时,陈独秀或许是从蔡元培的死联想到自己,文中悲观地用了“后死的我”4个字,读后令人伤感无限。

蔡元培死后不久,5月,又传来大姐突发脑溢血病逝于江津油溪镇的消息。这令他再一次陷于痛苦之中。

陈独秀小时候,大姐对他最好。他参加革命离家后,虽几十年与大姐没有见面,但大姐的儿子吴继严这些年一直跟随自己从事革命活动。自前年到江津后,因为姐夫经商,生活条件稍好些,便时常挂念他,给他一些接济。不久前,大姐还专程来江津看他,没想到当时一别竟成了永别。想到自己兄弟姐妹4人,自己最小,长兄、二姐早逝,“大姐今又亡,微身且苟延”,陈独秀不觉悲从中来,写下挽诗一首,寄托哀思:

姊意愿偕住,临行复迟疑。
送我西廊外,木立无言释。
依依不忍去,怅怅若有思。
骨肉生死别,即此俄顷时。
当时未警觉,至今苦追忆。^②

① 此文刊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

② 陈独秀:《挽大姊》,收入《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第1辑,安庆市历史学会等,1981年刊印本。



挽诗缠绵悱恻，感人至深。

亲友的相继去世，使陈独秀沉湎于无限的悲痛和一个又一个沉重的精神打击之中，不能自拔，一种万念俱灰的念头悄悄钻进他的头脑中，过去常挂在嘴边和别人共勉的一句口头禅“不进则退”不再讲了，在事业上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也消失了。7月间，他听说周光年、何之瑜、台静农、魏建功在屈原祭日聚饮大醉之事后，做诗一首赠魏建功曰：“诗人枉向汨罗去，不及刘伶老醉乡。”^①魏建功看罢此词，对朋友道：“仲甫早年有诗自比忧国忧民的屈原，现在居然羡慕起西晋皖人刘伶醉生梦死的隐士生活，看来已是儿女情长、英雄气短了。”^②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事情，使陈独秀的心灵再遭重创。

1940年8月的一天，谁也不会想到，一贫如洗的陈独秀寓所竟遭到偷窃。当时，陈独秀正住在县城邓仲纯家中看病，听到消息后，气得半晌说不出话来。潘兰珍更是急得不知所措，本来就穷得要命，再被偷了，日子还怎么过呢？于是，他们病也不治了，急匆匆连夜赶回鹤山坪，一进石墙院寓所，见窗门大开，东西被翻得七零八落，几只装着换洗衣服的旧皮箱被窃，最为痛心的是，他几年来呕心沥血写成的文字学手稿和一枚杨鹏升篆刻阳文“独秀山民”玉印章也不翼而飞。不久，他在给杨鹏升的信中写道：“窃去衣物等十余件。唯失去兄在武昌所刻阳文‘独秀山民’四字章及弟尚难出版书之草稿，殊为可惜也。”



潘赞化和何之瑜闻讯赶来安慰，陈独秀苦笑着自嘲道：“这窃贼想来也是风雅之士，专偷我的印章和书稿。”

何之瑜道：“我前两天听县长黄鹏基说，这次失窃绝非偶然，是有政治背景的，你原是中共总书记，现在放着省城、县城不住，却要隐居深山老林，来看你的大人物又这么多，弄得神神秘秘的。国民党对你不放心，便暗中派人监视，见你整日闭门写作，又不知写些什么、写给何人，于是便蓄意制造一个盗窃的假相，借以检查你的书信。你今后还是小心些好。”

陈独秀听了不以为然地道：“我有什么可小心的，国民党派人监视我，我自然清楚。他们监视我无外乎3件事：一是看我和中共还有没有联系；二是看我是否搞组织活动；三是看我有无反对政府的行动。我

① 陈独秀：《寄魏建功》。

② 陈松年：《回忆父亲陈独秀》，收入《陈独秀评论选》，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现在一件也没有，他能探听到什么呢？”

话虽这么讲，但陈独秀对国民党特务时刻监视他还是十分恼火的，但又无可奈何。

不久，警察局将此案破获，失窃衣物大半归还，但文稿和印章杳无下落。这使陈独秀心情极度抑郁，很长时间没有再写作，见了朋友就叨念这两件东西。那文稿是他在病中一字一句抠出来的，可以说是他晚年生活的精神支柱，这个打击对他实在是太残酷了。

这起盗窃案究竟是何人所为，现在已成历史悬案，无从查寻。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陈独秀自从搬进鹤山坪的杨家石墙院，便时常有许多神秘的人物光顾，这无论对国民党特务还是普通家贼来说无疑都是大感兴趣的。

八十八



鹤山坪本是个不出名的经济落后、生活贫苦的地方，少有名人、要人光顾。但是，自从陈独秀这个神秘人物隐居在石墙院破屋后，这里似乎一下子也出了名，造访者纷至沓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

直到现在，鹤山坪年过古稀的老人仍然清楚地记得 60 多年前江津县长第一次进山的情景。

那天一大早，五举乡乡长突然带着几个乡丁来到鹤山坪，四处通知集市和农户打扫街道卫生。乡亲们谁也搞不清怎么回事，只是感到似乎要迎接什么大人物的到来。

果然，接近中午时分，一顶官轿在几名随行人员的陪同下，来到杨家石墙大院门口停下，从轿子里走出一位身着中山装、神气十足的中年人。随行人员敲门通报：“陈独秀先生在家吗？江津县新任县长罗宗文先生前来拜访。”

县长拜访陈独秀，这一下轰动了僻静的鹤山坪，一传十，十传百，大家更觉得石墙院内这位深入简出的老先生深不可测，居然连县太爷都恭恭敬敬地来拜访他。

陈独秀本想“息影鹤山心自闲”，与世隔绝，远离喧闹的城市，远离人间是非，做一个“隐士”安度残年，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要人们一个接一个前来拜访，打搅了他似已平静的生活，只不过他们不像县太爷那样兴师动众、打扫街道，而是微服私访，无人知晓罢了。



首先登门拜访的是戴笠和胡宗南。

张国焘投靠蒋介石后，在戴笠手下主持“特种问题研究室”。他向蒋介石建议，鉴于目前是国共合作时期，不易公开反共，而陈独秀曾是中共创始人，又连任过5届中共中央总书记，被中共开除，必定怨气冲天，因此由国民党知名人士公开访问陈独秀，挑拨他发表反共言论，然后编辑成册，扩大对付延安的宣传，是有力的武器之一，这比戴季陶等人所写的反共理论文章分量要重得多。蒋介石听了觉得有理，便指派戴笠、胡宗南专程前来拜访陈独秀。

陈独秀见到这两位不速之客，吃了一惊。宾主客气一番后，陈独秀就开门见山问道：“两位屈尊寒舍，想必是蒋先生关照要来的吧？”

戴笠毫不隐讳：“正是，蒋先生忙于抗战事务，抽不出时间来看你，但一直挂记你，特叫学生和胡司令代劳。”

“谢谢蒋先生的关照。”陈独秀冷冷说道：“鄙人逃难入川，现隐居僻静山村，虽以国事萦怀，却并不与闻政治，更不曾有任何政治活动。不知二位来此，有何指教？”

胡宗南从卫兵手中接过一份剪报递给陈独秀，一副同情的模样：“陈先生还记得前年在武汉受到中共诬陷一事么？大家至今谈起都甚感不平。”

陈独秀展开剪报一看，乃是1938年3月傅斯年、段锡朋、高一涵等9人在重庆《大公报》上因康生诬陷他为“日本侦探”而发表的辩护词启事。这一下子勾起他心中愤怒，便恨恨地说：“此诬陷之事，虽经特立先生和之瑜调解，但陈某受到的人身攻击和人格污辱，至今仍未忘怀。”

胡宗南道：“世人皆知陈先生为人坦诚，虚怀若谷，怎能充当那万人咒骂的汉奸。蒋先生首先就万万不信，党国的有识之士也都不会相信。傅先生等为你恢复名誉的启事，乃国人之公论、民心之所向。”

陈独秀感动地说：“非常感谢诸位先生主持公道，为陈某鸣不平。”

“陈先生，事已过去，就不要再提了。”胡宗南安慰道：“今天宗南和戴主任特来请教，值兹二次大战爆发，德军席卷欧陆，眼看苏俄处于极不利之局，国内国共问题由分而合，由合而斗，大敌当前，如国策不能贯彻，前途实堪隐忧。陈先生高瞻远瞩，对此有何高见？”

胡宗南的意思很清楚：目前国际形势对苏联不利，国内形势由于国共两党时合时斗，前途实堪隐忧，陈独秀过去受到过中共开除党籍的严惩，何不借机大骂一通共产党，以泄心头之愤。

殊不知，陈独秀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来意。虽然他对中共满腹怨



气,但他一直坚持国共之间的中立立场,决不为国民党提供反共的弹药。于是,他沉默良久后,放下手中的剪报,慢条斯理地说:“国共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是符合全国人民愿望的。弱国强敌,速战困难,但只要举国上下团结一致,则任何难关都可渡过。本人近来孤陋寡闻,更不愿公开发表言论,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务请两位对今日晤谈,切勿见之报刊,此乃唯一的要求。”^①

胡宗南、戴笠见套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只得又胡扯了几句,便匆匆离去。

时隔不久,又有两位神秘的人物来到鹤山坪。

这一天,陈独秀胃病发作,正躺在床上呻吟。突然,有两位重庆来的客人前来拜访。当客人走进屋内,陈独秀顿时惊喜交加,他万万没有想到,来客原来是周恩来和朱蕴山。

周恩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朱蕴山是安徽六安人,青年时期加入陈独秀领导的岳王会,后来参加同盟会,积极投身辛亥革命,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加入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后脱党辗转避居上海,参加邓演达领导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抗战爆发后积极为国共合作奔走,宣传联合抗日,是陈独秀的老朋友。



周恩来走进屋内,只见陈独秀双手捂胃,半躺在一张木床上,身上盖着一床破旧的棉被,床边还放着一些发了黄的书籍,满屋充满凄凉、萧索之气,想到当年陈独秀英姿飒爽,不觉一阵心酸,急忙走上前,握住他的手,亲切地道:“仲老,久违了。你还好吗?”

朱蕴山说:“仲甫兄,恩来特地从重庆来看望你。”

“恩来、蕴山,你们这么忙,还记得来看我这无用之人,不胜感激。”陈独秀握着周恩来的手,心里一阵潮涌,往事禁不住涌上心头。

周恩来和他的大儿子陈延年同岁,又是他当年的下级。早在大革命时期,这位政治老练、办事果断却又从不张扬的年青人就给他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他清楚地记得:大革命失败后,他被解除党内总书记的职务,是周恩来在临赴南昌领导起义之前,亲自安排好他的住所,使他免遭汪精卫的逮捕;在上海,很多同志冷落他,恩来经常去看望他,从不歧视他;当他发出“三封信”和中央矛盾异常尖锐的时刻,还是恩来几次找到他,苦口婆心地劝他放弃和中央的对立;就连最后这次提前出狱,周恩来也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现在中共如星火燎原,日益兴旺,共产国

^① 沈醉等:《戴笠其人》,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



际和王明对延安的控制影响也日渐削弱,周恩来在党内为毛泽东助手的地位已不可动摇,而自己穷愁潦倒,英雄末路,他还能专程从重庆跑到这偏僻的山沟来看望自己。想到此,陈独秀凄凉的心不禁涌出一股暖流。

“仲老,恕我冒昧,你身居山中,不知日后有何打算?”周恩来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问道。

“恩来,我已病成这个样子,还能有什么期望和打算呢?只想远离尘世和是非,在这僻静的地方研究研究文字学罢了。”

朱蕴山说:“仲甫兄,恩来这次特来江津,除探望你外,还想劝你去延安,那里的条件比这里总好些,还有外国的医生,你可以边工作边治病。”

“什么?请我回延安?”陈独秀大感震动,望着周恩来:“恩来,你不是开玩笑吧。当初我从南京监狱出来后,主动要求去延安,奈何衮衮诸公容不得我,反倒将我骂得狗血喷头,诬我是拿日本人津贴的汉奸,如今怎么又想起我这无用之人来了?”

周恩来一时语塞,不知从何解释。此时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已开过,进一步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央的领导地位,王明企图篡权的阴谋已经破灭,但他三言两语又无法将党内矛盾向陈独秀讲清,只得说:“历史的旧账,我们都不必再纠缠了。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这次我来请你回延安,也是润之的意见。现在大敌当前,前方将士浴血奋战,后方民众竭力支前。仲老,你毕竟当过几届党的总书记,绝非闲云野鹤、隐士游民,希望你能拿出老战士的胸怀和气度,抛弃个人成见和固执,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写个书面检查,回党工作吧。”

“恩来,请你谢谢润之和其他同志,但我还是那个主张,回党工作为我所愿,唯书面检查不能写。”陈独秀固执地摇摇头,停了一会儿,又伤感地道:“守常死了,延年死了,现在除了润之、恩来,中央没有我可靠的人,我既落后了,年纪也大了,中央开会,我怎么办呢?我这个人不愿被人牵着鼻子走,何必弄得大家不欢而散呢。与其去延安做摆设,我还不如就呆在江津,实实在在地做点学问。”

“仲老,中央绝无勉强之意,请你再慎重考虑考虑。什么时候愿意去延安,中央都欢迎。希望你多保重身体,如果想去重庆看病,可随时去重庆找我,一定为你提供方便。”周恩来说着,吩咐身后的警卫人员拿出100块银元,放到了桌子上。

陈独秀大惊,问:“恩来,你这是为何?”

“仲老,我们知道你现在生活并不宽裕。这是中央从互助会里拿出的一点心意,请你务必收下。”



陈独秀大为感动，眼中滚出两滴老泪，激动地说：“互助会是我当年提议所创，专门救济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家属。我何德何能，怎能收下互助会的钱。请你带回去，这钱我无论如何不会收的！”

朱蕴山道：“即使不论你为党做过的贡献，单从延年、乔年那儿讲，你也是烈士家属吧？你就收下吧。”

提到两个牺牲的儿子，陈独秀言语哽咽：“延年、乔年为革命牺牲，自是死得其所。和他们相比，我现在苟延残喘，实在是惭愧，这钱无论如何不能收。恩来，我知道你们也很困难，还是拿给更需要的同志吧。”

周恩来见他实在不要，只好把钱收了起来，站起身，与他握手告别。

“仲老，那我们就告辞了。有时间我们再来看你。”

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第一届民革中央主席的朱蕴山回忆说：“那时王明问题已经解决，毛泽东、周恩来对陈独秀是宽容的，但陈的思想还停留在抗战初期受王明排斥打击的状态中，总认为是中央打击排挤他……当时中央想把陈独秀弄到延安去养起来，因为他毕竟当过几届共产党的总书记，对党还是有贡献的。”



第十九章

陈独秀是一个有独立见解的人，但他过于迷信自己的“独立思考”，听不进不同意见，尤其是晚年更加固执，没有将自己融入火热的民族解放运动之中，而是闭门造车，思考出所谓“最后的政治意见”，最终为那些曾经是他的支持者、拥护者所抛弃。

八十九

1940年9月的一天，陈独秀正在破屋里专心致志地撰写《小学识字教本》，何之瑜突然陪着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以及王文元、濮德志3位不速之客来到鹤山坪。^①



尽管这3个人的到来是陈独秀万万没有想到的，但见到久别老友尤其是曾经一同度过5年狱中岁月的难友，陈独秀十分高兴。然而，陈独秀的高兴只维持了很短时间，便被他们带来的一个坏消息所破坏。

陈其昌告诉他，1940年8月20日，托洛茨基在墨西哥被人谋杀了。

托洛茨基自被斯大林逐出苏联国境之后，一直四处漂泊，居无定所，先是在土耳其，后又到过丹麦、挪威、法国，最后到墨西哥定居下来。他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不停地工作，一天也未间断撰写文章猛烈抨击斯大林。为此，他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首先是他的第一任妻子索科洛夫斯卡娅被流放西伯利亚，惨死在集中营里。他与前妻所生的两个女儿也先后死去，小女儿尼娜在父亲流放阿拉木图家时

^① 陈其昌实际上是1939年初到江津见到陈独秀的。



就因患肺结核而去世，大女儿季娜伊达则被驱逐出苏联，1933年在德国自杀。他与第二任妻子谢多娃所生的两个儿子列夫和谢尔盖同样没有逃脱厄运。谢尔盖先是被流放到克拉斯诺雅克边疆区，后被关进集中营并死在里面。1938年2月，列夫在巴黎做了阑尾炎手术，第二天便神秘地不明不白地去世了。

1940年5月20日，一伙身着军装的武装分子潜入托洛茨基居住在墨西哥的别墅，径直扑向卧室，自动步枪射出了交叉火力，同时从3个点向着托洛茨基平时睡觉的床上发射子弹。幸好他与妻子及时躲在屋角的地板上一动不动，这才奇迹般活了下来。

8月20日，第二次谋杀开始了。当时托洛茨基正在专心致志地阅读别人送来的一篇文章，一名刺客潜入书房，用一把登山用的冰镐对准他头部猛烈一击。托洛茨基惨叫一声，随即向刺客猛扑过来，警卫们闻声冲进书房，抓住了刺客。托洛茨基很快送到医院，墨西哥最好的医生们马上进行了会诊，对颅骨做了手术，然而由于大脑受伤过重，于8月21日19点20分去世。

陈独秀听完托洛茨基遇害的经过，呆了半晌，才从牙缝里恨恨地挤出几个字：“谋杀，政治谋杀！这完全是斯大林在消灭异己，搞‘顺我则昌，逆我则亡’。”

何之瑜担心道：“仲老，你也要注意安全，现在江津也出现了国民党特务，你最近还是少写政治文章，免得国共两党都不高兴。”

陈独秀暴躁地道：“我怕什么？我自投身革命以来，早将生死置之度外。杀了我，便成全了我。”

他在屋里不停地转圈，又道：“就因为一个基洛夫被杀，斯大林对苏联刑法做了修改，荒谬地规定侦察恐怖活动案件不得超过10天，被告结论于开庭前一天交给庭长；判决一经作出，不得上诉，不得赦免；极刑立即执行。你们看清楚没有，这就是独裁。列宁逝世时留下的7名政治局成员除了他自己以外，都被枪决了，都是反革命，这岂不是荒唐之极！”

他点上一支烟，猛吸两口，平静了一下激动的情绪，又道：“最近这段日子我经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在苏联，本来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有国有大工业、军队、警察、法院、苏维埃选举法这些利器在握，足够镇压资产阶级的反革命，用不着拿独裁制度来代替民主。须知独裁制如同一把双刃剑，今天用之杀别人，明天便会用之杀自己。实际上，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已经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所谓‘无产阶级的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



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① 其中原因之一,在于从政治理论上说,列宁和托洛茨基均不懂得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上之真价值,而拿‘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一空洞抽象名词做武器,来打毁资产阶级的实际民主。”^②

濮德志道:“仲老,你这样讲未免有些失之偏颇。列宁和托洛茨基都对无产阶级民主有过论述嘛。”

陈独秀冷笑一声,讲出一段使后人至今争论不休的理论:“列宁虽然讲过‘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但终究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至于托洛茨基,直至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唯其如此,才导致今天苏联社会主义流为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总之,由于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制度违反了民主制之基本内容,并且这些违反民主的制度都非创自斯大林,才出现独裁局面。这种局面的形成并非是由于斯大林的个人心术特别坏,而在于斯大林一切罪恶无不是凭借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等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现在看,苏联 20 年的经验,尤其是后 10 年的经验,应该使我们反省。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个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现在德俄两国社会主义是格柏乌政治,意大利和日本是附从地位,是现代宗教法庭,此时人类若要前进,必须首先打倒这个比中世纪的宗教法庭还要黑暗的国社会主义的格柏乌政治。像俄国的苏维埃,比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议会还不如。^③ 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制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④ 所以现在世界上已经形成了莫斯科、柏林、罗马三大反动堡垒。目前全世界的一切斗争,必须与推翻这三大反动堡垒联系起来,才有意义。”^⑤

王文元道:“仲老,你这是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



① 陈独秀:《再论世界大势》,1942年3月。

② 陈独秀:《给连根的信》,1940年7月31日。

③⑤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

④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2年5月13日。

度。”

陈独秀道：“我想请你首先分清这样一个问题：反对斯大林政权并不等于反对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与社会主义是对立的，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斯大林式的官僚政治绝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①至于现在的苏俄，不但它的生产力不能胜任领导国，它自身早已离开社会主义了。^②对于苏联，若要硬说它是社会主义，便未免糟蹋了社会主义。”^③

濮德志道：“那么你认为怎么样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呢？”

陈独秀脱口而出：“必须实行民主。只有民主才能有效地防止独裁的产生。现在人们对民主主义还有不少的误解，而最浅薄的见解，莫如把民主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的专制品。其实，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化之一种动力，因为人类社会，自有政治的组织及其消灭，在此过程中，民主主义乃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形成各阶段的内容与形态；唯其如此，无产阶级不应把解决民主任务及夺取政权分开，不能认为民主主义在取得政权后使用不着了，而应该认识到无产阶级在革命斗争中采用民主主义的政纲与口号是目的并不是手段，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并不是抛弃民主主义，而是扩大民主主义。如果谁不懂得这一点，谁便是抛弃了民主主义。^④应该看到，民主和科学是人类历史长期的要求，绝非权宜之计、临渴掘井的对策。如果用公式表达就是：原始社会里共产主义和民主主义是两大支柱；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推倒和埋葬了这两大支柱；资本主义社会发掘了民主，发展了科学，人类大跨步前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与科学无限发展，人类走向大同。”

濮德志不以为然地道：“你把民主和科学提到贯穿历史的高度，显然是违反了阶级分析的原则。”

陈独秀道：“我从来不反对阶级分析原则，我认为代表大多数人民利益，就是最好的阶级立场。成天大叫无产阶级万岁的人，未见得有利于大多数人民，也未见得有利于无产阶级。”^⑤

陈其昌道：“你这是修正主义论调。”

陈独秀轻蔑地瞥了他一眼：“你懂什么？民主主义是超时代、超阶级



①④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2年5月13日。

② 陈独秀：《再论世界大势》，1942年3月。

③ 陈独秀：《被压迫民族之前途》，1942年5月13日。

⑤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



的,民主主义是自人类发生政治组织以至政治消灭之间,从古代希腊和罗马、近代以至将来各个时代多数阶级的人民反抗少数特权之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的历史现象。^①人类社会政治制度发展演变的根本规律之一,则是每个时代民主制度向前发展之先,都经过一专制黑暗时期。我曾经专门描绘了一幅展示民主发展进程的示意图:上古世界是氏族社会民主制;古代世界也就是希腊、罗马,是大地主、大巫、军事首领的专制→城市市民的民主制;近代世界是封建诸侯及其末期的君主专制→资产阶级民主制;未来世界是法西斯蒂专制→无产阶级民主制以至全民民主制。虽然未来世界要经过一个法西斯蒂专制阶段,但民主制总是要战胜反民主的独裁制,在当代使人类近代的进化史走向另一道路,即不经过整个黑暗时期的法西斯蒂专制,而由资产阶级民主制直接走向未来世界更扩大的民主制。即或不可能,也应积极追求,至少要努力缩短将来法西斯蒂黑暗时期至可能的极限。”^②

陈其昌指责道:“你这是为资产阶级民主大唱赞歌。”

陈独秀高声道:“资产阶级民主有什么不好?我看资产阶级民主就有很多优点。我们绝不能简单地把民主政治当着是资产阶级的统治方式,是伪善,是欺骗,而不懂得民主政治之真实内容同时也是大众所需要的。^③其实资产阶级的民主制,不仅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且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④所以说,对于民主制度,无论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都不能鄙视它、厌弃它,把它当作可有可无的东西。尤其是在东方落后国家,长期受封建制度束缚,没有民主的气息和习惯,更应该把它当作战斗的目标而奋斗。^⑤年轻人,看问题要用脑子,不能人云亦云。”

濮德志道:“你这种见解,是否混同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战略目标呢?是否违背马克思主义呢?无产阶级革命目的难道是为了民主主义而不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吗?”

陈独秀以教训的口吻道:“所以我说,你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相当片面,相当机械而且幼稚。从马克思到列宁都没有把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分裂开来,他们多次教导从资产阶级形式民主到无产阶级实质民主是



① 陈独秀:《再论世界大势》,1942年3月。

②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

③ 陈独秀:《给连根的信》,1940年7月31日。

④ 陈独秀:《我的根本意见》,1940年11月28日。

⑤ 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

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列宁说过：资产阶级民主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民主，而苏维埃民主是多数人压迫少数人的民主，后者比前者广泛得多、扩大得多。德国社会民主党成立时，恩格斯还健在，他并没有指责这个党名称要不得，列宁也没有摒弃“俄国社会民主党”这个名称，可见他们并不轻视民主而是重视民主的。”

濮德志道：“可马克思、列宁明明说过要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民主。对此你如何解释呢？”

陈独秀道：“不错，他们是说过这样的话，但他们也说过，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最广泛的民主，只对极少数反抗新政权的人实行专政，难道这还不明白吗？你们总是把‘专政’这个名词奉为神灵，而把民主视为妖魔，岂不怪哉！现在苏联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专政到反对派，我举双手赞成，但专政到人民，甚至专政到党内，难道是马克思、列宁始料所及的吗？此无他，贱视民主之过也。”^①

濮德志道：“那你认为无产阶级应该实行怎样的民主？”

陈独秀胸有成竹地道：“‘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抽象名词，而是有它的具体内容。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无产阶级的民主，其内容大致相同，只是实施的范围有广狭而已。如无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民主同样要求一切公民都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罢工自由，特别重要的是反对党派之自由，没有这些，议会或苏维埃同样一钱不值。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政治上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社会主义是相成而相反的东西，民主主义并非和资本主义及资产阶级是不可分离的。无产阶级政党若因反对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摒弃民主主义又亦反对之，则必然出现独裁制、官僚制，而绝不能创造什么社会主义。^② 民主是社会进步抑或倒退的最可信指标，它本身并不含有阶级性，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社会主义者若在‘民主’头上扣上某某阶级的帽子而加以排拒，则是反动而非进步。一个真正的工人国家绝对应该比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更加民主。”^③

王文元又道：“那你怎样看待现在的苏联？”

陈独秀道：“斯大林的苏联已非列宁的苏联，它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反而是世界列强之一，甚至是与德意一样的奉行政治独裁的反动堡



① 《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刊《火花》第3卷第1期，1936年3月

②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

③ 王文元：《双山回忆录》，香港周记行，1977。

垒之一。”^①

濮德志道：“那你认为如果中国革命成功，应该采用什么制度？”

陈独秀道：“现在还没有实现的东西难以预料，不过如果革命胜利，我设想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人民政府，实行名副其实的自由、平等、博爱。”

濮德志道：“林肯的政府是人民政府吗？法兰西共和国实行了自由、平等、博爱吗？”

陈独秀道：“正因为他们没有名副其实地实行他们的口号，所以我们要认真地实行起来。须知上述口号鲜明响亮、通俗易懂，人民向往之。若不拘泥于名词偏见，我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就应该做到民有、民治、民享和自由、平等、博爱。”

濮德志道：“那是虚假民主，资产阶级是在欺骗人民。”

陈独秀道：“所以我们要做真实的，我们不需要欺骗人民。”

王文元问道：“难道巴黎公社的教训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你都忘记了吗？”

陈独秀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并不在于过于实行了民主，十月革命成功的经验也不在于实行了专政。资产阶级政权是少数统治多数，他们都能允许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不怕垮台，而无产阶级政权是多数统治少数，竟怕这怕那，强调一党专政，不允许言论自由，真是岂有此理！现在斯大林造成一个模型，不容有别的模式，还自称为马列主义。我看马克思、列宁地下有知，想必会喟叹呜呼的。”

何之瑜见王文元还要反驳，忙阻拦道：“好了好了，今天就争论到这里吧。其昌，你不要忘记此行的目的。”

陈独秀警惕地问：“什么目的？是不是又要拉我去上海？我和托派已没有关系了，上海我是坚决不会去的。”

陈其昌陪着笑脸道：“我们看到了你在报上发表脱离托派的声明，知道你当时是为了应付武汉那场笔墨官司，只能出此下策。你是我们的总书记，怎能说和我们没有关系了呢。”

一提武汉“汉奸案”，陈独秀心里就来气：“全是你们干的好事，发表的观点到处攻击国共合作，自然让人以为是破坏抗日，是汉奸言论。其实，我一直反对你们这种做法的。这倒好，你们批判我是机会主义，他们又说我是汉奸，结果两头不讨好，让我跟着你们背黑锅。现在又来找



^① 陈独秀：《被压迫民族之前途》，1942年5月13日。

我干什么？我再声明一遍，上海我是绝对不会去的，我和托派没有关系了。”

陈其昌道：“你老是我们反对派的中流砥柱，你不干了怎么行。老托生前一直惦记着你，特别是武汉官司发生后，他多次来信关心你的人身安全，他一直怀疑斯大林会在战争期间暗算你。现在好了，你躲到山里隐居起来，他远离苏联，还是给斯大林暗算了。”

王文元道：“我们这次来，不是让你去上海，而是邀你去美国。老托生前一再来信表示，希望你到美国去。他认为你如到美国，以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老革命家，且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家资格来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对于美国工人所能发生的影响会比莫斯科的代理人所发生的大到1000倍。老托现在虽然不在了，但第四国际更加需要你。你考虑一下，最好到美国去，一是安全，二是对身体有好处，三是生活有保障，四是能更好地发挥你的政治作用。”

陈独秀摇摇头：“美国我更不会去。前年胡适之邀我去，我没答应。现在身体大不如从前，哪里都不愿去。再说国民党特务对我监视得很严，也绝不会允许我出去的。生活问题，还过得去，《时事新报》约我当主笔，每月有一点津贴，亚东有时给一点版税，朋友们也常接济我。”

陈其昌说：“卖文为生，终究辛苦，不如到国外生活舒适，还能再轰轰烈烈干一下。”

“不管你们怎么说，总之我是不去的。”陈独秀停顿了一会，缓和了一下口气问：“你们在上海、香港的组织还有多少人？”

“上海、香港加上其他地方共有百十余人。”

陈独秀道：“人少还在其次，我当年创建中共时，全国各地的党员只有50多人，谁能想到现在发展成了可以和国民党抗衡的第二大党。关键是路线要对头。现值国家与民族危亡之际，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是当务之急，大势所趋，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你们不把心思用在抗日上，却到处攻击国共合作政策，从彭述之到格拉斯个个左得出奇，这就难免为斯大林派抓住把柄，说托派是汉奸组织，从而陷入被动。你们这是在自掘坟墓。我若不和你们划清界线，怎么和群众见面？”

陈其昌问：“依你看来，中国托派已经没有前途了？”

陈独秀毫不客气地指出：“何止是没有前途，简直是糟糕透顶！格拉斯这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只晓得摆第四国际的臭架子，关起门来，自立为王，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之外，别的将无所成就。这些人



如果能发展起来,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①

陈其昌有些不高兴地道:“你这种观点,在组织内是找不到一个拥护者的。”

陈独秀毫不在乎地说:“我不怕没有拥护者。冯玉祥倒过袁世凯,杀过吴佩孚的回马枪,囚禁过曹锟,驱逐过傅作义,反过蒋介石,人称‘倒戈将军’。我和这位将军有些类似,一生就会做反对派,从反满清一直到反蒋介石,后来又反斯大林,现在又反你们,都是少数派。我的一生都是在孤军奋战,但我从不怕孤立。”

话不投机半句多,陈其昌见和陈独秀的思想观点实在相距甚远,根本谈不到一块,便匆匆告辞了。

本来陈独秀到四川之后,和托派组织少有往来,而是忙于生计和治病,稍有空闲,便投入文字学的研究,基本上达到“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冬秋”的境界,但这次陈其昌在江津与陈独秀会晤后,便不断写信寄到江津,批判陈独秀“自‘八一三’以来所发表的一切文字”是从“超党”即“超阶级”立场出发的,“充满了机会主义的精神”。陈独秀实在忍无可忍,便于1940年9月写了《给西流的信》一文,寄给上海的濮德志。时隔不久,上海的托派组织通过《关于D·S对民主和独裁等问题的意见的决议》(D·S即陈独秀在托派内的代号——引者),指责陈独秀的错误“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顶点,发展到了完全离开第四国际的立场,完全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离开了无产阶级立场而站到最庸俗的、最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者的立场上去了”。

陈独秀看后,火冒三丈,致函朋友说:“近接到一些托派文件,见解颇荒谬,故写一文驳斥之。”^②他于1940年11月写了《我的根本意见》一文,寄给上海。此后,他又陆续写了一些致托派朋友的信,继续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就这样,以《我的根本意见》等书信文稿绝笔为标志,陈独秀经过认真反思,终于形成了自己与以往政治观点相距甚远的“最后的政治意见”。



^① 陈独秀:《给托洛茨基的信》,1939年1月。

^② 郑学稼:《陈独秀年谱》。

九十

陈独秀的“最后的政治意见”之所以和以往的政治理论发生了很大变化,有着主观和客观上的深刻原因。

首先,德、意、日法西斯在欧亚战场上的暂时领先,使陈独秀对大战前途产生了深深的担忧。

1938年8月31日,德军进攻波兰,英、法随即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接着,希特勒开始全面进攻西欧,先后侵占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1940年6月,德国占领法国,并开始轰炸英伦三岛。到1941年下半年,希特勒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9月,德、意、日3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正式形成法西斯轴心国。

1940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希特勒出动了190个师达500多万人、3500辆坦克、5100架飞机、5万门以上大炮,采用“闪电”战术,对苏联发动突然袭击,很快占领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以及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广大地区。1941年10月,希特勒对莫斯科发动了代号为“台风”的大规模攻势,艰苦卓绝的莫斯科保卫战开始了。



在亚洲,日本帝国主义也加紧了对中国和其他地区侵略的步伐。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几乎全歼美国太平洋舰队,宣告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此时的中国,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1938年12月,汪精卫投敌,在南京建立伪“国民政府”,国民党投降派诡称“曲线救国”,文武官员大批投敌叛国,高级将领有50多人,军队达50多万,造成“降官如毛,降将如潮”的丑恶局面。与此同时,日军对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实行疯狂的“三光”政策,国民党则趁火打劫,制造“皖南事变”,掀起了震惊中外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由于日蒋勾结,共同反共,到1942年,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人口降到5000万以下,八路军也减少到30多万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这使陈独秀对大战前途产生了深深的担忧。

其次,斯大林的肃反扩大化及外交政策使陈独秀对苏联产生了极大的不信任感。

1936年8月,苏联审判“托季分子恐怖中心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16人被枪决;1937年,审判“反苏托派中心案”,皮达可夫、拉狄克等15人被枪决;1938年3月,审判“右派和托派反苏联盟案”,布哈林、李可

夫等 18 人被处死。肃反期间,1934 年选出的 134 名党中央委员中,有 70% 被戴上“莫须有”的罪名逮捕和枪毙。最后,连流亡在外的托洛茨基也被人暗杀了。

为了维护自身利益,1938 年 8 月,苏联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8 月 31 日,德军进攻波兰,这使斯大林感到苏联的安全面临严重威胁。于是,斯大林决定建立一条从波罗地海到黑海的“东方战线”,加强西部边界,以应付未来必然要发生的苏德战争。

1939 年 9 月 17 日,苏联红军进入波兰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10 月底,这两地分别成为苏联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个加盟共和国的一部分。1940 年 6 月间,苏联对波罗地海沿岸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 3 国实行军事占领;8 月,这 3 国正式变成苏联的 3 个加盟共和国。1939 年 10 月,苏芬战争爆发,经过 3 个日夜,芬兰政府被迫签订《苏芬和约》,同意将部分国土割让给苏联。1940 年 6 月,苏联占领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这样,从 1939 年 9 月到 1940 年 8 月,苏联先后把西部边界向西推进二三百公里,对这些领土一直占领到苏联解体。

为了避免同日本对峙,苏联政府竟然于 1941 年 4 月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不顾中华民族领土主权完整,承认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条约规定:苏俄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神圣不可侵犯性。这个条约的签订,自然对苏联有利,但同时也为日本解除了北方压力,能够腾出手来侵略中国其他地方。日本外相在同德国大使谈话时,就曾直言不讳地承认:“这个条约的签订对我们非常重要,它将是加给国民政府的极大压力。”

这一切都使陈独秀认定苏联已经改变了社会主义性质,变成了和德、意并列的世界“三大反动堡垒”。

再次,从客观上来看,斯大林和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的托派组织在认识和实践“民主”与“独裁”的问题上,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政治时事做分析时,的确不同程度地存在缺点错误,这就为陈独秀就上述问题提出“最后的政治意见”提供了可以作为对立面、乃至据此而向极端发展的材料。比如:当时人们的确未加分析地一概否定“资产阶级民主”,斯大林搞的“党内斗争”的确造成了许多冤案,中共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指示而发起的反“托匪汉奸”运动的确有扩大化倾向,瞿秋白、李立三尤其是王明“左”倾路线压制不同意见,其前提的合理性都是值得怀疑的。至于中国托派组织信奉的托洛茨基理论,其在“民主”、“独裁”



问题上也的确充满极“左”的色彩。同样,对于国际形势的分析,正如陈独秀所指出的那样:“大战开始以来,重庆的《新华日报》,大声疾呼根据列宁上次大战的理论,指斥英法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之虚伪,反对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声称两边也都是侵略的强盗。”中国托派在当时的宣传上也“竟放过法西斯,去向英美攻击,且为苏联征战芬兰辩护”,由此形成“反对民主国的英、美”,“不攻击法西斯”和“拥护苏联”三个政纲。^①共产国际、中共以及托派组织对陈独秀的攻击,自然不能说服和压倒他,反而更加把他推向极端。

最后,从主观上讲,由于陈独秀与斯大林、共产国际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的矛盾与宿怨经过10余年的发展,尤其是经受“托匪汉奸”案的刺激,已经到了无法调和的程度。从这种敌对情绪出发,加上政治偏见,陈独秀就必然过多地怀疑、指责对方,夸大对方的缺点错误,而缺乏客观冷静的态度。



九十一

客观地说,陈独秀的“最后的政治意见”是非常复杂的。自其产生至今多年的历史表明:它既有偏激之词,又有深刻之见;既有主观猜测,又有高明预见。有些意见的价值现在也说不清楚,还有待后人去评说,有待将来的事实去检验。

关于民主问题。

陈独秀认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他较早地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提出了“无产阶级民主”的思想,并且提出“大众民主”这一概念,认为“如果不实行大众民主……必然沦为斯大林式的极少数人的格柏乌政制,这是事势所然,并非斯大林个人的心术特别坏些”,由此得出“以大众民主代替资产阶级的民主的进步的”结论。^②不难看出,他所提出的“大众民主”正是马克思所主张的工人阶级社会主义民主,它意味着由工人实行自我管理的民主制去替代资产阶级代议制民主。马克思一向认为:民主主义在历史上实现了人们的“政治解放”,但如果没有生产资料的社会公有制做保证,仅仅靠“政治解放”是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的,因

^① 陈独秀:《给连根的信》,1940年7月31。

^②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



此他认为必须走向“人类解放”。马克思确信当人们把自己“组织成为社会力量”时,才能克服“政治解放”的局限而实现“人类解放”。^①很显然,对马克思来说,社会主义是用实现经济和社会的民主的办法去进一步发展资产阶级所达到的民主,它是对“政治解放”的超越而不是消极的否定。沿着这个思路前进,马克思一生从未怀疑过,社会主义的政治形式应当是高度的民主制,换句话说,只有民主制才能与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相适应。这一点在马克思那里是不言自明的。在《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马克思明确表示:工人阶级自治的非官僚政治组织是社会主义的适宜形式,而这种形式正是陈独秀所说的“大众民主”。陈独秀认为“政治上的民主主义和经济上的社会主义,是相成而非相反的东西”^②,这与马克思主义观点是毫无矛盾的。这个思想纠正了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中过于强调无产阶级专政、轻视无产阶级民主的倾向,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发展指出了一个重要方向。近百年来,由于马恩列斯毛始终强调无产阶级政权对敌人专政的职能,提出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因此在马克思主义学说中,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十分丰富,而无产阶级民主的理论则极端贫乏。应该说,这是斯大林乃至后来的毛泽东等在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建设中犯错误的理论根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克服失误,推进社会主义事业,中国及东欧国家相继开展了改革,其中政治民主化是改革最重要的目标。陈独秀关于没有民主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论断是极其深刻的。在建设无产阶级民主制的过程中,他主张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也不是不可取的。

然而,陈独秀关于无产阶级民主制要借鉴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意见,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为人们所误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人士都认为他这一理论是“回到资产阶级民主的老路上去了”。1949年4月,胡适为《陈独秀的最后论文和书信》一书写了《序言》,竭力吹捧陈独秀的这些“独立思想”、“实在是他大觉大悟的见解”,并将该书书名改为《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论文和书信)》。直到1977年5月,台湾省的《传记文学》杂志社召开的“陈独秀先生座谈会”,还吹捧陈独秀的“最后民主见解”,建议“编印更完备的陈氏的‘最后见解’,并译成外文,广为流传(包括空投或邮寄共党统治区),使国人与世人认识这位曾是共产党领袖的中国知识分子怎样经过深思熟虑的痛苦经验,彻底否定了所谓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3页,人民出版社,1956。

② 《陈独秀著作选》,第3卷,第56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产阶级专政的共产制度”。^①这显然是歪曲和误解了陈独秀思想的原意，但也说明他“最后见解”的负面影响是非常大的。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其实，关于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争论，早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不久便开始了。首先对苏俄社会主义方式提出批评的是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是第二国际时期欧洲社会主义运动中著名的左派，她不仅在批判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时站在最前列，而且后来也激烈批判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派。十月革命后，她对布尔什维克表示了高度的赞扬和支持，但对列宁制定的党的集中制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认为列宁的集中制计划是企图用一个“无所不在和无所不知的中央委员会的托管”去代替工人阶级“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她对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解散立宪会议、控制言论、禁绝反对派的政策提出了异议。她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但它“必须是阶级的事业，而不是极少数领导人以阶级的名义实行的事业”，因此民主必不可少。如果取消了出版、集会自由，取消了不同意见，那时“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只有官僚是其中唯一的活动因素。公共生活逐渐沉寂，几十个具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无边无际的理想主义的党的领导人指挥着和统治着，在他们中实际上是十几个杰出人物在领导，还有一批工人中的精华不时被召集来开会，聆听领袖的演说并为之鼓掌，一致同意提出来的决议，由此可见，这根本是一种小集团统治——这固然是一种专政，但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一小撮政治家的专政”。卢森堡预言：“这种情况一定会引起公共生活的变化……这是一条极其强大的客观规律，任何党派都摆脱不了它。”^②



平心而论，卢森堡的看法是深刻的，但无法适用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俄国革命，因为它要求以无产阶级的成熟为前提，而这个前提在资本主义未发展起来的俄国是不存在的。因此，卢森堡的主张在经济落后的俄国便显得富有理想主义而缺乏实用性。就十月革命后的情况而论，如果列宁不解散立宪会议，那么他们刚刚用枪杆子夺来的政权就会被众多反对党合法地再拿过去！实际需要从来比理论考虑更强大，所以列宁不可能接受卢森堡的意见；相反，列宁认为卢森堡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

^① 《传记文学》编者：《关于陈独秀先生座谈会的几句话》，载《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广州自由中国出版社，1949。

^② 《卢森堡文选》，第503页。



退一步讲,列宁十分清楚社会主义只能以民主为基础,但是在特定条件下政权就是一切,为此必须用非民主的方法达到自己的理想。于是,在内战的环境下,苏俄党和国家始终是在不断地走向高度集权,不但外部的反对党派被取缔和严厉镇压,而且党内的民主也越来越受到限制,直至禁绝一切自由争论和派别活动,而这些在以前的社会主义运动中本是天经地义地合法的。应当说,在颁布这些措施时列宁是心怀歉疚的,他总是要加上这样一些声明:同志们,别争了,现在不是时候!我们的措施是暂时的,一旦局势允许,立刻解禁!如此等等。正是靠着这些措施,布尔什维克才奇迹般地战胜了各种敌人,保住了政权。然而,事情的复杂性在于,政治的绝对权力哪怕是“暂时的”,一旦在运作中固定下来,就不那么好改变了。列宁晚年不得不拿出相当大的精力对他深恶痛绝却又眼看着不断蔓延的官僚化、特权现象做斗争。在他去世后,经过持续多年的党内斗争,终于发展出了斯大林模式。

从这个角度看,陈独秀晚年对苏联无产阶级专政的看法与卢森堡是一脉相承的。同样道理,斯大林集权化的原因,既有个人因素的一面,也有为了加速社会主义建设,集中全国人力、物力反对希特勒德国的一面,关键是怎么辩证地看待他。

陈独秀依据列宁十月革命胜利后为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而采取的某些不得已的措施,特别是抓住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进而全盘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把“无产阶级民主制”与所谓的“独裁制”的“无产阶级专政”截然对立,甚至把后者视为德意法西斯改制的始作俑者,这些都是原则上的严重错误。陈独秀还认为“列(宁)托(洛茨基)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东与布尔塞维克之混合物”^①,这显然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列宁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否定了20世纪以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应当承认,斯大林晚年是犯了严重的错误。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苏联通过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农业全盘集体化、大清洗等一次次政治运动,从肉体上消灭了大批忠诚的革命者和无辜的人民,建立起一个前所未有的斯大林个人专政独裁制。在这个体制下,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高度一体化,领袖高居社会之上,用他个人的意志决定一切,不但不允许发表任何不同意见,也不允许有任何个人的思想。


当然,这些错误不能简单地归罪于斯大林个人,也不能说与制度无



^① 郑学稼:《陈独秀传》,中国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9。

关。但是,需要弄清的是,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到底是无产阶级专政制度本身的原因,还是制度缺陷造成的后果。如果是前者,就要从根本上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如果是后者,则是需要加强民主与法制建设,从而改善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问题。然而,陈独秀采取了前一种立场。他把当时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镇压国内外敌人颠覆破坏活动中由于没有经验、国家制度某些环节上的缺陷所造成的错误看成是整个无产阶级专政制度的罪恶,把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甚至法西斯专政等同起来,把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对立起来,从而彻底否定无产阶级专政制度。其实,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本来是并不对立的,而是统一的。只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才有广泛的人民民主;若削弱无产阶级专政,就会损害人民民主。在阶级消亡和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威胁消除以前,国家的专政职能是不能取消的。它的存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并不矛盾,它们的正确有效的工作不是妨碍而是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

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后认识。



陈独秀多次表示:自己最后的政治意见是根据苏俄 20 多年来的经验,深思熟虑了六七年才得以成长的^①;或者说自己主张重新估计布尔什维克的理论及其领袖(列宁、托洛茨基都包括在内)之价值,还有根据苏俄 20 余年的教训,非拟以马克思主义为尺度^②。陈独秀还说:“布尔什维克并非马克思主义,乃是俄国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亦即法国布朗基主义。”“布尔什维克的摸索、欺诈等罪恶”与马、恩不同。^③ 所以,“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意见,彻底推翻”。^④

这里所谓“以前的意见”,是指陈独秀自 1920 年建党以来信仰和为之奋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现在经过 20 多年的风风雨雨,陈独秀突然宣布要将它“彻底推翻”,并称是“深思熟虑了六七年”才得以形成,这表明他在世界观上的确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陈独秀当年批驳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而强调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谓无政府主义者“只有眼睛看见劳动阶级的特权不合乎德谟克拉西,他们却没眼睛看见戴着德谟克拉西假面具的资产阶级的特权是怎样

① 陈独秀:《给西流的信》,1940年9月。

② 陈独秀:《给S和H的信》,1942年1月19日。

③ 陈独秀:《致××的信》,1941年12月7日,收入《保卫马克思主义》。

④ 郑学稼:《陈独秀传》,中国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89。



……我敢说：若不经阶级战争，若不经劳动阶级占领权力阶级地位的时代，德谟克拉西必然永远是资产阶级的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的利器”。^① 他的“最后的政治意见”则是明确地否认了无产阶级专政。

即使在陈独秀被开除党籍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仍然没有否认无产阶级专政和十月革命，只是表明自己是站在恢复列宁主义的国际、巩固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拥护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立场上来“反对斯大林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和官僚主义的组织路线”，只是认为斯大林是“以攻击托洛茨基为名，实行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② “最后的政治意见”则把列宁、托洛茨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概否定，又显然是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由此看来，陈独秀的“最后的政治意见”，从政治理论和思想体系上来说，其实质是接近了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即伯恩斯坦、考茨基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崇尚的“社会民主主义”，同时也衔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兴起的所谓“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20世纪80年代西欧国家信奉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抽象地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而在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

陈独秀是一个有独立见解的人。他说过：他的“自来之论，是根据历史现在之事变发展，而不是空谈主义，更不是引用前人之言为立论之前提，此种‘圣言重’的办法乃宗教之武器，非科学之武器也”。换言之，陈独秀“探讨真理之总态度”，在于反对“迷信与成见”两端，“故而见得孔教道理有不对处，便反对孔教，见得第三国际道理不对处，便反对它，对第四国际、第五国际、第……国际亦然。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③

应当说，作为一个“终身反对派”，陈独秀在前半生作为“康党”分子而反对清朝顽固派，作为“乱党”分子而反对改良主义者，作为革命派而反对袁世凯复辟，作为五四运动的旗手而反对一切封建主义卫道士和守旧者，作为马克思主义者而反对假社会主义者的无政府主义者，最终成为时代精神的指导者，都是依据“历史现在之事变发展”而反对“迷信与

① 陈独秀：《谈政治》。

② 陈独秀等：《我们的政治意见书》。

③ 陈独秀：《给S和H的信》，1942年1月19日。



成见”，这一独立思考的思想方法是可取的。他晚年思索并提出的“最后的政治意见”，因为他并未接受过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等人的修正主义思想影响，应该说也是他“独立思考”的结果。

晚年陈独秀在思想上仍与马克思主义固有的批判精神是相通的。马克思有一句名言：“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①恩格斯也指出，科学愈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就愈是符合工人阶级的利益。^②在早期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确贯穿了这一精神。当时的众多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有探寻事物本质的真诚态度，有追求真理的忘我境界，他们不怕直率地说出对自己对别人都残酷的事实。然而，当斯大林模式确立以后，这种无私精神在研究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正是马克思所鄙视的那种“有益还是无益，便利还是不便利，违背誓言还是不违背誓言”的卑下考虑了。^③陈独秀晚年直言不讳地说出他所“独立思考”的问题，人们可以不同意他，但没有理由责备他的这种求实精神。

问题在于，陈独秀过于迷信自己的“独立思考”，尤其是在对自己的某些政治偏见没有认识并抛弃的前提下坚持所谓的“独立思考”，实际上就是迷信自己的成见，这与他自己所说的“探讨真理之总态度”就不能不是一种无法解决的二律背反。尤其是在晚年，他将自己封闭起来，没有融入火热的抗日民族解放运动之中，闭门造车，思考出一种观点便孤芳自赏，自以为正确得不得了，便越发迷信、越发固执，根本听不进别人的意见，最终为那些曾是他的支持者、拥护者和追随者所抛弃，这就是陈独秀的悲剧原因之所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人民出版社，1956。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58页，人民出版社，1958。

③ 《资本论》第1卷第2版跋。

第

二

十

章

陈独秀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政治上不断遭到打击，思想上找不到知音，几乎到了无人理睬、被人抛弃的地步，而周围的亲朋好友一个个“先我而死”，这使他的心灵刻上了难以拂去的“无数伤痕”。

九十二

陈独秀隐居鹤山坪后，曾经几次赴渝就医，但身体未有好转。邓仲纯是个忠厚之人，尽管邓太太对陈独秀夫妇无礼，但他一直和陈独秀保持着深厚的友谊，每隔几天便上山免费给陈独秀看一次病，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从不间断。无奈陈独秀此时病情已十分严重，邓仲纯费尽心机，精心照料，也无明显效果，反而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潘兰珍几次悄悄问他怎么办，邓仲纯只能叹气摇头道：“仲甫英雄一世，现在落到这个地步，心情忧郁，又不愿对人讲，积聚在心。这样的环境不改变，就是华佗再世，也无回天之力。”



陈独秀自1913年参加反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背井离乡，除了在北大任教时比较安逸外，其余几十年一直是反动政府通缉的对象，过的是颠沛流离、提心吊胆的亡命生活，期间先后5次被捕入狱，尤其是最后一次被捕，经受了5年牢狱之灾，患上了严重的肠胃病和高血压，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摧残。

入川后，陈独秀的生存环境每况愈下，政治上不断遭到打击，思想上又找不到一个知音，虽自称“不怕孤立”，但真正到了无人理睬、被人抛弃的地步，心中却总有一种深深的孤独和悲哀；再看看周围的亲朋好



友：养母、大姐、罗汉、蔡元培等一个个“先我而死”，心灵刻上了难以拂去的“无数伤痕”，怎不使他的精神倍受折磨。

生活上更是陷入困境。他搬进鹤山坪，除了和邓太太闹翻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减低生活费用。然而，由于物价猛涨，他的生活还是十分窘困，有时不得不靠典当度日。他除了偶尔为《东方杂志》和编译局写稿，每月领取一点少得可怜的稿费，主要靠蔡元培、邓贻秋叔侄、杨鹏升、邓仲纯等朋友的接济，再就是由当年北京大学毕业的社会名流和国民党官僚组成的“北大同学会”定期给他资助生活费，这成为陈独秀晚年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这种迫于生活、却之不恭而受之有愧、近乎靠别人施舍度日的生活，极大地伤害了他一贯自恃清高、洁身自好的自尊心。但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又不得不如此。在他不得不接受赠款后的一些复信中，经常可以看到“既感且惭”、“且感且愧”、“不胜惶恐之至”、“屡承厚赐何以报之”等等这样的字句，字里行间，包含着这位末路英雄难以言表的辛酸和羞辱。



即使到了如此穷困潦倒的地步，陈独秀也并非什么人的赠款都接受。他为自己规定了3条原则：第一，“素无知交者，更不愿无缘受赐”。第二，国民党著名的官僚或共产党的叛徒赠送的钱物，即使出于同情而非政治拉拢，也坚决拒绝。叛徒任卓宣（叶青）汇给他200元，不久便被退回^①；朱家骅赠他5000元支票1张，被他拒绝；张国焘寄赠5000元，也请郑学稼代为退还^②。第三，“无功不受禄。”他的《小学识字教本》原定由国民党教育部出版，为此出版社已经提前预支给他两万元稿费。但是，由于他与教育部长陈立夫为改书名发生了争执，书没出成，稿费出版社也没要回，但陈独秀到死也没动这两万元钱一下。

1941年春节临近，虽是战乱期间，但山里的百姓仍然忙着置办年货，家家炊烟袅袅，带出一丝节日的气息，唯独陈独秀家中冷冷清清，看不出有半点过年的味道。

这天早上，北风呼啸，朱蕴山提着几只鸭子来到鹤山坪。他一踏进陈独秀家，就觉一股寒气扑面而来。屋里没点炉子，陈独秀穿着单薄破旧的棉衣，冷得瑟瑟颤抖，半躺在床上，戴着老花镜，正津津有味地看着一本字帖。联想到陈独秀当年气吞山河的英姿，朱蕴山不觉一阵悲酸涌上心头。

^① 任卓宣：《我与陈独秀先生》，载中国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

^② 陈独秀致郑学稼的信，1941年3月15日。转引自郑学稼著《陈独秀传》。



看见朱蕴山到来，陈独秀忙放下手中的字帖，吃力地想站起。朱蕴山见状，紧步向前，抓住他的手劝阻道：“仲甫兄，你躺着别动，我又不是什么客人。”

陈独秀感慨地说：“如今，能常来看我的，除了你和仲纯，实在是不多了。”

“现在国难当头，朋友们都忙着抗日大事，你躲在这偏僻的山村，交通不便，大家想来看你也挺不方便，其实都挺惦记你的。”朱蕴山安慰着，又道：“快过年了，我给你带来几只鸭子。”

陈独秀高兴地说：“不瞒你说，我这个年还真是难过。有这几只鸭子，就有年味了。”

朱蕴山又问：“天这么冷，你穿这么少怎么行，我下次来给你带件新棉袍来。”

陈独秀忙道：“不用，上次柏文蔚来看我，送了我一件灰鼠皮袍。”

朱蕴山问：“老将军这么大年纪了，也来看过你？”

陈独秀道：“我与柏文蔚在辛亥革命前便是生死与共的老朋友，早年一起创办藏书楼，组织励志社，共同发起岳王会，两人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踏遍大江南北，到处宣传爱国、鼓吹革命。二次革命时，他在安徽当都督，我当秘书长，情义深重呀。虽然他现在做了大官，却绝非薄情寡义之人。”

朱蕴山又问：“既然他赠你皮袍，为何天气这么冷，不见你穿上？”

陈独秀一时语塞，潘兰珍道：“让他给当了。”

朱蕴山瞪大眼睛，埋怨道：“仲甫兄，这就是你的不是了，生活有困难跟大家说，都是患难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嘛！”

陈独秀笑道：“过几天就赎回来了，这点小事，不值得一提。”

朱蕴山又道：“我看你还是搬到县城里去住，无论看病，还是生活，城里总比这里方便，朋友也好随时有个照应。恩来上次提出让你回延安的建议，你也可以考虑一下。”

陈独秀摇摇头道：“蕴山，山村有山村的乐趣，空气好，又安静，耳目闭塞，什么事见不到，什么话听不到，心里不会烦，对我的高血压大有好处。所以，县城我不会去，重庆也不想去，延安更不能去。我到延安怎么办，都是我过去的部下。他们开会，我往哪里摆？大家理你不是，不理你也不是，彼此都别扭。除非抗日胜利后，回故土安庆。”^①

^① 朱蕴山：《关于陈独秀的几点回忆》，转引自唐宝林等编《陈独秀年谱》，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你这固执脾气，真拿你没办法。其实我也只是随便说说，人各有志，主意还是你自己拿。咱们不说这些，仲甫兄，这么多年来，你还没送过我一个字，今天能否赏个光？”

陈独秀见推辞不掉，想了一下，摊纸写下一首词：

贯休入蜀惟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
岁晚家家足豚鸭，老俛独羨武荣碑。

贯休是五代名僧，当年在四川修炼时曾经一度生活窘迫。《武荣碑》是帖，全名为《汉执金吾荣碑》，为恒帝末年的稀世珍品。朱蕴山明白陈独秀是在词中自比贯休，但不知他把《武荣碑》用在词中是何用意，便问：“仲甫兄，前三句好懂，但不知后一句怎讲？”

陈独秀笑道：“欧阳竟无大师收藏有《武荣碑》帖。这欧阳虽然早年与我相识，但我多次向他借之，他总是再三推脱，不肯借我，弄得我无可奈何。前几日我想反正今年难得清闲，无论如何也要将此帖借来欣赏，便写了这首诗送他。欧阳兄大概为我的心情所动，不得不忍痛割爱，破例将此帖借给了我。”

说罢，陈独秀拿起正在翻看的那本字帖，得意地晃了晃：“这就是我最好的年夜饭，精神食粮。”

朱蕴山听了道：“这么说，你是用诗换帖，我是用鸭换诗了。”

这一年春节，陈独秀有了欧阳竟无大师的《武荣碑》帖和朱蕴山赠送的几只鸭子，高兴得不得了。除夕之夜，家家户户都在放着鞭炮热热闹闹吃年饭时，他让潘兰珍煮了鸭子，热上一壶酒，挑着油灯，饮一口酒，然后细细品味着《武荣碑》帖，时而默默吟诵，时而比划着隶书的笔锋，手舞足蹈，像一个孩子。

潘兰珍望着他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背过脸去偷偷抹眼泪。

陈独秀去世后，朱蕴山回想起他晚年窘困的生活，曾写诗一首道：

掀起红楼百丈潮，当年意气怒冲霄；
暮年萧瑟殊难解，夜雨江津憾未消。
一瓶一钵蜀西行，久病山中眼塞明；
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定论老书生。

随着时光的推移，鹤山坪人虽然并不知道住在石墙破屋这位神秘老



人曾是共产党的总书记,但觉得他并不神秘,和蔼可亲,没有架子,还喜欢接济穷人;又知道这位老人很有学问,字写得很好。于是,周围山里人只要有红白喜事,或逢年过节,便纷纷上门请他书写对联。^①陈独秀则有求必应,凡是穷人,便分文不收为之书写,其联文大多摘录古诗词,有时也当场即兴写来。山里人纯朴情真,见他分文不收,觉得过意不去,有时便拎点农产品,或者送点烧柴之类的东西。天长日久,山里人对他们夫妇也很尊敬,只要见了他和夫人站在门口或者早晚散步,总会亲热地向他们打招呼。

转眼间到了1942年春节。这次过年,陈独秀不像上一年那样冷清得只有《武荣碑》帖了。上门请他写对联的山里人特别多,只要来的大都拎着一些年货送给他。因为过年,他又不好固执不收,只好贴纸贴墨,书写对联回赠人家。一来二去,今年的年货特别丰盛,鸡鸭鱼肉都不用花钱买了。于是,他便和潘兰珍商量,托人下山叫松年一家上山过个团圆年。

陈松年这几年过得也不宽裕,一家4口只靠他那点微薄的薪水养活,有时还要给父亲看病抓药,可以说欠了一屁股债。有时潘赞化看不过去,便卖点珍藏的字画接济他。所以,自从陈独秀搬进鹤山坪后,一家人没有在一起过个团圆年。

陈松年有心想跟父亲过个团圆年,可是经济拮据使得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父亲托人捎信叫他一家上山过年时,起初并不想来,心想待过了年三十,初一早上上山给父亲拜个年就行了。父亲生活也很困难,一家人在一起过年,哪来那么多钱置办年货。可陈独秀一再捎信催促,这样,到了年三十下午,一家4口才赶上山来。

陈独秀见松年一家来到,十分高兴。除夕夜,陈独秀按照家乡安庆的风俗,叫儿子在院里鸣放鞭炮,鞭炮在山间空旷的夜空噼里啪啦响个不停,全家人围在小桌前,欢欢喜喜地吃了顿团圆饭。陈独秀喜笑颜开,一手抱着大孙女,一手抱着刚出世后不久的小孙女,在屋里不停地转来转去,尽情享受这天伦之乐。然而,谁也想不到,这竟是他在这人世间过的最后一个团圆年。



^① 张永通:《我们对于陈独秀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点了解和认识》。

九十三

1942年春天的江津，雨天多于晴天，那连绵的细雨总会使陈独秀生出无限的愁思，刚刚开朗的心情又如死灰一般。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每当雾蒙蒙的，空气潮湿，气压较低，正是百病皆发的时节。陈独秀住的石墙破屋，顶漏地湿，这使得他整天感到胸口憋闷、头昏目眩。

陈独秀早有胃病，几次狱中铁窗生活的折磨，又使他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自从流落江津，息影鹤山，更是贫困交加、穷困潦倒，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已到风烛残年。1940年他到重庆治疗，医生便说他的心脏不能再扩大半指，否则活不了3年。虽然医生和朋友都瞒着陈独秀，但陈独秀心中对自己的病情也基本明白。他看西医没有什么好的效果，便找一些中医偏方自己治疗。当地人说，玉米缨可以治心脏病，于是就常托人从乡间弄些玉米缨煎水喝。隐居鹤山坪后，又听说用蚕豆花泡水服可以治疗高血压，于是每年春暖花开时，他都要到田间采摘些蚕豆花，晒干泡服，虽无什么明显效果，对身体也无什么损害。



1942年3月，陈独秀接到杨鹏升的来信，说想请他为其印谱叙文。此时他心绪不佳，根本不想做任何事情，便强支病体，给杨鹏升回函，说自己对印章过于外行，推脱了叙文之事；同时，对杨鹏升多年来为他寄钱、寄笔墨、寄稿纸信封等表示感谢，并要求杨鹏升以后“勿如此也”。

这一日，又下起蒙蒙细雨，陈独秀想起最近听到外界对他撰写的《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一文评论太悲观，于是强撑着起来准备再写一篇文章阐述他的政治观点。

正写着，何之瑜和陈松年打着雨伞进来。陈独秀见到他们，只是欠了欠屁股，算是打了招呼。

何之瑜道：“仲老近来身体怎么样？我带来了杨鹏升将军给你的一封信。”

陈独秀拆开信，见里面又寄来1000元钱的汇单，感到十分不安，道：“总是让蓬生破费，怎么好意思呢。”

潘兰珍说：“以后有机会再感谢人家吧。”

陈松年看到父亲桌上一叠摊开的《再论世界大势》文章，劝道：“听邓叔叔讲，您近来总是头晕，还是少写一点。”

陈独秀道：“不要紧的，年龄大了，血压有点高，慢慢就适应了。”

何之瑜道：“听说为了出版您写的《小学识字教本》一书，国立编译馆已寄来2万元预支稿费，可陈立夫让你换书名，你坚持宁可书不出，也不换书名。何必这么认真，换就换吧，又不是什么原则问题。”

提起此事，陈独秀气就不打一处来，道：“陈立夫说我用‘小学’两字不妥，容易和‘小学校’混淆，他懂什么？‘小学’是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2万元稿费可以不要，但我的文章别说两字，就是一个字也不能改。”

何之瑜又道：“我还听说张国焘给你寄来5000元，也让你退回了？国焘不管怎么说曾经是你的学生和老部下，你这样一概拒绝，似乎也太不近人情了。”

陈独秀用蔑视的口吻说：“张国焘是什么东西，一个叛徒而已，我陈独秀没有这样的学生。古人尚知不吃嗟来之食，我现在虽然一无所有，但这把硬骨头还是有的。我宁愿穷死、饿死，这种人的钱不能收！”

何之瑜敬佩道：“仲老，你真是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真英雄也。我算服了你了。”

“你也不用拍我的马屁，我是什么我心里最清楚。我现在行事不管他人怎么想，只求对得起天地良心而已。”陈独秀感叹了一番后，转了话题，问道：“最近有什么新闻？我现在对外面的事情一概不知，和瞎子、聋子没有什么区别了。”

何之瑜道：“前不久，我在重庆见到董必武，听他说毛泽东正在延安开展一个什么整风运动，很是热闹。”

陈独秀饶有兴趣地问：“什么叫整风运动？”

何之瑜道：“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批判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什么的，每个人都要对照这几条反省自己。”

陈独秀听了，点点头道：“这是毛泽东要拿王明开刀了。那王明怎样？”

何之瑜道：“王明自然不服，可又没有办法。眼看大势已去，王明只好默认了毛泽东在中共的领导地位。”

陈独秀感叹道：“这就是毛泽东的过人之处，我是自叹弗如呀。”

何之瑜见他说得伤感，忙安慰道：“其实毛泽东当年也是你老的学生，这叫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嘛。”

陈独秀点点头道：“这倒也是，毛泽东当年对我还是十分尊重的，我对他也无什么恶感，我始终认为他是搞农运的实干家。王明可不同，他是个根本不懂中国国情、只会瞎指挥的卑鄙小人。”



何之瑜又道：“我听懂必武讲，毛泽东最近在延安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还提到过您呢。”

陈独秀道：“噢？我这个无用的老头子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

何之瑜道：“毛泽东说，将来写党史还是要写你的，说你对中共是有贡献的。”

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做《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党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陈独秀听罢何之瑜这一席话，一时无语，内心却涌上许多往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想去延安，毛泽东回答必须先公开承认错误，他自然不干。后来王明指使康生发表文章，诬陷他是汉奸，他一气之下，和中共打了一场笔墨官司，最终堵死了回到党内的路子。开始，他将此事迁怒于毛泽东，所以周恩来几次请他去延安，都被他拒绝。现在看，毛泽东也有他不得已的苦衷。虽然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实际掌握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权，但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他一直不放心，1937年底派王明回国，很明显就是要取他而代之，如同大革命失败后用瞿秋白替换自己一样。可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却能够在这样恶劣的政治环境下，一面在国共合作中和蒋介石周旋，一面抗击日本侵略，最终搬开了王明这块绊脚石，说出了“将来我们修党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这样的话。这恐怕是自陈独秀1927年下台以来15年间中共最高领导人第一次在党内这样客观评价他，他怎么能不感慨万分：“润之确实有高招呀，我在15年前就说过，中国的事情要靠中国人办。过去在斯大林的高压下，我办不到，可润之办到了。且不管他搞的那一套我是否同意，就冲摆脱斯大林这一招，我就佩服之极。”

何之瑜道：“其实我看，毛泽东和您在许多方面都有相似之处，只是您生不逢时罢了。上天派先生来创建共产党，派毛泽东来发扬光大共产党。”

陈独秀一愣：“是吗，生不逢时？你说得对，这就是命呀。”

何之瑜乘机劝道：“依我看，毛泽东对你不错，不如到延安去养老，条件总比这里好得多。”

陈独秀摇摇头：“你不懂，条件再好也不能去。他走他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陈某人一辈子从未屈服过任何势力和个人，临死了不能丧失人格和操守，我现在剩下的只有人格了。”

何之瑜见他愈说愈伤感，不敢再深谈，又劝了几句，便和松年离去了。



九十四

陈独秀当时并不知道,这时候的延安已非1938年他要求回中共时的延安。那时候,王明踌躇满志,以“钦差大臣”身份从莫斯科回来,大有准备取毛泽东而代之的架势。而到了1942年春天,毛泽东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共领袖,并且开展了延安整风运动。

自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肯定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以来,毛泽东的工作可谓是得心应手。但是,皖南事变又给他敲了一个警钟。

在此之前,毛泽东不是没有看破国民党蒋介石反共的本质,不是没有预见到可能到来的反共摩擦,也不是没有提醒过新四军领导人准备应付突然袭击。为此,他亲自制定了非常具体的先发制人的方案。但是,就在蒋介石大规模进攻即将到来的一瞬间,他受到了共产国际连续发来的电报,季米特洛夫明确表示,蒋介石的主要危险,还只是有被亲日派牵入圈套而由反共走向投降的可能性,还看不出有全面剿共和降日的决心,故中共无论如何“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

毛泽东并不赞同莫斯科的意见,但没有莫斯科的支持,先发制人根本不可能实行,因此他只能设法采取其他办法来缓和目前的严重危机。几乎就在皖南事变发生的同时,他又收到季米特洛夫发来的电报,严厉批评他“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而此时破裂已经到来了,蒋介石先发制人,毫不客气地一举吃掉了项英率领的近万人的新四军队伍。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毛泽东震惊了,他愤然致电周恩来,要他质问刚刚到国民党政府上任的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叶项被俘,全军覆没,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请问崔可夫如何办?”^①联想到自建党以来共产国际多次对中共的粗暴干涉、瞎指挥,特别是1938年在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以共产国际提出的“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指示,全盘否定了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的抗日主张,险些将中共再次引入歧途,毛泽东不能不开始考虑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中共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这一重大问题。他要寻找一个突破口,这个突破口就是皖南事变。

1947年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专门讨论皖南新四军失败问

^① 《毛泽东关于将皖南事变告崔可夫并征询意见致周、叶电》,1941年1月15日。



题的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项英的错误是怎么来的?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抗战以来一部分领导同志“只知片面的联合而不要斗争、不要独立自主的政策”造成的。问题的根源在于有些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甚至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不了解经过10年反共的蒋介石。毛泽东情绪激动地讲这一番话时,不知是不是话中有话,但肯定会使在座的王明如坐针毡。

博古犯错误,乃至项英犯错误,在毛泽东看来都是一个问题,那就是理论不能联系实际。理论不联系实际,说到底就是不能依照中国革命的实际来考虑问题,一味地照搬、照抄莫斯科的指示或苏联的模式。外国人考虑问题不从中国实际出发也就罢了,如果中国党内一些人也不从中国革命的实际出发来考虑问题、决定政策,而是“言必称希腊”、“钦差大臣满天飞”,习惯于唯莫斯科之命是从,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即使共产国际不干涉,党内也势必出现严重问题。



抗战以来,毛泽东写了一系列重要理论文章并没有得到重视,《新华日报》竟然拒绝发表他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也“只当作中央的一般政策文件看待”,而弥漫延安的都是“空洞的理论研究”,“言必称希腊”,“钦差大臣满天飞”。王明则被许多人视为难得的“理论家”,名噪延安,甚至被一些女青年奉为偶像。

当然,类似的问题,毛泽东并不是没有看出来,只是当时解决问题的时机尚未成熟。皖南事变的发生,使得毛泽东再也不能容忍党内这种唯莫斯科之命是从的风气发展下去。1941年5月14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发来电报,直截了当地要周恩来转告崔可夫:中共怎么做自有中共的道理,要他“不要随便乱说”。毛泽东同时告诫周恩来等一定要明白:对俄国人的话,“不可不听,又不可全听”。^①

几天后,毛泽东在延安宣传干部会议上公开做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著名演讲,大谈“很多留学生”对中国的历史一点不懂,对中国的问题无兴趣,对自己党的指示不重视,“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到处照搬万古不变的教条。胡乔木后来回忆说:“毛泽东的报告用语之辛辣、讽刺之深刻、情绪之激动,都是许多同志在此以前从未感觉到的。”但是,许多人仍没有理解这个报告的深刻含义。《解放日报》也是在1年后才发表这篇报告的。毛泽东不无感慨地说:“我做《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

^① 《毛泽东关于团结对敌问题给周恩来的指示》,1941年5月14日。

影响。’但是,这更加坚定了他要整风的决心。”很明显,毛泽东是话中有话、有备而发。

在毛泽东看来,改造那些习惯于拿着教条来唬人的“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的领导人,就不仅是机不可失的问题,而且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

7月1日,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政治局通过了一个《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以约束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决定明确提出:全体党员和党的各级组织都必须“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反对任何阳奉阴违的两面派行为,坚决杜绝任何小组织和派别活动。^①

紧接着,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进一步通过《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反对将学习马列主义原理原则与了解中国社会情况、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互相脱节的恶劣现象”为名,要求全党树立立足中国革命和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②

9月10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举行的党风学习专题会议上,做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开宗明义地宣布: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时期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列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但是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现在延安的学风就是主观主义的,党风则是宗派主义的。粉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方法,首先要认清其严重性,分清真假马克思主义,其次必须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面提倡把中国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马克思主义化,一面提倡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他提议,取消过去的所谓“理论家”头衔,今后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真正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人才算得上是理论家。

几天后,毛泽东决定:成立高级学习组,先花半年时间,“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与我党20年历史两个题目”。此后,他接连发表了《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话,掀起了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

1942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正式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作出以下决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着领导整个



^{①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卷,第144、176页,中共部中党校出版社,1991。



毛泽东与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人员合影。

党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举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重新决定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 3 同志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会议中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

与此同时,政治局决定: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与组织委员会,作为政治局书记处的助理机关。前者由毛泽东、王稼祥、博古、凯丰 4 同志组成,以毛泽东为书记;后者由刘少奇、王稼祥、康生、陈云、张闻天、邓发、杨尚昆、任弼时 8 同志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

这一决定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一元化领导权威。

这一天距陈独秀逝世仅有两个月的时间。



第 二 十 一 章



陈独秀一生中握笔的最后一个字是“抛”，他抛弃了这个世界，最终也被这个世界所抛弃。友人叹道：“仲甫一生轰轰烈烈，虽然毁誉难凭，大道莫容，但其是非功过现在恐难结论，论定尚须十世后。”

九十五

1942年5月12日上午，陈独秀身体略感好受一些，便让潘兰珍泡了一杯蚕豆花水，喝下后不久就感到腹胀不适，当晚睡觉不安。此时正是多雨季节，蚕豆花被雨浸后发酵生霉，长了黑点点，陈独秀没有在意，结果喝了带菌的水中了毒。^①这天夜里，雨欲下又不下，气压低得使陈独秀血压上升不降，难受得他喘不过气来，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潘兰珍看在眼里，急在心头，却又无奈，问：“老先生，阿拉这就去找邓先生。”

陈独秀摇摇头，有气无力地说：“深更半夜的，几十里山路，你一个人去我怎么放心。不要紧张，我休息休息就会过去的。”

次日清晨，陈独秀果真感觉好了许多，便强撑着爬起身，来到书桌前，坚持写完《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文，又给何之瑜写了一封信，称此文“可以说是前三

^① 何之瑜：《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收入《陈独秀评论选》，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文(《我的根本意见》、《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引者)的结论,更是画龙点睛了”。

陈独秀自己没有料到,这封信竟成了他的绝笔。

写完之后,已近中午,陈独秀感到头又晕了,便躺到床上休息。正在此时,包惠僧从重庆专程赶来看他。见到老朋友,他喜形于色,又挣扎着坐起来,吩咐潘兰珍到镇上买了一点猪肉,中午的饭菜有了荤味,便觉得丰盛了许多。陈独秀说道:“要像上次邓老请客那样,我可请不起,惠僧你就凑合着吃吧!”

包惠僧忙道:“很好,很好,我又不是外人。”

客人吃得满意,主人心里得意。陈独秀高兴,也饱餐了一顿。岂料当天晚上,他便感到腹痛如刀绞,到半夜时分,强撑着从床上探出上身,将腹中的积食“哇哇”吐出,吐后稍适,但精神十分疲惫,双目无神,近乎凝滞。到了下半夜,潘兰珍为他服了“骨炭末”,才觉稍微舒服。^①

此后一个星期,陈独秀病情时好时坏,总觉得耳鸣加剧、四肢无力。潘兰珍几次要到山外去叫邓仲纯,都被他止住。

5月17日傍晚,陈独秀感到腹胀剧烈,疼痛,勉强起身欲入厕所,刚起身突觉一阵天眩地转,“扑通”晕倒在床上,霎时四肢僵直,冷汗如注,昏迷不醒,吓得潘兰珍束手无策。这深山夜晚,大地沉睡,万籁俱寂,叫天天不应,叫地地无声,潘兰珍只能在微弱的煤油灯下,满面泪水,守候在生命垂危的亲人身旁,不时地给昏迷不醒的陈独秀敷换毛巾。^②

三更时分,陈独秀苏醒过来,慢慢睁开无精打采的眼睛,正欲启动嘴唇,想对潘兰珍说什么,旋即又昏迷过去。潘兰珍发现,他浑身颤抖,冷汗涔涔,发起了高烧。

18日清晨,陈独秀好似睡了一夜长觉,苏醒过来,长长地吁了口气。守候在身边、眼睛充满血丝的潘兰珍见陈独秀醒来,略带几分高兴地说:“老先生,依终于醒过来,可把阿拉吓坏了,醒来就好。”

陈独秀苦笑一声,自知此次病得不轻,便叫潘兰珍托邻居到山外去喊邓仲纯来。

邓仲纯得知陈独秀病重的消息,心知不妙,急忙到九中喊了陈松年、何之瑜,三人急急忙忙赶到鹤山坪,已是太阳西斜。走进杨家大院,见陈独秀又处在昏迷状态。邓仲纯忙打了一针,灌了一些药。许久,陈独秀才又悠悠地苏醒过来。



^{①②} 何之瑜:《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收入《陈独秀评论选》,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邓仲纯见这次陈独秀病得厉害，便来到外屋悄悄和何之瑜商量，给重庆名医周伦、曾宝天两位医生写信，派人请他们务必速来鹤山坪会诊。陈独秀上次在重庆住院期间，便是这两位名医为他治疗，因此对他们十分信任，听说去请他们，心中顿觉有了希望，便望眼欲穿地盼着。

5月22日，陈独秀又接连出现3次昏厥。邓仲纯打了强心针抢救，才又慢慢苏醒过来。

5月23日，邓蟾秋、邓燮康和潘赞化、高语罕等人听说陈独秀病危，赶来探望。江津县医院西医邹邦柱、康熙光也一齐来到鹤山坪，和邓仲纯一同会诊之后，对陈独秀“施行灌肠，大便得适，然病情仍未少减”。

这时候，专程去重庆请陈独秀所信赖的周伦、曾宝天的人回来了，说两位名医虽然医务繁忙，还是仔细研究了陈独秀的病情，确认陈独秀病已垂危，实无挽救之力，故未前来诊治，但为了表示对陈独秀的最后友情，他们又捎来了一些急救药品。

陈独秀从昏迷中醒来，未见到他所盼望的周、曾两位名医，心中生还的一线希望如同肥皂泡破裂了，马上又昏迷过去。

傍晚时分，邓仲纯将大家召集到外屋，神情凝重地说：“仲甫的病实在不轻。不瞒你们说，由于高血压已严重影响到心脏，加之食物中毒，稍不小心，就可能发生生命危险，我看大家都要有思想准备。”

何之瑜强忍悲痛道：“先生待我恩重泰山，这几年我又受北大同学会委托照料先生，因此料理先生身后之事自是责无旁贷。师母和松年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力而为。”

陈松年哽咽地道：“家父后半生萧条，经济拮据，生活上全靠诸位朋友慷慨资助，没留下一文钱，能省就省吧，不必铺张，买口薄棺，就地安葬，待抗战胜利时再迁回老家安庆。”

“这绝对不行！”潘赞化首先反对：“仲甫毕竟有过辉煌的时刻。青年时期向孔教宣战，向偶像宣战，有一种凌厉之气，不失为一个前驱者。一生坚贞，身后穷愁，毕竟是一个操守者。因此，我们要对得住他。用最好的木头，请最好的木匠给他打一口像样的棺材。”

高语罕叹道：“仲甫一生轰轰烈烈，虽然毁誉难凭，大道莫容，但其是非功过现在恐难结论，论定尚须十世后。这样的伟人若是草草掩埋，实在是上天的不公。”

“潘先生、高先生言之有理。”邓蟾秋道：“一般所谓革命者，不成功即成仁。成功者则富贵功名，生荣死哀；不成功者，死后亦有政府褒扬、社会追悼。唯仲甫先生一生清苦，不事权贵，傲骨铮铮，洁身自好，此等风



范，滔滔天下，能有几人！因此，身后之事，绝不能草草了结。这几年先生与老朽及燮康侄交往甚密，感情笃深。他的身后大事、衣衾棺木等费用，均由老朽和燮康侄共同负担，夫人及公子不必担心。不过具体事宜，烦请各位分头操办，老夫实在因年事高，力不从心了。”

“蟾老慷慨解囊，令人感动。”何之瑜冲着邓蟾秋连作3个揖，又道：“不过还有一事须请诸位商讨，先生百年之后，是在鹤山坪就地安葬，还是葬于江津县城？”

邓燮康道：“诸位，这事我已与叔父商定，我愿将县城西门外桃花林边新建的别墅康庄园地捐赠给独秀先生作为墓地。此处是鄙人的避暑山庄，面对长江，背倚春山，幽静安逸。先生以前多次赏光在此小住，闲时常到前坡眺望远景，说过‘得此佳景，平生足矣’。先生百年之后能安葬于此，也算是了却先生的生前宿愿。”

高语罕道：“如此最好，独秀先生是一个东西南北四处为家的革命者，自然也是抱着‘青山处处埋忠骨’的见解，若能安息于此，也可以说此生无憾了。”

潘赞化道：“邓先生不愧为热心肠的开明人士，令人铭记。以先生一生之学问、事业及人格，长眠于此，绝不会污辱这块净土。”

大伙商定，邓蟾秋叔侄便告辞回去，分头准备去了。



九十六

1942年5月25日下午，从昏厥中再度醒来的陈独秀，感到四周出奇地安静。他挣扎着动了动，好像四肢已不属于自己，自知死之将至，不禁悲从中来。他定了定神，睁开眼睛，见潘兰珍坐在床边打盹，便挥着无力的手，嘶哑而悲凉地说：“阿珍，你去请何先生来，我有话……要对他说。”

潘兰珍见先生醒了，赶忙跑到外屋，将何之瑜请到病床前。

何之瑜这位跟随陈独秀多年的北大学生，一直对陈独秀尊师如父，自罗汉去世后，便默默承担起照料老师的任务。此时看到老师被病魔折腾得只不过比死者多了口微弱的气息，回想起他当年北大时的英姿，禁不住一阵心酸，眼泪簌簌地往外流。

陈独秀见何之瑜到床前，强睁开眼，不停地喘气，艰难而断断续续地说：“之瑜，你是我最可信赖的人，这些年你受北大同学会的委托照顾我，其情毕生难忘。现在，我就要走了。我留下的书，由你经手，送给北大。”

我的书稿,你和松年、抚五等人商量处理就是了。”

何之瑜强忍悲痛说:“先生,你别这样说,你的病会好的。这两年我对先生照顾不周,还得请先生多多包涵。”

陈独秀苦笑一声道:“我的病我清楚。我死后,丧事从简,也不要登报。”

何之瑜道:“先生尽管放心。”

陈独秀闭眼休息了一会儿,又叫了一声:“阿珍。”

潘兰珍赶紧抓住他的手,哽咽道:“先生,我在。”

陈独秀道:“阿珍,为夫……对不起,你跟我这些年,除了……担惊受怕……吃苦受累……”

潘兰珍泪飞若雨,道:“先生,别再说了,阿拉孤苦伶仃,如同路边野草,是先生不嫌弃我,今生得以伺候先生……阿拉知足了。”

陈独秀百感交集地说:“死,并不足畏,延年、乔年、筱秀早已先我而去了……可是,我临去之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呀!我去后,你务求生活自立,倘有合适之人,可从速……改嫁,安度后半生。有一事……你要切记,为夫立身世间,虽非高风亮节,却也不失……做人的操守。教育部寄来之款,不可动用,另外,切不可……拿我的名声……卖钱。”^①

陈独秀话未说完,站在一旁的潘兰珍已是泪流满面,呜咽着说道:“阿拉知道,阿拉不会做……对不起先生的事情。”

倏地,陈独秀喉中“霍霍”疾吼,胸脯起伏,欲咳又咳不出来。陈松年赶紧将床头边的油灯往前挪了挪,见父亲双目大睁,一张脸憋得通红,嘴唇抖动了好半天,才发出极微弱的声音:“松儿……松儿。”

“爹,松儿在。”

“松儿……松儿,”陈独秀气喘吁吁地道,“爹愧对你母亲,愧对你姨妈,也无颜见江东父老。爹去后,你不必扶柩回乡,就在此地埋葬,待抗日胜利后回家时,再把我的棺木和祖母的棺木都带回去。”

陈松年热泪盈眶:“爹,松儿……牢记在心。”

第二天上午,包惠僧的妻子夏松云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赶到鹤山坪,潘兰珍忙带她们进屋。

夏松云拿出300元钱对陈独秀说:“惠僧回家说先生生病了,段锡朋和几个北大同学临时凑了一点钱,先让我们送来应急。”^②

① 何之瑜:《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收入《陈独秀评论选》,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

②② 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载《党史研究资料》1979年第3、5、8期。



陈独秀干瘦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他无力地睁开眼睛,说:“谢谢。”他歇了一会儿,又喃喃道:“要是惠僧来了多好啊。”说完,又昏睡过去。

第二天,包惠僧赶到了鹤山坪。潘兰珍忙拉着包惠僧进屋。

邓仲纯站在陈独秀床前,见包惠僧进来,便说:“包先生可来了,仲甫昨天清醒时还念叨你呢,这次昏迷的时间比较长,交替打了强心针和高血压针,到现在也没有醒过来。”^②

包惠僧俯下身子,只见陈独秀仰卧在床上,一双眼睛紧闭着,削瘦的脸庞在暗淡、闪烁不停的煤油灯花照耀下变得越来越惨白,高烧、心口剧烈疼痛,像一场暴风雨,使他周身不时地惊跳、抽搐,两只手抖动不停,不时猛抓胸口。这双过去曾是那么有力地高擎起科学与民主的大旗、揭开全国新文化运动的帷幕、开天辟地举起中国共产党旗帜的大手,如今变得骨瘦如柴,条条青筋裸露,不忍目睹。他的嘴唇已经向里抽缩起来,每次带着很大的痛苦微弱地呼吸一次,就像吞东西一样,一张一合,而且这微弱的呼吸次数越来越少,完全凭着输液维持着那垂死的生命。

包惠僧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淌了下来。

九十七

晚上8时许,陈独秀大脑突然出奇地清醒起来。他虽然嘴不能说话、眼无力睁开,但他清楚地凭声音分辨出谁在屋里走动。死亡的迫近,使病魔缠身的陈独秀对现实中的一切挫折、危机都产生了一种令其心碎的无力感,这个世界已经没有过多的东西可以给他这个受到严重创伤的孤独心灵带来一点精神慰藉。世俗的物质享受对他从来就没有吸引力,对往日辉煌功绩的回味只会增添他的精神失落感。这时候,他反而有一种就要解脱的感觉,浑身出现了少有的舒服,像是腾云驾雾飘上了天空,梦游着他几十年战斗过的地方,嘴角露出一丝微笑。

陈松年在旁边感觉到他的变化,急忙俯在耳边叫道:“爸爸,包叔叔看你来了。”

陈独秀努力想睁开眼,看一眼这位曾经与自己一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但没有做到。这位从未屈服于任何艰难险阻的挑战者,似乎第一次感受到个体力量的渺小,感受到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迎接现实的挑战,一切都已显得那么无可奈何、力不从心。他再一次努力,慢慢睁开了双眼,望着包惠僧,张了张嘴,似乎有话要讲,但什么话也讲不出来,



情急之下，突觉得脸颊一阵发凉，似乎是两行泪水流了出来。

陈松年预感到不妙，一把托起陈独秀的头，扯着嗓门喊道：“爸爸，爸爸，你怎么啦，你快醒醒呀。”

陈独秀再没有醒过来，任凭潘兰珍和陈松年怎么摇晃，他也没有一声应答。邓仲纯拉起他的一条胳膊，任凭怎么搭脉，脉搏已经停止最后的跳动。久治不愈的高血压引起突发性心脏病，使他走完了他那曲曲折折、功过是非皆有的人生旅途。

顿时霹雳一声，潘兰珍心胆俱裂，她失去了患难与共、唯一可依赖的亲人。她搂住陈独秀已经开始发凉的身体，悲痛欲绝，失声痛哭，泪如泉涌，哭得是那样凄凉，哭诉得又是那样悲哀：“老先生，你走了，让我一个人怎么活下去？老先生，你怎么一个人走了，为何不将我一同带走……”

陈松年夫妇、孙女长琦一齐跪倒在地，哭声震天，冲出僻静的山村鹤山坪石墙院，打破了寂静的山村夜晚。在侧的何之瑜、邓仲纯、包惠僧等也不由得悲恸哽咽，叹息不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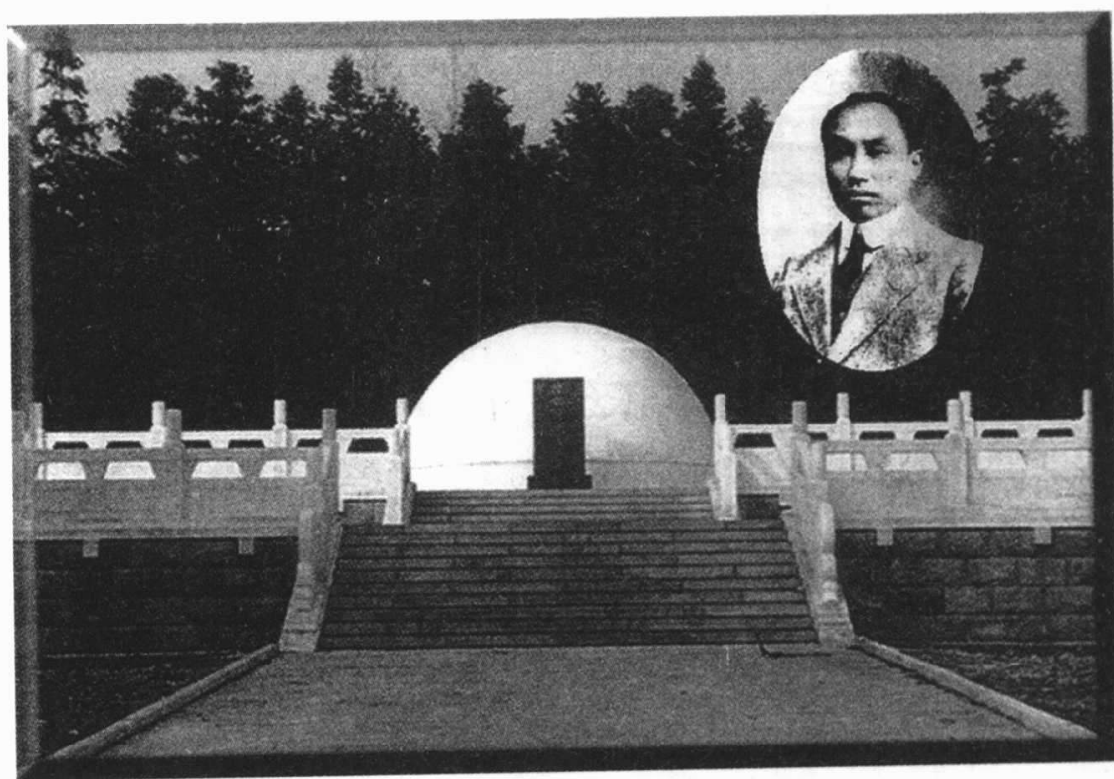
此时，陈独秀两只眼睛还圆圆睁着，似乎还在望着那熟悉的亲人和生前好友，似乎还眷恋着那充满阳光的人世间，似乎心中还有什么未尽事宜需要交代……怎么也不愿闭上眼。

邓仲纯见状，俯下身子，悲酸抽泣道：“仲甫呀，你还有什么不瞑目的？你这一生有光辉之时，英雄过，风光过，已名垂青史，你就把眼睛闭上吧。”说着，用手把陈独秀的眼皮往下抹了抹，直到他那双当年炯炯有神的眼睛完全合上，邓仲纯才松了手。

包惠僧来到书桌前，在油灯下看到陈独秀于5月13日写下的他一生握笔的最后一个字，正好是《小学识字教本》中的“抛”字，不禁一阵酸楚，无限感叹道：“先生呀，先生，你曾经被一代青年尊为思想启蒙的导师，奉为向旧营垒冲锋陷阵的旗帜；你曾经博得万人景仰，拥有煊赫的声名；你曾经领导了一场改变民族历史的新文化运动，创建了一个改变中国命运的政党……但最终在一片谴责声中被历史所抛弃，来到这偏僻的荒山野岭，穷困潦倒，苦度余生。现在你终于抛弃了你的亲人，抛弃了你的一切朋友，抛弃了你的呕心沥血、精心研究的音韵学，抛弃了你追求一生的事业，就这样孤零零、冷清清地离开了人世间。唉，也好，也好，这世界抛弃了你，你也彻底抛弃了人世间的的是是非非，在极乐世界你可以自由自在，也无须烦恼和忧愁了。”

陈独秀死了。生前坎坷，身后寂寞。以他这种高血压慢性病，如果





陈独秀墓

经济条件稍微优越一些,居住环境稍微舒适一点,根本不会这么快就死的,而这些条件他完全可以轻易得到。他可以去当国民党政府的部长,可以去当国民党政府的参议员,可以去大学当教授,可以到美国去著书,还可以到延安去颐养天年,但这一切他都拒绝了。他拒绝了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就拒绝了他,就为了维护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骨气”。

陈独秀死了。他死得太简单,太不轰轰烈烈,死后社会反响竟是那么出奇的冷漠,似乎他真的成了这个世界上一个多余的人,以至若干年后,有人还为之鸣冤不平:“对你的死都绝对地沉默,他们不愿(或不能)论你的功罪,他们不愿(或不敢)辨你的黑白,他们想在沉默中,使人忘却你的一切。”^①

陈独秀死了。没有惊动任何人,所有的人都在照样生活,他的老友静尘大师为此痛惜地说:“陈独秀在10年或20年前,噩耗传来,无疑将引起全中国或甚至全世界的大冲动,可是这个时候,他的死不过像一片小小的瓦片投到大水里,只是水面上略略掀起几圈微波,死非其时,这情景对于一位怪杰的陨落真是最凄惨不过的。”^②

然而,毕竟还有人在沉默中爆发。陈钟凡放声大哭道:“生不遭当世骂,不能开一代风气之先声;死不为天下惜,不足见确尔不拔之坚贞。生死然斯何人,怀宁仲甫先生。先生之学关世运,先生之志济群生,斯世斯民方梦梦,先生肆志其孤行。孤行长住何所图?口可杜,身可诛,穷坚老壮情不渝!”

可这一切,陈独秀都听不见了,对他也无所谓了。他抛弃了这个曾经令他眷恋、热爱、为之奋斗一生的世界,赤条条两袖清风而去。

凄风惨惨的夜晚,一代人杰陈独秀就这样走完了他辉煌而又坎坷的人生旅途,溘然长逝,终年63岁。

这一刻,是公元1942年5月27日21时40分。

(完)

1982年8月初稿于济南

2004年10月定稿于德州



① 高语罕:《入蜀前后》,载《民主与统一》第8期,1946年7月20日。

② 《古今月刊》第5期,1942年7月。



后

记

我读大三时，曾经不知天高地厚地写过两篇历史作品，一篇名为《陈独秀辞职》，探讨的是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应当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一篇名为《陈独秀之死》，揭示的是陈独秀被开除党籍之后凄惨的晚年生活。初稿完成后，一位老师便好心地告诫我，自古隔代修史，尤其不要写像陈独秀这样说不清道不明的人物，以免自讨没趣。一盆冷水当头浇下，两部书稿自此就压了箱子底。



走上工作岗位后，尽管事务繁忙，又远离学术研究这一行当，但心中总觉有一个未了的心愿。事隔16年，我终于还是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翻出已经发黄的书稿，将前一篇作品进一步润色加工，冠名为《迷航》，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并荣获山东省第六届精神文明建设“精品工程”奖。4年之后，又一鼓作气，完成了后一篇《陈独秀之死》的再创作，由青岛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圆了我的梦。

回首20年前，我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冲劲，向一个党史“雷区”发起冲锋，虽几经坎坷，困难重重，却痴情未改，从不言败，我也由昔日一名单纯幼稚的大学生成长为党的领导干部，世界观发生了很大改变，对人生的感悟多了几分厚重和沧桑，手中的笔也变得越发沉甸甸。看今日之书已非昨日之书，想今日之我也非昨日之我，不觉生出无穷的遐想与感慨。

我所写的陈独秀,是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占有特殊历史地位的伟人,也是中共党史上最有争议的人物。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像陈独秀那样翻天覆地、摧枯拉朽地改变20世纪前期的中国历史和中国人的思想观念。他发动了新文化运动,使中国人第一次冲破几千年封建思想的牢笼。他领导了五四爱国运动,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他缔造了中国共产党,并领导了党的早期革命,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奠定了坚实思想和组织基础。但是,他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导致了大革命的失败,从而结束了他辉煌的政治生命。

近半个世纪,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陈独秀的研究领域一直是个“禁区”。这几年,随着各种思想禁锢的解除,关于陈独秀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他的反清活动及建党贡献已经定论,大革命时期的功过是非也日渐明朗。但是,怎样为被开除党籍后的陈独秀画像,仍然是史学工作者讳言的论题。他生命的后15年,政治活动远不及前期的革命生涯来得生动和轰轰烈烈,而单纯枯燥的史料考证又没有什么可读性,再加上“托派”的经历,更为这段历史平添了许多是非,稍微把握不好,就有为其翻案之嫌。所以,迄今为止,很少有人专门研究并评价陈独秀的这段历史。

实际上,陈独秀的晚年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他先是被自己亲手创建的中国共产党所开除,又因为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蹲了5年大牢,后为国共两党所不容。他有着许多荣华富贵的机会,却为了保持气节而宁肯穷困潦倒,最终在贫困孤独中死去。最可悲的是,他固执地反对自己当初为之奋斗的理想,却自以为是在大义凛然地捍卫共产主义的信仰。他就像舍生忘死刺秦王的壮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最终的结果是,他抛弃了这个世界,也为这个世界所抛弃。读他这段历史,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哲学的思考。

本书在创作过程中得到许多师友关心、支持和帮助。我的老领导、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高挺先同志欣然为本书作序,书法家王征远、徐明及同事高吉刚、朱红岩、朱英豪、刘道华、陈鹏为本书的创作和出版提供了诸多帮助,吕明灼教授、范希春研究员对本书做了专家审读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韩英、王云庆提供了许多图片资料,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陈璞平

2004年10月于山东德州

